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

WELTKULTUREN UNTER GLOBALISIERUNGSDRUCK

ERAFAHRUNGEN UND ANTWORTEN AUS DEN KONTINENTEN

[德] 赖纳·特茨拉夫 Rainer Tetzlaff／主编

吴志成 韦 苏 等／译

The intuitive explanation of th
simple. If a dollar is taken away fr
penditures by the amount of his
and, if this dollar is given to a wo
tures by the amount of his margin
quantitative effect on income dep
these marginal propensities diver
statistical models are based show
are, at least, close together. If we
is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o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

——来自各大洲的经验和反应

WELTKULTUREN UNTER GLOBALISIERUNGSDRUCK

ERFAHRUNGEN UND ANTWORTEN AUS DEN KONTINENTEN

[德] 赖纳·特茨拉夫 Rainer Tetzlaff／主编
吴志成 韦 苏 陈宗显／译
吴志成／校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德)特茨拉夫主编;吴志诚,韦苏,陈宗显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俞可平主编)
ISBN 7-210-02442-5

Ⅰ.全… Ⅱ.①特… ②吴…③韦…④陈…
Ⅲ.国际经济关系—经济一体化—影响—研究
Ⅳ.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414 号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
(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
吴志成 韦幼苏 陈宗显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55 千
ISBN 7-210-02442-5/F·358 定价:2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出版者的话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有人认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眼

前。但不可否认，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外，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我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及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我们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因此，我们这套《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便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我们将丛书定位于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是据于以下考虑的：首先所选书目均对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次，它不属于某一专门学科，它具有跨学科性、综合性、开放性，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律等诸多学科；再次，所选著作的作

者在西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西方公认的学术大师。最后，我们注重丛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注重对我国学术界有建设性影响。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毕竟是西方学者，他们的思想无一不打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将西方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的鲜明倾向，从而有将全球化定位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趋势。这套译丛，无论是个案的研究剖析、专题讲座或专题研究，在现象的揭示和学术研究的字里行间，都有其意识形态的清晰印记，文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当代资本主义其形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全球化的经济将给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它将使世界更加地开放，更加一体化，也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在阅读本丛书时就特别需要我们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态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和融入更加丰富多样的全球化政治、文化和生活之中，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也才符合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总　序

这套译丛主要收录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一些深有影响，代表西方学术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关注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名著，除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知识创新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一本著作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假以时日，有足够的时间来验证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严格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这些著作，从

时间上说还不具备称得上名著的资格。所以，本译丛所收录的这些名著，只能说是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且得到多国学者推崇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同仁推荐给我的，它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著作的作者和编者都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其次，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代表了西方主流的观点。这里的所谓主流，指的是这些理论和观点在西方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不论这些作者属于激进的左翼，还是保守的右翼。最后，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观点，都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译丛第一批推出的四本著作。大体上都具备了这些特征。例如，帕特南教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意大利的长期个案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内在原因。此书在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影响极大。吉登斯教授的《失控的世界》，将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告诉人们“全球化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罗西瑙教授主

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奠基之作，开辟了一条分析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的新途径。赖纳教授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深刻地反映了各主要国家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文化回应，是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变迁的基本参考书籍。

作为本译丛的主编，在第一批著作出版之际，容我首先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朱卫东先生。他们本着繁荣学术研究的宗旨，不惜重金购买版权，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发行这套译丛。还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劳动，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各自承担的翻译任务，功不可没。最后，欢迎国内外学界的同行，热忱推荐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俾使译丛能继续下去。

俞可平

2001 年 6 月 13 日

译者的话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如果全球化还只是一个时新的字眼和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的话,那么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谁也不能否认,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不争事实,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世界是全球化世界,21 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人类这一最富挑战性的现象,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有何感想? 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利弊祸福何在? 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的反应如何? 德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堡大学教授赖纳·特茨拉夫博士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来自各大洲的经验和反应》(迪茨出版社 2000 年初版)将有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全球化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如编者所言,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为这样一种观点:作为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影响作用因地方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也应该允许它因区域不同

而引发不同的讨论,而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种现实的发展趋势和环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采取政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将来人类一定能以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调控世界经济,达到比现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目的。

本书包括导论和五个部分。在导论中,编者概要地介绍了"全球化"的不同的含义、全球化批评者和拥护者的代表性观点以及妇女的边缘化、"新贫困"等目前已成为世界政治目标的个别全球问题。本书编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极富讨论和争议的多含义多层次的概念,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世界转型,包括多种相互交织的跨越边界的交流过程,这些过程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政治上也为所有繁荣中心地区所要求。全球化应包括日益增加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借助于新的通讯技术从而变得更加密切的网络化;通过分散不同产地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思想、概念、图像和消费方式及消费品的快速流通;不断增强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意识;跨国机构和全球网络化;政治运动数量的上升及其意义的增强。因此,它涉及到这些过程在纵向和横向即在国家、次国家和跨国家层次上的相互渗透。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全球化主要有4种不同的主题性的意义:首先,只有当事情涉及到需要描述全球范围环境危机的特征时,才可能谈论全球化。环境破坏的作用是全球性的,而且形成危机网链,在世界范围内使危害者和受害者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第二,全球化被理解为西方经济制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与征服。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体制得到传播。同时,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发达经济在工业化国家占优势的世界市场上遭到排挤;第三,全球化意味着工业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扩张所引起的反作用及其不断增强的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力(尤其是新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其后果是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各企业、部门和地区适应

变化的压力;第四,随着经济、通讯和运输体制的全球化,投机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如失业、贫困女性化、刑事犯罪、毒品交易等也随之国际化,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的全球化。在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上,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现实主义三种代表性观点。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新现代化攻势是福还是祸。乐观主义者把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的巨大机会看成是落伍的(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只有顺从适应全球化才能拯救和提高现有的富裕水平,而悲观主义者则抱怨即将出现的由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行为体所造成的民族自治状态、祖国情感、舒适和民族特点的丧失。一些人要求对当地经济作必要的结构调整,以产生或取得竞争力,而另一些人控诉全球化的后果,并且拒绝通过削减福利国家、反调整、灵活变通、私有化、减少社会生产中的国家份额等来向全球化屈服。与此同时,编者还评析了当前全球化讨论中的第三种观点即全球化怀疑派和(可能的)全球化现实主义者对全球化的立场。此外,导论分析了三个文化圈(亚洲、近东和中东地区、非洲)的传统与文化自我理解的意义,并探讨了这些能给国际竞争力"带来"或者争取到哪些内在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并结合与"帝国主义西方"发生的变化多端的争论历史,进行了一些具有区域特征的现实讨论。

在论述各大洲有关全球化的具体经验和反应之前,本书安排了第一部分"全球化的框架条件:人口增长与通讯革命"。

第三世界研究专家曼弗雷德·韦尔克的研究题目是《人口增长和全球化:一个被低估的冲突领域》,文章主要探讨了人口增长对全球化进程所起的影响作用(迁移、政治不稳定、环境危机)。作者指出,人口问题格外具有全球性并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条件,世界人口的日益膨胀不仅在生态学上令人忧虑,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从而对全球化的前景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与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发展中国家爆炸性的人

口发展，一方面将导致国家安全政策重要性，甚至未来国际体系制度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使得穷国向富国移民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此，本文强调下列几点：1)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损害。汹涌的移民潮产生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这实际上涉及到第三世界向北方国家的扩展，由此将出现一个割裂、多元文化的社会，其中民族归属与社会阶层就会相互制约，这样可能会导致极度的紧张与冲突，部分还会引起对外政策的相应变化；2)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较大人口数的少数民族的存在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对其母国的政策，并制约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选择；3)问题与冲突的输入。移民的目的国往往输入来自移民母国的问题与冲突，有时还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恐怖主义。除了对外政策的损害（"排外"），还会对紧张关系和排外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有悖于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4)南北之间的新摩擦；5)爆炸式人口增长将使顺利摆脱不发达的梦想十分渺茫，社会下层的生活条件将更加糟糕；6)人口的增长及对环境的多种破坏造成对地球三方面的滥用，即资源的可支配性、生物界的再生能力和大气的质量。而这些问题和冲突的加剧可能侵害国家结构，导致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权的建立，从而不仅威胁地区稳定，南北关系也会恶化。鉴于全球化讨论忽略人口问题这个对当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曼弗雷德·韦尔克提醒人们，如果全球人口增长依然得不到重视，在判断全球化前景时就会缺乏远见，整个全球化讨论就会陷入僵局。

凯·哈菲兹的论文《传播媒介—通讯—文化：全球化讨论的歧途与前景》描述了全球化通讯网络对正在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同一性作用。电讯领域，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和网络常常被看做是全球化的动力，这种全球通讯业的发展引发了非物质的流动、价值观念的交流变化和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网络化，征服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并且在伊斯兰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调整成就。作者将近东和伊斯兰国家的背景联系作为经验范例，探讨传播媒介和通

讯领域中的几种矛盾的全球化现象，详细分析了在全球化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传播媒介部门，即世界范围内外国(通常是西方)卫星电视和广播节目的接收、卫星节目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媒介市场、全球信息网络化、外国报道，继而利用相互依赖的观点说明了新闻传播媒介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在有关全球化的“框架条件”之后，第二部分是“亚洲：对‘亚洲危机’的反应，印度相互对立的讨论与中国的全球化乐观主义”。编者安排了三篇有关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章：贡特·舒伯特概括了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全球化和亚洲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俞可平和盖尔·奥姆韦德则分别介绍了中国与印度的全球化讨论。

在《亚洲危机是全球化的边缘化吗？区域评价》一文中，贡特·舒伯特概略地描述了自1997年中期亚洲危机爆发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从亚洲地区不同国家精英们的言论、思想和预测中得出的见解。他将亚洲危机三个方面的内因评价区别开来，它们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层面有关——亚洲危机作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或者说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危机)。他认为，总结亚洲危机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混杂多样的印象：因为采取了殖民主义态度，西方应对亚洲危机负责，一部分人由此对西方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抨击；也有人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崩溃和经济衰退的结构和体制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强调主要应该从亚洲自身去寻找原因。为了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亚洲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也要求不再排斥市场调控和“卡西诺资本主义”。尽管亚洲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混乱，但危机给亚洲提供了反思所犯错误、对通往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路线进行必要调整的机会。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产生根本的怀疑。而且，经济全球化被视为国际公平条件下实现富裕与无忧无虑未来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此而言，亚洲危机“仅仅”使人意识到新的无限制自由化市场的破坏性程度，而且给予了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批评者一定的市场。那些从区

域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中认识到经济现代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必要关联的人也大大增加,如果自由民主标准的普遍性能得到理解,他们也拥护“政治”全球化。从观察分析中本文作者最后总结出为将来理解区域全球化得出的结论:1)亚洲经济奇迹被西方视为竞争资本主义征兆下全球化胜利进行的表现。多数亚洲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也有人反对“政治”和“文化”全球化,“亚洲价值观”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和道德权威失效;2)随着东亚危机的发生,对西方的愤怒也骤增。事实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了过度的危机管理,在确定一个国家的紧缩政策时,这种危机管理反而激化了形势,必须立即予以调整,这就导致了政治与经济上更强硬的“亚洲化”;3)亚洲政治具有多样化;4)典型“矿工资本主义”的危害在本区域被持续的经济成功所掩盖着;5)社会资源分配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可能会扩大结构的不平等,加剧社会的堕落,甚至会危及体制。作者进而指出,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亚洲表现出继续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征兆,但亚洲危机仍然是全球化的边缘化。作为必然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所显示的“亚洲特色”也许将比世界社会预言家们迄今能想像的还要多。

在《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中,俞可平,这位被赖纳·特茨拉夫教授称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几本有关全球化的论著,并且有资格成为中国前景讨论中整体上持最乐观态度的杰出专家”,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评析了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讨论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1)全球化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2)全球化的类型;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4)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利弊福祸分析。

作者认为,全球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参与这场全球化讨论的学者分别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因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角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概括起来,大体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其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作者指出,这些界定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相关大讨论相比,中国的这场全球化讨论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一是它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二是它正在逐渐超越简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关于全球化的类型,文章介绍说,全球化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一体化之上,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

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就此有的学者还特别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模式,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交往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法律的全球化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法学家的议事日程。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树立全球的法律意识,把解决全球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淡化国家意识,倡导立法的非国家化。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中国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

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全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提供了许多良好契机。它有利于吸收外国资本,有利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有利于本国产品走向世界,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等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明显不利的因素。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消极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外商的控股和技术垄断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构成威胁,外债超过一定限度时会潜藏很大的风险,外贸和资本对外依存度的增大可能削弱防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规模开放金融市场则可能极大地增加金融风险等;第二,削弱国家的主权。参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遵守业已存在的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而这些国际性

的契约大多数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标准制定的,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发展中国家有时不得不对某些管理权限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主权。

在许多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盖尔·奥姆韦德的文章《印度的全球化讨论》详细地描述了印度生动热烈的全球化讨论。1991年,随着纳西蒙哈·拉奥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全球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方面在印度逐渐引人注目,由此开始了印度有关全球化的公开讨论。盖尔·奥姆韦德有意识地研究了那些重要的观点。他指出,尽管最常用的全球化定义是"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商品、思想、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也尽管人们认为全球化实际上由技术控制,但这一涵义至少在使用这个概念的多数知识分子中变得越来越消极。全球化被认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霸权的追求。这种悲观的全球化观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化被看成是在外部强迫,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被认为是国际帝国主义代表的压力下所为。从这一点看,全球化代表了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为此,人们发出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号召;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使用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依赖理论的经济分析概念来解释全球化的影响。根据这一点,全球化从经济上导致了印度经济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严重依附;导致了多数贫困化、物价

上涨、不稳定和印度资本主义自身的削弱；多数人口的边缘化也大大地增加。全球化意味着“掠夺”或“卡西诺赌场式的资本主义”；第三，全球化的政治实质在于民族国家的衰退。全球化的左派反对者比印度民族主义者更加强调应该保护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正是这些人士最强烈地反对削弱国家在价格、关税制定等方面的作用；第四，部分全球化的重要批评者强调环境影响，他们把环境影响看做是“北方对南方生物和其他资源的持续掠夺”；最后，全球化的文化方面受重视。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商业化、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从各个方面看，印度民族主义者把这种文化的挑战看成是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全球化是对印度的传教进攻、信息进攻和文化进攻”。印度全球化的反对者包括国大党内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士、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左右派共产党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同盟家族”，他们在有关全球化的问题上有着令人惊奇的接近。随后，盖尔·奥姆韦德具体阐述了印度工业界的反应、商人的态度、农民组织的作用、首陀罗的观点以及印度科学家对全球化的乐观表现，这些印度的全球化乐观主义者对上述所有观点都持反对态度。超然于悲观和乐观两种观点之外，印度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则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们强调趋全球化之利、避全球化之害的政策。

多少年来，非洲这个几乎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所重视的大陆一直为贫穷落后和冲突战乱所困扰，在全球化大潮中，非洲更是面临特殊的挑战。第三部分“非洲：处于世界经济和政治边缘化与开发内部发展潜力的希望之间”让我们从中分享到非洲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它包括两篇关于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文化——经济区的文章。其中一篇出自“非洲领导人论坛”秘书长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之手，另外一篇由罗伯特·卡佩尔撰写。

罗伯特·卡佩尔的文章《全球化过程中非洲的发展潜力》从世界经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非洲有关这一题目的相关文献资料，得出了非洲竞争力前景暗淡的结论。这篇论文突出强调，全球化过程只是边际性地有助于改善非洲的经济前景。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巨大经济转型表明，非洲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货币经济已经来临，自给自足的社会已不复存在，社会结构比任何时候显得更加濒于崩溃。面对这种几十年以来已经呈现的发展情况，在全球化过程中，非洲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克服是否将出现较好的前景？为了生存和发展，非洲是否将形成某些内部潜力？究竟有哪些行为体，社会的根本变化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哪些社会冲突中形成？为了能够长期地克服非洲的危机，从根本上人们应该从何处着手？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罗伯特·卡佩尔首先研究了那些与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后果有联系的最主要的方面，即世界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通讯和运输。正是由于非洲的现实困境和在这些方面的不利条件，使得非洲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化之中，甚至有被排除在世界之外的危险。接着探讨了哪些社会行为体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哪些很少或根本不能受益的问题。对非洲来说，全球化过程意味着一次巨大的挑战，但由于结构方面的危机征兆，非洲几乎不能对付这种调整压力，在此情况下，五个基本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薄弱的工业基础、大多数非洲国家突出的债务问题、低生产率、职业和技术能力以及人力资源极其低下的水平、人才流失与资本外逃等。这些因素表明了非洲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能消除这些问题，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不会持久。关于非洲国家竞争的弱点问题，如下四种主要解释被认为对目前非洲的发展危机负有责任：政治上不稳定、腐化堕落和暴力在非洲广泛地扩散；内部的不灵活性；外部的冲击，饥荒和不利的气候条件；社会福利导向与国家的拒绝。最后，文章总结认为，非洲深入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既没有给非洲带来“现代精神”，又没有为

非洲开辟稳定的社会和地方发展前景，在全球化进程中，非洲的发展特色在于深入的边缘化；由于结构因素、外来冲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违规行为，目前非洲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几乎不能灵活地做出反应并且适应这种转变，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措施至今只能够对少数国家产生推动作用。总体上，非洲未来的前景仍不令人乐观。

《非洲与全球化过程》进一步研究了非洲的全球化状况。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认为，由于代际差异、意识形态和自身理解不同等因素的影响，非洲人对全球化的内心感觉也因人而异。多数年长者控诉了全球化在非洲造成的种种后果，全球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丑恶新面目遭到了否定。而年轻一代非洲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深信，全球化将改变在这个大陆沿袭至今的工作方式，全球化也许就是通向机遇无限的新天地的大门，并藉此使非洲从过去跃向未来。非洲大陆令人沮丧的基础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战乱、极为沉重的债务负担、政府机构及其存在的合法性似乎都得不到信任，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非洲要想获得国际经济竞争力，无异于在根本不具备现代化便利条件下进行大卫对歌利亚的战斗，也就是说，需要排除万难的勇气与智慧。非洲，作为一个面对外界因素和内部冲突依然脆弱的大陆，已经毫无准备地卷入了全球化过程，而且由于自己制度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缺乏，大多数非洲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虚弱不堪，这些政府没有能力使本国以适当的形式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也无法从全球化中获益或跟上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全球化过程给非洲带来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权威和权威主义传统模式的瓦解，出现了新的领导形式和水平。因而，在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全球化促进了非洲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民主的主要内容被理解为允许多党的存在和举行选举。在对非洲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时，作者强调，要实现与工业和经济增长中心接轨，非洲就必须自行采取一系列措施：非洲的学术机构应高度重视能力的

积累，大力增加对学术机构的投资，以创造限制人才外流的条件；市民社会要使政治领导们感觉到他们的压力；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审议和批准国际条约；吸纳私有经济，允许私有经济领域在非洲发挥作用；非洲国家必须努力使国民经济发展以增长为取向，鼓励国内储蓄，为国内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开放的环境；完善吸引外资的条件，鉴别和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实行优良的管理；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市场经济等等。

与亚洲和非洲一样，拉丁美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大陆，其全球化进程和状况同样复杂多样。本书第四部分"拉丁美洲：受制约的现代化、区域化、民主化与尚未解决的社会排外问题"的三篇文章向我们详尽地研究了全球化时代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经济变革、区域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相关情景。

首先，克劳斯·埃塞尔在《受制约的拉丁美洲现代化》中重点阐述了拉丁美洲"受制约的现代化"的内在原因。他描述说，在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拉丁美洲国家停滞不前，其技术—工业和社会落后状况正在加重，究其现代化发展受阻的原因，具体表现在：1)伊比利亚人的后裔，现代化活力低的社会来源，政治、制度、组织与工艺的现代化水平低下，强大的外来专业化压力以及本土现代化计划的影响；2)拉丁美洲社会的经济与权力结构以及思想与行为模式处于异乎寻常的稳定，尽管社会曾出现过三次历史契机，但没有导致延续性的断裂，这种基本稳定的存在证明是增长、差异化、复杂性和学习的障碍；3)市场机制由于内部市场的封闭而得不到发育；4)收入集中与贫困化进一步加剧；5)过度的异质性：分化的经济与社会，缺失的国家一体化，正是国家匀质化趋势微弱和国内需求狭小这两个因素抑制了工业化发展；6)反资本主义成就动机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模式；7)没有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完善的游戏规则、低要求的企业、得不到发展的技术文化等等。虽然内源性障碍导致了制约现代化的连续性的强大趋势，但是拉丁美洲还

表明，现代化道路不可规避。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所以这些国家必须辨清方向，通过全球范围的学习获得技术工业活力，自我探索并付诸实施符合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扫除障碍，创造特有的、适合本国情况又能应付各自外来挑战的模式。

随后，在两篇极具现实研究价值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拉丁美洲：经济变革与区域化》和《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发展：尽管存在社会抵制，但民主政治依然稳固吗?》中，德特勒夫·诺尔特首先对拉丁美洲全球化过程的各个方面做了粗略概览，然后介绍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讨论的基本方针与立场，并简要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从不同侧面重点探讨了拉丁美洲全球化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在拉丁美洲的表现及其引起的反应、全球化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等问题，接着阐明，作为后果与反应，全球化过程怎样有利于促进拉丁美洲和整个美洲大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不断加强的一体化。文章认为，在拉丁美洲，全球化(首先是经济意义的)、区域化和民主化彼此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全球化对区域合作和巩固民主发挥既有促进又有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民主化和世界市场--体化过程齐头并进，民主制度推动彼此间扩大贸易往来，间接地有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而且大量的事例说明了民主化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对消除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促进作用。在区域或次区域的一体化框架内，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比其他发展中地区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该地区各种政府间组织相互交织并彼此结成网络，经济一体化联合直接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考验，发展走势良好，民主政治日益扎根于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因此，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在大多数国家中获得了高度的合法性。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拉丁美洲民主政治面临的社会挑战、社会不平等对民

主政治成就的危害、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犯罪率的攀升等等。

在总结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文章后,本书结尾部分“结论:通过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提高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预见性”得出若干结论,并且就经济全球主义论题提出了重要的发展策略方面的思考和政治调控能力以供讨论。赖纳·特茨拉夫得出的结论表明:全球化原本被视为“西方”现象的代表,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世界秩序”有着历史联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和评价存在着差别;文化的全球化歪曲和贬低了地方和国家的活动范围,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新的现实和可能的经验领域;同类性的“全球村”没有出现,相反,一系列全球性城市正在形成之中;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教育和权力精英们以及非民主制国家中原则上的反对派集团都期待着从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中谋求自身物质和非物质的好处;在抵御经历痛苦的全球化风险时,第三世界地区都有国际合作的愿望;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全球化的悖论,政府对此的反应往往无能为力;各国政府都面临全球化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要发展各自产地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太远离社会公平的理想,否则统治地位面临威胁。这些建议、理念和改革设想明确提出,在全球政治领域,不仅急需采取行动,实行全球管理,而且政治家们必须坚决果断地采纳已经制定好的纲领和方法。

吴志成

作者前言

东西方冲突消失后,“第三世界”的人们对由含义模糊且令人不安的“全球化”一词来界定的新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或者失序究竟有何感想?是对具有威胁性的市场极权主义的恐惧居多,还是借助于新的全球通讯交往途径而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抱的希望占优?相关国家从“亚洲危机”和结构调整计划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社会后果中得出了哪些结论?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是一个尝试,它让人们能听一听在一次关于全球化的世界学术会议上来自第三世界各国就这一主题所阐述的观点,以便了解各种特殊的世界观,并对夺回政策制定权限变得更为敏感。其出发点为这样一种观点:作为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影响作用因地方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也应该允许它因区域不同而引发不同的讨论,而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种现实的发展趋势和氛围有助于认识和理解采取政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将来一定能

以集中统一的行动来调控世界经济，达到比现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目的。本书也可以看做是为纪念发展与和平基金会成立10周年于1996年在波恩举行的讨论的继续，这次讨论会以德国科学家和政治家为一方，以来自非洲、近东和亚洲的代表们为另一方，它所达成的认识可以用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的话来概括："以往的生活责任使我们能够重新限制我们那种以他人为代价来满足自己无节制的财富和权利欲望的膨胀，并且不利用国家集体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在导论这一章中，编者概要地介绍了"全球化"的不同含义、全球化批评者和拥护者的代表性观点以及目前已成为世界政治目标的个别全球问题。此外，导论还分析了三个文化圈（亚洲、近东和中东地区、非洲）的传统与文化自我理解的意义，并探讨了这些能给国际竞争力"带来"或者争取到那些内在的前提条件的这一问题。同时，结合与"帝国主义西方"发生的变化多端的争论的历史，还进行了一些具有区域特征的现实讨论。亚洲和伊斯兰文化精英们对普遍行为准则的趋同接近被解释为被迫适应时代潮流。

第三世界研究专家曼弗雷德·韦尔克的研究题目是人口增长对全球化进程所起的影响作用（迁移、政治不稳定、环境危机）。除了东方问题专家凯·哈菲兹关于全球化通讯网络对正在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同一性作用的文章之外，这是惟一一篇没有划归某一特定区域的论文。第三世界"过剩人口"向世界各地的迁移使人口统计的范围成了一个普遍的课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现代传播媒体。这种传播媒体征服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并且以这种方式——正如凯·哈菲兹所强调的那样——在伊斯兰社会也取得了巨大的调整成就。

在关于全球化的"框架条件"（人口增长与全球媒体）两章之后，安排了三篇有关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章。德国的中国问题

专家G. 舒伯特概括了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全球化和亚洲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另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叙述了这些地方关于最近时期西方扩张影响的讨论。俞可平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几本有关全球化的著作,并且有资格成为中国前景讨论中整体上持最乐观态度的杰出专家。印度的盖尔·奥姆韦德将印度生动热烈的讨论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这一讨论中,全球化怀疑派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把“乡村前景”和“第四世界”的范围(首陀罗的观点)引入到讨论之中,并且使传播广泛的关于不惜一切(文化的)代价利用全球化有利条件的论点具有相对性。

随后是两篇关于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文化——经济区的文章,该地区迄今从全球化机会中获利最少。其中一篇出自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领导人论坛”秘书长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之手,他在非洲就全球化这一题目举办过多次专题研讨会。他在随笔里流露出非洲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重新优势所表现出的典型的矛盾心态。另外一篇文章由莱比锡的非洲问题专家罗伯特·卡佩尔撰写,他从世界经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关于非洲这一题目的相关文献资料,得出了非洲竞争力前景暗淡的结论。

两位来自柏林(克劳斯·埃塞尔)和汉堡(德特勒夫·诺尔特)的德国拉丁美洲专家承担了第四部分的写作任务。他们详细研究了拉丁美洲业务和政治精英们的旧日恶习与新近美德。在这里,埃塞尔在具体的教科书中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受制约的现代化”的内在原因,而诺尔特在两篇极具现实研究价值的文章中探讨了全球化对区域合作和巩固民主机会的既有促进又有冲击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拉美政治晴雨表的资料数据,拉丁美洲世界观在诺尔特的分析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本书最后从关于文化圈的文章中得出几点结论,并且就经济全球主义论题提出了重要的发展策略方面的思考和政治调控能力以供讨论。

我应该感谢那些为发展与和平基金会这一并不简单的研究项目的完成提供建议与帮助的人们。基金会的布尔克哈特·柯尼策尔、托比亚斯·德比尔和米歇尔·罗特写来充满鼓励的信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德国之声”的同事海因里希·贝克施特雷塞尔帮助我与非洲领导人论坛建立了联系；艾伯特基金会新德里办事处的贝蒂娜·路易丝·吕鲁普使我与印度的女研究人员和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海德堡新教研究协会的贡特·舒伯特负责协助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化问题的专家建立电子邮件联络。我要特别感谢沙利尼·兰德里亚，虽然她自己正在柏林和印度紧张地从事大学教授执教资格工作，但她仍然向我解释印度有关赞成和反对全球化的复杂的讨论。我也能够与汉堡东方研究所所长乌多·斯泰因巴赫就伊朗总统哈塔米这位民主与人权领域多种发展趋势的重要证人交换意见。汉堡政治学研究所的两位大学生同事库尔特·希尔施勒和施特芬·鲍尔帮助我设法获取各种资料，而德特勒夫·诺尔特经常向我提供图书市场上关于全球化题目的最新出版物。库尔特·博德默尔、沃尔夫冈·马切斯基和马戈·许勒尔的讨论文章大大丰富了由约阿希姆·贝茨和沃尔夫冈·海因领导的汉堡德国海外研究所全球化问题课题组进行的讨论，而且向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托马斯·西博尔德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他翻译了几篇英文论文，对所有的文章进行了编辑处理(有时也加以删减)，并且帮助我完成了最后定稿。在此我要向他表示特别的谢忱。

赖纳·特茨拉夫
1999年10月于汉堡

作者简介

赖纳·特茨拉夫，1940年生于巴特萨尔茨布鲁恩，在波恩和西柏林学习政治学、历史和日耳曼学，获博士学位，1977年以来，在汉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任教授。他是汉堡和平研究和安全政策研究所与海德堡新教研究职位以及汉堡非洲学研究所的董事。特茨拉夫著有许多有关非洲政治和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与第三世界民主化前景的论著。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第一辑

《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 罗伯特D·帕特南

《没有政府的治理》
[美] 詹姆斯N·罗西瑙

《失控的世界》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当代西方学界主流权威力作
公共管理硕士（MPA）必读名篇经典



本丛书收录20世纪末期以来当代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文章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均代表西方主流观点，它们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值得有志于学术创新的学者和关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读者认真一读，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采取对应之策。

丛书策划　许志锐 林学勤
丛书主编　俞可平

目　　录

第一部分 全球化的框架条件:人口增长与通讯革命

第二部分　亚洲:对"亚洲危机"的反应,印度相互对立的讨论与中国的全球化乐观主义

第三部分　非洲:处于世界经济和政治边缘化与开发内部发展潜力的希望之间

导论

全球化——“第三世界”——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没有人能抵制全球化;在基础设施领域,全球化是这样一类战争:杀人或者被杀。”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发展部部长哈哈拉普先生1994年9月。(引自:彼得雷拉,1997, 285)

“全球化”——一种多含义多层次的概念

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几年来“全球化”成了一个极富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它已发展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带来

了不安宁，而且必定成为专业讨论中对立面的佐证。这是市场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分离化和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同样也造成混乱，引起不安。首先，它体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的含糊不清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从民族安全国家向国际竞争国家转化的过程，至少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是如此。对此，经济或者说开放的国民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似乎赢得了胜利，而主张市场政治调整的左派立场（凯恩斯主义）则被迫转为守势。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过程，而政府却阻止实行违反市场理性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联盟由此提出了工资纪律和社会国家退却的要求，以保证产地竞争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地欺骗”和“全球化陷阱”的批评者从中预料到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克赖勒，1999，605）

更狭义的全球化在大约30年前即当第一个全球性通讯联络系统建立时就开始了。这一系统创立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如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24时制全球信贷市场……假如可以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西方控制了整个全球化过程的话，那么现阶段则没有人再能控制。”（吉登斯，1999.3）随着“亚洲危机”的爆发，情况可能有所改变，因为在此期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如政治上失控的市场引起的混乱更多，带来的福音则少。至少在是世界银行，作为市场矫正行为的政治上负责的交易又重新受到欢迎，真是令人惊讶。[①]以科学为基础的“认识和思维模式变化是多么快！”

本文要说明的是争论激烈的全球化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而

---

① 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1999年5月从亚洲危机中得出了引人注目的结论，并且为“后华盛顿共识”辩护：“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体制——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和维护它，就很难有效地调动储蓄收入，利用资本。如果经济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优势就消失在‘寻租’中，而且也不能朝着创造财富的方向发展。”（斯蒂格利兹，1999，30——外文引文已被译成德语）

且以非欧洲文化的思想和经验领域为中心。因此，全球化在重要的概念和内容方面必须清楚明了，这对于不同区域理解全球化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将第三世界以前的四个政治地理大区域理解为简称的“世界文化”或“文化圈”（不包括“第二世界”），这些区域以特定的政治主张联合成区域组织。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忧虑和发展任务，并且在文化方面截然不同。通过它们在世界交往中各不相同的立场来展示他们共同的特征。西方以它对其存在大约1500年之久的文化的强大影响而明显区别于所有其他的文化圈。它推动了现代化、工业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并且使其成为“世界大事”，从中没有一个社会能逃脱没落的惩罚。

但是，伊斯兰以其具体而又颇具威胁性的新形态的重新强大，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拉美文化圈国家（智利、巴西、墨西哥）的勃勃生机充分表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机会是绝对难以阻止和掩盖的。对此，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推测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并非现实的可能。（米勒，1998；森格哈斯，1998）因为要更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渗透作用不难使他认识到，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全球共同问题所产生的更多的是共性，而不是实质性的差别。那些认为像“西方”一样“成熟”的区域文化正面临着衰败，而且超过了无所不包的世界意义的“黄金时代”，甚至也已经不再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等等看法（亨廷顿，1997，499）都属于文化历史思维方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法不能适应面向21世纪的当代潮流。那么又有谁能够说出“西方”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现在“第三世界”不也在越来越多地大谈特谈第一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集团的“全球城市”而闭口不谈“第二世界”吗？

也许普遍认同的是，“全球化”描述了民族国家边界消失和超越边界的（新）相互联合的过程，它的结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也不完全相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致可以分为至少四个

具有不同发展前景的地区。这里的地区不是指原始的地理界限，而是指在适应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问题上采取不同行为的一种社会类型：

●军事相当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地区(西欧，北美)，“民主和平”的区域；

●迅速变化、解体和无政府状态地区(撒哈拉以南和伊斯兰文化圈的部分非洲地区，前苏联周边地区，哥伦比亚、秘鲁的不安定省份等)；

●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以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转型国家)；

●转型社会：社会内部的民族化和国家的构成完全处于进行和变革之中的国家(高加索共和国及其他相关地区)以及不安定但在继续现代化的全球化漩涡中连续开放也必须开放的国家(伊朗、北非、近东和中东)。

一直在反复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化究竟有何新奇独特之处，以至于引起对共同前途如此的担忧、希望和推测？欧洲的海外扩张和前现代社会的“渗透”——就如同殖民主义的老话所言——难道不是一种过时的统治方式？或者是，过去殖民化世界的人们早就开始感受到自己是全球化世界秩序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尽力共同塑造它。我们试图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历史性的世界转型：作为边界消失、网络化和现代化的全球化

大卫·赫尔德领导的伦敦研究小组的全球化概念广为流传：

“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网络和社会关系系统在空间上不断扩展，人的行为方式、积极性以及社会力量的

作用表现出洲际(或区域之间)的特点。"(佩拉汤等, 1998, 136)

全球化包括多种相互交织的跨越边界的交流过程,这些过程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政治上也为所有繁荣中心地区所要求。此外,如下内容也属于全球化含义:

"日益增加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借助于新的通讯技术从而变得更加密切的网络化;通过分散不同产地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思想、概念、图像和消费方式及消费品的快速流通;不断增强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意识;跨国机构和全球网络化;政治运动数量的上升及其意义的增强。因此,它涉及到这些过程在纵向和横向即在国家、次国家和跨国家层级上的相互渗透。"(伦德林,1998, 16)。

在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迪南德·布兰德尔、莱因霍尔德·本迪克斯、福尔克尔·博恩希尔、哈特穆特·埃尔森汉斯和迪特尔·森格哈斯等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思想传统中,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逊(全球化概念的普及推广者)把全球化定义为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本来起源于欧洲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以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危机为始端。同时他将这种构想的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起始点与全球化区别开来。经验论分析家们借此进行认识并对全球化加以诠释。同时,它们也体现了数百年来全球化过程得以进行的形式(罗伯逊,1992, 27):

- 民族统一社会(民族国家)
- 社会国际体系(世界体系)
- 个体(具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 人类概念(世界)

一方面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消除世界与空间限制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密集化和网络化的过程。国际贸易已存在几个世纪,但新的国际贸易呈现出批量化、网络密集化和多元化,而且由新的具有机动反应能力和灵活性的经济行为体即所谓

全球角色来进行。最重要的资源是有关复杂关系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网络化运行体制,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不仅在机构程序方面,而且在物质上从社会政策直至安全政策各方面都全面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舒曼,1999, 73)

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当中,全球化有如下4种不同的主题性的意义:

首先,只有当事情涉及到需要描述全球范围的环境危机的特征时,才可能谈论全球化。"环境破坏既不受空间限制,时间上也不可转换,既无等级也与产生地无关。它们的作用是全球性的,而且形成危机网链,在世界范围内使危害者和受害者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亨斯巴赫,1997, 4)

第二,全球化被理解为西方的经济制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与征服。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化)和民主形态(民主化)体制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发达经济在工业化国家占优势的世界市场上遭到排挤。

第三,全球化意味着工业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扩张所引起的反作用及其不断增强的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力(尤其是新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其后果是加剧了工业化国家的各企业、部门和地区适应变化的压力,比如在德国、法国就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化恐慌。这里常常被人遗忘的是,(西方的)"积极的全球化"先于(在西方的)"消极的全球化"发生。全球趋势预测2005项目是可以理解的,即随着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大,"反全球主义"的反应也将增加。文化的多元主义、宗教的分离主义、种族部落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以地方、部落或民族形式增加的寻求同一性"的表现方式。

第四,随着经济、通讯和运输体制的全球化,投机资本主义的畸型发展如失业、贫困女性化、刑事犯罪、毒品交易等也随之国际化,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犯罪的全球化。像适用于被盗的汽车、贵

重珠宝首饰或非法获得的金钱一样,全球交通运输网络也适合于毒品和武器的运输,因而经济犯罪和传统犯罪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分清。近几年投入和洗出的黑钱爆炸性的猛增,据估计,每年非法洗钱数量高达5000亿美元之多。(肯德尔,1999, 6)

我们还可以区分出全球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不过在此不再进行详细论述。但是,“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重要区别则不可回避。(阿特法特/曼科普夫,1996)乌尔里希·贝克将“全球主义”理解为“世界市场排斥或者替代政治交易,即统治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单因果和经济主义方式行事,并将全球化的多个层面简单化为一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即便经济方面也还只作了线性思考,而把所有其他方面如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如果确切如此的话,只置于世界市场体制中的从属地位。”(贝克,1997, 27) 全球化在此不是被理解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专门经济负担造成的结果,即便政治对它也完全束手无策。尽管有足够的论据证明,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控制能力之间继续存在着剪刀差,但是我们仍然期待着全球化状态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推动力。

世界范围内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全球化大讨论:代表性观点

几年来在现代社会各区域都存在着全球化的争论,其起因是世界经济中突然发生的、难以理解的变化。历史进步就是在推动中辩证地跳跃前进,但绝不是平坦和均衡的,以至于它总是伴随着怀疑和牺牲,假如像“全球趋势——2005项目”的预言符合实际的话,即“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所有机构包括我们的学校、工作岗位、信念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社会性大转型”。(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1997, 1 和 14)那么可以理解的是,1998/1999 亚洲政治和金融危机这场闹剧必定会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现象的征兆——战争门槛下的激烈变革可能将成为 21 世纪的正常状态。

全球化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所争论的是新现代化攻势是福还是祸。有一些人——我们称之为乐观主义者——他们即使不承认,也还是把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的巨大机会看成是落伍的(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而另一些人——悲观主义者——尤其抱怨即将出现的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行为体所造成的民族自治状态、祖国情感、舒适和民族特点的丧失。一些人要求对当地经济作必要的结构调整,以产生或取得竞争力,而另一些却抱怨全球化的后果,并且拒绝通过削减福利国家、反调整、灵活变通、私有化、减少社会生产中的国家份额等来向全球化屈服。首先提到的那种观点的依据是,人们认为只有顺从适应全球化才能拯救和提高现有的富裕水平,而后者则想通过坚决抵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巴西总统昂里科·卡多佐堪称全球化乐观主义者的典型之一。

“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正是这种认识使我们发展中国家陷入必须依靠政治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处境。然而,这些用来调节全球化过程的政治措施,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也各不相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经济全球化已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的措施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应该完全现实地接受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政治上无所作为,反而为我们走上国际舞台提供了崭新的前景。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区别,南方绝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全球化,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彼此利用国际投资和贸易潮流的不同程度。”(卡多佐,1998, 10~11)

在此,我们将全球化忧虑的一个本质方面描述为:处于发展中和贫困化地区的南方正在走向衰落瓦解(南方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整体),由此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种族隔离。

另外在欧洲,《经济的恐怖》一书作者维维亚娜·福雷捷,正在

出版书名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布尔迪厄,1998, 47)和在肆无忌惮的全球化攻势背景下不得不发出“自由贸易的致命病毒”警告的霍斯特·阿夫黑尔德(阿夫黑尔德,1994)等人都属于全球化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忧虑都集中在老工业化国家劳动人口的社会排外主义这一点上,因为对劳动社会来说,作为加剧的国际竞争的后果,(有酬)劳动已经宣告结束。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基本问题:如何安置想要工作,但在全球化了的世界上又找不到合适工作岗位的庞大的劳动大军?

自从18、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社会进步已经与有偿劳动和劳动分工结合在一起。在现代劳动分工的经济社会里,这被称为支付报酬的劳动,因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是国家合法要求的基础,它也是个人引以为傲并获得社会承认的基础。本世纪末,劳动已成为社会分裂瓦解的因素之一。

“现在,进步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劳动分工不再相互合作,空洞的创新概念代替了进步。……尽管进步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它还是承诺共同的富裕和发展。相反,创新则主要地被看作是经过进化的更新。它总是不断要求人们摆脱社会结构中通过技术可以替代的多余的部分。”(科赫,1998, 385)

民主社会的社会凝聚力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随着被裁减劳动人员的增加,社会正处在衰退中。在国家中这会使越来越少的公民对民族、对公共的民主承担义务。伴随着由劳动造成的分裂,政治堕落将不断增加”。(科赫,1998, 385)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和批评全球化的《里斯本小组》主席里卡尔多·彼得雷拉对全球行为体的无止境的竞争发出了警告。他看到“受全球性社会种族隔离”影响过的世界像破晓的黎明般近在眼前。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失去与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广泛而且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不是参

与使新的“全球世界”得以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相互结合和一体化，而是在相反方向越走越远。分裂情况发生在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亚洲(东南亚几个国家例外)、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和东欧。……而且分裂情况也发生在洛杉矶、伦敦、东京的内部，它不是贫穷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过程。(彼得雷拉，1997，297)

在现代世界本无居所的“全球城市”里是那些全球行为体，即跨国公司及它们在各地的子公司、国际组织以及那些全球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在拍板定调。它们虽然无处不在又无处为家，然而又总是频频成为各种事件的焦点。全球城市也是全球化的原本的实施地点：在当地特定的环境里，全球性事物可以被感受到：大约在交易所、时装店、在艺术宫殿里，尤其是在全球性公司那里。为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不同出身来历的人有时必须学会共同相处生活。由此创造出新的认同性来作为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扎森，1998，XXXII)

除了全球化乐观主义者和全球化悲观主义者之外，在当前的全球化讨论中还有第三种观点应该受到重视，那就是全球化的怀疑派和(可能的)全球化现实主义者。这里可用匈牙利的投机商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的论点作为典型来加以说明。乔治·索罗斯看到了全球引发的资本主义的作用方式，垄断和卖方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会破坏所有已经发展的社会平衡状态。不久前，他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一个“庞大的循环系统”作了比较，这个循环系统将以它现有的形式给第三世界带来巨大弱势和风险。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系统，“它先将资本吸引到中心，然后把它投资到边缘地区。这个系统的阀门是那些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个阀门总是向全球化金融市场的扩张敞开的，而一旦资金外流变为输入时，阀门就成为障碍，并且(在边缘地区)导致系统崩溃。”(索罗斯，1998，168) 因此，索罗斯不是用基本的内部原因来解释目前

的亚洲危机(“矿工资本主义”、腐败等)，而是把它看成是“国际金融系统自身病态”的结果。“危机不只是局限在亚洲，也涉及俄国、南非和巴西，并且有力量影响所有欣欣向荣的市场，只有这种设想论证了：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来自国际金融体系自身内部。”但是，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像经济学理论通常所写的那样：“它不能像一个钟摆在经过强烈摆动之后依旧能回到它的平衡点上，而是“更像一个拆除机的大重锤，从一个国家挥舞到另一个国家，最终瓦解最弱小的市场。”(索罗斯，1998，113)

第三世界的讨论：边缘化的妇女，“新贫困”和全球化的社会代价

如果人类社会的社会分裂和排外不断加剧的话，指日可待的便是受害者的自我反省，这也是对自身认同的自我保护。这一情况大多是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有意识的反应。这种全球化被非欧洲社会的知名人士认为是世俗主义、西方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对自身“神圣”传统的攻击。在一些国家里，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影响通过各种对立和矛盾批判性地反映出来。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连同与处境相关的基础知识在内的知识贮存(特别在妇女身上)遭到了破坏，也失去了价值，(迪特里希，1996，343ff)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却又削弱了家族式歧视的统治地位(等级制度、童婚、否定妇女财产所有权)：现代发展的力量——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学校——为妇女开拓了新的发展机会，不过这又成为全社会高昂的代价：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获益者和无教养的妇女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生产环境的受害者中，妇女运动进一步分裂。(班纳吉，1996，

143)全球化还加剧了"生活性生产"和"赢利性生产"之间的矛盾[1]。这是一个在边缘化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的社会里无法消除的矛盾。

第四世界究竟如何将全球化理解为西方社会不公正世界经济秩序的强制推行,这可以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第三世界网络台台长马丁·科尔的阐述为例。他把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为"全球化的消极接受者",它们毫无保护地听任边缘化命运的摆布。随着"布雷顿森林"机构方面解释权的难以置信的增强,国家的主权逐渐丧失。因此,在"南方的观点"看来,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得失分配不平的极为不平等的过程出现的。这种不平衡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即少数国家和集团从中获利,而多数国家和社会集团蒙受损失或被挤到了边缘。所以,全球化、两极分化、财富集中化和边缘化彼此联系在同一个过程中"。(科尔,1998,5)科尔认为走出这个死胡同的惟一途径是在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下推进国际机构的民主化,加强联合国系统,并以这种方式通过"全球治理",以期能更早地实现更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远见构想。

结构调整要求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话题并非偶然。与结构调整政策相联系的对特权集团收益的非议(它通常导致退休金一类收入的减少)已经成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关系中的一种长期的政治冲突。(贝茨,1995)在这种变化中,"新的贫困者"就是结构调整中的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与结构性的穷人不同(那些人一直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与市场经济没有联系,而且少有机会和途径获得人造降价商品和服务)。这种新的贫困化是由错误的经

---

① 关于印度的全球化讨论和结构调整政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村地区妇女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的专题研讨会及其文献资料来详细了解,请参看班纳吉(1996)和迪特里希(1996)有关印度甘地运动的目标、行动方式与局限的理论文章。

济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的紧缩计划造成的后果。它导致了需求、公共开支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以及紧缩信贷政策的实行。(特茨拉夫/诺德,1996)新贫困者在阿根廷称为贫民社会,他们大多属于有教养的中等阶层,但正处于没落之中的群体成员。这些新贫困者包括哪些人呢? 德尔加多是这样描述的(1995, 57):

"新贫困者主要是在公共事业单位的就业者、失业者、教师、领养老金者和受冷落部门的年轻科研人员。此外,还有在国家服务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工作的原本就收入低微的那些人,他们现在还能感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可以支配的薪金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种情况波及到大多数的军人。收入微薄的退休人员是这种新贫困的典型。因为,要是他们没有能在经济上援助他们的子女的话,他们就会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同样包括45岁以上的再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

与其他转型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相类似,阿根廷的全球化受害者的状况完全可以与除了台湾之外也许属于正在赶超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的南韩这个亚洲国家的低层就业者的情况作比较。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危机"便导致了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可怕的社会动荡:在短短几个月里失业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几乎200万人,仅是1997~1998年破产的企业达1万家。在经济衰退的高峰期每天就有1万人失业,80%低收入阶层(比就业者收入低20%)因经济崩溃的影响使他们收入减少了5%~15%。在意识层面上,危机受害者产生一种对"美国式残酷资本主义"的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排挤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那些"正式的职员,他们对自身遭受市场经济的处罚感到愤怒",然而正是得益于这种市场经济,他们取得了迄今令人惊奇并为儒家道德所认可的社会发展成就。(帕沙,1998,535~536)

阿根廷和南韩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鼓动和组织实施结构调整性改革计划的国家也普遍地——尤其是在社会底层——产生了主要的消极影响作用，特别是在收入和就业、价格(尤其基本商品)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等领域。遭受结构调整政策消极影响最严重的当数“那些社会阶层”，即“他们刚好生活在贫困线之上或以下。……尤其是那些由女性造成的正处于危险之中的贫困家庭，在结构调整下，他们的社会状况明显恶化：由于所受教育较差，存在文化障碍和严重的歧视，女性很少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地位状况，也很难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西博尔德，1995，25)

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由南向北的各种移民是这种变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奥皮茨，1997)由于全球化效果的影响(由贫困所决定的)来自南方的移民压力肯定会进一步增大：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工具使人们能够目睹富裕和安全等方面的差距，大大改善的旅游条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克服这种差距的机会，但主要的是本身就包含并宣传鼓励社会空间流动性权利的西方价值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蔓延，对人们逃离家乡起了鼓励作用。

文化对经济的意义：调整压力下的世界观与时代观

文化可以理解为共同经验存储的总和。面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它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导向系统。经验的存储和这个导向系统使个人能够主观地认识自己和本地的“我们群体”，同时也能够区别与“其他人”和“陌生”环境之间的虚拟界限。因此，可以将文化看做是一个由意义结构严密编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围绕个人并通过由社会化所决定的习惯感觉和思维模式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发生影响。它并不取决于所谓文化价值的“纯洁”(这本来就没有人能

够最终加以断定!),而是由具体情景中支配人的行为的文化世界观的内在意义来决定。

文化具有调节作用,因为它通过鼓励和惩罚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价值理性行为。在这方面,与其他传统相比,有几种文化传统明显更适合于激发人们寻求积极参与全球化市场的机会与风险。虽然比较文化——社会历史研究对此还处在如履薄冰的境地,但是这种观点几乎不能反驳,比如说一种受到儒教影响的效率伦理学要比非洲那种传统的保守平等伦理学更有益于全球化。这种非洲传统的伦理学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认可了自私利己的竞争行为。

不久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迪尔凯姆传统中的"历史文化学"辩护。针对由传统社会历史造成的对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的普遍偏向,他竭力维护"文化思想结构和世界观以及宗教信条与仪式的优先地位",认为,正是这些因素才形成"真实"。(韦勒,1998,9)在人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民族运动、种族文化运动、宗教运动及其共同体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我看来,对这种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依赖产生的方法论思考是解决我们所关切之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一条件使我们能理解那些在非欧洲国家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讨论。在这里,人们所重视的并不是我们的全球化状况,而是其他人即我们的竞争对手或我们合作伙伴的世界观的形成、改变或者贬值。在有关全球化压力下人类共存条件文化对话的出路问题上,这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方面,所有世界观都经受了艰难的利益现实的长期考验,也就是说,它们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由全球完全资本主义化所产生的对非欧洲文化的现代化压力变得更为强大而且广泛存在,一个人类走向自我的长达500年旅程的新时期到来了,——但又不清楚明确的目标。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将文化进化从缓慢的过

程中拯救出来，继而强迫它们进入飞速发展之中。文化的惯性也许很大，但它并没有减轻现代化的现实压力。各种文化都被卷入了一场迅猛而且常常伴随痛苦变革的旋涡之中”。(米勒，1998，35)从一切迹象看，这是一种有经验依据的事实——一种变化的“历史趋势”，还经常与人的意愿相悖。有些人为从传统中解救出来叫好，另一些人则指责这是文化的威胁——可以肯定的是，第二、第三世界的权力和思想精英们在思想及行动上对他们如何被送人漩涡之中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还)不能影响这个漩涡的中心，这个角色可能在下一个世纪留给了中国——但他们可以用抗议、部分地拒绝、创造性的革新、批判性有选择性的调整等方式来尝试对全球化进程对他们所在地区人们所起的作用加以控制调整。(特茨拉夫，1999a)

文化(包括宗教)作为一种自我主张的源泉已经趁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后起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抵御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欧洲区域以外的文化以其更大的自信重新引人注目。”一位《现代东方》的敏锐的观察家指出：“文化之根又一次地向外伸展，以便发展具有社会合法性并已形成政治立场的新生力量。对产生文化和创造文明的西方不加批判的模仿照搬的时代已走向终结。”(斯泰因巴赫，1998，87) 在东南亚也可以断定，“片面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特别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与全球转型局势相对立的新的基本模式。”(马切斯基，1998，285)

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地方和区域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和效益压力：这个方向大体由全球行为体预先设定。“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历史优势，但目前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当西方工业国家在过去 500 年间将自己建设成一个作为贯彻殖民政策的世界劳动分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时，其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已从结构上影响了竞争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比如私有财产的高度重要性,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质",以及对个人(个体)公民人权的重视都属于这种结构。根据前现代社会如何借助其特有的文化机构迅速而顺利地适应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世界市场作为从物质上平衡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舞台正在发挥着作用。这里的标准就是收益利润:为资本投资和资本利用寻找合适的地点。

世界区域差别:"文化结构"和"文化方式"

经验表明,在条件相同情况下,与西欧和大西洋社会模式功能等同的那些社会(例如儒家特色模式),应该得到"世界资本"的偏爱,而其他比如以社会平等和团结为最高价值(例如非洲的部族联盟)的社会则宁可被避免。在这一点上,所有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像"善行"、"宽容"、"辛勤劳动")。然而在伦理教育价值观的规范中,父母传授给孩子们的内容则存在着特定的差别,比如在亚洲,人们非常强调"独立自主性"和个人的"责任感",而在非洲一些国家里这方面并不重要,而是"顺从"、"崇敬祖先"以及"宗教信仰"的价值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283)

如果在传统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文化继承一直发挥着作用,那么伴随着全球化,市场的文化特征及其向外辐射会变得更加重要,例如跨国企业已经"迫使国家更多地争夺有利的产地"。(博恩希尔/特雷齐尼,1996,61)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完成它们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社会富裕的期望,那么它们就陷入了接受功能性妥协的困境。从全球行为体的观点来

看，就会出现一场围绕最佳产地质量的社会秩序竞争，这场竞争赋予了文化价值因素一种特殊的地位。

在现代化完成过程中，如果将民族学者汉斯—彼得·米勒的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与它的许多行为体（国家、大集团、跨国公司）的“文化方式”进行区分，就可以得出一种如我所认为的对深入研究有回旋余地的可信而又实际可行的概念。“结构”可以诠释为“一种亚文化体系，该体系直接或间接地使社会统治手段具有生产和管理能力。除了量的方面外，社会一体化和政治合法性的质的标志也有助于一个国家在社会团体中的权力地位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活动空间。”（米勒，1996，86）

区分“结构”与“方式”使我们能够“重新处理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化问题。原则上可以认为，文化变异在结构核心领域产生最小的回旋余地，而在方式领域的回旋余地则最大”。在结构领域——其他人称之为核心文化——发展也总是包含着西方化（就像迪特尔·森格哈斯在他的《文化六边形》中所阐述的那样）。“只要在世界体系中结构复杂性的趋同被认为是必要的，即使发展的条件并不充分，与此必然联系的就有，在符号规范领域内的变化会随之发生，不过，只有那些有助于人们融入地方经济的变化才会发生。……这些方式手法的意义仅仅表现在社会内部环境中，它与结构和重要的社会权力方面的脱离使这些方式适合于突出地方主义认同及其界限。”（米勒，1996，87～88）

一个社会所固有的“文化遗产”决定了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社会一体化的速度和灵活性，而这种转型过程总是给社会带来不安。这样，从暴力和合法的混合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文化方式”就得以逐渐形成。

在边缘地区，失业、犯罪和社会贫困化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通常将它视为“第三世界”的特有现象）；而现代人类社会中心区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随之突然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一个

世界"的历史发展逻辑。因此,西方不安宁的"教师爷社会"有必要继续发展为宽容的"学习社会"。在学习文化中,被动接纳其他文化的(从感觉上似乎就是异国的)宽容变成了一种积极的行为。这不再涉及其游戏规则最终仍由西方制定的简单的自由放任,而是关系到积极探索其他文化对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要素的贡献。

如果人们进一步思考反映一个社会学习能力的文化机构的可变性,即地方文化的可塑性,那么就可以理解民族社会和地方社区受文化影响的学习能力,以便于能够顺利适应按全球性标准来衡量的资本主义使用逻辑的必要性,这里的细微差别常常体现在投资者的信任与合作伙伴的期望可靠。

有这样一种观点,它试图将经济利益、文化偏好和政治制度一起置于同一个逻辑系统中,以此人们也能够解释为何在同样的世界市场条件下,有些国家(亚洲)已经发展起来,而另外一些国家(非洲和大洋洲)却被淘汰成为"第四世界",这里的大部分人们陷入了边缘化境地。

随着正常区域界限的消失——如民族国家,时代也有了全新的意义:灵活性、改革愿望和变革速度成了国际竞争能力的社会文化条件。但在许多非欧洲国家中,这些并没有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协调一致。在神秘的时代观念依然盛行而且过去总是当代一部分的那些地方,估计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创新(如出售土地)和按理性行事。从不稳定的方面来看,"全球化表现出不仅尝试将当代重新殖民地化,而且也要使未来继续成为殖民地。"(兰德里亚,1998,18)尤其是最近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韩和俄罗斯的大动荡——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和面临社会崩溃威胁的中间社会阶层举行的激烈的示威和抗议,使人们对作为全球化伴生现象的合作与分裂冲突有了初步的印象。

但是,全球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超越古典民族国家的个体和社会行为领域(网络),由此作为个人认同基础的传统国家、祖国和

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经受过考验的价值系统,地方文化现在仍然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文化划分了行为的活动空间,规定了被证明确有意义的方针导向。然而,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这些地方文化只有处理好如全球部落这样一类充满麻烦的复杂现象时,它们才能生存下来。[①]在这种情况下,将新的方法应用于解决现存问题意义上的创新能力是成功发展的关键。国家对独创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的教育培训当然也就成为一个国家未来能力的同义词。“在全球竞争时代,决定输赢的将是人力资源的质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 16)而不再是对原材料、石油或机器的占有。

对全球化的创造性反应:“伊斯兰社会”和西方

如果人们现在研究伊斯兰文化圈国家的政治宗教发展——在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伊朗、苏丹、印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很快就会认识到,“伊斯兰”只能用作复数:只有“伊斯兰社会”,没有伊斯兰世界。(罗特,1993)为了避免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积极研究全球化的挑战。(阿尔—阿泽

① 全球趋势2005项目将“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两极性”视为政治中新的辩证法:全球主义内部的部落主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28)“全球地方主义”这个混合词(由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组合而成)建立在相似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并非偶然的是,针对这种观点,日本创造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全球地方化”已开始在国际上灌输渗透,并把地方性理解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在欧洲的全球化讨论中,罗兰·罗伯逊(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为这种全球地方观辩护,认为这种观点可能揭示“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地方性是全球性的微观表现形式。像均匀化和非均匀化这些表面矛盾应看作是“同时性趋势”,“虽然这些趋势在具体情况下可能不相容,但其最终结果则是互为补充的。”

姆,1993)

与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领导高龄化的问题有关,目前在中东地区新的一代"对自己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对本国形象及其在政治结构现代化方面的无能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与他们的前任相比,这些人更穷、更年轻,也更现实理智。(阿贾米,1999, 30)比如阿贾米认为(他目前在华盛顿教授国际政治),中东政治稳定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已经"陷入新的经济竞争力现实和贫困之中"。"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人们认为必须放弃过去25年的政策基础——对农业的偏见,公共部门的垄断,自上而下运行的已完全歪曲的教育培训系统以及受到保护的市场。"(阿贾米,1999, 34)现在的目的已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而是"面包和工作",特别是在那些由于石油开采量减少、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的地区,"财富和权利的时代"已经为一个"新的贫困"时代所替代。(阿贾米,1999, 33)

在历史上,伊斯兰东方经常在相对封闭、迷信传统和更强烈的世界开放与西方化之间来回徘徊。这种情况同样而且特别适合于伊朗——在全球化的诱惑下,这个伊斯兰国家目前可能正在进行激动人心的改革试验。波斯/伊朗已经越过了一条极不平常的道路——从特殊的现代化倡导者沙哈·礼萨·巴列维经过宗教精神领袖沙里阿提和霍梅尼到现今的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雅托拉·阿里·沙里阿提(1933~1977)在《外来物质文化影响下穆斯林的自我异化》中考察了欧洲人的自觉行为——根据官方的说明,在长期反抗沙哈政权的过程中,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批判性的年轻一代的榜样,毫无疑问,这一代并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自己传统的价值重要和高明。"可笑的是,汽车从我们身上辗过,压断了我们的手、脚和肋骨,然而我们还在流着血模仿那些控制方向盘并辗压我们的人。"(沙里阿拉,1980, 19~20)西方的现代化与世俗主义、唯物主义和女性的"性解放"被视为一种能致人瘫

痪的毒品，只有宗教才是对付它的惟一手段。因此，伊斯兰复兴强调自己的伊斯兰价值观，并被当成一项现代工程——一项面向未来并有助于将动荡不安的穆斯林社会引入一个绝对不被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统治的世界的现代工程。

随着穆罕穆德·哈塔米当选总统（1997年5月在获得伊朗70%的选票战胜以革命领袖阿雅托拉·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保守传统主义者后上台执政），在伊朗国内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位改革家，他努力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愿意忘却那段阿雅托拉·霍梅尼这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沙哈·礼萨·巴列维的战胜者将西方的霸权诽谤为“大撒旦”的时期。“我们不回避谨慎地吸收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积极成分。”（哈塔米，NZZ，1997. 12. 12，2）这里尤其应该提及的是法治国家、分权制度、司法独立和经济主体更多的行动自由。

“一方面，我们必须批判西方的缺陷，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吸收它们的成就。如果我们达到了一个精神和历史都很成熟的阶段，并且有能力和作出自我选择，这两者都可能做到。”（哈塔米，1998，35）

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具有伊斯兰特色的调和的新自由主义，它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国家所走歧途和弯路的相互矛盾的结果。

这种帝国主义西方及其受害者之间文化碰撞的基本模式似乎是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在另外某个时候，在西方与非欧国家发生的其他碰撞中，这一点同样有据可查。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就已经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文化教育阶层的行为举止作过说明，“全盘否定西方的一切与主张完全西化之间的各种细微差别”都能找到，即便是“那些绝对否定任何西方化的人也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完全摆脱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弗兰克，1962，104）本书中

俞可平的文章以此为出发点证明了继续向西方靠拢的趋势。

中国的例子显示出权威国家在政治上的两难选择,这些国家既要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同时又想分享全球化的信息内容,因此,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表示:

“如果中国与网络连接,就科学技术而言,这是一种进步。但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将实行监督。即使我们实现网络联通,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绝对的信息自由。”(引自格鲁勒,1998, 322)

非洲的讨论:对作为新殖民主义攻击的结构调整计划的批评

“非洲就不一样吗?”(罗德里克,1999, 103)——“在非洲难道连时钟都走得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由于这个大陆的发展结果令人失望,这些问题总是被反复地提出来。(费尔杜西,1998)毋庸置疑的是,拥有6亿人口的撒哈拉南部非洲比任何其他大陆都要穷,那里的人们目前总体上比30~40年前独立时生活还要差。它们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已经滑落到2%以下,外来私人直接投资在49个非洲国家(南非和尼日利亚除外)几乎还找不到途径。

自从东西冲突结束以来,非洲再次经历了一个动荡和根本变革的时代。一些国家正处于良性的变革之中(民主化,持续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则局部地陷入崩溃(萧条、国内战争、负债累累、无政府状态)或者政治阶级仍保持专制停滞状态,大部分居民四处逃散。它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政治决策依赖于个人,在那里,国家市民社会和营利团体的分化得不到加强。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也不具有整个社会理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目前面对全球化进攻所紧急需要的!国家和社会从结构上没有区别,因而其正式结构不能掩盖权力的世俗和

地方主义本质。

在那些还不能实现或加强民主化的地方，如果不存在全球行为体，那么非正式的行为体就会独占鳌头，多年来在这个大陆的所有地区，人们不难观察到殖民国家分崩离析的现象，即渐进或迅速的国家崩溃。

作为殖民和后殖民统治与管理中心，国家越是退却，过去那些经受过考验的社会机构——种族、宗教与文化机构——就越有可能承担起至少是部分的必要的体制功能（如果根本不出现作为通往混乱人口的持续权力真空的话）。继此发生的是大范围社会联系（民族）的解体并为地区的、小范围的共同体（种族、社会文化运动）所取代。在许多地方，由权力竞争所引起的形势危机和种族政治化现象已经普遍存在。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非洲人将全球化基本理解为威胁、进一步动荡和对外来统治的担忧，这也并不令人吃惊。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权力精英和大学学者们对最近一段时期外来干涉的疑虑依然根深蒂固，这一点与整个地区（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乌干达和加纳例外）迄今仍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 1980～1995 年这段时期，16 个亚洲国家中有 14 个在经济上可能迎面赶上西方，然而 39 个非洲国家中只有 4 个（有充分的数据来证明）能做到。（努嫩坎普夫，1998，41；沃尔穆特，1999）

非洲的同行们认为外来因素是 1980 年以来出现的“非洲危机”的最重要原因，阿德巴约·阿德德基可以称得上是这种观点的一个见证者（非洲发展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西方强迫非洲各国政府放弃自己的发展计划，继而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调整政策。这种结构调整政策战略的目的在于财政管制、出口增长、债务还本付息能力和短期的危机管理，而且由于实施中必然引起各种社会困难而遭到许多方面的批评指责。它被认为是对非洲社会本质的攻击。（阿德德基，

1995，74）

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哈茂德·曼达尼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就全球化和结构调整这一题目所做的评价可能极不引人注目：

“天大的讽刺是，作为‘条件’，非洲人民被强迫接受一种冒充为理性的世界观；每个非洲国家都受到压制，并被一系列黄金信贷缚住了手脚。结构调整开始限制人民的购买力，破坏国内市场，因而在那些市场成为部分结构的地方走向了终结。它加强了统治整个非洲大陆的暴力体制，任何改善和提高政府能力的谎言都不能掩盖这个事实。”违背人民利益的调整政策只能“变成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曼达尼，1995，22）

在非洲的讨论中，全球化一般被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权力扩张的胜利，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而遭拒绝。沙米尔·阿明，这位非洲著名的左倾制度批评家从全球化中首先认识到“第一世界的新发展”，这种发展伴随着“一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不平等的全球收入分配体制，并将边缘国家的工业置于从属企业的地位”。因而剥削和全球两极分化（中心与边缘的协调统一）决定了非洲未来存在潜在的混乱。（阿明，1992，11）[①]

在这里，非洲科学家不是批评这种或那种夸耀，甚至也没有指责这样或那样的实质错误，而是极为关注过去遗留下来在非洲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重要代表人物之间的猜疑究竟有多大。如果连学术文化阶层都不能充分理解西方采取必要措施用来防止非洲大陆最终滑落到全球边缘的政策，那么伙伴式的发展合作又该如何进行呢？

在那些政府几乎成为教育体制的惟一担保资助者的新兴后殖民国家，在经济贸易私有化和反调整过程中，国家开支的削减已经

① 在埃多露1997年和姆坎达怀尔1997年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

产生部分严重的影响。人才从非洲向西方和北方的流失——每年好几万人——导致了非洲大学必要科学研究工具(书、杂志、实验设备)的大量亏空,从而使非洲处于一种完全脱离国际创新中心的状态。如果撒哈拉南部非洲当地拥有的文化知识与世界"平均"或"正常"文化知识之间的差距不能迅速果断地缩小的话,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化将引发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不稳定影响的整个次大陆的社会经济排外行为。

目前的形势到底有多紧张呢?这里可以用一个惟一的指数来说明:如果切合实际的话,我们正处于知识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知识的获得、传播、使用、储存和转让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 1)那么每个学生的教育公共开支就是制度竞争力的一个标准。在撒哈拉南部非洲,1985年平均每个学生的开支为92美元,10年后还只有87美元。然而,在东亚国家,相应的数字分别是60美元和155美元,在南亚分别为77美元和223美元,在拉丁美洲分别为211美元和444美元,在阿拉伯国家分别为476美元和444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 111)换句话说,为了不落后于世界水平,除了撒哈拉南部非洲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加大了发展教育的力度,然而,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为争夺国家权力和巩固社会团结的斗争却仍处于中心地位,生产投资大大减少。

小结:在西方和非欧社会之间探求一种新型关系——从可怕的教师爷到模范的合作伙伴

面对大西洋社会中西方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相对吸引力和起源于经济全球主义的巨大力量,如今西方作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依然备受注目。和平与文化研究专家哈拉尔德·米勒继续发展了迪特

尔·森格哈斯的早期思想,(森格哈斯,1994)他强调西方文化圈的相对优势,并试图说明:

“与伊斯兰世界、亚洲或者非洲的分裂相比,西方内部冲突和危机已逐渐消失。最重要的是,西方开放社会不存在对新的挑战的应变和适应能力。要同时实现效率、团结和合法,我们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办法。但是,由于这个社会本身受宪法保护的多样性,我们容易找到这些办法。多样性是创造性的前提条件,只有制度上的创造性才是21世纪的解决办法。”(米勒1998,35)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希望,“欧洲宽容模式”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由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成就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欧洲大陆在文化传播中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魏登费尔德,1996, 31)然而,西方对全球化过程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近东中东国家以及“西方”的民主规范和制度保护方面的忧虑仍然有增无减。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强迫全球市场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中国、伊朗和南非接受目的明确的机构和亲市场的行为模式,但不一定是民主统治形式。难道像拉尔夫·达伦多夫所预言的那样,我们正处于新的专制世纪的前夜吗?所谓的调整强制就一定排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的新民主吗?如果“封闭民主”在世界各地区已经不存在的话,那么,由于不同的原因已经开始进行的转型过程是否会受到阻碍或变形走样呢?(舒伯特/特茨拉夫,1998)“全球相互联系”在政治民主上究竟能否负责地建立起来?“民主问题”将成为“21世纪的规划项目”吗?“正是在柏林墙倒塌、边界消失的历史时刻,西方发达社会就接近了它自身的极限。全球化加剧了现代社会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内部矛盾。”(魏登费尔德,1996, 109)

所有这些问题都超越了本书的范围,而且还需要我们研究好几十年。但是了解研究有关西方以外社会未来忧虑和希望的讨论则是本书关注的事情。在全球化讨论中产生的如下问题尤其令人

感兴趣：

1．处于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对全球化这个作为现代美好社会预言的最新变化的期望是什么？

2．鉴于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制度，他们最强烈的担心是什么？对一切标准规范进行改造还是摆脱正在失去活力的传统？

3．调整困难和危机现象（“亚洲危机”，拉丁美洲经济危机，非洲发展方向危机）应该归因于外来因素（全球化）还是由内部改革造成的？

4．哪些社会行为体（国家、民族、集团）将从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利益？

5．谁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为边缘化和社会排外所威胁的民族和集团？

6．全球化对地方和国家民主是一种危险和挑战吗？

7．作为全球化的后果，利益表达、价值和世界的全面趋同是否可信？——（在全球民主斗争文化的意义上）什么能够增加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

尽管如下文章不能完全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赖纳·特茨拉夫）

参考文献：

阿布—赞德，纳斯尔·H.，（与迪特尔·森格哈斯的谈话），1996：世界文化的未来。伊斯兰世界与现代，载于：发展与和平基金会（编），发展、文化、和平，新的世界秩序展望。1986～1996发展与和平基金会成立10周年讲话与观点，波恩，第21～36页。

阿德德基，阿德巴约，1995：经济发展：非洲的需要，载于：基达内·门吉斯蒂伯/B.伊库博拉耶·洛甘（编），非洲远离经济自由化。

经济调整与选择,伦敦,第 56~74 页和 228 页。

阿夫黑尔德,霍斯特,1994:没有对象的福利? 市场经济背叛了拥护者,慕尼黑。

阿贾米,福阿德,1999:改革对传统。阿拉伯政治体系的承受力与本质,载于:国际政治,7,第 30~36 页。

阿尔—阿泽姆,萨迪克·J.,1993:现代的不适。伊斯兰启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阿尔特法特,埃尔马/比吉特,曼科普夫,1996:全球化的极限。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态和政治,明斯特。

阿明,沙米尔,1991:混乱帝国,第一世界的新发展,汉堡。

班纳吉,尼马拉,1996:结构调整计划和妇女的经济行为,载于:拉奥等(编),变化现场,印度妇女行动的结构背景,新德里,第 133~145 页。

贝克,乌尔里希(编),1998:人类社会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贝克,乌尔里希,1997:何谓全球化?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贝茨,约阿希姆(编),1995: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政治制约,汉堡。

博恩希尔,福尔克尔/布鲁诺,特雷西尼,1996:人类社会的分化过程及其说明,载于:汉斯—彼得·米勒(编),世界体系与文化遗产,柏林,第 53~79 页。

布尔迪厄,皮埃尔,1998:防火。反新自由主义攻击事业中的发言权,康斯坦茨。

卡利斯,约尔克(编),1997:通过什么并如何来缔造和平? 考验中的文明六边形,雷堡洛古姆。

卡多索,费尔南多·恩里克,1998:全球化的社会后果——边缘化还是待遇改善? 载于:康拉德—阿登拉基金会(编),外国信息,第 1 期,波恩,圣奥古斯汀,第 3~11 页。

张汉皮,1997:台湾:未来共同体与文化全球化,明斯特。

哈塔米,穆罕穆德,1998:任何宗教都不是绝对的真理,载于:FAZ,1998. 09. 26,第35页(译自波斯语)。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全球趋势2005。新千年的挑战,华盛顿,1997。

达伦多夫,拉尔夫,1998:全球化诠释,载于:乌尔里希·贝克(编),人类社会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41~54页。

德尔加多,丹尼尔·R. 加西亚,1995:"新贫困者":结构调整的受害者,载于:概况,3月第1期,第56~57页。

迪特里希,加布里埃莱,1996:选择知识体系与妇女行为:组织前景,载于:拉奥等(编),变化现场。印度妇女行动的结构背景,新德里,第335~363页。

迪特里希,沃尔夫冈,1998: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一体化与和平。东非、中美和东南亚比较,维也纳。

埃多霍,费利克斯·摩西(编),1997:全球化与新的世界秩序。21世纪非洲的承诺、问题与前景,韦斯特波特。

费尔杜西,米尔 A.,1998:崩溃与觉醒之间的非洲。巴伐利亚州政治教育工作中心,A 103,慕尼黑。

格鲁勒,亚历山大·K. A.,1998:没有国家的领域?自由信息的获得与网络审查,载于:国际政治与社会,第3期,第310~323页。

哈菲兹,凯(编),1997:伊斯兰与西方。策划对话,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海因,沃尔夫冈,1998: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政治与社会稳定。载于:南北现实,汉堡德国海外研究所,第3期,第458~481页。

赫尔德,大卫/安东尼·麦格鲁/大卫·戈尔布拉特/乔纳森·佩拉顿,1999:全球转型。政治、经济与文化,剑桥。

亨斯巴赫,弗里德·赫尔姆,1997:经济伦理方面的全球化,载

于：政治与当代史，B21，1997.5.16。

卡普尔，罗伯特(编)，1999：非洲的经济前景。结构、改革与趋势。汉堡。

肯德尔，雷蒙特，1999：全球化经济——全球犯罪。国际刑警组织总干事所作总结报告，载于：NZZ国际版，9.20，第6页。

科尔，马丁，1998：全球化与全球管理需要。南方观点，1998.4.22讲话稿，第三世界网络，槟榔屿。

金，大卫(编)，1991：文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伦敦。

科赫，克劳斯，1997：资本主义世界，载于：水银，9～10月，年度第51期，9～10册，第582～583页、第763～777页。

克赖勒，米歇尔，1999：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载于：沃尔夫冈·梅克尔/安德列亚斯·布什(编)，东方和西方民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605～623页。

马切斯基，吕迪格，1998：东亚的现代化过程：文化对经济的意义，载于：南北现实，第2期，第280～290页。

曼达尼，马哈茂德，1995：民主化与市场化，载于：门吉斯蒂伯/洛甘(编)，非洲远离经济自由化，伦敦，第17～55页。

马蒂斯，福尔克尔(编)，1992：十字路口或者对话。南北关系的前景，波恩。

门泽尔，乌尔里希，1998：全球化对分离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梅斯纳，迪尔克/弗朗兹·努舍勒，1996：全球治理，21世纪之交德国政治的挑战，波恩。

姆坎达怀尔，坦迪卡，1997：非洲社会科学：打破地方障碍，超越国际存在，载于：非洲研究周刊，第40卷，第2期，9月2日，第15～36页。

米勒，汉斯—彼得(编)，1996：世界体系与文化遗产。从民族学和社会学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与发展，柏林。

米勒,哈拉尔德,1998:文化共存,对亨廷顿的反驳,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纳尔,沃尔夫·迪特尔/亚历山大·舒伯特,1994:世界经济。政治的困境,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努嫩坎普夫,彼得,1998:获益者还是受害者?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载于:BMZ/GTZ(编),专业会议。全球化:发展合作的机会与挑战,埃施波尔恩,第31~45页。

奥皮茨,彼得J.,1997:逃亡与移民,载于:发展中地区的基本问题。21世纪之交的南方,慕尼黑,第73~100页。

帕沙,维尔纳,1998: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南韩的社会分裂:社会稳定政策的必要性,载于:南北现实,第3期,季刊,第533~547页。

佩拉顿,乔纳森/大卫·戈尔布拉特/大卫·赫尔德/安东尼·麦格鲁,1998:经济全球化,载于:乌尔里希·贝克(编),全球化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34~168页。

彼得雷拉,里卡尔多,1997:竞争的极限——远离市场统治下的经济与全球化,载于:恩斯特·乌尔里希·魏茨泽克尔(编),没有界限?每种制度都需要界限——但是这应该如何渗透?柏林,巴塞尔,波士顿,第284~304页。

兰德里亚,沙利尼,1998:全球化与性别调查:前言,载于:露特·克林格比尔/沙利尼·兰德里亚(编),女性眼中的全球化,回顾与展望。发展与和平基金会"一个世界"文本,波恩,第16~33页。

拉奥,尼蒂亚/露易丝,吕鲁普/拉特纳,苏达斯汉(编),1996:变化现场,印度妇女行动的结构背景,新德里。

罗伯逊,罗兰,1992: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变化,伦敦。

罗伯逊,罗兰,1998:全球地方化:时空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载于:乌尔里希·贝克(编),人类社会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92~220页。

罗德里克,达尼,1999:新的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华盛顿。

罗特,格尔诺特(编),1993:伊斯兰社会,理解不信任的29条建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扎森,萨斯基亚,1998:全球化及其不满。关于人员和货币的新流动的文章,纽约。

沙里阿提,阿里,1980:文明与现代主义,载于:伊斯兰复兴,第1期,8月,伊朗大使馆编,波恩。

舒伯特,贡特/赖纳·特茨拉夫(编),1998:第三世界的封闭民主,奥普拉登。

许勒尔,马戈,1998:全球化、自由化与中国的社会稳定,载于:南北现实,第3期,第512~523页。

舒曼,哈特穆德,1999:全球化及其行为体,载于:世界趋势,第21期,1998/1999冬季刊,第73~87页。

森格哈斯,迪特尔,1994:世界将漂向何方?关于和平共处的未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森格哈斯,迪特尔,1998:违背愿望的文明化,文化自身的冲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西博尔德,托马斯,1995:结构调整的社会方面——中期总结。INEF报告,第13册,杜伊斯堡。

索罗斯,乔治,1998: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危险中的开放社会,纽约,1998;德语翻译,柏林,1998。

斯泰因巴赫,乌多,1998:从教师爷文化到学习文化,载于:埃克哈德·费廷霍夫/汉斯·迈(编),时代交替——交替时代。汉斯—里尔耶—论坛,关于时代问题的新教论文,第2卷,汉诺威,第87~124页。

斯蒂格利兹,约瑟夫.E.,1999:更多的工具与更高的目标。发展与经济研究世界研究所年度第2讲,联合国大学,发展与经济研究世界研究所,网络:1999.5.18。

特茨拉夫，赖纳/安东尼·诺德，1996：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货币基金构成，动态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合作与一体化机制，奥普拉登。

特茨拉夫，赖纳，1999：非洲全球化的后果，载于：南北现实，年度第10卷，第3期，第544～552页。

特茨拉夫，赖纳，1999a：什么来自第三世界？载于：马丽昂·格雷芬·登霍夫/特奥·佐默（编），21世纪的假想，纪念赫尔穆特·斯密特诞生80周年，柏林，第107～122页。

特茨拉夫，赖纳，1999b：非洲国家有效国家暴力的废除，载于：和平—期望。国际谅解与国际组织专页，第2册，柏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1998年度报告，巴黎。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1992：地理政治与地理文化，变动中的世界秩序文章，剑桥。

韦勒，汉斯—乌尔里希，1998：文化史的挑战，慕尼黑，1998。

第一部分

全球化的框架条件：人口增长与通讯革命

人口增长和全球化：一个被低估的冲突领域

尽管人口增长在许多课题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①]，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它几乎未被涉及。人口统计学一直是人口学家很少关注的一个专业领域，也仅有少数政治学家直到今天方才认识到人口问题对国际政治具有怎样的意义。此外，这样一种错误看法流传甚广，即由于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出生率均在

① 本文以作者原有文章为基础，韦尔克，1997；1999a 和 1999b。内容的重合不可避免。

下降，所以人口问题已经缓解。而本文将阐明，人口问题丝毫没有得到缓和，情况恰恰相反！

如果说，人口增长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很少得到重视的状况已经令人惊奇的话，那么，尽管这一课题格外具有全球性并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条件，但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却根本没有得到反映，这就更令人惊异了。举例说明：未来25年内，拉丁美洲的人口将从5亿上升到7亿——也就是说，净增2亿！如果人们结合拉丁美洲那些尚未解决以及不断新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人口问题引起的）来解释这些数字的话，倘若人们考虑到，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却大大降低——即便还不是负增长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认识到，将人口问题置于全球化讨论之外是脱离现实的。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因为它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只有当人们注意到世界人口的增长及其地区不均匀现象时，才能认清人口难题的全球意义。

这里列举一些历史资料：公元前7000年时，全世界人口总数估计为1000万人，公元前4500年时为2000万人，公元前2050年时为4000万人，公元前1000年时为8000万人，公元纪年时达到1.6亿人，1700年时上涨为6亿人，1900年时为16亿人，到1950年已激增为25亿人[①]。从1950年到1987年——也就是说仅仅37年间——世界人口翻番为50亿，同期，世界人口每年增长8000～9000万人左右。尽管已经采取了适于抑制全球性人口增长的种种直接和间接措施，但人们首先必须想到50年后将有约100亿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样的增长不仅在生态学上令人忧虑，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从而对全球化的前景带来一系列后果。

---

①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1967年，第654页；菲舍尔世界年鉴，1985，第682页；国务院环境质量委员会（编），2000年的地球，致总统的报告，第1卷，华盛顿，1980年，第9页。

关于人口难题和统计

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当代世界人口增长可以扼要地表达如下:出生大大超出死亡;虽然平均出生率在下降,但死亡率同样走低;虽然越来越多的妇女生育的孩子相对(每位妇女)越来越少,然而总的绝对数量还是日益增大。人口增长率虽然放慢,但全世界人口却日益膨胀,人们估计,约100年后,当世界人口数量在100~140亿之间时,世界人口增长就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增长率为零)。

当人口曲线下降到人口不再增加(补偿水平)甚至可能再度下降时,被称为人口过渡,而这一过渡在目前发展中国家中的进展不同于工业国家历史上的经历,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均远远高于工业国家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出生率,同时死亡率也下降得更为迅速,这不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而主要是受"外来的"影响,即得益于更加发达国家的革新(尤其是战胜主要死因方面所取得的医学进步)。此外,过去那些曾出现过人口过剩的工业国家当时能够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以更大得多的规模(相对地)输出人口。

发展中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3/4,并占世界人口增长的90%(目前年均大约增加8000到9000万人)。未来5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几乎增加1倍。1995年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接近80%,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10个百分点(将近90%)。

从全世界看来,虽然人口平均增长率和出生率不断下降,但我们目前还是处于惊人的增长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金字塔"年轻"的年龄结构所造成的所谓的人口增长动量或者惯性所决定的,这就是说,在青年人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中,即在人口分布

金字塔中比较平缓的部分,育龄妇女多于“老龄妇女”。虽然平均出生率(按每位妇女计算)下降,但由于育龄妇女越来越多,所以出生孩子的总量还是在增加,从而导致我们正置身其中的人口增长的雪崩效应。目前人类正处于青年人数量最多的历史时期。只有人口出生率下降到“补偿水平”,人口才会在高水平上稳定下来。众所周知,在一些工业国家中人口甚至再度下滑。

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

●医学与卫生事业的进步:妊娠和产科医学的进步以及控制儿童死亡率和消除其他主要死因(尤其是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免疫力缺乏症即艾滋病也许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幅度减少,但这种观点必须分地区和时间加以详细论述。今后20年间,艾滋病还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这样的作用。与此相似的是,只要人们不对大量人口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战争也就不会具有同样的效应。

●贫困:只要没有极端到造成超乎生物学意义的再生殖水平之上的大量的儿童和正常死亡的话,那么贫困也可以促进人口的增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例如:在一个边缘社会—经济环境中,多子女具有社会及养老保险的意义,因为孩子们创造的收入超过了他们所引起的费用;受教育程度低和妇女作为母亲的主导作用;不正常的家庭状况;乱交的泛滥;对避孕方法的无知或者难以得到避孕用具等等。发展是良策是广为流传的观点,但很快就没有了市场,因为:第一,第三世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发展”简直就是爆炸式人口增长的先决条件(通过“进口的”药物成功地战胜了一些主要死因,同时既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又延长了平均预期寿命);第二,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进展过于迟缓,所以人口曲线难以匀速下降;第三,人口增长本身是决定性的发展障碍;第四,只有在那些贫困人口真正称心如意地实现了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发展过程才能产生抑制人口的作用。只要观察一下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

的发展,那么后者绝不是一个想当然的结论。

如果说发展确是良策,那么它可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这样的良策却难以寻觅。此外,人们并没有这种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会遵循合理的发展策略并竭尽全力消灭大规模的贫困。

●促进生育或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还执行明确的促进生育的政策了。自从开罗会议以来,尽管主流趋势是节制生育,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未全力以赴。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相关措施,(贝雷尔森/哈夫曼,1997,第 134 页)但也有少数国家例外,没有执行统一的、长期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因为他们的文化难以接受这样的政策,同时人口政策的相关机构也不具备足够的手段或能力。首先是中国实行了一项义务性的、卓有成效的控制生育政策,尽管这种政策代价巨大(此外还有国家侵犯家庭的私人空间、大量的堕胎、杀害女婴、性别比例失调),并且只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才会得以贯彻执行。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一定是道德约束或者宗教保留;某些发展理论的错误观点、民粹主义倾向或者行政机构不完善同样可能产生影响。

表 1:1995~2150 年各地区的世界人口规划(单位:百万)

地区	1995	2000	2050	2100	2150
世界	5692	6114	9578	10958	11401
发达中国家	4448	4842	8222	9589	10013
工业国家	1245	1273	1367	1379	1399
各大洲					
非洲	719	821	1999	2643	2827
亚洲	3443	3703	5638	6289	6509
拉丁美洲	475	512	804	883	906

续表：

地区	1995	2000	2050	2100	2150
北美洲	295	309	374	384	388
欧洲	731	737	721	714	726
大洋洲	29	31	42	45	46

资料来源：赫维希·比尔格，世界人口。活力与危险，慕尼黑，1996，第100页。（原始数据：世界银行1994～1995年，平均变量）

●使用避孕手段以达到计划生育，即便是在长期不发达情况下也可以既避免压力巨大的人口政策，又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然而除了那些（本来就太多的）父母希望得到的孩子之外，还有无数的不期而至的妊娠，虽然这样的妊娠大多以堕胎告终，但还是使大量意料之外的孩子来到人间。意外生育大约占到20%。

●社会规范与价值能够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某些传统的价值和规范可以起到抑制人口出生率的作用（例如禁止结婚，排斥非婚生育），但也能促成更高的人口出生率，例如：限制使用避孕手段的宗教戒律；大男子气概：认为男子的价值由其生殖能力及其子女的数目决定；过于宣扬母性；所谓的重男轻女，它对人口的影响源自这样的格言："多女之父亲总望有儿"；以及诸如大家庭（"多子多福"）的理想。社会规范与价值还可以以其他方式影响人口增长：在一些发达地区平均结婚年龄提高，无子女夫妇和独身生活得到普遍认可，从而抑制了人口出生率；而非婚生育得到承认也是大势所趋，这就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不发达地区——从人口统计意义上讲，这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地区——出现了广泛的社会价值规范的瓦解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与之伴生的是乱交和不负责任的父母。

安全政策重要性的改变

国家"力量"由多重因素构成,其中之一便是人口数量。虽然后者不能单独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无关紧要,但一般来说,它是举足轻重的。(萨尔克西安,1989,第557页)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当它能够最佳地利用其"人口资源"并发展技术、经济与军备时,往往比人口稀少的国家更具威力。(迪蒙,1993,第39页及以下各页;萨尔克西安,1989,第552页)这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会出现对迄今为止的南北半球之间安全政治平衡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口"天文数字"。不久的将来,国际体系的制度结构也会随人口增长而改变。到2050年,将有16个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而其中只有两个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和日本)。可以预计,一些人口庞大的国家会逐渐抑制西方在本地区的影响,对区域一体化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跃升为工业国家重要的经济伙伴或竞争对手,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重要的地位,并提出全球共同发展的要求。

在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出现负增长,并向老龄化发展,其中包括处在具有劳动能力和符合兵役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重的下降,可能会危及祖祖辈辈苦心经营所达到的富裕水平,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人口发展长此以往只注重质量优化,那么国家安全能有何种程度的保障。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却是爆炸性的,其金字塔相对平坦,这就是说,儿童和青年人占据极大比例。这样一来,虽然发展问题更加严峻,但可以通过资源集中来动员巨大的——包括军事的——潜力。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低出生率的年份"。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谢奈(1995,第424页)以"穷人的爆炸与富人的锐

减”来描述的发展[1]。而且南方国家正在扩充军备，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或进口或自己制造现代军事装备，甚至工业国家先进民用技术的国际性扩散也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有利于军工部门的生产能力。因而，工业国家为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发展以及通过技术和军备的转让使它们得以实现安全政治稳定的种种努力，也可能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后果。(萨尔克西安，1989，第561页)同时，由于如下两个原因，工业国家对所谓第三世界进行军事——主要是“地面”的——干预的能力降低了：第一，在实行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及其联盟结构中，已经越来越难果敢坚决地采取这种措施；第二，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军事能力，能够使外来干涉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今，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军事行动几乎不再可能。越南和阿富汗已经表明，人们如何能够成功地抗拒超级大国，而类似的情况在100年前想必是不可能的。插手索马里以失败告终，对伊拉克的干涉恐怕也难逃同样的结局。英国不得不动用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便夺回由阿根廷占领的福克兰群岛(译注：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但却从未考虑过在阿根廷领土上进行推翻军政府的战争，毕竟阿根廷是一个人口将近4000万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军事干涉如对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地(但不包括古巴、也不包括东西方冲突结束之后的军事干涉)，在如巴西和墨西哥这样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恐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更不用提中国和印度了。在此起作用的因素中，人口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也有一些人口大国未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它们人口分量的作用(例如孟加拉)，但相反的是，也有一些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或地区能够从质量上充分弥补它们数量上的匮乏(例如以色列和台湾)。然而，这些都是违反常规的例外。

① 引言由外文译成德文。

"一个世界"的思想，在全球化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积极的、催人奋进的梦想，但如果这种梦想不能变成现实，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例如可能加剧南北冲突。导致这种冲突尖锐化的因素可能会有很多，比如全球化不断推进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持续的不发达与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并存，对紧缺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军备的不断扩散，奉行侵略性、也许是"反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独裁政权的建立，以及与移民相关的冲突。（萨尔克西安，1989，第560页；诺伊弗，1982，第16页）

工业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5%左右，北约国家则只占到10%——且呈日渐下降的趋势。（科基施，1989，第421页）谢奈（1995，第431页）谈到"世界的非欧洲化"；西方列强对全球安全政治的秩序要求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在此人口因素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第三世界向北方的扩展：移民与少数民族

作为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的结果，穷国向富国移民的压力显然越来越大。对此，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角度出发应强调下列几点：

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损害（迪蒙，1993，第40页及下页）：汹涌的移民潮产生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如果这些少数民族来自一个相当另类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话，那么通常他们也很难适应新环境。正如人们偶尔也会谈及"拉丁美洲化和亚洲化"一样，同样也有"欧洲的非洲化和伊斯兰化"之类的言论。（谢奈，1995，第433页）可以断定存在这样的趋势，即原籍居民所占比例下降，而外来移民（包括他们的社会——文化一体化往往有限的后代）所占比例上升，并且，这种状况比过去更为严峻。

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许多国家都曾（或多或少）成功地实现

了对大量移民的一体化，但眼下，尤其是未来可预期的国际移民，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实际上涉及到第三世界向北方国家的扩展。对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前景，人们的估计与其说是乐观的，不如说是悲观的。

各国总是更多地通过形式上的国籍而不是“民族”来定义自身。然而，各移民群体往往继续保持着种族的认同，其人口与政治的分量也不断增加。如果移民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被同化的话，那么就存在着形成亚文化群和各种聚居区的趋势，从而有可能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本国居民”的文化认同。那么出现的将不会是民族融合的国家，而是一个割裂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其中民族归属与社会阶层就会相互制约（民族阶级），这样可能会导致极度的紧张与冲突，部分还会引起对外政策的相应变化。

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迪蒙，1993，第 45 页及下页）：较大少数民族的存在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对其母国的政策，并制约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选择。（萨尔克西安，1989 年第 555 页）

问题与冲突的输入：移民的目的国往往输入来自移民母国的问题与冲突（科基施，1989，第 422 页），例如将在目的国领土上继续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或政治冲突，西方社会的自由在此得到充分利用。众所周知，这还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恐怖主义。本地居民一体化能力的不足——也许还要加上外来的少数民族对一体化的反感或者说不能被一体化（科基施，1989，第 421 页；迪蒙，1993，第 45 页及下页）——除了对外政策的损害（“排外”），还会对紧张关系和排外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有悖于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此外，如果相关的东道国容纳其外交“伙伴”的反对派并无视与这个伙伴之间是否存在友好关系的话，那么这样的少数民族还可能恶化外交关系。

南北之间的新摩擦：移民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政治高压手段。

有些国家如果能够“撤回”自己的国民的话,它们还能为此感到庆幸。但其他国家则以“打开闸门”相威胁,例如当时的古巴,由于美国的指责而倾泻出滚滚的移民浪潮,甚至乘机把犯人和精神病人都送出了国门。在西方国家受保障的政治避难将来有可能成为独裁者用以讹诈的工具,因为他们随时能够制造出“经济难民”和“真正的”政治难民,而西方国家根据宪法则有义务收容这些人。

对西方工业国家来说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冒险,要么更加坚决地控制移民压力——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第一种选择事实上是否如其支持者所描述的那般令人神往似乎尚存疑问,因为这要付出一系列难以估量的代价和风险,诸如社会保险金的筹措和不断的文化碰撞之类的关键词的确还没有涵盖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第二种选择——即加强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则要以政治果敢为前提条件,而这在标榜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中恐难以做到。从南北关系的角度应该看到的是,与长期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来处理合法与非法移民相比,第二种选择——假如能够得以实施的话——所造成的紧张关系与冲突可能会更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外来移民很少)的情况令人颇感兴趣。

增长的人口,持续的不发达:对地区稳定的危害

爆炸式人口增长——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将使得顺利摆脱不发达的梦想十分渺茫,社会下层的生活条件可能还将更加糟糕。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所谓青年负担,换言之,就是使茁壮成长的青年一代如意地实现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困难。混乱的城市化造成了更多的新问题,除了行政管理的不胜其责之外,贫困人口也表现出比富裕阶层更加迅速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贫民区以最快速度在蔓延。然而人口的膨胀所损害的不仅是集体的生活质量,还有

食物保障,(埃利希/ 埃利希, 1990;科基施,1993)原因如下:

●现有土地资源日渐耗竭。选择贫瘠的土地带来的只有歉收,同时大量的农业用地由于错误或过度的使用而退化荒芜。

●全球气候变化也会对很多国家的农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表现在若干方面:平均气温的升高,气象过程的改变(其中包括极端天气形势的频繁发生),降水量和水循环的变化,植被带的移动,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扩大。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不能无休止地继续进行,此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充分到位。

●淡水的日渐稀少限制了农业的扩大。

●农业生产领域中最重要的发明已经完成,"创新红利"越来越低。目前,这还只涉及需要高额费用的相对的低增长。(布朗,1994,第8页)

●从头几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食品生产至少与人口的增长同样迅速,但这却不是一个长久的发展趋势。"转折"已经发生。(布朗,1994,第8页;埃利希/埃利希,1990,第68页)

●在理想的条件下,是否能为100亿人——或者更多——生产和分配充足的食物,也还没有定论。(诺伊弗,1982,第16页和第18页及下页;凯茨,1996)即使得到肯定的回答,也将是一个相当幼稚的选择,因为条件不理想,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变得理想。就是在目前,即在"只有"60亿人口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能丰衣足食,很多国家早就无力确保本国人口的基本供应了,(科基施,1993,第420页;埃利希/埃利希,1990,第69页及以下各页;发展与和平基金会,1996,第74页)并且由于进口能力不足正逐渐沦为国际救济的受益者(它们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进一步受损)。目前约10亿人遭受饥饿的折磨,另有10亿人营养不良。(埃利希/埃利希,1990,第67页;布朗,1994,第41页;布朗/凯恩,1995,第3页)

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面临的危害,人们可能还会想到,少

数民族问题不只存在于工业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隐含着爆炸性的冲突隐患，并且还会因为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各个人口群体之间数量对比的变化而进一步增强。（埃伯施塔特，1991，第119页以及以下各页；科基施，第421页）

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赶超式——根本称不上持续的——发展可能不太现实，相反，“非洲和亚洲的整个地区将陷入苦难与暴力的深渊。”（施蒂默尔，1993，第36页）

环境引发的冲突有增无减

人口的增长及对环境的多种破坏造成对地球三方面的滥用，即资源的可支配性（其中也包括淡水与土地）、生物界的再生能力以及大气的质量。尽管目前3/4的全球环境问题是由工业国家引起的，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并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也将成为大多数问题的罪魁祸首。不过，这不是按人头，而是总共，即根据它们庞大的人口来计算。（韦尔克，1987）

本文论述人口增长的全球意义，因此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对它们各自环境条件的灾难性后果，即使这些后果会得到“认真考虑”。遍及全球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性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畸形的发展表现在：人类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资源的可支配性和生态的承受力都可以无穷无尽。虽然这一错误结论人所共知，但如何安排多数人利益的方式与方法至今仍然与恰当的解决途径相对立。由于国际性的国家共同体现在已经表现出无力实施用以约束全世界的可持续原则，所以也不必期望在世界人口下个世纪将实现翻番的情况下，还能落实这一原则。因而，冲突的伏笔已然埋下。

尽管由生态原因或者多种原因共同引发的具有超地区意义的冲突还不很常见，但是人们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政策效力有限，

这些冲突的数量和爆炸性都会增加。鉴于这一事实，即在每一次冲突的产生中都有众多无法预期的特殊因素的影响，所以，对此类事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无论从地区来看还是就时间而言都无法预测，对此可以确定的是：

可分的共有财富的使用，如果它的支配量低于所有可能的使用者的要求的话，就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这无论是对不可再生的还是可再生的资源来说都是如此。对前者来说，即使新的蕴藏不断发现，它在地球上的现有总量也都是有限的。国际性经济增长和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共同加速了短缺，特别是那些不是随地可取但却处处可用的财富。在可分的共有财富中，首先是石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那些最重要的产油国和地区（近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是极富产油活力的最有影响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来看尤其如此。虽然国际市场上还不存在供应不足，但目前相对稳定的世界市场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很难承受了，况且他们也没有能力从需求方面对价格施加影响。石油时代的即将结束对国际政治的意义目前还不可预料。

资源短缺与国际冲突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表现在水资源（淡水）的情况当中。在很多地区，水资源正日益短缺，造成这种状况的混合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需求的不断增长；污染和有毒污染造成越来越多的使用限制；降雨量下降；当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不可再生的天然蓄水的消耗（贝希勒尔，1993，第54页及以下各页）；海平面升高以及极端天气形势（如风暴）的增加使地下水与地表水发生盐碱化。

许多国家不得不“进口”水（跨边境的河流或地下水），因为它们的需要量超过了本国的再生性水资源。有些国家极为依赖“进口的”河水，以至于它们必须依靠河流上游国家人民的友善。在214个国际河川与湖泊中，大多数的取水、管水和水污染都是有争议的，有些地区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需要国际社会严肃对待的程

度。(格莱希,1993,第100页;格拉策尔,1993,第309页)

由耕地和草地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具有跨地区的政治意义,而且可能还会尖锐化。全球天气过程的变化可能殃及大范围区域,如通过植被带的移动(特别是沙漠的扩大)以及某些极端天气形势的破坏性作用(飓风、风暴和长期干旱),同时由于错误或过分使用,耕地和草地也发生大面积土壤退化。还有,由于海平面的升高,很多沿海地区会长期淹没于水下。而此间,人口增长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即便由此引起的冲突首先主要在国内加以解决,但它们仍可能成为关系重大的国际问题。

在不可分的共有财富上——特别是有关大气层和所谓的沉陷地区(吸纳有害物质之地),虽然也存在着冲突,但它们几乎不会引起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因为分不清肇事者和受害者,也就不能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主要肇事者(工业国家)和主要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已很明朗。不过后者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充分履行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他们把工业国家的生态罪责视为南北冲突的新形式。一旦全球环境危机的后果更加明显,这种冲突就可能尖锐化并使其他南北问题升级。

与此相关、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世界海洋的鱼总量问题。世界海洋被视为全球公地并遭到滥用。正如迄今已经存在的一样,近海水域激烈的渔业冲突将来同样可能出现,而且由于同期鱼总量的不断缩减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将来极有可能愈演愈烈。然而,只要不再出现其他重大的冲突因素,这样的情况——还有其他生态冲突中的类似状况——也不会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安全政策问题。

生态退化的间接效应难以估计,但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大规模的环境移民。环境移民是资源日益短缺所引起的分配冲突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不仅是此类冲突的受害者,而且自己也会成为其他冲突的元凶:“冲突造成难民,但难民也能造成冲突”,(魏纳,

1995,第198页)从而可能危及国际安全,例如在出现下列伴随现象时:武装移民的入侵;损害政治稳定;对经济和社会效率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接纳国社会主导价值的威胁;组建反对自己母国的政治反对派。这些情况现在(尤其是在非洲)已经出现,今后可能事态还会扩大。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大量孟加拉人涌向世界各地可能会发生的景况。

所有因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而起的问题和冲突——也包括种族矛盾——的加剧可能侵害国家结构,并导致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权的建立,(霍默—狄克逊,1994,第6页及下页和36页;1991,第77页;贝希勒尔,环境破坏,第53页;贝希勒尔,1994/1995,第45页及以下各页)从而不仅地区稳定受到威胁,南北关系也会恶化。还有一些易于煽动人心并成为御用工具的极佳论据表明,在南北生态冲突中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加充分的准备,这些论据矛头直指工业国家的自我生态特权化,认为工业国家本质上是转移自己的环境污染,也就是对所有国家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无理要求。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深受自己造成的、因持续的贫困和"进步"引起的环境污染之苦,但这些污染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向外转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说几乎不会危害工业国家。(霍默—狄克逊,1991,第77页及下页;贝克,1995,第17页)

全球化讨论中的人口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多方面的过程,不仅涉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全世界的实行,还包括国际系统中国家作用的变化(逐渐被削弱),各种行为体之间跨国相互依存的加深,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或"世界文化"(例如价值、规范、象征、语言、行为准则、优良管理、民主政治、人权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的匀质化效应,通讯的跨国界密集化,国际移民的增多以及对造成国际危害的共有问题(例

如军备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气候难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疾病和毒品消费的蔓延）的敏感程度的上升。

当然，也存在一系列与全球化过程成功推进背道而驰的其他因素，如：分化和边缘化效应，重点反西方的民族和种族复兴运动，在改变了的框架条件下南北冲突可能的新形式，与日俱增的、胜少败众的争夺资源、权力和机会的斗争，具有跨地区后果的国内抵制行动，越来越多的国际控制和稳定问题，混乱潜力的激活，构建国际结构的人员未能完全民主合法化，推卸国际责任，反抗“工业国家全球经济恐怖”。与这些因素相比，全球人口增长至少必须等量齐观，但这还不够，因为人口增长本身就强化而且是大为强化了上述因素。

因此，如果全球人口增长——如此前一样——依然得不到重视，在判断全球化前景时就会缺乏远见。只要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变，整个全球化讨论就会陷入僵局，因为它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因素已经对当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曼弗雷德·韦尔克）

参考文献：

贝希勒尔，京特，1993：环境破坏：战争还是合作？明斯特。

贝希勒尔，京特，1994/1995：环境战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吗？载于：埃贡·巴尔/迪特尔·S·卢茨（编），我们的共同未来——全球挑战，巴登—巴登，第45～50页。

贝克，乌尔里希，1995：国际风险社会。关于全球危险的政治活力，载于：国际政治，50，8，第13～20页。

贝雷尔森，贝尔纳德/罗伯特·哈夫曼，1979：关于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资源配置，载于：国际计划生育展望，5，4。

布朗,莱斯特,1994:科学打出问号,载于:政治生态学,12,38,第8~11页。

布朗,莱斯特/哈尔·凯恩,1995:重估地球的人口承受力,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

谢奈,让—克洛德,1995:北方/南方:人口比较,载于:国际政治,秋季号,69,第423~436页。

迪蒙,热拉尔—弗朗索瓦丝,1993:人口统计学与地缘政治学,载于:国防,4月号,第37~54页。

艾伯施塔特,尼古拉斯,1991:人口变化与国家安全,载于:外交,夏季号,第115~131页。

埃利希,保罗/安妮·埃利希,1990:人口爆炸,伦敦。

格拉策尔,克里斯蒂安,1993:水——未来的冲突因素,载于:奥地利军事杂志,31,3,第309~314页。

格莱克,彼得·H.,1993:水与冲突。淡水资源和暴力冲突,载于:国际安全,18,1,第79~112页。

霍默—狄克逊,托马斯·F.,1994:环境的短缺与暴力冲突。个案证据,载于:国际安全,19,1,第5~40页。

霍默—狄克逊,托马斯·F.,1991:开端。引发激烈冲突的环境变化,载于:国际安全,16,2,第76~116页。

凯茨,罗伯特·S.,1996:人口、技术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贯穿历史的红线,载于:Daedalus,125,夏季号,3,第43~71页。

科基施,弗里德里希,1989: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21世纪的冲突隐患,载于:奥地利军事杂志,5,第417~422页。

科基施,弗里德里希,1993:世界营养问题并非未来危机,载于:奥地利军事杂志,31,4,第296~305页。

诺伊弗,马丁,1982:地球并未同时膨大,慕尼黑。

萨尔克希安,萨姆·C.,1989:战略中的人口问题,载于:生存,31,6,第549~564页。

发展与和平基金会(编),1996:发展、文化、和平:世界新秩序展望,波恩。

施蒂默尔,米夏埃尔,1993:大规模移民:国际安全的背景,载于:霍斯特·西贝特(编),移民:对欧洲的挑战,蒂宾根,第31~38页。

魏纳,迈伦,1995:安全、稳定和国际移民,载于:肖恩·M·林恩—琼斯/史蒂文E.·米勒(编),全球危险。变化的国际安全,剑桥,马萨诸塞/伦敦,第183~218。

韦尔克,曼弗雷德,1987:第三世界的环境破坏,慕尼黑。

韦尔克,曼弗雷德,1997:人口增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埃本豪森: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韦尔克,曼弗雷德,1999a:拉丁美洲人口增长的后果,埃本豪森: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韦尔克,曼弗雷德,1999b:全球人口增长对国际政治的后果,载于:政治与当代史,国会周报增刊,3月5日,B10/99第21~29页。

传播媒介—通讯—文化：全球化讨论的歧途与前景

电讯领域，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和网络常常被看作是全球化的动力（加迪斯，1991；吉登斯，1984；1985）。全球通讯不只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而且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如果没有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递，这种通讯根本不可想像。正如经济变化导致越来越强烈的物质流动一样——全球化萌芽的观点——全球通讯业也引发了非物质的流动、价值观念的交流变化和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网络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和人权的希望有赖于通讯传播媒介的中介作用。

由于一系列迹象表明高度工业化国家控制了这个过程，比如，大型西方通讯社一直垄断着绝大部分国际新闻传播，因此约翰·加尔通在其《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一书中将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描述为文化和通讯帝国主义的联合也就不足为奇。（加尔通，1972）像全球化的“悲观主义者”一样，在“全球化”概念被完全创立之前，“乐观主义者”就已经在通讯和传播媒介领域存在。全球化不是固定的理论，而是一种使许多传统的关于全球通讯、现代化、依赖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讨论统一起来的范例。

然而在传播媒介和通讯的联系上，全球化过程是不相同的，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平衡作用的传播媒介的能力存在争议。因此，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全球化评价的基础均受到了损害，因为尽管有不同的规范评价，但这两个方向都起因于全球化存在这个前提。除了传播媒介和适应于世界文化的“全球村”思想之外，在讨论中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小流派，它强调现存全球通讯系统的保守力

量。在这个流派看来,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以比通常所想像的还要强大得多的规模被模仿传播。所以,虽然存在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但迄今为止,全球性标准在反国家、宗教和其他传统思维模式的政治与文化指导思想上仍没有被普遍接受。从这一角度看,面对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像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事件一样,世界文化状况更可能是正常现象的例外。传播媒介和电讯总是借助不同的网络传递全球信息材料,这种信息还可以随意地加以利用。这里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全球化中,资本和技术现代化的扩张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有意义的不是对全球化思想进行匆忙的归类,而是重新思考通讯传播媒介与全球化之间理论联系的经验基础。在人们认为全球化是否和以何种形式值得期望之前,全球化是作为全盘西化被拒绝,还是作为完美的现代化被接受,必须清楚全球化是否是一个同样包含所有生活领域并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社会的过程。

下面将探讨传播媒介和通讯领域中的几种矛盾的全球化现象。这里主要将近东和伊斯兰国家的背景联系作为经验范例。然而思考的说服力并不限于这一地区,在世界其他区域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发展。

传播媒介作为“交流的世界系统”:向现实主义观点接近

在全球化讨论中,传播媒介常常被认为是统一的现象。如果不区分各种全球化思想流派,人们可以引证不同传播媒介部门出现的大量不同类型、有时还彼此相反的发展来予以论证。

这里至少可以列举四个传播媒介部门,它们一直被作为明显的全球过程的例证:

●世界范围内,外国(通常是西方)卫星电视和广播节目的接收。

●地方和区域卫星节目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媒介市场。

●借助网络的全球信息网络化。

●国家印刷和电子媒介的外国报道。

集权体制几乎不能有效阻止人们直接接收外国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这可能是全球化讨论所关心的最常见的论据之一。比如,尽管制定了相应的法律禁令,但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仍然只是很不认真地尝试在这一环节实行传播媒介主权的独裁形式。从那些政体的角度来看,人们必须考虑到为防止失去因对私人领域的广泛侵犯而使政治体制遭受的合法性所进行信息检查的部分损失。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与欧洲和美国的私人电视相似,发展中国家卫星电视的使用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借助外部传播媒介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受检查的传播媒介领域,以此促进世界范围内政治文化的民主适应,这种因全球化理论家所代表的观点只是极为有限地为现有的经验使用调查所证实。不难发现,在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持续收看欧美节目是一种仅限于少数精英范围的现象。获得卫星接收技术上的障碍、语言障碍或对为西方观众所设置的节目缺乏兴趣等等,尤其妨碍了下层和中下阶层的正常使用。(穆斯塔法维,1997)然而正是中下阶层——学生、教师、小商贩以及其他——构成了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推动力,因为较高的教育水平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困境和政治分裂相互联系在一起。人们不能指望通过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使用西方的传播媒介节目来从根本上推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发展中国家的使用者从外国节目中间接获得的有关他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很少能够通过它们自己已受到审查和传播媒介的有限节目传递出去,这也减弱了全球化的热情。西方的外国报道通常只能有条件地满足这种知识信息传播的前提条件,因为除了某一

危机之外，有限的电台不能保证连续报道。然而，在激烈的冲突形势下，西方电台常常表现出能提供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信息节目。

为了支持西方传播媒介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内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论点，这样一些通讯分散的情况几乎还不充分。西方广播电视节目的政治影响是一种“旅馆——全球化开端”。西方科学家和专家为在从卡萨布兰卡到雅加达的各个大旅馆都能接收到它们本国电台的可能性感到激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的社会使用这一事实还不可改变。

在发展中国家，接收西方节目与收看本国新的卫星电视相比，卫星电视很少受到欢迎。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地方传播媒介市场的增加被反复解释为传播媒介全球化的标志。（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1994；布赖登巴赫/楚格里格尔，1998）实际上，比如在沙特阿拉伯，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起一个具有大量新电台的电视帝国，（哈菲兹，1996）而且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生产的电影影片比好莱坞生产的还要多。尤其在电视生产方面，向西方新闻职业标准的接近也很引人注目。在如埃及和约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新闻节目看起来也与美国或德国相似。向媒体美学和各自文化美学部分的适应容易被描述为全球化的征兆。

但是，政治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让人认识到，尽管出现形式和审美标准的接近，传播媒介生产者和市场的新的多样性在内容的基本趋向上不是指向全球化方向，而是分散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卫星电视世界性扩展的速度令人惊讶。同样，集权国家领导阶层对全球化各层面进行政治检查控制的容易程度也值得注意。虽然大多数新的节目供应都属于私人产业，比原来的国家电视更现代、更符合市场需要，但它们在政治倾向上更少地亲国家（哈菲兹）。除了如在阿拉伯世界颇受欢迎的批评性电台贾泽尔这

样的特殊情况下，在全球化时代，亚洲和非洲的电视市场在政治上依然是依顺驯化的。即使是跨国播送的电台如鲁珀特·默多克明星电视，也必须对权威国家的规定作出让步。（昆茨克/齐普费尔，1996）各种预言很少证实：跨国新闻企业能够摆脱民族政府的控制，并开始终结权威民族国家模式。相反，长期以来，分散的传播媒介发展领域内全球资本和扩张利益的目的，在于与政治权力拥有者之间达成妥协而不是对抗。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近东，分散的传播媒介市场根本不可能直接达到西方的新闻媒介自由的标准。即使在拉丁美洲，它已经实现了从权威新闻传播体制向经过调整的自由传播媒介体制转变，许多国家中私有制新闻传播媒介资本与国家领导之间的顺从关系也比欧洲更为鲜明，以致于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独立的新闻传播媒介。

特殊的条件适用于与传播媒介相关的全球化讨论的第三领域——网络。一些权威体制就此也努力争取通过补充常用的限制方法，从直接的警察干涉和借助过滤系统与网页指南进行的网络端口限制到鼓励自愿自查，来实现对传播媒介的政治控制（格鲁勒，1997）。然而，为了能实现全球化乐观主义者与网络连接的希望，即弥补南北之间的信息和教育差距，提高文明社会的价值地位，以及促进边缘国家民主化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在大部分国家缺少经济和技术前提条件。与卫星电视相比，人们更少地提及全球范围内网络的广泛使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整个非洲才有不到 10 个网吧，而且目前网络连接的增加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远远落后于欧洲、美国或者日本的迅速增长。只要提到网络，南北之间的信息和知识鸿沟不是在减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也存在一种特殊的发展，它描述了目前网络对全球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持续影响。只要生活在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那么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派、移民和流亡者就会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来促进全球相互作用。尽管他们的祖国没

有与全球信息和新闻潮流更有效地联结起来，但是移民群体利用技术途径和常常较大的政治言论自由首先在西方国家表达政治立场，构建交际网络；(曼达维尔，1999；洛尔克尔，1997)他们也利用扩大移民文化知识含量的发展，这种发展有利于区分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文化，而且通过大量个人渠道反映到区域之中。在空间分散的少数派飞地的网络化中，可以感觉到朝全球村方向发展的明显进步。

在全球化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外国报道。与网络不同，这里涉及中介新闻，就是说，在新闻制造者与接收者之间并不直接进行信息交流，而是先由传播媒介组织和新闻记者进行加工整理。鉴于全球信息量的不断增长，对信息的新闻学组织的需要也在增加，以至于像在全球化讨论框架内有时所设想的那样，人们不能期望报刊、广播和电视这些传统的传播媒介部门将为网络所取代。(梅克尔，1998)

全球化乐观主义转变开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外国报道迅速、持续、跨国界地介绍了政治、社会与文化事件的现实知识和画面，也导致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形成紧密的交流网络。大多数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介系统是否能完成这一任务，仍然是一个评价标准与传播媒介成效的可测性问题。在后现代全球化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激进结构主义观点反对对现实存在的独立感觉的理解。与此相反，从重构主义的角度看，外国报道介绍的也许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形象。这种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文化相近的国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与冲突，以及理解多样化的领域，简言之，非常有限地集中在那些对本国新闻传播媒介体制具有特殊新闻价值的新闻。(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等，1985)由于对这些现实片断的解释带有特定的国家、地方或其他分散的意识形态特点，结果，即使是在政治体制相似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以同一消息来源为基础并经过解释加工的事件也常常被外国报道描述得完全不同。

(古列维奇等,1993)

因此,外国报道一方面是一种介绍世界知识的手段。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驯化”。外国报道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仅在于这种有限的意义。另外,一系列调查自相矛盾地表明,在90年代这个全球化的10年里,人们对外国报道的兴趣减弱了。在公共合法广播电台机构中,相应的电台数量有限,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原则上私有广播电台几乎不存在。(梅克尔,1998)美国的调查研究显示,冷战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对世界大事的兴趣比后面的年代要大。(诺里斯,1995)具有经济结构转变和由移民引起的文化导向丧失为特征的全球化明显促进了新闻受众的精神“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不能用简单化的“全球村”观点来解释。

总之,由已经建立起来的新闻传播媒介部门来看,我们可以断定,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预测全球化的趋势。“新闻传播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文化、价值或整个政治秩序的产生,或者有助于现有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新型工艺技术的加强,只能由不同的理论观点来回答。

显然,尽管在网络领域,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工艺技术条件方面仍将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差距,但在电讯领域,全球信息的网络化却已得到发展。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方面——报刊、广播和电视,网络化也取得了进步,但同时可以看到一个全球传播媒介网络分散使用的强烈趋势:例如,通过对西方电视节目接收的精英限制和国家与国家语言节目(经由卫星)的迅速增加,或通过国外报道的“驯化”等等。

为了清楚地说明新闻传播媒介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相互依赖的观点。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1977,8f)强调,“网络化与相互依赖不同”。“网络化”在这里被定义为“货币、商品、人员和新闻的跨国界交流”。“相互依赖”则被理解为彼

此相互依赖的合作伙伴之间赢利、损失或零总游戏。（奈，1992，162）大众传播媒介是全球化和全球信息新闻流动的网络系统。由于大多数传播媒介主要面向国内、民族或地区市场（跨国传播媒介如美国有线新闻网例外），在某种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介仍然只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国际经济交流必须考虑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的利益，然而，与刚处于萌芽状态的跨国政治体制的关系相比，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公众利益和国家政治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与伊曼纽尔·里希特（1992，163）的估计一样，那些以"作为系统理论单位的交流社会"的整体存在为出发点的观点，不能明确区分网络化与相互依赖[①]。一般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国家社会和政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从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性的角度看，它们至少是局部的分裂。

全球化—文化—认同：交流作为理解全球文化发展的缺失环节

"全球化"大讨论并不统一，而是划分为一系列的讨论。各个科学学科都确定了极不相同的重点。一方面，在以通讯科学为导向的社会科学中，有关全球化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这些文献所描述的改革与依顺理论家的立场得到了加强，然而，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经济科学中，通讯概念经常只是以电讯和传播媒介的形式出现。（巴克尔，1997；斯雷贝尔克—穆罕默迪等，1997）如果全球化不能逐渐形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活力的现象，那么人们就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地将它列为主要被认为是决定性的经济全球化的

①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指出，与大部分贸易不同，像教育交流和旅游一样，全球通讯的其他部门也不能被看做是相互依赖的系统。英克尔斯，亚历克斯 1975：正在出现的世界社会结构，载于：世界政治，27，第 467 - 495 页。

一个重要前提。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比较，更为令人惊奇的是，所谓的信息时代被称颂为经济发展的哥白尼式的转折。

从技术中心论的角度看，电讯对政治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评价过高，这属于全球化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同时，很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的交际特征几乎还没有人研究，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内，尤其有利于促进政治和文化相似领域的全球化的全球通讯潜力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一篇有关全球化文献的概况文章中，玛丽安娜·拜斯海姆和格雷戈尔·瓦尔特这样总结(1997,174)：

“在部分文献中，全球化(……)从理论创立一开始就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过程。其他专业领域的发展——如通讯、文化、移民、环境——要么已渐渐隐退，要么被视为经济变化的单纯的表面现象。在我们看来，总体上没有理由赞成这种分析视角上的经济狭隘性。”

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过程相联系，通讯不应该归结为一种工具性视角。除了传播媒介的仪器工具外，通讯概念还指个人、国家和文化领域之间大量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些过程像经济过程一样对全球化的未来同样非常重要。通讯的本质不只在于它将信息从A点传递到B点，而是在传递中改变它们。此外，通讯并不绝对都是富有成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体的交流能力也极不相同。全球化最强有力的一个调节因素，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映经济基本数据资料的发展，反而是心理、感觉和通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全球化的经济主义思考方法是不可能的，揭示政治学中通讯的主要现象很有必要。

如果人们研究全球化与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通讯观点说明了现存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矛盾的观点(参见：本书中特茨拉夫的导论)，并在它们之

间调解斡旋。全球化乐观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正处于产生之中，这种文化意味着文化区特征的进一步混合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克服人们之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实现人权理想：巴别塔的最终倒塌（译者注：巴别塔指基督教《圣经》中未建成的通天塔）。（布赖登巴赫/楚克里格尔，1998，205ff）与此相反，悲观主义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是发生了混合，而是西方结构的过度化，它使发展中的文化边缘化，并要求进行适应调整。在悲观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文化侵略的过程。（莫拉纳，1999）在全球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不是跨文化认同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终结，就是恪守各自的文化同一性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信条。

这两个论点过于简单化，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并不理解文化、文化的形成和产生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作为交流行为的结构和变化的过程等等。两个核心论点是：

●文化认同的坚持和扩大都是依赖于文化间和跨文化交流是否发生或者这种交流是否遭到拒绝的过程。

●文化、亚文化和各自的文化载体分别偏爱哪些交流战略，这是一个文化定义和力量对比的问题。

如果人们首先专心研究文化的交流结构问题，那么文化领域中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交流影响的例子是塔马·利布斯和伊莱休·卡茨（1990）关于像在非欧文化圈的《达拉斯》一样的西方肥皂剧的消费调查（译者注：肥皂剧是一种情节感人的广播系列或电视系列剧，在美国常由肥皂制造商资助制作）。除了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作为支持悲观主义的西方化全球化论点的标志外，各个调查国的电视观众对《达拉斯》的理解方式和意含所指都极不相同。卡茨和利布斯的调查之后接着是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相似地发现早年《达拉斯》在法国（赫尔佐克—马辛，1986）、荷兰（昂，1985）和阿尔及利亚的不同的使用过程和后续讨论。所有研究表明，不是只进行单向

的美国文化传输，在虚拟传播媒介商品输入的过程中，也成功地获得了鉴赏力。因此，文化不是统计量上的大小，而是在语言、视觉或听觉符号编码和解释的原始交流行为中，其设计构造不断更新。(哈尔，1981)文化符号都需要解释，而且文化成员通过各自使用的理解范畴来解释说明：什么与驯化过程相似，这一过程在如上已经提到的外国报道中如何被描述。然而，这些对《达拉斯》不同解释的事例清楚表明，不完全只存在相互区别的文化价值，而且家庭也是一个对文化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达拉斯》是一个参照系统，它使不同文化区能够重视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家庭概念。因而《达拉斯》是一种美国的文化出口——在利用过程中，像普遍的思想背景一样，地方的思想背景也发挥了作用。

卡茨和利布斯的调查让人对西方的"文化侵略"到底发生与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文化帝国主义观点以抑制全球化过程中的非欧文化为出发点，低估了这些文化借以保护自己的象征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否能消除文化差别，或者逐渐产生的全球文化特征并不在于，像布赖登巴赫和楚克里格尔所言，文化异同是否能越来越强烈地通过同样的参照系统表达出来，(布赖登巴赫/楚克里格尔，1998,209)这些仍然存在争论。即使是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并不是单纯的出口，而是由文化转型过程所决定，像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不同人权根据一样，民族文化——音乐的多种混合形式表明了这一点。

布赖登巴赫和楚克里格尔把世界"麦当劳"化的观点真正看成是全球化的庸俗想像。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不仅在非欧国家而且在西方都存在极不相同的流派，他们反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文化侵略的观点。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全面拒绝使用非伊斯兰参照系统，坚持传统意义和解释。文化的交流结构概念被对统一的、非研究性的思想的保守理解所替代，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关系也被认为根本不相容。伊斯

兰的文化解释设置了大量的交流障碍,既反对自身文化的新解释,也反对其他文化的新注释。然而,对传统文化解释的退却被理解为西方进攻性全球化时代保护认同的惟一途径。鉴于在所有其他文化区(如印度原教旨主义)同样存在差异巨大的活动,全球化过程不能被视为向全球文化的线性发展,而是同时表现出各大洲彼此相反的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莫利/罗宾斯,1995)

在西方,差异性和交流拒绝不仅出现在欧洲新的右翼中,而且出现在像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这样一类文化概念的普及中。像伊斯兰、儒家文化和西方这些世界文化不可避免或至少是内在的冲突的确切范例从本质上否定了文化的交流特征及其解释和变革能力。亨廷顿错误地认为,伊斯兰世界反西方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误解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比《文明的冲突》更为显著的是文化之间"缺乏交流"。(哈菲兹,1997)与亨廷顿相反,哲学家们,比如埃及人纳斯尔·哈米德·阿布·扎德,虽然并不总是把伊斯兰传统看做对政治理论有用,但它根据理性解释改革伊斯兰和向西方纲领接近的"积木原则"开放了人权。(阿布·扎德,1998)

伊斯兰主义者与阿布·扎德之间的矛盾表明,意欲理解全球化中文化和通讯之间关系的尝试不能局限在只强调文化的交流特征。更确切地说,在任何个别情况下——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时期——必须研究哪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解释力。(哈尔,1996,5)文化的交流特征不仅仅在于文化符号的解译和编码过程,在于文化定义或文化结构,而且也在于一定意义的成功传播和公开实行中。

并非偶然的是,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已经赢得更大欢迎的伊斯兰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既是伊斯兰主义者同时也是敏锐的传播媒介策略家。他们利用如录像这样的小型

传播媒介工具来逃避国家审查，宣传他们的目标[①]。他们特别注意利用西方传播媒介和世界公众，以便通过对本国的反作用，将他们的政治价值提升为取代现有体制的惟一选择；而且他们控制了传统的交流机构如集市和清真寺。(拉旺，1996)前南斯拉夫政治的民族化就是一个即使不是由不同意识形态的有力联系所引导和引起，也是由它推动的过程。如果彼得·格洛茨(1995)要求对这个地区实行新闻危机管理，在这种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化全球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交流力量对比基本一致的文化力量对比如何发展。在有赖于不同政治和世界观流派的细微差别中，民族文化观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文化观常常包含在如"西方"、"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这样的文化区概念中，并且随各自公共交流及其不同文化解释的主要流派的相应导向而出现(参见：上面有关外国报道"驯化"的描述)。如果涉及到统治形式(如优良管理讨论)或人权问题，跨文化交流(赖曼，1992)和全球文化的产生就要求现存文化概念的解体或相对比。

交流影响和文化的定义力最终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来区分。考虑到高度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不同，交流的准备只是开始才有限地存在，(巴尔托利，1992)就这点来说，南北冲突与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交流的潜力与其说在于这种理解力，不如说是这种论断：全球化不仅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发展或文化认同相联系，而且全球化的所有要素都与交流准备、交流战略和全球化行为体的交流影响处于功能联系之中。如果从各个层面来理解交流的中心作用，并将交流的工具

---

① 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准备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霍梅尼曾使用录像。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安娜贝勒/阿里·穆罕默迪，194：小传媒，大革命。通讯，文化和伊朗革命。

性解释扩大为全球“网络”和随意利用与扩建的“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对全球化是否并以何种形式继续向前发展作出判断。

原则上,通讯是顺利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不同速度的缺失环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联系而且不具有理论性,但约翰·加尔通的“另一种全球化”使文化和通讯成为全球秩序的基本价值不是没有可能的。(加尔通,1998)

(凯·哈菲斯)

参考文献:

阿布·扎德,纳斯尔·哈米德,1998:人权——女权:走向民主之路,载于:德国——阿拉伯大众传播媒介对话,对外关系研究所编,斯图加特。

昂,伊恩,1985:观察达拉斯,纽约。

巴克尔,克里斯,1987:全球电视,入门,牛津。

巴尔托利,海克,1992:文化间交流的障碍,载于:赖曼(编),跨文化交流,第 174~191 页。

拜斯海姆,玛丽安娜/格雷戈尔·瓦尔特,1997:“全球化”——概念发展过程中的缺点,载于:国际关系杂志,1,第 153~180 页。

本特勒,京特,1992:电视与现实。重构大众传播媒介理论的开始。载于:克努特·希克蒂尔/伊尔梅拉·施奈德(编),电视理论。柏林,第 45~67 页。

布赖登巴赫,约安娜/伊娜·楚克里格尔,1998:文化争论。全球化世界中的文化认同,慕尼黑,第 61~67 页。

加迪斯,约翰·刘易斯,1991:关于后冷战世界,载于:外交事务,2,第 102~122 页。

加尔通，约翰，1972：帝国主义结构理论，载于：迪特尔·森根哈斯（编），帝国主义与结构性暴力，依赖性再生产分析，法兰克福，第29～104页。

加尔通，约翰，1998：另一种全球化。21世纪文明社会的前景，明斯特。

吉登斯，安东尼，1984：社会的组成结构，剑桥。

吉登斯，安东尼，1985：民族国家和暴力，剑桥。

格洛茨，彼得，1995：大众传播媒介与对外政策。东南欧与欧洲联盟之间关系发展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载于：东南欧消息，1，第1～7页。

格鲁勃，亚历山大，1997：网络绝对自由的终结？归罪内容对信息社会的影响，马尔堡。

古列维奇，米歇尔/马克·R·利维/伊扎克·勒，1993：全球新闻编辑室：电视新闻全球化中的趋同与多样性，载于：彼得·达尔格伦/科林·斯帕克斯（编），通讯与公民。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纽约，第195～216页。

哈菲兹，凯，1996：沙特阿拉伯广播与电视，载于：广播与电视国际手册1996/97，汉斯—布雷多广播与电视研究所编，汉堡，第91～95页。

哈菲兹，凯，1997：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斗争？载于：凯·哈菲兹（编），伊斯兰与西方。策划对话，法兰克福，第15～27页。

哈菲兹，凯等：中东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变革模式，载于：凯·哈菲兹（编），大众传播媒介与中东社会，克雷斯基尔。

哈尔，斯图尔特，1981：编码/解码，载于：斯图尔特·哈尔/多罗西·霍布森/安德鲁·洛/保罗·维利斯（编），文化、大众传播媒介、语言。文化研究未定稿，1972～1979，伦敦，第128～138页。

哈尔，斯图尔特，1996：谁需要“认同”？载于：斯图尔特·哈尔/保罗·迪盖（编），文化认同问题，伦敦，第1～17页。

赫尔佐克—马辛,赫塔,1986:解读达拉斯,载于:社会,1,第74~77页。

亨廷顿,塞缪尔,1993:文明的冲突? 载于:外交事务,3,第22~49页。

基欧汉,罗伯特/约瑟夫·奈,1977: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波士顿/多伦多。

昆茨克,米歇尔/阿斯特丽德·齐普费尔,1996:大众传播媒介市场的全球化:鲁珀特·默多克与他的帝国,载于:当代南北,4,第768~779页。

利布斯,塔马/伊莱休·卡茨,1990: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读物,纽约。

洛尔克尔,吕迪格,1997:虚拟穆斯林——网上伊斯兰与阿拉伯,载于;东方,2,第236~244页。

曼达维尔,彼得,1999:数字伊斯兰:改变宗教知识的界限? 载于:SIM简讯,3月,第1~2、23页。

梅克尔,米丽娅姆,1996:网络化世界。全球信息社会的前景。载于;米丽娅姆·梅克尔/马库斯·克里内尔(编),国际通讯。导论,奥普拉登,第299~321页。

梅克尔,米丽娅姆,1998:电视中外国报道的结构,载于:克劳斯·坎普斯/米丽娅姆·梅克尔(编),电视新闻。过程,结构,功能,奥普拉登,第257~274页。

莫利,大卫/凯文·罗宾斯,1995:认同的空间。全球大众传播媒介,电子风景和文化边疆,伦敦。

穆斯塔法维,贝尔卡塞姆,1997:马格雷布的外国电视——一种具有文化和政治影响的传播媒介,汉堡,第425~455页。

莫拉纳,哈米德,1999:全球传播媒介讨论的继续:对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意义,载于:凯·哈菲兹(编),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伊斯兰与西方,全球化世界中的破碎形象,克雷斯基尔,第105~118

页。

诺里斯,皮帕,1995:运动的探照灯:冷战世界的网络新闻创作,剑桥。

奈,约瑟夫,1993: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介绍,纽约。

拉旺,希·穆罕默德,1996:阿富汗传统通讯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载于:东方,3,第495~509页。

赖曼,霍斯特,1992:跨文化交流与人类社会,载于:霍斯特·赖曼(编),跨文化交流与人类社会,全球相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践,奥普拉登。

里希特,伊曼纽尔,1992:世界统一的瓦解,现代理性与全球性,法兰克福。

舒尔茨,温费里德,1976:新闻媒体中事实的虚构。现实报道分析,弗赖堡。

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安娜贝勒,1994:国际交流中的全球与地方,载于:詹姆斯·柯伦/米歇尔·古列维奇(编),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伦敦,第177~203页。

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安娜贝勒/德韦恩·温塞克/吉姆·麦克纳/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编),1997:全球背景下的大众传播媒介,读物,伦敦。

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安娜贝勒/卡勒·努登斯腾/罗伯特·史蒂文森/弗兰克·乌格博阿贾(编),1985: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外国新闻:29个国家的国际报道。大众通讯研究国际协会为联合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总结报告。巴黎。

第二部分

亚洲：对“亚洲危机”的反应，印度相互对立的讨论与中国的全球化乐观主义

亚洲危机是全球化的边缘化吗？区域评价

1997～1998年的亚洲货币和金融危机严重地阻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1998年底以来预言的重新稳定趋势是意味着有关国民经济的长期恢复和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的回归，还是危机将更快加剧，学术界对此存在分歧。那么，亚洲危机是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一次必要的“调整插曲”，或者仅仅是更长期的结构危机的开始呢，这种危机要求人们采取重大措施朝

着区域化和选择性保护主义方向来抑制“失序的市场”，对此目前也不能确切地定论。

迄今为止，亚洲① 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信奉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准备进行超国家的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似乎意味着完美无缺，只不过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依然有阻力。换句话说，在亚洲部分很有影响的精英人物看来——主要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全球化被视为是能脱离其社会同样不可缺少的要求——民主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纯粹经济活动。反民主的制度思想和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被用来反击福山（1992）在作为西方自由社会模式胜利的《历史的终结》中所描述的幻想。在亚洲，有关经济和政治文化全球化之间存在必然的相互依赖的观点似乎也能被驳斥为经济繁荣和政治权威之间有其一致性，至少有这种可能。199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和 1998 年下半年马来西亚改革运动逐渐形成以来，“亚洲模式”在政治方面好像已经走到了极限。看来亚洲必须忍辱前进，按全球化的要求进行经济和政治结构调整，进而完全为欧洲——大西洋文明模式所征服。

自 1997 年中期危机爆发后至今仅有几年时间，虽然目前没有人对区域经济和政治前景发表明确的意见，但是在如下有关问题上仍然可以得出一个中期结论：亚洲近来进行的关于市场高度自由化的意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自由紧缩政策的讨论会出现哪些结果呢？克服危机——人们会想到 1998 年 9 月马来西亚令人瞩目地实行了局部的资本流通管制——一定要以反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为代价吗？在经济方面将来也会由此出现与西方的鲜明界线吗？或者除了——感觉到的——必要的经济调整反应外，对亚

① “亚洲”——如果不做更为详细的解释——包括如下第一代和第二代“虎国”，基本上是东亚和南亚国家。

洲全球化成功前提的理解更可能倾向于按照西方模式坚决把民主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球化所内含的完美使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包括个人主义政治文化,按照自然规律得到发展,——尽管存在各种不利的说法,在社会模式选择的意义上,这种完美正在谋求“历史的终结”,据此,难道人们应该给这些受全球化理论启发的命题增添新的内容?很长一段时间在本区域到处流传这样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只要坚决支持“亚洲价值观”和“反西方”的发展道路——但不反现代——就预示着将来的成功,亚洲危机就是这种观点的催化剂吗?

下面应该概略地描述一下自1997年中期危机爆发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从亚洲地区不同国家精英们的言论、思想和预测中得出的见解。在此,我将亚洲危机三个方面的内因评价区别开来,它们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层面有关——亚洲危机作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或者说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危机)。最后应该思考的是,从单个反应中到底能为将来理解区域全球化得出哪些结论[①]。

亚洲危机——一个简短的评析

在国际投机商的压力下,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最终被迫宣布本国货币铢与美元脱钩(原因见下),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先后陷入了程度至今未被控制的金融危机的混乱之中。与年初相比,到1997年底,马来西亚林吉特损失了41%,泰铢和韩圆也贬值50%,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70%。(韦格尔, 1998,

① 所有名称未经证实的文章,主要载于香港杂志《远东经济评伦》,都出自所谓“亚洲人”之手,通常是区域学者、金融市场专家、企业家和政治家。

142)数千家企业登记破产。[1]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到1998年底,该地区将新增1000万失业者。(远东经济评论,1998.12.31～1999.1.1,22)

在经济危机之后,紧接着到处出现政治危机。1997年秋,泰国差瓦立政府被迫辞职,以示对危机负责。在韩国,作为危机标志的日益尖锐的劳工关系加重了1997年12月新选总统金大中上任的负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他的指定继承人安瓦尔·易卜拉欣之间的矛盾也摊牌了。安瓦尔主张马来西亚经济实行更激烈的自由化,含蓄地指责政府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危机政策。为此,安瓦尔失去了政治职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落入马来西亚司法机构手中。同时他担任了反对他的政治养父马哈蒂尔的新改革运动的领导人。[2] 最后,印度尼西亚不仅结束了苏哈托时代,而且发生了以前几乎不可想像的的政治分裂,这种政治分裂主要表现为激烈的社会暴力和种族宗教冲突。然而,为苏哈托所歪曲的苏丹体制的根本民主化前景却已初现端倪。(舒伯特,1999)

毫无疑问,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几个国家受危机的打击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得多。这些区域国家几乎不可能抵御货币投机,它们不确切的基本数据资料(据说)已经被歪曲"变样"——这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部门的惊人"泡沫",工业部门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巨大的财政收支赤字以及很少整顿因而不透明的金融市场和企业部门。相反,那些一般看来虽然宏观经济数据也存在问题,但坚持一定的资本流通监管,而且拥有可观的外汇储备的国家显然能够较好地对付危机。极权体制和极为脆弱的联合民主国家——如印度

① 1998年初韩国贸易联盟报道,危机开始以来,每天平均有200家韩国企业关门停业,这意味着每天增加4000名失业者。(布拉德,1998,537)

②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审理,1999年4月安瓦尔由于滥用职权被判处6年监禁。当月,他的夫人旺·阿齐扎建立了正义党,打算将反对派联合起来,继续进行反马哈蒂尔的政治斗争。

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国内政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了暴力骚乱。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危机引发了政府的更迭;至少从发展趋势看,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权威的退却。相反,一些实行区域联合民主的地方,比如台湾和菲律宾,则似乎能够避免政治危机的爆发。

在西方国家和债券国银行的有力干预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控制了对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援助,同时责成这些国家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加速推进其市场的自由化。马来西亚抵制了这种外部干涉,而且部分地从国际金融市场撤回。马来西亚有选择地实行资本流通监管的做法和马哈蒂尔总理对美国投资管理者乔治·索罗斯的敌意抨击就是亚洲对危机最引起轰动的回应。然而,在区域政治和经济精英内部仍然隐含着一场非常广泛而且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的争论。

经济危机的内因评价

原因和范例说明

遭受亚洲危机打击的国家不仅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完全突如其来的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而且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打击。亚洲是一个过去人们常将新的千年称为"亚洲太平洋世纪",而且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后殖民的)自信心的地区,(德拉贡/舒赫尔,1994)现在怎么可能突然和如此迅速地失去了现代化努力的成果呢? 问到这种衰落的原因,回答则极为多样。在危机爆发后,西方就有人立即查找责任,有时很有公众效应。有些人认为一个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绝对支持的反亚洲阴谋正在形成之中。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主张将目光主要集中于亚洲自身,这些人在危机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占了上风。

阴谋理论

在危机爆发后，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它们推测有一种重要的反亚洲阴谋。首先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活动家们联合起来，目的在于引诱亚洲企业因短期贷款而债台高筑。这样就保证了他们长期获得高额利润，然后通过货币投机对企业财产价值进行协调性的破坏——可能以最低价格收购这些企业。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暗中参与了此事；其最后目的在于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新自由派的苛刻条件和在那些至今进行了成功抵制的亚洲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模式。（远东经济评论，1998.3.19,31）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被看成是西方分化战略的意识形态代号。

首先是马来西亚政府首脑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菲律宾总统费德尔·拉莫斯的观点一致。马哈蒂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7年秋天在香港共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亚洲危机称为阴谋诡计。归根到底，其目的是利用西方来阻止区域经济发展，“……传播媒介中控制巨额财富的少数几个人想要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停止赶超西方的努力。”① （远东经济评论，1997.10.2）马哈蒂尔极力反对这种说法：主要是集体主义、腐败和泡沫经济引发了危机。因为若不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停滞的话，这些问题事前就已经存在：“您不能说，人们很贫穷是因为苏哈托政权败坏。这种政权存在了32年之久，每年都有增长，人们更为富有，直到你通过简单的货币贬值方法从人们手中夺走钱财。”（远东经济评论，1998.2.7.17）费德尔·拉莫斯再次指控“外部力量”共谋对付菲律宾货币。（远东经济评论，1997.7.24,5）

虽然阴谋并不总是立即就可以被识破，但是经过思考分析同样可得出结论，外国应该对危机负决定性的责任。正是因为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对“亚洲经济奇迹”信誓旦旦，才不断激发

① 外语引文已译成德文。

起投资者的利润预期。1993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甚至给这种乐观主义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因而马哈蒂尔反复强调,这样就最终助长了超出实际的预期:

"借钱给我们的人、投资者,他们为什么看到这样错误的信号呢?(……)他们决定在这个国家投资是受有关马来西亚的有利报道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8.7.2,17)所谓"亚洲奇迹"归根到底不过是西方为了骗取亚洲国家前途的一个巧妙骗局。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和反美主义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解完全一致,也是为危机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开列的紧缩和结构调整政策从一开始就像在西方一样存在争议。就这点来说,下面提供的论据也可以印证:由于混合利用削减预算、短期提息和增税等措施,基金组织加深而不是克服了亚洲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私有部门而非国有部门的危机。基金组织实行双重标准,它将国内(亚洲)企业推向市场,同时保护外部(西方)债权国利益。它首先是为它的主要股东美国的意志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不是研究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以"教师爷的狂妄自大"来贯彻它的标准,以此达到经济和社会极端反生产的效果。韩国对基金组织的批评最为激烈,人们提及一个现代"特洛伊木马"现象,马中有大量的外部贸易利益——表面上被伪装为"援助",特别是放松了外国人在国内获得财产的要求和规定。泰国政府也多次批评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大拍卖"和其中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这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和国。"尽管像泰国和韩国一样,印度尼西亚自己也正在寻求基金组织的援助,但人们毕竟都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涉。(布拉德等,1998,538.,548;远东经济评论,1998.10.8,118)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停人,特别是其领导人米歇尔·

康德苏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心态在亚洲国家遭到明显的抵制。因而，当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的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在经济界中出现严重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亚洲地区10个不同国家的优秀管理者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1.6%的被调查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是亚洲国民经济的正确“疗法”，然而48.4%的人看法相反。

看一看这种阴谋理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总是可以发现美国成为各种祸害的根源。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结构改革进程中，将国内企业拱手让给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的前景激起了外来恐惧反应。人们似乎担心殖民主义会在新的外衣的掩盖下重新复归，特别怀疑美国不仅已经操纵着这场危机，而且现在还想摘取“已经取得的果实”。凭这种感觉，一场面向美国的廉价大拍卖即将在亚洲发生。尤其是在韩国，反美主义不是什么新现象，民族主义、反美情绪高涨。学生组织起来公开焚烧外国食品，号召抵制进口商品和美国的快餐系列。为加强国家财政作出贡献，人们慷慨捐赠金银首饰。(经济学家，1999.12.13)1998年2月，在经济界的参与下，马来西亚官方组织宣布了口号为“亲爱的马来西亚人，请买马来西亚产品”的运动。人们想由此证实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危机，不依赖外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能取得进步的能力和决心。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开展“自救行动”，并一直将反西方作为重点——以纪念遭受殖民压迫的过去，这一点目前正面临着亚洲危机的侵袭。

反论：亚洲自负其责

尽管遭到批评，但自始至终有人对怀疑西方反亚洲的利益政策就是危机主要原因的观点提出异议。新加坡女记者琳达·林提出，阴谋论是亚洲广泛范围内对危机复杂背景缺乏理解的结果，是对自由市场的作用方式缺少体验。因此，为了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人们在寻找替罪羊。(远东经济评论，1998.3.19)为证实这些

论点，可以引证谴责西方最严厉的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一次采访中回答有关亚洲货币逐渐衰弱的原因时的谈话：“我真的不知道市场如何运行。……有人在行动，但我不知道是谁。”（远东经济评论，1998.7.2，15）

亚洲个别国家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脆弱明确地反映了其政府非理性的经济政策，这一点在韩国尤其如此。人们反对亚洲新西方殖民化的观点，要求进行根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比如韩国政治学家咸彩凤这样写到：（1998.112）

“无论危机何时发生，人们都应该尽快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或者提供阴谋理论。他们好像在想他们可以把危机归因于消极的判断和其他的错误，或者当他们注意到强大阴险的外部力量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感到解除了他们自己的责任，这些看法又是多么没有说服力。……同样无可辩驳的是，韩国通过将其国民经济融入到为‘外国势力’主宰的世界市场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必然意味着韩国就被外国势力征服了。从自由市场原则的角度来看，韩国经济一直很封闭。尽管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融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是为了促进新兴工业，韩国对国内市场仍然实行有力的保护。”

韩国不是要提防受外国控制的危险，而是不应该将全球化理解为单行道，它必须克服思想障碍，最终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一角度看，不仅韩国经济界人士的保护主义意识应对危机负责，而且韩国文化的“前现代非理性”也同样有责任，这种文化明显地表现出过分强调家庭关系、地方主义和个人地位。正是这种非理性最终阻碍了全球资本主义西欧模式的应用，作者对此并不怀疑。（坤，1998，112~114）

另一种观点指出，韩国对危机的最初民族主义反应就是震惊和令人记忆深刻的外来恐惧。长期以来，官僚和韩国大康采恩（财阀）的领导们通过对公共舆论的控制来阻止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

以致面临危机时，在政策方面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人们被迫接受现实，要么否定现实。政府选择了第二种可能，在有关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上欺骗公民。换句话说，为了从已被认识到的根本改革的必要性上转移注意力，人们将沙文主义工具化。（永哲，1998，141～143）

亚洲危机不仅为许多区域精英揭示了他们国家金融和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沉重地打击了流传下来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尽管在广泛的范围内其流行性不可动摇。1998年2月，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这样报道：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坚持只使用我们自己的产品，将会损害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只出口我们的商品而拒绝使用进口商品，就没有国家与我们做生意。（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8.3.26，12）展望未来，要求我们始终不渝地拥护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一点已为目前的事实所证明。在此也应该考虑到，可以通过与西方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本国企业的效率。”

寻找克服危机的“亚洲”方案

总结亚洲危机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混杂多样的印象：因为采取了殖民主义态度，西方应对危机负责，一部分人由此对西方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此外，也有人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崩溃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的结构和体制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这些原因主要应该从亚洲自身去寻找。为了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而不成为它的牺牲品，亚洲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也要求不再排斥市场调控和破坏性的“卡西诺赌场资本主义”。那么，现在的争论到底得出了哪些有关危机的具体答案或实际上已付诸实施了呢？

马来西亚重新实行资本流通监管

马来西亚对危机的反应最为激烈。马哈蒂尔总理曾多次坚决反对用于短期信贷资金筹措的投机证券资本，从1998年9月初开

始,他不顾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的反对实行资本流通监管。[①] 因此,马来西亚经济已部分脱离世界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西方银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国际金融界对此的反应多数是不理解和反对。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却似乎表示赞成,高负债的马来西亚企业家也必须保持沉默,他们只能期望,在拒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的“保释”方案后,通过政府实行银行低息为债务改期谈判提供新的余地。[②]

从亚洲危机分析中,马哈蒂尔总理仅仅反对投机资本而不是长期固定的直接投资进入本国,并从这一点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正是那些以获取短期利润为目的的投机者把马来西亚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对此马哈蒂尔引证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例子,一般认为,那里实行的部分资本流通监管对这些国家受危机影响很小起了决定性作用。虽然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放松管制的国内政治压力大大增加,而且也产生了影响,但是马哈蒂尔总理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流通管制只是稳定国民经济的短期方法。如果他的政策最终取得成功的话,即使最终不能断定资本流通管制对经济的恢复实际上有多大的作用,也会打破将新的资本流通管制引入到继续实行自由化的国民经济中的禁忌。可是马来西亚反对全球化辩护“新自由主义历史哲学”的政策现在已经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异端试验”的努力将会重新合法。

亚洲经济区域化合作与克服危机的新思考

即便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危机的发生,为了将来能更好地战胜危机,在1997年克服危机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监管”的

---

①9月1日由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公布的最重要的措施是:1)马来西亚所有存于国外的外汇于1998年9月30日丧失价值;2)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价值以每美元3.8林吉特的固定汇率确定;3)一年以后,即最早在1998年9月1日外国资本可以转移;4)马来西亚出口必须用外币支付。

②“保释”意味着为防止企业倒闭或国民经济的无支付能力而接管债务。

批评就已经显示出亚洲各国在考虑新的合作形式。因而日本政府建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并且自己打算投入1000亿美元。这不仅仅符合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亚洲10国的一项高层经理调查中,有62.7%的人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远东经济评论,1997.12.4,36)这样一个组织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可能迅速和明确地理解区域和特定发展模式问题。(布拉德等,1998,541页及下页)1997年11月,当计划被提到在马尼拉举行的有10个亚洲国家财政部长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官员参加的国际经济会议的日程上的时候,西方七国,尤其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坚决的反对。无奈,日本撤回了该项计划。(远东经济评论,1998.11.19,21)

1999年1月,欧元启动。在此背景下,亚洲也有人开始探讨共同货币是否可能是将来避免货币危机的一条路子。基于各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性,“亚洲货币联盟”仅具有乌托邦的特征。此外,为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危机管理和发展政策,有人建议创建“东京俱乐部”和“亚洲重建和发展银行”。迄今为止,这些计划中还没有一项变成现实,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亚洲危机的经历已经促使人们思考经济政策的“亚洲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亚洲的角度——而且也从批判西方的角度来看,在克服危机时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已经失灵。

亚洲对货币与金融危机的回应——部分脱离世界市场和区域化——难道表明了与区域全球化之间存在新的差距?全球资本主义至少看起来已经获得了新的评价。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未能整治的金融风暴可能导致“市场专制”。在广大人民阶层贫困化和由此产生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没有安全网络的世界市场一体化的社会后果已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市场自由化的名声不佳”,一位评论家用这种观点准确地概括了本地区的情形。(远东经济评论,1998.5.14,61)在亚洲危机的初期印象中,1997年12月,当

泰国国王提醒人们，他的国家可能会退回到简单的商业生活时，这实际上意味着告别了早期的全球化乐观主义。

尽管如此，本区域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从这种意义上就是说亚洲持续融入到不断开放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更确切地说，有相当多的人把经济全球化看做是亚洲社会进行自身改革和丢卸传统包袱的新动力。一位泰国金融市场专家这样解释：

"如果你没有经历泰国危机，你几乎不能理解这种心理上的打击，看起来有如希望成为泡影，企业倒闭和人们失业。尽管危机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它至少有一点好处：改变了泰国人的思维。在一切都过去之后，真庆幸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9.3.11,34）

与人们从前的期待相比，政府变得更有效力，新宪法也更加民主，政治体制日益透明。由于亚洲危机重新变得活跃起来的主要是有关正确道路的讨论而不是关于目标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经济自由化思想将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有关更坚定的经济区域化的设想也大大增多。那些反对马来西亚极端做法的人认为，市场力量的自由行为应受到限制，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必须得到调控。此外，"我们的增长必须建立在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基础上。如果我们背弃这一点，我们就会回到石器时代。"（远东经济评论，1998.2.12,49）

政治危机的内部评价和"亚洲价值观"问题

如上所述，在遭受危机打击特别严重的国家，亚洲危机的最终政治影响巨大。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在泰国和韩国，现存的民主体制最终能够抵挡社会和政治压力，然而在马来西亚却发生了制度危机，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出现政权交替。在迄今为止趋向极权的和常常任人惟亲的统治结构控制一切的地方，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呼声根本不予置理。像韩国政治与国内大康采恩暗中勾结，马来西亚执政党马来西亚民族

统一组织与经济之间的腐化堕落关系应对危机负责一样，活跃的公众同样要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精英伙伴资本主义”对危机负责。似乎觉得只有在新的政治公开和法律保障的条件下，才可能战胜危机。韩国新总统金大中、印度尼西亚反对派政治家阿明·赖斯和麦加瓦蒂·苏加诺普特里以及马来西亚改革运动派安瓦尔·易卜拉欣正好预示着这一点。

然而，在各自体制政权之外，许多亚洲精英并不完全支持反对派联合组成的改革运动对现有体制进行激进民主化的要求。西方经常被指责利用亚洲危机为其区域“民主分化”战略服务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范围内，对这种要求把物质援助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的指责尤其引人注目。有人这样告诫一位马来西亚政治家，“如果发展权重要而且真的不可转让，那么——在人权和民主的幌子下——就不会存在援助、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条件。”(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7.10.9，39)西方忽视了亚洲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不允许轻率实行民主，民主只有在稳定的中产阶层和整体教育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些前提还不具备，由于亚洲危机，其发展也暂时受到了限制。轻率的民主化将加重危机。除了经济恢复之外，政治上的重新稳定也应处于优先的议事日程上。

相反，另外一种观点强调，比如韩国总统金大中，不实行民主化，危机国家的经济恢复几乎不可能。——亚洲危机促进了传统的讨论，然而这一次——至少现在看来——更确切地说，有损于传统的权力精英。虽然危机使区域极权和民主政体同样处于政治压力之下，但是，民主(菲律宾、泰国、韩国、中国台湾)最终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特别像在“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多年来在本区域内进行的有关权威主义和现代化在亚洲的特殊协调性的讨论有了新的扩展，并且经受了考验。这涉及到“亚洲价值观”和危机之间的联系：“亚洲价值观”是对危机负有责任呢？

还是在克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在35个国家35000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亚洲人似乎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远东经济评论,1998.1.22,32)对此总是可以列举出诸如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尊重祖先、重视集体和强烈的家庭责任,当然也包括对强政府的好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价值观与消极的东西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在亚洲一次高级经理的民意调查中,63.7%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没有"亚洲价值观",那么在他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51.9%的人认为,"亚洲价值观"将有助于区域经济的恢复。(远东经济评论,1992.2.19,32)

但是,更富批评性的观点也指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消极方面。亚洲密切的家庭联系有利于小企业的竞争能力,可是它在一定的意义上也阻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因为公司机构总是由(少数)家庭集中控制着。而且这种典型的等级制度导向使大康采恩的董事会可能不要求股东方对有关事务作出解释说明——这是助长不透明的腐败企业政策的因素,尤其是在韩国和日本早已司空见惯。总是只有那些俭朴的职员和工人们在厉行节约,而政治—经济统治阶级则过着远远超过自己实际经济水平的生活。正是后一点使人注意到从"亚洲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危机的矛盾心理:

"正像携教堂募捐逃跑的牧师几乎并不违反盗窃戒律一样,亚洲国民经济的内部危机向我们表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说教多,实践运用少。"(远东经济评论,1994.2.26,5d)

与此相反,西方观点却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评价。在亚洲危机的背景下,它们常常坚持认为,只有抛弃这些价

值观才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民主化[①]。亚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第一反应常常是批评西方干预过多,并且想将自己堕落的文化强加给亚洲。但是,除此之外,大部分亚洲精英并不理解西方对"亚洲价值观"的分类,也激起了对全球化压力旗帜下的自身文化特性同化的反对。按照这种方式,"亚洲价值观"变成了旨在更好地战胜全球化的自我保护主义:

"这些天来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新的不常用的概念如'集体解雇'、'年薪'、'企业公开'和'敌意的接收';它们实际上只是新型传统观的表面现象。要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生存下来,亚洲可以发挥哪些智慧呢?如果这些新的价值观对现代社会的生存真的很重要,那么要保持自身的特点,亚洲人应如何创造性地接受并完善它们。"(宋澈,1998.128)

从这一方面看,"亚洲价值观"总是被证明并详细理解为亚洲关于全球化解释的必要补充。"亚洲价值观"代表着现代精神的亚洲特征,尽管这种现代精神必须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但它仍然有文化层面的权利要求。就这点而言,关于"亚洲价值观"仅仅为亚洲权迷精英们创立了一种统治思想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贾亚苏里亚,1997,26)

结论:作为机遇的危机

尽管由于亚洲危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混乱,但是就本

① 持这种观点的特别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亚洲问题专家奥斯卡·韦格尔。结果,正是如下这六个"文化方式动机导致了弊端的产生":1)模式追求;2)保全面子、等级制度和纪录欲;3)准备承担风险直至宿命论;4)土地崇拜和地产神话;5)长老主义和社群主义;6)"与金钱的其他关系"。在韦格尔看来,"这些破坏性结构"将来也会危害亚洲的国民经济。1998:"亚洲危机"的不同探讨,南北现实,第2期(季刊),第303~310页。

文所描述的本地区经济和政治精英们的基本观点来看,似乎令人乐观。危机"覆盖着的收获",它给亚洲提供了反思所犯错误、对通往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路线进行必要调整的机会。印度尼西亚政治学者优素福·瓦南迪这样指出,目前尤其应该遵循一种让多数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超越了市场并不关心的多数人"。(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8.2.12,50)撇开这一点,亚洲人似乎认为,危机很快会克服的。这样,在被调查的10个亚洲国家的高层经理中,有79.5%的人在贬值灾难后几个月就表示,他们确信,亚洲经济奇迹没有"消失"。45.1%的人估计在3~5年内会出现经济复苏,43.5%的人甚至指望最晚在两年后就实现这一目的。只有2.1%的人认为可能要持续5年之久。(远东经济评论,1998.1.29,29)

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产生根本的怀疑。此外,经济全球化被视为国际公平条件下实现富裕与无忧无虑未来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此而言,亚洲危机"仅仅"使人意识到新的无限制自由化市场的破坏性程度,而且给予了那些在西方人数众多的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批评者一定的市场。那些从区域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中认识到经济现代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必要关联的人也大大增加,如果自由民主标准的普遍性能得到理解,他们也拥护"政治"全球化。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将"亚洲价值观"解释为亚洲精英们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些精英想给由西方主导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留下自己的烙印,并从中努力吸取政治教训,即接受多元结构和民主制度。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这种讨论停止了。与本国国内不断引证全球(普遍)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批评人士相比,亚洲价值观常常更少地针对西方本身。尽管这种说法没错,然而除此之外,不容忽视的是政治(新)权威主义和文化顺从依然为人们所关注,而且完全被西方现代派理解为阿拉伯世界原教旨主义对自身同一性正面临丧失的反响在亚洲的对应物。在此背景下,亚洲价值观

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专有文化概念，因而不会变成“意识形态批判的场所”。

最后应该总结本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并进行简明扼要的评论：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亚洲经济奇迹被西方视为竞争资本主义征兆下全球化胜利进行的表现。多数亚洲人赞成这种观点，然而在许多地方，也有人反对为西方同时要求的“政治”和“文化”全球化。“亚洲价值观”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和西方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权威失效。虽然要求改变亚洲权力结构使之有利于西方经济利益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在亚洲危机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这种指责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这与那些长期以来仅仅依靠现代化的物质成就把握着政权的独裁精英们的统治目前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威胁有关。另一方面，整个区域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共同的担忧，即在经济衰退时期，西方的文化征服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新的殖民化，至少也会给亚洲国家内部的稳定造成重要损失。对此不仅独裁的精英们，而且热心的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表示认同 。

2)在东亚危机发生时，对西方的愤怒也骤增。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那些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制定了这些国家自身所期望的一揽子救助计划，但是在有些地方它仍然被视为西方(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事实很快就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了过度的危机管理，在确定一个国家的紧缩政策时这种危机管理反而还激化了形势，因此必须立即予以调整。地区精英们清楚，尽管他们的经济政治体制结构也应对危机负责，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常常被看成是国家向西方的屈服，是一种耻辱。此外，许多亚洲人凭经验吃惊地发现，全球市场已经采取措施对付本国的国民经济，而这些亚洲人依然还在相信这个市场。比如，像马来西亚政府首脑马哈蒂尔这样一类无礼的西方批评者就

证实并且反复谈到政治和经济上更强硬的“亚洲化”这个词。尽管这在本地区还未成为趋势，而且最终归属于有关采取一定措施实行资本市场调节的意义和必要性的专门讨论，但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态将不会消失，也应该告诫西方防止一成不变地坚持新自由主义理论。

3)亚洲政治具有多样性。作为危机结果，本地区的几个极权体制都面临着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正是这种动荡不安最终将可能比危机前更容易导致民主体制。同时，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民主作为国内政治的缓冲器，从而在(不可避免的)危机时期整个体制不受到威胁，这种认识在本区域似乎已被接受。但是按这种方式，作为经济全球化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的西方民主(议会、三权分立的)和市场经济的必要互补性意识在那些至今与这种认识背道而驰的国家是否应该得到促进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因为如果建立在经济实力和体制调节能力基础上的这些制度能够控制经济危机，并且为保证自身的统治安全而在政治(政权)上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就会出现不同的反应——也许会导致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的复兴，并伴随着对亚洲部分和西方之间充满矛盾的界线进行划分的危险。

4)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典型“矿工资本主义”的危害在本区域早就众所周知，但是被持续的经济成功所掩盖着。亚洲危机后，人们加倍努力试图将国家与经济分离开来，增强两种部门体制中的透明度和公开控制。人们也试图指出这些努力是否富有成效，或者在下一次增长推动下，过去的良好愿望是否能不再被抛弃——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许多西方警告者的行列中，在危机爆发后，他们对这种观点都持批评态度。

5)从亚洲危机中，人们首先学会了：社会资源分配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可能会扩大结构的不平等，加剧社会的堕落，甚至会危及体制。目前，这种忧虑尤其笼罩着中国，但是在其他国家——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增强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在亚洲国家,这是否将导致更公平的政治,仍需拭目以待。假如西方想与亚洲一起共同实现世界社会和平的理想,它就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因此,在上一次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亚洲表现出继续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征兆。但亚洲危机仍然是全球化的边缘化。它向西方等地区说明了它缺乏抵抗国际货币投机的能力,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自己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严重影响了对自由化市场合理性的信任。在危机爆发后才两年特别是在大多数国家企业和银行部门必要的结构改革还没有实施时,就谈论持续的经济再稳定,未免为时过早。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困难局势,少数国家如马来西亚,在更长的时期内还会遭受政治混乱的打击。在文化方面,对意味着极端反西方的“亚洲认同”的重视问题将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必然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所显示的“亚洲特色”也许将比世界社会预言家们迄今能想像的还要多。

(贡特·舒伯特)

参考文献:

布拉德·尼古拉/沃尔登·贝洛/卡迈勒·玛尔霍特拉,1998,驯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亚洲危机,载于:第三世界季刊,第19卷,第3期,第505~555页。

戚彩凤,1998:关于对外统治的谈话,载于:韩国焦点,第6卷,1~2月第1期。

德拉贡·维尔纲/京特·舒赫尔(编),1994:亚洲新的自我意识,一种挑战? 汉堡:亚洲学研究所。

福山·弗兰西斯,1992: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伦敦。

贾亚苏里亚·卡尼斯卡,1997:作为反改革现代化的亚洲价值

观,载于:亚洲研究北欧通讯,12月第4期,第19~27页。

杨坤,1998:韩国国家危机的非理性,载于:韩国焦点,第6卷,1~2月第1期。

舒伯特·冈特,1999:印度尼西亚——国家聚爆还是民主的新开端?载于:布鲁诺·肖赫/乌尔里布·拉奇/赖因哈德·穆茨(编),和平鉴定,1999,明斯特,第271~284页。

宋澈,1998:经济危机与亚洲价值观,载于:韩国焦点,第6卷,5~6月第3期。

韦格尔·奥斯卡,1998,可怕的1997:亚洲货币和经济危机之年,载于:当代东南亚,第2期。

哈永哲,1998:韩国人是偏激的爱国者?载于:韩国焦点,第6卷3~4月第2期。

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

“全球化”在这些年中成了世界各国一个时髦的术语，它本身也像麦当劳、互联网和电影“泰坦尼克号”那样被全球化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在纷纷谈论“全球化”，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界有影响的流行理论或迟或早都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响，如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及全球化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直到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关注，但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绝妙注解，它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是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这样几个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

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教授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7年亚洲国家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继泰国、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先后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基本上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危机的威胁却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1998年3月9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①]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一时间，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论著纷纷发表，诸如《全球化的陷阱》等一些西方学者的重要著作开始被译成中文出版。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一套《全球化论丛》，共有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

① 江泽民：见《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2)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采取什么样的对策;4)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下面我们试图对国内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所发表的不同观点作一简要的评析。

全球化的不同定义

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①。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

① 蔡拓:"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75页。

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1]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2]“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3] 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而已。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4]

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顺理成章的便是，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正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第三种界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

---

① 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② 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③ 杨朝仁、韩志伟：“全球化、制度开放与民族复兴”，《全球化的悖论》，第138页。

④ 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①

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作为一体化和分裂化的全球化

然而，所有上述界定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

① 张颐武："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6页。

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但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倘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它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以至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社区运动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由于地方自治在全球化背景的继续发

展,以至于出现了特别反映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则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但国际政治的霸权从两个变成了一个。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其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却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正如在前面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

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第一,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都是合理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第二,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第三,全球化的这种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既然全球化本身所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对立或悖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矛盾或悖论,而是哲学上所说的二律背反,所以我们说全球化是一个二律背反。

作为全球化核心的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的一体化之上,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①]。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②]。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文章主要论述的是经济全球化问题。事

---

① 李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

② 朱景文:"关于法律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胡元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实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化严格限于经济领域，并直接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的一体化或国际化，个别学者甚至反对使用一般的全球化概念，尤其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认为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放弃中国目前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

在一般学者眼中，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它指的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各种商品互通有无，竞价出售，为人类所共享”[①]。一些学者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1)生产活动全球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2)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国际贸易趋同化；3)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金融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4)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5)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对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构成严重挑战；6)经贸人才国际性，作为国际经济贸易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人”越来越多，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竞选对象[②]。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

① 穆光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 年第 3 期。

② 参阅薛荣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等，《世界经济》1998 年第 4 期。

他们论证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因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只有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一体化才能使一国经济发展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使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达到最优状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还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他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①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促进民主”

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 1989 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②

---

① 参阅刘力：“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11～12 期。

② 刘军宁：“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 年第 3 期。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并非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发展,它与现代化自始至终相伴随。有的学者特别地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模式,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六个: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责任性(accountability),即人们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rule of law),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状态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模式”。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交往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法律的全球化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法学家的议事日程。一些法学研究者认为,“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援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国家作为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法律问题”。② 对于某些法学家来说,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树立全球的法律意识,把解决全球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淡化国家意识,倡导

① 俞可平:“从善政到善治”,《方法》1999年第1期。

② 李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

立法的非国家化。[①]

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论

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种极不相同的思潮。但是,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论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等。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但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②]

全球化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中国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全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国际

① 参阅朱景文"关于法律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全球化与中国》,第111~119页。
② 谭君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全球化的悖论》,第131~132页。

合作的质量，有利于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共享，有利于大气污染、臭氧层减少、毒品泛滥、非法移民等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地位，增加了国际金融的风险，扩大了南北差距，使得落后国家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操纵和冲击等。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提供了许多良好的契机。它有利于吸收外国资本，有利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有利于本国产品走向世界，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等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明显不利的因素。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消极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外商的控股和技术垄断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构成威胁，外债超过一定限度时会潜藏很大的风险，外贸和资本对外依存度的增大可能削弱防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规模开放金融市场则可能极大地增加金融风险等；第二，削弱国家的主权。参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遵守业已存在的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而这些国际性的契约大多数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标准制定的，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有时不得不对某些管理权限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主权。[1]

正如许多学者清醒地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约参加了《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公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条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

---

① 参阅王朝才等“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柳剑平“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等，均见《全球化与中国》第180～200页。

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正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呼声。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全球化过程将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历史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主权基础受到侵蚀,受到发达国家某种经济霸权的威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最近的东南亚危机正是其特定表现"①。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对许多原来热心于全球化的中国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小心地、审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强调选择参与的时机和方式。

全球化对中国的风险

首先,不少学者屡屡指出,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鉴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操纵,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步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把它当作中国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必然会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其他国家,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只会起到揠苗助长的作用。针对少数学者提出的"同步全球化"观点,许多学者作出了强有力的反驳:"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必须在

① 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的悖论》,第50~51页。

经济制度上与市场经济国家保持‘同步’，否则便无法正常地推进改革、发展经济。这种观点把全球化及其条件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是脱离国情和片面的，而且也相左于一些现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①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能全方位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而应当有选择地有保留地参与。与政治和文化比较而言，经济全球化应当是优先考虑的重点，虽然大家都知道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是很难分开的。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来说，所谓全球化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但是，即使在经济方面，中国也不能无保留地全面参与，而应当适度向全球经济开放。不能对经济全球化抱太多幻想，经济全球化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要认识到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地位，认识到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应当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强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监管，始终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经济全球化策略。

最后，有些学者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应当建立在经济民族化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发挥民族经济的优势。正如我们在开头已经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一对合理的悖论，在经济领域也一样。经济全球化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壁垒，加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民族化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明显。例如，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每一个国家又都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各国之间各种类型的贸易大战此起彼伏，各种国际性的冲突每每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得以表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呢？或者说把

① 李克穆："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全球化与中国》，第44页。

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加速与全球经济接轨,还是放在发展民族经济上?一部分学者明确主张,应当把重点放在经济的民族化上面。在他们看来,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的意义,恰恰相反,各国都力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明显。所以,他们的结论是,"那些片面强调开放而忽视保护民族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只有发展民族经济才是个根本的硬道理。"[1]

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从已经发表的围绕全球化的论著来说,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分别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虽然这场讨论还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某些特征。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相关大讨论相比,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一是它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二是它正在逐渐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中西之争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历时时间最长的争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究竟是"中国化"还是"西方化"?中国知识分子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刚刚实行对外开放的清朝的洋务运动,经过国民党政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时期。在中西之争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这一信条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权下表述的方法不一样,但其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即中国与西方是对立的两极,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我们所用,但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大多数

---

① 高德步:"全球化还是民族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年第5期。

学者都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但除了极少数学者外，一般都认为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西方化完全等同起来。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操纵者，但全球化的主体应当是平等的民族国家。所以，中国决不应当西化，但应当积极参与全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挣脱由来已久的“中—西”这一或多或少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分裂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1949年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而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被纳入西方世界的范围，西方国家几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国—世界相互关系的话语便由原来多少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西”之争，转变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几乎都会引发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然而在这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讨论中我们发现，尽管几乎所有学者都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全球化的进程，但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明显不同意把全球化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化。他们并没有倡导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但都主张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由此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的话语正在逐渐消解中国思想界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俞可平）

参考文献：

王朝才等，1998：“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见《全球化与中国》，1998。

杨朝仁、韩志伟，1998：“全球化、制度开放与民族复兴”，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

高德步,1997:"全球化还是民族化?",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 年第 5 期。

王逢振,1998:"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穆光宗,1998:"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 年第 3 期。

柳剑平,1998:"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战备的选择"等,见《全球化与中国》第 180~200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朱景文,1998:"关于法律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胡元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1~119 页。

谭君久,1998:"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1~132 页。

刘军宁,1998:"全球化与民主政治",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 年第 3 期。

俞可平主编,1998a:《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俞可平,1998b:"从善政到善治",见《方法》,1999 年第 1 期。

刘力,1997:"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见《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11~12 期。

李林,1998:"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学习与探索》,1998 年第 1 期。

王宁等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薛荣久,1998:"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等,《世界经济》1998 年第 4 期。

蔡拓,1998:"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的悖论》,第

50～51页。

纪玉祥，1998："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张颐武，1998："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见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胡元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李克穆："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

印度的全球化讨论

1991年，随着纳西蒙哈·拉奥政府突然宣布“新经济政策”，印度有关全球化的公开讨论开始了。在经历有关宗教、贫困社会阶层的照顾和稳定等问题的竞选斗争后，整个反对派出人意料的发生转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根据广为人知的印度概念《曼道尔与曼迪尔》）。尽管开展了关于关贸总协定和《邓克尔计划》① 的激烈讨论，但是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问题依然与此相联系。就好像他们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国公司这样一类帝国主义力量所强迫一样，这种讨论涉及了所有并非由国内因素引致的变化。然而，“全球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方面逐渐引人注目，并且取代了如“新殖民主义”这样一些概念。

论坛及其意义

印度的全球化论坛尤其多种多样，不同的论坛具有不同的倾向。新产生的论坛可以被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印刷品、电子媒体以及研讨会和公共活动。

印刷品：在过去数年中，印度报刊杂志的读者不断增加，对讨论进行评价变得困难复杂也是一个现实。与大众杂志《前线》一样，《经济和政治周刊》和《研讨会》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杂志也反对全球化这一主题，甚至那些有名的日报社论作者也是如此。作为

---

① 《邓克尔计划》是指由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主席阿瑟·邓克尔于1991年12月在谈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章程时提出的建议。

分析文章的阵地，大量的新杂志如《瞭望》周刊和许多经济刊物同样独具特色，他们要么支持全球化，要么采取变化灵活的立场。非政府组织也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印度大多数传统的政治书刊都研究全球化，它们经常集中反对《邓克尔计划》和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的影响。

●电子媒体：1991 年以来，借助于新的政府和私人频道，电视在印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大与发展。它们提供消息、经济报道、众多采访以及就不同题目与公众进行的讨论。不过，其作用颇有争议。另外，各种频道发送的最受欢迎的节目就是印度影片。广告《消息》节目和西方连续剧的重播常常比平淡的讨论影响更大。比如在 1996 年的一次调查咨询中，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学生——其中还有几个来自中下阶层——都知道一个在中上阶层中作用明显且涉及手机的特殊的电视广告。在印度，手机——在乡村，儿童玩具和学童的皮包现在都是根据它的样式来生产制作——说明了以神秘的高科技为特征的全球化是怎样与广泛扩展的主观想像相联系。

●研讨班、公共活动等：根据狭隘的字母排列顺序和媒体影响程度(1994 年一项调查估计，12%的农村家庭拥有电视机)，反对党采取了很多战略试图将讨论推向公开。在乡村，他们的活动从具有学术风格的研讨会发展到举行公共活动和游行示威。比如，1991 年至 1993 年，与政党没有联系的强大的印度农场主运动在有关《邓克尔计划》和关贸总协定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不和时，两个议会党团在德里举行了大规模的赞成和反对关贸总协定的游行示威。同时，这些组织和左派政党在乡村也举行了大量的集会，在这些集会上，他们发表了支持自身观点、富有说服力且常常极为生动精彩的评论和讲演。对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抗议已成为左翼反对派和工会每一次示威活动与印度人民党的大多数运动的一部分。

印度有各种公开讨论的文化活动，这些讨论包括各种不同的有关全球化的观点。然而要对它们进行评价，就必须先作几点重要的限定：

一种限定涉及到，这种公众坚决支持的观点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和积极分子的周围环境。如印度的大多数工会组织都与政党有联系，这意味着工会组织在各种可能的问题上都代表着某些鲜明的立场。然而，即使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常常具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理睬领导的意图，仅仅只是利用组织的战斗性和优势。甚至那些能将数十万人召集起来的“社会运动”组织也难赢得选举。大量公共活动的参加者占村民的百分比很小，而且示威活动的大多数听众也很少受那些代表性思想的影响。

例如，我们曾有过这样的体会，两个政治上极为坚定的积极分子的亲戚满怀热情地决定要登记他们的当地妇女组织，目的在于他们能够参加一个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农村排水工程项目。在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听取了左派全球化反对者发表的演说后，他们如愿以偿。结果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世界银行是一个他们愿意分享、并且资助极为丰裕的来源。那些参加过明确支持反全球化立场运动组织的农民的表现也同样如此。他们厌恶为法国的香水市场生产鲜花，或为蒙桑托的苗木试验和它在印度马希科的配件供应厂提供土地。当许多有关“邓克尔计划”的讨论在城乡只能将数百人召集到一起时，1997 年美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在浦那一个剧院举行的一个深奥晦涩的报告却吸引了数千人——这再次说明了全球科学组织的吸引力。当讨论继续激烈进行时，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全球化的印象是与技术和经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来研究那些重要的观点。

反对全球化:“新东印度公司”

尽管最常用的全球化定义是“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商品、思想、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也尽管人们认为全球化实际上由技术控制,但这一涵义至少在使用这个概念的多数知识分子中变得越来越消极。全球化被认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霸权的追求。这种悲观的全球化观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被看成是在外部强迫,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被认为是国际帝国主义代表的压力下所为。全球化与结构调整计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实施和已失去保护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从这一点看,全球化代表了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一个威胁印度独立的“新东印度公司”。因此,人们发出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号召。

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使用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依赖理论的经济分析概念来解释全球化的影响。[①] 根据这一点,全球化从经济上导致了印度经济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严重依附;导致了多数贫困化、物价上涨、不稳定和印度资本主义自身的削弱;多数人口的边缘化也大大地增加。全球化意味着“掠夺”或“卡西诺赌场式的资本主义”。多国公司被看作是世界资本主义机构的核心,全球化损害了民族资本。印度企业和印度产品本身就不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经济技术实力匹敌。虽然世界

① 虽然使用了列宁的语言,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基本理论设想大大偏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发现,资本出口导致了资本主义“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到海外的附属地区”,依赖理论强调资本从第三世界的撤离和由此增加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与贫困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的全球化力量的立场差不多是嘲讽的。

范围的金融活动受到重视，“外国机构投资”作为直接投资的意义增加，但人们依然越来越将多国公司视为全球化的主要力量。附带说明的是，全球化的反对者首先以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名义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全球化妨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的选择。

左派经济学家阿肖克·米特拉（199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强加一种模式宁可慢些，但要稳当些。一种模式有其全球背景……目的绝对明确：应该保证让世界不发达部分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模式的机制一点也不复杂。穷国被迫开放其体制，它们羡慕西方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富强。在它们的信念中，自由市场经济是世外桃源的代名词。投机者和货币操纵者立刻就会出现。他们将其影响渗透到了不同的经济领域，加强对国家银行系统、股市和其他决策机构的控制。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种外在力量就不会起作用……”

第三，全球化的政治实质在于民族国家的衰退。在印度社会主义政治学家拉杰尼·科塔里看来，大多数反对者认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前就抨击过国家），在独立后第一个10年内国家起到了解放的作用。全球化时代是反国家时期的回归与回归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就是随处可见的“国家退却”：伴随着第三世界结构调整政策的是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战胜和对发达工业化社会福利国家的攻击。全球化的左派反对者比印度民族主义者更加强调应该保护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正是这些左派人士最强烈地反对削弱国家在价格、关税制定等方面的作用。

第四，部分全球化的重要批评者强调环境影响，用生态女权主义者范达纳·希瓦的话来说，他们把环境影响看做是“北方对南方生物和其他资源的持续掠夺”。（希瓦，1998）环境运动是许多知名

人士将资本主义和商业化视为生态破坏的主要武器。[1] 比如在“人民运动国家联盟”建立时，迈扎·帕特卡担任了领导任务。人民运动国家联盟是一个积极分子小组，其主要运动与全球化问题有关。在人民运动国家联盟中，渔民运动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奥里萨和泰米尔纳德之间的沿海水域进行蟹类养殖就是所谓破坏性的全球化生产的一个极好例子。

与此相联的是“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是关贸总协定的主要的薄弱环节，评论指出，农民已不可能再使用他们自己的种子，本地居民的“地方意识”和生物的多样性都已受到损害。自相矛盾的是，对“生活方式”专利权思想的抨击依然激烈，——尽管最早的一项“生活方式”专利权是由在美国工作的印度科学家申请注册的。对国际专利体制的攻击得到了那些从1970年印度专利法中获益的印度制药企业的大力支持，这一法律虽然不允许生产受专利保护的产品，但它允许根据专利“继续改进”这种产品。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一种新药品的化学分子式，发展一种稍有不同的生产过程，并且将自己的商标投入市场。这也伴随着一种从感情上描述奶牛和其他生物越来越专利化的公众运动。

最后，全球化的文化方面备受重视。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

---

① 一个例外是“科学和环境中心”小组，它的目标对准官僚政治。大多数环境保护者都是全球化反对者，他们认为，他们反对大资本和国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反对私有资本，要求国家充当环境的保护者。

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对我们神圣文化的进攻”

对所有全球化的反对者来说，这样一些议题是共同的，他们的论据主要源于左派的传统讨论。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在有关全球化的问题上，印度的左右派力量有着令人惊奇的接近。他们包括国大党内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批人士、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左右派共产党和有时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同盟家族”。

“同盟家族”理论政策的重要贡献是被描述为全球化对立面的国货运动纲领。国货运动在词义上意味着“来自自己的国家”，是20世纪初针对外国商品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主题。现在的目标指向外国企业在印度生产的商品。为了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印度人从早到晚已全面陷入外国产品的网络中，从牙刷到肥皂，人们已经为各种多国企业产品列出了清单；也掀起了反对诸如麦当劳、卡吉尔、肯德基炸鸡和最近反蒙桑托种子等不同企业的运动。尽管没有一场运动取得成功，不过它们刮起了一场风暴，也赢得了公众的极大注意，有助于推迟印度专利法的修订。

必须强调的是，在印度民族主义势力内部，拉什特里亚斯瓦亚姆塞瓦同盟（印度的一个原教旨主义政党。译者注）推动了国货运动——婆罗门的、沙文主义和反动本质的发展。拉什特里亚斯瓦亚姆塞瓦同盟为“同盟家族”命名，而且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它常常被认为是拥护共产党的群众阵线。作为国货运动问题的主要论坛，贾格拉昂曼什国货运动与拉什特里亚斯瓦亚姆塞瓦同盟的联系密切，两者都认为自己处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权力监督之下。贾格拉昂曼什国货运动的发言人断然声明，他们乐意看到世界贸易组织遭受破坏。

从各个方面看，印度民族主义者把文化的挑战看成是全球化的最大挑战，用当时印度人民党书记穆利·马诺哈尔·乔希的话

讲,“全球化是对印度的传教进攻、信息进攻和文化进攻。”(引自:印度时代,1994.4.17)同盟家族的印度教纲领把印度人定义为那些视“圣地”为“祖国”的人。其实,这种印度人认同的最大威胁在历史上穆斯林的进攻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不久以前发生了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凶残攻击),但是全球化的文化方面,特别是性表达方式和男女关系的自由态度被认为对传统印度家庭构成了同样的危险和威胁。因此,外国的电视频道也被当作是一种重要的威胁。米歇尔·杰克逊和印度女权主义影片《火》也多次遭到攻击,因为他们威胁了“神圣的印度价值观”。在一些人看来,对家长制传统形式的保护,对共产主义反对派的拒绝和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某种特殊的态度是全球化反对者最忧虑的问题 。

全球化的左右派反对者有几点重要的区别。印度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了它在保护印度企业中的作用。印度人民党的口号“内部自由化先于外部的自由化”(或者像阿肖克·乔古勒所说的,“完全的内部自由化和有选择的外部自由化”)表明接受私有化,但反对全球化。在技术和外国投资方面,需要技术和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消费品之间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为左派所广泛接受(首先由于所有政府都认为吸引投资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口号——“要计算机芯片而不是土豆片”——已经广为人知。“印度应由印度人来建设”是一句通俗易懂、激励自己努力的语言,——当然,它也试图发挥散居在国外的印度人的重要作用。

保卫全球化:“笼中之虎”

印度全球化乐观主义者对所有这些观点几乎都持反对态度。例如,虽然全球化的保卫者赞同1991年印度的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外界所强迫,但是他们强调,这是必要的,因为自从印度独立

以来所遵循的发展模式已陷入危机。"尼赫鲁模式"——根据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命名——强调在国家部门中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和对保留下来的私有部门进行过激调整,它创立了一种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证明简直没有生命力的指令经济。"许可管制"这个名词——为了从官僚机构那里获得生产活动的许可,每个人从有权势的资本家到农民都必须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贿赂,去签字盖章审批——概括了由于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使许多人都亲身感受到厌恶。因此,如同政府中全球化反对者已经认识到的主要反对手段一样,全球化的保卫者也将愤怒不满发泄于国家。

全球化的保卫者对多国企业的存在和力量从未有过争议,但是他们重视印度企业在竞争中的生存能力。他们指出,印度实际上已经发展了一个具有不同工业结构和良好科学和技术基础的强大经济,然而由于政府和"许可管制"的限制阻碍了这种经济的发展,现在是该减少限制和发挥经济的国际作用的时候了。多国企业肯定有其自身的利益,印度企业必须保护这一点;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领域,在这样一些领域里,印度企业不仅可以获得资本,而且能得到工艺和管理技术。

在专利方面,有人论证认为,印度有大量的创新,国家将从更严格的专利体制中获利;实际上也能赚取可观的外汇。1997年印度人试图在美国获得郁金的专利,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在美国为这一案件出庭辩护而且赢得了这场官司。理事会主席G. R.马歇尔卡尔强调指出,"这个成功经历表明,如果我们为一个有充足证据和在技术法律理由方面得到充分支持的专利案件辩护,那就没有理由为我们传统知识基础的保护担忧。"(引自:匿名者,1997.24)因此,印度科学家对全球化表现得比较乐观。

印度商人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当看到大多数麻烦障碍消除的时候,尤其是到了1995年,商人们表现出高度的兴奋。有关印度是一只"笼中之虎",一旦摆脱束缚,会像东亚国家一样获得极

大发展的观点开始流行，后来又逐渐产生了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是由那些受竞争伤害最强烈的企业提出的。这当然包括许多依赖国家支持和与“许可管制”相关产生垄断利润的印度工业部门。这些企业在1994年前后合并为“孟买俱乐部”，而且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孟买俱乐部”从未公开反对全球化，相反，它的主要口号“一个游戏场地”表明，外国企业享有特权，印度企业应给予同样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切合实际的，比如，取消关税，在印度却保留着产品消费税。）这也暗含着这样的看法：国家没有退却，相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它必须完成大量的工作。由于其首席部长重视高技术，而且成功地引进了几笔可观的外国投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安德拉邦已成了印度的一个典范 。

因为收取8%的附加税来保护印度企业，所以另外一个早就让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阶段是与印度人民党政府的1998年预算联系在一起的。鉴于商界的压力，这一关税率后来被减少了一半：工业家不愿再为进口部件付款。这种情况表明了印度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印度工业协会总会长将多国议题和印度商界议题做了区分，对许多趋势持批评态度，但为共同的利益辩护，他的如下解释说明了“协商全球化”到底是什么：

“印度工业界的反应是，它希望多国企业本地化。即使有助于印度的发展，作为强大合作者的多国企业也能从中大大获益，但是，对支配和控制、对单方面考虑、对陈旧过时的技术和产品仍然存在不满……印度必须继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坚决促进国外投资。在政策框架内，政府行为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印度和外国企业的工业战略、工业思想和工业行为上。”（达斯，1998）

农业讨论

印度全球化讨论的一个特殊的特征在于实力强大、政治上独

立的农民组织领导人所起的作用。这些组织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面前代表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农民利益。由于农业问题写进了关贸总协定，全球化对农业的影响特别有争议。

农民运动总是在区域内组织的，每一个农民运动组织在一定的语言区内相对强大；而在整个印度范围内的团结统一则很脆弱。与政党集中化农民组织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运动采取了联盟的形式。在1991年后，这些组织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的差异（首先出自个人原因）变得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马哈拉施特拉邦某政党成员沙拉德·乔希成了衷心保卫全球化的最伟大的群众领袖，而卡纳塔克邦农场主联盟的南琼达斯沃米教授却组织了新的反卡吉尔、肯德基炸鸡和其他多国势力商标的运动，并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全球化的反对者辩护说，农业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领域，因为绝对自给自足的印度农民不敌工业社会技术强大的农业贸易。全球化首先被视为世界性农业贸易和商业农业的扩大。种子专利将阻碍农民使用他们自己的种子，而为多国化肥、种子和生物技术企业所垄断。根据关贸总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印度必须进口其食品的3%。

相反，沙拉德·乔希和全球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则论证说，农民将从贸易开放中获利最多。乔希多年来一直声称，印度政府实际上以资助的名义，更确切地说，就是通过削减贸易、地区限制、出口禁令、附加捐税和其他的办法来剥削农民。结果每年从农业抽走数百万卢比用于支持工业和行政机构。当关贸总协定的“资助总额”条文——根据这一条文可以估价不同的国家资助农业的程度——表明对印度农民各种重要农作物的资助效果不良时，（古拉提/沙尔马）这就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确凿论据。

关于必须进口产量的3%，该政党的发言人指出，这只适用于“市场准入”。实际上，正是印度政府甚至在关贸总协定生效前就

已经进口粮食，才对印度农民造成了损害。

乔希和其他人认为，由于印度农业在国际竞争中过于脆弱，以至于其出口和创汇能力不能“拯救印度”。与全球化乐观主义者不同，乔希强调印度工业的弱势。由于过多的保护和垄断条件，大多数加工制作的商品都是劣质的；此外，根据国际标准，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起来的印度工人的工资水平虽然太低，但与生产率相比依然算高。按照西方的标准，印度工业没有竞争能力。相反，由于农民从事生产的生活标准极低，也由于世界市场价格高于印度和有利的热带气候条件，印度农业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印度农民应该能够通过国际贸易挽救国家。可以说，印度农民也是真正的企业家。在使用“困虎”这个比喻时，农村公开集会上提出了这样的论据：

“农民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凶恶的野兽，它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对它说：别离开笼子，热带丛林很危险，野兽将吃掉你；你在笼中呆得太久了，你太虚弱了，很难活下去。但是农民说：我是一只老虎，热带丛林是我的家，我想出去，获得我的自由，将为之进行斗争。如果你想自由，就来奥兰加拉德。”(第五次政党会议讲话稿，1993)

在马拉提文献档案中，这些论证还有一种比英语文本显然要清楚得多的解释。在反种族运动中，也经常使用诸如保卫全球化和对全球化反对者进行反击这样的语言。在全球化反对者呼吁民族主义并将全球化描述为新殖民主义的地方，乔希和其他人就会联想到另一种传统——反种族运动，那些支持反种族运动，并且维护自身利益的民族主义领袖简直成了英雄。在这种事情上，英国人被看做是那种至少允许通过教育来获得解放与社会地位的向上升迁发展的人。印度的统治阶级具有“非法英国人”特征，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被描述为“婆罗门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统治阶级和国家官僚政治机构被农民视为主要敌人。

因此，在关于专利和种子的讨论中，相关政党的发言人不仅强调农民决不只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而且也习惯于到市场去购买种子特别是杂交种子，他们想得到优质的新种子。乔希通过揭露在传统的婆罗门体制中，教育已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从来不可能免费享受，以此抨击反对者的虚伪。

首陀罗的观点

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群体所涉及的利益不同，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印度社会阶层的特殊标志就是种姓因素。最近，兴起了一种强大的、以首陀罗或者贱民和其他低等种族为基础的运动。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值得研究。

尽管在这里也存在差异，但正在逐渐形成几种模式。在许多领域，首陀罗的观点与婆罗门拉什特里亚斯瓦亚姆塞瓦同盟恰好相反，因为它的目标在于"完全的外来自由化和有选择的内部自由化"。一方面，有一种由诸如 S.K.托拉特这些经济学家指出的普遍的担忧：私有化可能损害首陀罗在公共部门就业和工作岗位的数量。（托拉特，1996）首陀罗比其他任何群体对福利效果和社会开支都更为不安。因此，现在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另一位首陀罗经济学家纳伦达·贾达夫表明了他的观点：必须支持一种开放经济，但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贾达夫，1997）

另一方面，也有反种族运动的传统，而且这种反种族运动对民族主义者的辩白表示怀疑，因为它为婆罗门精英的利益服务。这种运动涉及世界传统，它特别强调法国革命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博爱。甘地——在把他与印度穷人等同起来的遮羞布下——和被形容为总是穿着大衣、打着领带的首陀罗英雄阿姆倍伽尔的自然描述象征着他们在这一观点上所达到的不同。对首陀罗来说，地方的比全球的更容易遭受危险。一本马拉提著作这样谈到它：

“在文明繁荣时期，印度与许多国家保持着关系，如与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和其他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因此，印度文明中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比那些以种族利益为基础并对科学、贸易和进步加以限制的雅利安人的成就要大。甚至现在雅利安人试图重新复活拉姆·拉吉雅、欣杜·拉什德拉等人的古老理想。因为这种政策，雅利安人反对新的全球化计划。”(乔杜里，1994.1)

关贸总协定规定赋予了劳动者竞争的优势，而对寄生群体产生消极影响：

“这对婆罗门主义将是一种损失，他们不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贱民不会增加，相反会减少。”(乔杜里，1994．3)

总体上看，首陀罗对这些论点极为矛盾。运动的焦点首先在内部，也就是攻击婆罗门精英、要求就业照顾和教育、惩罚犯罪行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有关全球化的讨论被视为精英内部的讨论。正如论述尖刻恶意却颇受欢迎的记者 V.T.拉杰谢卡尔所说的“纳西蒙哈·拉奥想将国家出卖给世界银行，但社会主义的婆罗门人阻止他这样做”。(1995，54)

趋全球化之利

全球化讨论似乎慢慢就要结束了。许多人断言，与(不管哪一个政党的)最高决策者们有关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印度不同政党的经验表明：在执掌政权后，为了正确认识资本和发展技术的需求要求引进外资，各党派反对以任何方式攻击全球化。在印度人民党联盟上台执政以后，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恩荣事件中的转变也许最有影响(译者注：恩荣是印度一家地方电力公司)。最近的观点就是印度人民党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的主张：人们应支持“和谐的全球化”。

超然于简单而极端的观点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全球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能趋全球化之利、避全球化之害的政策。——就像当代印度商界许多言论谨慎的领导人物一样,首陀罗发言人如托拉特和贾达夫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点在文化和大众化方面也非常明显。(例如曼查德拉,1997;费尔南德斯,1998)

这种新导向的最权威的代表人物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尔蒂亚·森。森在经济学界的声誉主要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上,但他也从事一系列其他可以被称为应用经济学甚至哲学如饥饿、性别、不平等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例如,关于“消逝的妇女”的研究,他利用与性别相关的数字,估计在世界上几乎有1亿妇女(印度有4000万)“消逝”了,即死得太早,这种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家长制影响的具体计量方法。森一般被认为是左派人士,在获奖前森的思想经常被发表在如亲共产主义的《前线》杂志上。在很多人看来,森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幻想在国际上的失望正在不断增加。

森所坚持的观点是,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一定伴随着社会福利开支,特别是在教育和健康上的支出,它们将为现代世界经济的成功打下基础。如他将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印度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于民主体制的帮助,减少了饥饿死亡的人数。但是他也指出,中国在公共教育和个人能力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更好成就对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决定性的。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说:

“我认为,全球化毕竟是一种积极力量,如果它能适当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它就会成为世界繁荣的主要力量……总之从全球化中可以获得重要的利益。因为我赞成全球化。”(引自:印度,1998.10.15)

为了从全球化中获利,森强调对政治的投入和社会福利开支的必要性。政府不应直接从事工业活动,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提供

健康保障和教育,实行农村改革;为了帮助穷人在危机时期度过自由化的“难关”,“社会保险网络”是必要的。森对他的祖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印度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健康保障、教育和农村改革。当它们突然实行经济开放的时候,大量的人不能跟上全球世界的发展。”(引自:印度时代,1998.10.15)“第三种观点”现在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利用政治趋全球化之利避全球化之害的必要性。在全球化讨论不断进行的同时,这种讨论也逐渐从意识形态化的、紧张的行为转向关于政策的冷静客观的讨论。现实问题是,在政策转变后,许多政治力量不去完成协商全球化所要求的艰巨任务,反而立即激化了民族或宗教沙文主义。

(盖尔·奥姆韦德,德语翻译:托马斯·西博尔德)

参考文献:

阿洛伊修斯,G.,1998: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当代演讲说明:首陀罗的观点,“大众媒介的全球化,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后果”研讨会文章,邦加洛,联合神学院,7月29日~31日。

匿名者,1997,专门报告,专利:保卫古代智慧,载于:现实,9月6日,9月9日。

乔杜里,纳格什,1994:什么是关贸总协定?载于:巴胡贾恩·桑加尔斯(马拉提双周刊)。

乔古勒,阿肖克,1998:国货运动思想,印度人民党关于经济事务政策的文章。

达斯,塔伦,1998:印度的战略需要重新思考,新闻陈述,印度工业联盟,3月20日。

费尔南德斯，维尔马，1998：我们文化和价值体系中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影响，尼马尔·尼凯坦。

戈希，贾亚提，1998：全球化与不平等，载于：前线，4月24日。

古拉提，阿肖克/阿尼尔·沙尔马，1994：关贸总协定支持农业什么？载于：经济和政治周刊。

古鲁，戈帕尔，1998：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当代演讲说明：首陀罗的观点，“大众媒介的全球化，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后果”研讨会文章，邦加洛，联合神学院，7月29日～31日。

印度社会研究所，1997：全球化，概况；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和作为技术统治的全球化，新德里：印度社会研究所，不定期论文，7月。

纳伦达，贾达夫，1997：开放的市场与自由市场，纳希克，11月28日。

乔希，沙拉德，1998：独立出了什么错？

科塔里，拉杰尼，1995：面对全球化：民族国家会坚持下去吗？载于：印度时代，7月1日。

库尔马，萨希，1997，文化进攻：大众媒介、全球化与国家，载于：前线，2月12日。

C.T.库林，1997，全球化：它是什么？载于：内部自由化，9月3日，9月5日。

曼查德拉，丽塔，1997：市民社会边缘的全球化，载于：印度时代，12月31日。

米特拉，阿肖克，1998：我们还能摆脱第一批亚洲虎所遭遇的命运吗？载于：网络系统，1月18日。

尼南，塞万提，1998，媒体全球化：电视对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当代演讲说明：首陀罗的观点，“大众媒介的全球化，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后果”研讨会文章，邦加洛，联合神学院，7月29日～31日。

奥姆韦德,盖尔,1998,霸权,大众媒介与全球化时代的首陀罗,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当代演讲说明:首陀罗的观点,“大众媒介的全球化,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后果”研讨会文章,邦加洛,联合神学院,7月29日~31日。

I.G.帕特尔,1998:经济改革与全球变化,新德里:印度,麦克米兰。

希瓦,范达拉,1998:帝国主义的新边疆,波士顿:南方恩德出版社。

希瓦,范达拉/阿肖克·伊马尼/阿夫沙尔·雅里,1999,全球化及其对种子安全的威胁:印度转基因棉花试验的案例,载于:经济与政治周刊,3月6日~13日。

S.K.托拉德,1996:告别演说,“首陀罗新经济政策的效果”研讨会,浦那大学社会学系,12月9日~11日。

第三部分
非洲:处于世界经济和政治边缘化与开发内部发展潜力的希望之间

全球化过程中非洲的发展潜力

本世纪开始时,非洲的发展前景比10年前更加暗淡。直至不久前宣布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富有成效的增长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半的国家正处于内战、类似内战、动乱和地方冲突之中。在一些国家,还存在更大的社会抵制等待处理。甚至新南非也面临着若干重大问题,它在20世纪90年代才实行了摆脱种族隔离的最后一次和平过渡。

当然在非洲也存在一些希望之星,如果想一想这种发展似乎多么不大持久,这一情况就会引人注目。最先应当提到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这里南非除外),它们是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而且长期以来拥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其后是一些人均收入较低

却比较稳定的国家,例如塞内加尔、科特迪瓦,也许还有加纳和马里。可是,乌干达、纳米比亚和贝宁的稳定则似乎比较逊色。此外,非洲是贫困的大陆。只有在少数一些国家中,人均收入在过去20年才有所增加。大部分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仅有小部分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例如健康、教育、清洁水的获得)的满足能够得到保证。对于多数居民而言,一切问题都与生存有关,每年人均收入远远低于800美元,尤其是这种人均收入的分配十分不平均。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是两个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增长和高额投资在30多年内调整富裕的"渗出"并用于较大部分居民的国家。在几乎所有其他的国家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因为精英们的年薪目标妨碍了增强生产性的财源。所有部门的——除了少数一些由外国企业所控制的飞地(译者注: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或势力范围)以外——生产率都很低。由于卫生和教育事业多半处于一种悲惨的状况,所以在短期或中期内,尚不存在加以改善的可能。

这篇论文要突出强调的是,全球化过程只是边际性地有助于改善非洲的经济前景。一些国家也有理由希望利用自由化世界市场的机会(例如在科特迪瓦、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和南非);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中,目前还不存在这种机会。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巨大经济转型表明,非洲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所有部门中,货币经济已经来临,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不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也只存在于边缘化中。一个具有农村和农业特征的非洲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和以城市为导向的非洲。这些变化削弱了某些传统并且迫使这些传统适应新的情况。可是现代化只在少数一些社会部门中开始并且只有助于保证少数人可靠地生存。令人担心的是,青年——非洲人口的大多数——将面临一个多半不大有成果的未来。许多人因此移居国外,前往南非、欧洲和北美。社会结构比任何时候显得更加濒于崩溃。面对这种几十年以来已经呈现的发展情况 ,在全球化过程中,非洲的经济增长和

贫困克服是否将出现较好的前景？因此非洲不能回避进一步的调整。问题在于，为了生存和发展，是否将形成某些内部潜力。究竟有哪些行为体，社会的根本变化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哪些社会冲突中形成？为了能够长期地克服非洲的危机，人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呢？

首先，这篇论文将研究一些经济的趋势，并且指出由于全球化过程而更加突出的一些主要问题。接着探讨哪些社会行为体获益，哪些很少或根本不能受益的问题。最后，本文试图介绍进行调整的开端。如果政治和经济“违法行为”继续存在的话，那么社会抵制是否将会增加？

非洲全球化压力正在增加：一种挑战

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上与日俱增的一体化过程，这个过程与自由化过程和针对未加调整的经济结构计划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某些跨国的康采恩起着主要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与现实货币经济结构（金融市场）的脱钩。这种全球化过程使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彼此接近。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不同时发生的非国有化（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具有有限的干预能力）与区域化过程以及向心和离心的形势彼此结合。总而言之，这是超越边界的交流和相互作用过程在强度和影响范围方面增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也包括文化关系。效率高的金融市场、分配系统和不断改善的通讯使交易费用降低。全球化方面新近出现的是区域—全球性关系网络的扩张、密集和稳定（戈特瓦尔德/黑默尔，1998；努嫩坎普，1998），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观察，这种变化在两个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非洲的福利国家危机和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危机。作为被输入的国家，这种软弱的国家起源于殖民时代，并且在全球化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计划的过程中加倍地被

非国有化。这种加倍的非国有化是通过发展合作中的政治条件化和结构调整计划来实现的。在经济方面,通过私有企业对货币主权和不断增长的国家私有化的侵蚀,甚至通过私有企业对国家领土的侵蚀,非国有化变得一清二楚(在尼日利亚的壳牌石油公司、安哥拉和加蓬的石油工业或者在塞拉利昂和刚果的金刚石矿区)。

●新的通讯革命特别重要,它引起空间重要性的根本变化,从而也引起领土重要性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某些学习过程和对某些在非洲几乎还认识不到的技术变化的调整成就。超越边界的贸易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和超越边界的、在冲突情况下能以不同方式为政治组织加以利用的信息正在扩展传播。国家的非领土化也为某些犯罪组织开辟了广泛的活动部门。[①]因此产生这样一些过程,其结果为"那些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是通过跨国行为体、通过其市场机会、目标方向、认同和网络而出现的,并且横向地被连接起来"。(贝克,1997,第 28 页及下页)然而,也存在着国家控制的可能性。一种"超全球化"(佩拉顿及其他人等,1998,第 34 页)的观点就大为过分了。按照这种观点,到处存在着已经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共同体、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证明"失去地方性"。虽然全球化在不断增长,但是经济仍将首先表现出国家的特点。这些经济结构具有行动活动余地。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非洲。

对于非洲来说,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选择,这样的发展选择因国家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非洲认识到,由于自己结构方面的不均一性,由于世界市场中的边缘化以及由于某些内外部条件,使自己的发展面临特殊的挑战。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中,非洲依然充满希望。通过发挥内部的发展潜力

---

① 其中一些例子是设在卢旺达的"千山广播电台";在利比里亚内战中的内战领导人卡洛斯·泰洛尔通过卫星电视播放的每日报道;或者在塞拉利昂冲突中电视文化对青年组织的教育作用。(巴赫,1997;巴亚尔等,1997;雷诺,1997, 1998)

非洲可以避免进一步边缘化。可是，目前将这种情况加以转化的可能性显然比20年前困难多了。

衰退、繁荣、萧条

为非洲发展而创造的环境条件究竟如何呢？我首先着手探讨与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后果有联系的那些最主要的方面。这些方面就是世界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通讯和运输。

在国际贸易中，非洲进一步边缘化了：非洲经济的特点多半是进出口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高额的份额。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这样的份额由于通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及通过贸易期限造成的损失所出现的大量的保护而减少。(汉瑟姆/卡佩尔，1994；伊邦，1996；罗德里克，1998；世界银行，1999)非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继续下降。(1990年为2%，1997年为1.6%)此外，非洲经济的特点还表现在单方面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上，这样的结构直至今日仍显示出典型的殖民地专业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出口结构中[①]存在着很多的歧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避免或者减少"荷兰病"[②]。几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被包括在全球价值创

---

① 详细情况请参见如下的章节。(卡佩尔，1999)

② "荷兰病"的意思是：通过专门资助一个部门(尤其是原材料部门)，极大地扭曲和加深结构上的不均一性，因为这个部门对赚取外汇作出重要的贡献。当人们在荷兰发现了天然气并且加以开采的时候，人们创造了"荷兰病"这个概念。这个部门在经济方面迅速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所有其他出口部门的衰落。这个部门得到国家特别强大的支持，以便增加出口。从经济方面考虑，原材料部门的扩张意味着，劳动力流入正在扩张的部门，假如在这个部门能得到更高工资的话。因为所有其他的部门不能支付这样的工资，所以就导致那些没有得到支持的出口部门的衰落。增长的出口导致货币的相对的升值，这种情况歧视了那些没有进行扩张的出口部门。"荷兰病"现象，准确地说，没有出现在荷兰(因为这关系到一种多样性经济结构)，反而主要出现在第三世界的那些原材料国家中。(奥蒂，1994)

造系列中。一些国家在夹缝中获得了成功。通过农产品和原材料援助基金,洛美协定[①]加深了单方面的、结构方面的依赖性。虽然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大约30年来未加以改变的对外贸易结构,也就是说,对一两种产品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以原材料生产为导向的日益强烈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在加工工业方面显示出正的增长率。

对外贸易集中到欧洲联盟国家,而区域性贸易交流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始终很低(远远地低于10%)。区域一体化的增长潜力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对这种潜力也不能估价过高。

世界贸易自由化使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进一步走向边缘化,以至于几乎不能希望从对外贸易方面得到对经济发展较大的促进。此外出现了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冲击,而非洲对这些冲击几乎无能为力。这样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冲击,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损害。与此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出口下降,与许多国家进口的巨大减少相互结合造成了生产不足。由于非洲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依赖机器、工厂、初级产品等的进口,所以某些正在降低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变得特别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相应的进口得到财政资助,出口才能够扩大。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发展出口部门,必须赚取外汇,这些外汇有助于人们获得在当地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这种冲击的影响也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方面,从而也表现在居民的人均收入方面。

那些妨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商品进出口交换比率不仅表现了非洲几乎不能影响价格的制定,而且以导入歧途的贸易政策为基

① 洛美协定是目前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71个国家与欧盟签订的一个条约。该条约的目的在于,通过贸易合作,发展援助以及对农业原料和矿物原料的补偿基金促进这些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卡佩尔,1998a)

础，这些贸易政策向出口征税，并且不鼓励出口的多样化。由于向工业企业家们和农场主的产品征税，对货币估计过高，也由于国家的收购和出口垄断，妨碍了某些工业企业家和农场主使自己适应世界市场的要求。因此，非洲国家总体上显示出不灵活的调整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国家失灵了，因为比如为了提高能力水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停止了。（米特卡尔/特斯法丘，1998）

在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方面，非洲同样被继续排除在外。内部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水平是非常低的。每年大约 180 亿美元（1990 年至 1996 年）的发展援助比大约 20 亿美元（除南非外）的平均私有资本涌入高得多。如果再加上南非，形势就有点向有利于私有资本涌入的方向发展。可是这表明，对私有资本来说，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1995 年，这个大陆甚至比不上投向马来西亚的资本涌入数额。而且，那些少量的投资涌入都集中在那些输出石油国家：安哥拉、刚果、喀麦隆、加蓬和尼日利亚。在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48 个国家中的 32 个国家）中，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外国的直接投资记录。

从趋势上看，非洲将可能被从世界市场中排除出去，因为其现存的通讯、信息以及运输程度还不充足。获得重要信息和运输货物都很昂贵。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现代化通讯技术非常落后，而且很难弥补，因为技术能力不足和政府缺乏创新构成了结构方面的障碍。1997 年，在大约 5 万个因特网服务机构中，大部分机构（超过 90%）设在南非。（奥欣科亚/侯赛因，1998 年，第 119 页）

在非洲范围内或者与非洲之间的运输是昂贵的。从非洲出发和到非洲去的平均运输费用——除了石油运输和其他大批货物运输以外——要比第三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运输费用高得多。这种运输费用平均高于关税，而且其作用比非关税壁垒大。（阿姆贾德等，1996）结果，外国投资，尤其是对生产制成品和工业产品企业

的外国直接投资停滞不前。此外,高额的内部运输费用妨碍国内市场的形成。不充足的内部基础设施(运输/通讯/能源)几乎不允许在生产多样化和向非传统地区出口的多样化方面出现突破。在过去10年期间,能源供应、水供应和电力供应的情况恶化,目前电话和运输的工作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众多灾难性的基础设施限制了非洲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前景。

对非洲来说,全球化过程意味着一次巨大的挑战,但由于结构方面的危机征兆,非洲几乎不能对付这种调整压力,在此情况下,五个基本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佩尔,1999a):

●薄弱的工业基础是非洲市场世界一体化和地区贸易往来的一个不利的先决条件。(拉尔/王韦,1998;拉尔/施图尔特,1996;王韦,1995;米特尔卡/特斯法丘,1998)除了南非和津巴布韦以外,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至今也未见成效。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很突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全部债务(在1997年底)已经增加到大约2600亿美元。那些传统的指标还显示出一种令人可怕的景象;所有危急的界限都已超过。债务还本付息限制了投资活动。通过贷款进行发展的计划似乎很少取得成功。

●几十年以来低生产率成为非洲经济的一个特殊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按过去25年期间的平均数计算,整体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数。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在生产率发展方面获得了进步,例如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低劳动生产率和整体要数生产率清楚地表明,虽然其劳务费用较低,但非洲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生产地区之一。由于生产率低下,并且由于通讯和运输费用昂贵,非洲迄今既没有起到被转移的生产基地的作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国际价值创造系列产地的作用。(热勒费,1995)

·职业和技术能力、人力资源极其低下的水平,被证明是农业、

手工业、工业、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尤其是在受过培训的工程师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极大的落后表明，起飞几乎不可能。“许多非洲国家既没有制订出一项科学政策，也没有制订出一项技术政策。”（阿维诺敦，1998，第23页）[①] 如果非洲想要长期地深化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话，就必须着手加强目的在于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培训和技术研究水平，并且也是为了提高职业教育水平而进行的努力。（阿普尔顿/麦金农，1996）在这方面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和国际赠与者团体转变思想。

●人才流失与资本外逃：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不良发展影响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资本外逃与人才流失方面。一些新近的估计表明，大约40%的非洲有价证券资本在大陆以外投资。学术精英分子从许多非洲国家移居外国。工程师、医生、教授、手工业者、教师和许多文艺工作者背弃了非洲，主要在欧洲、近东地区产油国和美国工作。这些精英分子本来能够在国内为提高调整成就作出贡献，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作出了“退出选择”，这样就削弱了非洲社会的创新能力。（世界银行，1997）

由于全球化过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变量有了新的范围——借此绝对不会随之出现解决这些问题的简单办法（参见一览表－1）。人们不能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研究非洲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一种非常不同的混合同时出现在这套变量中，从而要求不同的增长战略。

一览表－1：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

可变的作用
Ⅰ.几乎不可改变的情况

① 引言由外文译成德语。

续表

1.自然情况	
——气候	——天气、自然条件对可能增长的影响。
——自然资源(提供原料)	——"荷兰病"的危险。
——内陆国家—地理位置	——巨额的运输费用,在对外贸易中较小的盈利可能性。
——人口增长	——在经济增长低的情况下导致人均收入下降。
——地方的圈套	——在一些国家中出现地方生态系统的耗尽。
2.低收入	能对积极的增长做出贡献;内部增长理论的赶超假想;被转移的、低工资的"生产基地"。
3.传染效果(接触传染)	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的一些邻国具有某些消极的放射效果,增长率高的那些邻国放射积极的效果。
4.国内市场	低程度的规模经济;狭小的国内市场阻碍工业化。
5.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冲击	消极的商品和收入进出口交换比率具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能够导致贫困化的增长。
6.世界利息水平	1970—1990的20年间对增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续表

7.远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巨额的运输费用、通讯密度小，合作的某些优越性不能够充分地被利用。
Ⅱ.可以通过政策长期地产生影响的因素	
1.储蓄和投资份额	极低的储蓄和投资份额阻碍增长；首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不安全(风险)。
2.债务	使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丧失勇气，扩建基础设施的资金，提高人力资本变得困难。
3.资本外逃	国民经济的损失，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国家的投资受到限制。
4.技术能力水平	整体要素生产率很低；1960—1995年期间出现负的经济增长；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例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
5.提供人力资本—知识积累	低水平的技术能力阻碍经济增长。
6.运输费用	由于不充足的道路网造成的巨额运输费用和业已调节的市场。
7.基础设施	不充足的基础设施阻碍经济增长和企业界发展，并且导致生产率低下。

续表

8.通讯	没有与国际标准结合并且没有在国内传播(南非和毛里求斯的某些部分例外);只在各个首都存在着足够的通讯。
9.出口产品	对少数一些出口产品的巨大的依赖性导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微弱。
10.收入的分配	不相同的收入分配;缺乏中间阶层,购买力低以及较低的储蓄和投资份额。
11.非法活动或者受到阻碍的活动	非法活动阻碍经济发展;国民经济遭受损失。
12.公众的选择—投票权或者退出	专家的外流:国民经济的费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在南非出现专家的移入和外流。
Ⅲ.政治上可以改变的变量	
1.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的低水平和运转情况不良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有消极的影响。
2.发展援助	本来应该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然而能够对“荷兰病”效应以及低储蓄和投资份额做出贡献;分别按照政策或者集中或者分散投资和政府的支出(消费或者投资)。

续表

3. 汇率	长时间地对货币评价过高；切合实际的汇率具有宏观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
4. 财政和货币政策	可以行使限制机构的职权从而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5. 税收政策	向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效果的对外贸易征税；整个税收系统是不充足的。
6. 公共服务	视性质而定，既有积极的公共服务又有消极的公共服务，然而大多数是不充分的；此外整体结构也有问题。
7. 开放的市场	显而易见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许多国家中通过限额、关税、税收、销售部门执行反出口政策。
8. 公共机构；"社会资本"	具有巨额交易费用的非正式的公共机构框架；所有权方面的问题、种族或民族问题造成的紧张关系、腐化堕落、政治上的不稳定等导致经济增长的消极的效果。

在基利克，1998；卡佩尔，1998b 著作的基础上制定该表

上述这些因素表明了非洲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能

消除这些问题，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不会持久。这就是说，因为那些基本的、可以产生影响的因素（一览表第 II 部分中的 1－10）能够中长期地加以改变，而它们的积极作用在以后才能够感觉到，所以现在特别取决于从这里强有力地开始。大多数国家很少对第 II 组因素采取措施，这一点甚至对于例外的国家毛里求斯也变得一清二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毛里求斯已经开始系统地改变第 II 组和第 III 组的那些因素，以便借此影响第 I 组的那些在结构方面起作用的因素（例如单方面的对外贸易结构，小的国内市场）。与这个大陆的大多数国家相比，毛里求斯目前领先大约 30 年，这涉及人力资本供应、技术水平、储蓄和投资份额、公共机构的效率、调整的准备和灵活性等方面。（佩格，1994，第 215 及以下各页）

在政治上更容易变化的变量方面（第 III 组），许多非洲国家慢慢发生了思想转变。世界银行首先从这里开始。然而，这样的调整过程进行太慢，也远远没有达到必要的深度和力度，以便为外逃资本的返回和移居国外的专家们的回归创造一个对国内外投资者有利的环境。国家、中央银行、公营企业、私有银行、企业联合会、对外贸易组织、销售部门等仍然坚持自己设立的巨大的障碍和停滞不前的思想方法，各种非正规行为广泛地得到传播。只有当人们能够有力地利用第 III 组变量中已得到改善的行为活动空间的时候，第 I 组所容纳的更难以发生影响的情况才能朝着实现更加有利的关系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第 II 组指标和第 III 组指标的改变，大多数非洲国家将继续保持结构方面的落后和贫困状况，而且仍会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之列。

只有少数一些国家能够进入起飞阶段，并且改变第 III 组因素。全球化过程增大了调整的压力并且为那些准备进行调整的国家开辟了有利的前景。

关于非洲国家竞争弱点的讨论

为什么非洲国家多半被证明很少具有发展和竞争能力？关于目前非洲的发展危机，有以下四种主要解释：

●战争、腐化堕落、政治上的无把握和不稳定：国际组织、赠与者团体和一些专家把腐化堕落、政治危机、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种族分歧和内战看做是非洲持续落后的原因。政治上不稳定、腐化堕落和暴力在非洲广泛地扩散。这种情况对描述这个大陆的危机形势当然起作用。结束军事冲突和政治危机以及消除腐化堕落和集体主义虽然会大大地提高实现非洲美好前景的可能性，但是根本不存在通过和平实现发展的自动机制。这首先与下列因素有关。

●不灵活性：另一个论点主要是以不发达的内部经济因素为出发点。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多出版物中首先要提到这种内部的不灵活性。应该打破不灵活性的经济改革（国家确定的汇率或者垄断的销售协会）已经陷入停顿状态，此外由于一些国家缺乏改革决心，再者也因为那些结构方面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比设想的大得多。

●外部的冲击：在过去数十年期间，对外经济的限制被视为主要因素，例如价格变化，摇摆不定的进出口交换比率，汇率的变化，还存在一些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俄罗斯出现的那样的金融危机，以及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变化。这些因素清楚地表现了非洲经济的反复无常。另外还加上非洲国家几乎不能施加影响的饥荒和不利的气候条件。

●社会福利导向与国家的拒绝：据说非洲国家拒绝并且没有把自己的角色看做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等级的社会福利导向也许是不发达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社会福利恐怕首先要从国际

贸易税收、农业税收、造成不良实际利息的贷款分配以及平行汇率与官方汇率之间差额的吸收中提取。在市场自由化以前，吸收社会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外国投资者和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本国企业家、获得进口许可证的企业家、销售部门以及公营企业。在市场自由化以后，得到好处的倒不如是本国的企业和进口商。结构调整计划、政治和机构改革在大多数国家中只不过导致传统精英分子为新的技术政治精英分子所取代。机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公共机构的衰弱。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与公共机构的加强背道而驰。

上述这四种解释包括了非洲的主要问题，但这些解释的认识价值仍然不足。在我看来，这涉及到一些无论如何必须予以补充的重要因素，也涉及上述所列解释的其他考虑。尤其应该列举的重要方面是家庭生存战略、传统的价值模式、对其他国家成就的嫉妒等等。《关于批评表达的不同文化标准》具有重要意义，(德特默，1998，第258页)正如沙巴尔/达洛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国家和社会并不是独立的，领主主义占统治地位，不符合惯例的情况广泛流行。精英需要得到重新利用，然而精英分子同时通过纵向的再分配与居民相结合。当然，也存在着非个人的行为。而个性已被融入共同的逻辑中："非洲在缺乏真正的政治制度化或者缺乏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正在正常工作'。"(沙巴尔/达洛，1999，第163页)

社会和经济转型

深入的转型既没有给非洲带来"现代精神"，又没有为非洲开辟稳定的社会和地方发展前景。(卡佩尔，1997)目前同时存在许多彼此重叠的结构，这些结构需要从根本上进一步加以改变：

卷入全球的生产(出口农业和原料生产)至今也没有同地方经

济联系在一起。在有些国家中出现了飞地——例如在安哥拉、加蓬、尼日利亚——，除了以开采地使用费形式保证社会福利以外，民族国家几乎没有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在那些原料出口国中，几乎不存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博茨瓦纳、南非除外)。只有少量的精英分子得到好处。尼日利亚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尼日利亚通过国家从一些经济部门中撤出促进了庸俗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市场力量现在能够自由发展——例如在阿南布拉州、埃努古和阿维亚，在这些地方出现了工业核心。(布罗伊蒂加姆，1997)然而，这种资本主义也有其消极方面，例如公共机构的减少和各种违法经济活动的增加，甚至国家公务员们也参加了这些违法经济活动。通货膨胀、迄今极其压制的军政府、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对奈拉的过高评价以及广泛流行的腐化堕落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例如大学职员、医生、教师、不由国家支付工作报酬的公职人员、农村的和城市的中小企业。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贫困在广泛地扩散，大多数尼日利亚居民低收入的情况已经超过15年。只有少数人(军队、高级官员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企业)从国家的崩溃和经济衰退中得到好处。然而首先是多国康采恩——例如壳牌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吉普等——在它们的原料飞地赚取了高额利润。因此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具有非常强大的地位，并且建造了自己的基础设施、安全机构、学校和有关社会福利机构，无论当地居民还是这个国家都没有从上述这些设施和机构中得到好处。在其他国家中也出现了人们所描述的国有财产私有化现象，这些现象部分地涉及到某些绕开国家来进行的“非正式的”投资。

塞拉利昂、刚果、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的情况也非常明显。在避开国家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中的外国企业生产和出口钻石、木材和

黄金。在一些政治情况不稳定的国家，为数众多的企业把资金投入到它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并且建立一支防卫部队，以保证其经济活动的安全。这些企业不纳税。(雷诺，1997；巴亚尔等人 1997；米塞尔/瓦莱，1997)在一些实行财产所有权私有化的国家中，存在着一个失去法律制约的阶层，这个阶层包括下层无产者、临时工、守卫人员和安全人员、钻石和黄金勘探者、强制劳动者、私人军队和青年帮派中的受压迫者。暴力市场出现了，国家已失去它的作用。

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南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此外，属于这些努力的还有为调整经济而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那些协议，直到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为止，这种经济仍由国家、大型经济企业和经济联合会——也要在与工会的合作下——极其有力地控制着。在南非的经济生活中，国家起着巨大的作用，甚至现在主要还是在中央一级作出经济政策决定。国家占有的巨大份额和经济决定的中央集权化现在已被证明是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能够克服那些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首先取决于加快结构转变。为了能够在国际竞争中长期经受考验，通过巨大的教育努力来提高社会的职业和技术能力也是卓有成效的。(马雷，1998)

在经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的基础上，目前政府的经济政策试图既解决巨大的就业危机，又使南非的工业具有竞争力，然而这与解雇劳动力联系在一起。此外，经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把下列各项事务作为目标：将所有公营企业私有化，在共同谈判系统范围内灵活地运用劳动市场，通过税收政策上的鼓励来促进投资，通过对小型工商业部门的支持来增加失业者的就业，并且通过对边缘部门的稍高评价来使南非的工业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让我们作出如下总结：在全球化进程中，非洲的发展特色在于深入的边缘化。大多数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很少。少数现存的束缚表明，非洲是工业化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出口生产单方面地集

中于原料和农产品，进出口交换比例的冲击和其他一些外来的冲击也经常发挥消极的作用。与国际价值创造系列联系较少；跨国资本和本地资本的联系渠道不畅通，因而，技术和知识的扩散就很困难。排除在外的强烈程度反映在低下的生产率中。因为在非洲将发生什么根本变化，经济改革计划直至今日仅仅集中于宏观经济变量等，这些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几乎都不可能出现，所以在不远的未来非洲仍将置身于全球化的有利影响之外（例如技术扩散、投资的涌入、外逃资本的回流、人才流失的转变等）。如果经济政策环境允许这样做的话，即使在夹缝中，非洲企业也能有所作为。由于自己严密的生产结构处于一种有利的开始状态，毛里求斯和南非不在这样的估计之内。

非洲的内部发展潜力

除了一些采取灵活适应态度、取得部分成功的国家外，非洲国家首先面临如下选择：

●利用出口部门现存的比较优势，虽然这些部门——主要是原材料部门——随着结构的扭曲而出现。

●发挥内部潜力，这些潜力在国内和出口导向方面都能起作用。内部发展潜力表现在工业、农业和需求方面的增长和调整上，在此情况下，要考虑某些措施的社会影响。

“内部潜力”这个估计把视角对准隐含在全球化过程发展趋势背后的国家或区域的内部前景。因此这个估计并不仅仅包括内部的经济增长方面[①] 与殖民地时期相反，现在在非洲用于“原始积累”的储备物资显然已经耗尽：那种从前正常运作的、为了保证城

---

① 关于“内生的发展”这个概念的讨论被大大地扩展了。它经常被用作二者择一的、自主的 、自动集中的发展或自力更生的同义词。（施特赖费尔勒，1997，第 391 页 ）。

市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化过程极其重要。为了保障就业和收入的获得,城市中非正式部门的小企业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正式经济结构出现危机,内部城市经济结构承担了保证生存的职能,同时形成了生气勃勃的发展状况。融入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压力使得内部潜力发生变化,迫使这些潜力进行调整(例如本地可支配的资源、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变化)。它们对阶级、行为体、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转型过程导致非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渐解体,也导致城市化和农业的相对削弱。其后果是生产和需求发生变化。

内部发展计划必须考虑这些变化,并且在此情况下必须注意到,由于全球化日益集中的压力和社会渗透,差异也增加了。具有结构不均一性特征并且已经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的社会,一方面遭受更加强烈的非一体化和分离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出现了一种新的前景。

虽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不均匀性,但是由于非洲大陆内部的变化而开辟了新的前景。(恩杜卢/范·德·瓦勒,1997)这些前景来源于迅猛的城市化和非正式部门的扩展。而内部潜力也从随着城市化而出现的城市需求购买力的增长中——通过实行规模经济——得到了促进。于是出现了市场规模效应,外部性也应运而生。落后和先进的连锁机构产生了,这些连锁机构使所有的生产者在一些大的市场附近安营扎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些连锁机构导致一些生产者云集的大中心的出现。虽然这种需求大部分是由贫民(加上正在慢慢扩大的中间阶层)的收入组成的——也就是说这种需求是贫民的大众购买力,这种需求成为本地生产和工业的潜力——因而成为内部发展潜力。所以,本地企业家潜力的产生在于对本地大众购买力的适应,这些企业家一方面生产消费品,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生产生产资料。

然而,这终究没有涉及企业只为本地的市场从事生产,由此损

害进口代理工业化。这可能是一种选择——然而多半是一种不够好的选择——,因为过渡过程导致市场的开放,从而使取消某个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变得困难起来。另一个相比之下好得多的选择在于,本地的市场充当出口导向的基础,借此保证那些本地的企业,使它们的生产率适应国际水平。另一方面,出口可以——但不一定——增强内部发展潜力。如果出口产品生产者——例如在尼日利亚的大众汽车公司和标致公司——在没有大量连锁机构的情况下在这个国家里从事生产,只会对内部化产生一个很小的促进。有些出口生产区的情况也是这样。出口促进战略能够——只要它们使本地的企业强大,加深同本地生产者的联系并且能够导致本地整体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完全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时为国家的独立自主创造一个有利的对外经济形势和回旋余地。"(海因等,1994,第326页)因此,工业区的形成[1]和非正式部门的现代化,有助于形成一个内聚的国民经济和经济区的匀质化,并且有利于消除发展障碍。

概述

在全球化过程中,非洲必须克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出现的更大的困难。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正是由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而产生的某些问题的无危险的开端。自由化和结构调整计划——也许是在没有改善经济增长潜力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了这个大陆的变革。全球化促进了国家加倍的非民族化和国家机构的削

①人们把工业的区理解为某一地区非正式部门的小型工业企业、手工业者和企业的聚集。这些企业专门从事某一种生产或者某一个生产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导致了强化的劳动分工。出现了知识转让,这种知识转让为这个区内的所有参加公司服务。为便于解决某些共同的问题,企业之间进行协作,于是逐渐形成了信任关系。此外,出现了持续的创新过程,这些过程提高了"集体效率"(纳德维/施米茨,1994)。

弱，并且由此促进了某一个发展中国家潜力的削弱。软弱的公共机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福利导向、政治不稳定和某些“非官方价值模式”阻碍了灵活的调整战略的实现。巨额的交易费用产生了。机构软弱的后果表现在违规行为、非法活动和犯罪行为等方面。结构调整计划一方面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削弱而加强了这些过程，然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具有新的增长潜力的迅速变化过程。尽管对非洲的调整压力正在增大，但是发生深刻变化的希望则很小。

总之，由于结构因素、外来冲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违规行为，目前非洲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几乎不能灵活地做出反应并且适应这种转变。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措施至今只能够对少数国家产生推动作用。发展援助有利于社会福利的获得，并且似乎与其说是减弱国家和社会的违规行为，倒不如说大大地增强了这种违规行为。(朗哈默尔，1996)经济增长的中心可能出现在那些正在日益扩大的人口密集区。这些密集区可能成为内部发展的基础，而且导致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城市不断提高的购买力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形成，并且有利于供应城市的农业生产。这两者又导致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分化和形成。

对非洲未来前景的评价总体上不令人乐观。时至今日，“现代”在非洲几乎尚未来临。非洲依然正常发展，然而前景仍旧不明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有一个交换的经济结构，倒不如说是将有一个积累、投资和转变的经济结构。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将逐渐地形成，以致持久地打上世袭关系烙印的、重新分配的纵向和人事系统还将长期地占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命令将导致经济的无效。

如果非洲想要根本改善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处境，从而提高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收入，就必须开始研究对内部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这就需要关注(一览表—1 中的)第 II 组和第 III 组因

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某些坚决的行动，以便减少政治和经济上的违规行为。

（罗伯特·卡佩尔）

参考文献：

阿维诺敦，阿迪贡·阿德，1998：非洲科学与技术中人力和制度能力的建设与应用，载于：非洲发展评论，10，1，第10～51页。

阿姆贾德，阿齐塔/乌尔里希·赖因克/亚里山大·耶茨，1996：外在障碍造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贸易中的边缘化吗？华盛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未定稿，1986。

阿普尔顿，西蒙/约翰·麦金农，1996：提高人的能力，载于：恩杜卢/范·德·瓦勒（编），第109～149页。

奥蒂，理查德·M.，1994：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政策改革：资源问题，载于：世界发展，22，1，第11～26页。

巴赫，丹尼尔·C.，1997：边境与分界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载于：世界趋势，14，第97～111页。

巴亚尔，让—弗朗索瓦/斯特凡·埃利斯/贝亚特丽斯·伊邦，1997：非洲危险的犯罪，布鲁塞尔。

贝克，乌尔里希，1997：何谓全球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布罗伊蒂加姆，德博拉，1997：替代国家：东尼日利亚的制度与工业的发展，载于：世界发展，25，7，第1063页。

沙巴尔，帕特里克/让—帕斯卡尔·达洛，1999：非洲的发展：作为政治工具的无序状态，牛津，布卢明顿，印第安纳波利斯。

德特默，埃丽卡，1998：非洲与欧洲合作中的冲突与制度影响的可能性，载于：当代南北，12月第2期，第257～261页。

热勒费，加里，1995：全球生产体系与三种世界发展，载于：巴巴拉·斯大林思(编)，全球变化与区域回应：发展的国际新背景，剑桥，第100~142页。

戈特瓦尔德，克劳斯/汉斯—兰贝尔·黑默尔，1998：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吉森：发展经济学论文集 第26号。

汉瑟姆，迪尔克/罗伯特·卡佩尔，21994：黑白神话—非洲与发展政治学讨论，明斯特，汉堡。

海因，沃尔夫冈等，1994，以汽车为中心的农业工业的发展，汉堡。

伊邦，贝亚特丽斯，1996：东部非洲——贸易保护主义者？外来自由化的艰难之旅，巴黎。

卡佩尔，罗伯特，1997：世界经济与贫困，汉堡。

卡佩尔，罗伯特，1998a：发展与合作，莱比锡。

卡佩尔，罗伯特，1998b：非洲发展危机的原因及经济改革的契机，载于：密尔·A.·费尔多斯(编)，垂死与新生之间的非洲，慕尼黑1998，第79~121页。

卡佩尔，罗伯特，1999a：非洲持续的欠发达，载于：国际政治与社会，1，第38~55页。

卡佩尔，罗伯特，1999b：南非共和国：经济形势与展望，波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国别分析论坛。

基利克，托尼，1998：非洲经济起死回生了吗？参加“非洲创业：贫困与增长之间”大会的论文，爱丁堡，

拉尔，桑贾亚/弗朗西丝·斯图尔特，1996：非洲的贸易与工业政策，载于：恩杜卢/尼古拉斯·范·德·瓦勒，(编)，第179~209页。

拉尔，桑贾亚/塞缪尔·王韦，1998：撒哈南以南非洲的工业政策与工业化，载于：非洲经济论丛，7，增刊1，第70~107页。

朗哈默尔，罗尔夫·J，1996：非洲的经济改革：是由出资方的恩惠支撑的吗？载于：经济与社会科学杂志，116，1，第119~144页。

伦达尔，马茨，1998：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经济与未来，载于：伦纳尔特·彼得森（编），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未来的经济挑战与对策，伦敦，纽约，第21～43页。

马雷，海因，1998：南非：变化的局限。变革的政治经济学，伦敦，纽约，开普顿。

米塞尔，弗朗索瓦/奥里维耶·瓦莱，1997：非洲的钻石经济政策，巴黎。

米特卡尔，林恩/塔费勒·特斯法丘，1998：工业化初期促进企业学习政策的作用：非洲国家应汲取的经验教训，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非洲的比较研究，论文第11号。

纳德维，哈立德/休伯特·施米茨，1994：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布赖顿：发展研究所交流论文，第339号。

恩杜卢，本诺/尼古拉斯·范·德·瓦勒，1997：非洲经济复兴计划，新不伦瑞克/牛津。

努嫩坎普，彼得，1998：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过程与“全球化危机”，基尔：基尔论文集，第328号。

奥欣科亚，T. W./ M. 努尔丁·侯赛因，1998：信息技术与非洲的经济发展，载于：非洲发展评论，10，1，第100～133页。

佩格，希拉，1994：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伦敦，纽约。

佩拉顿，乔纳森/大卫·戈特布拉德/大卫·黑尔德/安东尼·麦格鲁，1998：经济全球化，载于：乌尔里希·贝克（编），全球化政治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34～168页。

雷诺，威廉，1997：世界贸易，军人与非洲国家的再创造，载于：世界趋势，14，第8～29页。

雷诺，威廉，1998：军人政治与非洲国家，博尔德，伦敦。

罗德里克，达尼，1998：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政策与经济改革，剑桥。

施特赖费尔勒，弗里德黑尔姆，1997：内部发展，载于：M.舒尔

茨(编),发展:论发展社会学,奥普拉登,第291~312页。

王韦,塞缪尔·M.,1995:输出的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技术、贸易与工业化,伦敦。

世界银行,1997: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华盛顿。

世界银行,1999: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华盛顿。

非洲与全球化过程

过去10年来，全球化成为全新的时髦字眼，用以描述全球活力交融的新局面——当代世界的面貌。这个概念的诗情画意不仅混淆了人们对错综复杂世界的视听，而且使全球化概念本身迅速风靡一时。然而，内行看门道，只要稍加分析就很容易使人明了：剔除其所有夸夸其谈，全球化其实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冷战及随之而来的变迁，从战后时期意识形态的分裂到单极世界中政治、贸易、经济领域里自由主义的粉墨登场——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技术（和对新产品的接受）发展的框架，其结果就像飓风般蔓延：大范围地席卷而过并造成极大后果，许多人猝不及防地卷入其中，大多数人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却根本无力搭上利益的便车。没有国界的资本流动（既投机又不投机）变成现实，世界公民的产生已经成为一种合乎实际的想像，地球村似乎也是现实和成立的。铁幕终于不复存在了。乔治·奥韦尔（译注：英国作家，1903—1950）不可能幻想出比这更妙的构思了。简言之，人类显然已经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找到了绝好的替代物。

全球化的新旧“现实”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老生常谈又是新生事物。说它是旧事物，是因为它并没有新内容。全球化久已有之，并有着收益和代价五味俱全的历史，对这一过程的冲击力和推动力人们也有所体验并熟悉这一过程。相当清楚的是，那些主要行

为体的根本目的在于，在若干年内使人类的世界经济完全融为一体(这一现象涉及全球化)，这成为各种掠夺战争、“传播文明使命”、海盗式远征、贸易战争(例如鸦片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幕后动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全球金融体制与安排，建立联合国制度及地区合作与协作的种种努力背后昭然若揭的“调控”意图，都是简化这一过程的尝试。多年来，进展基本停留在技术进步水平的功能上，从而促进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就是在冷战高潮时期，谈论法郎区、卢布区、美元区也并不稀奇。

全球化是旧事物，因为对全球化与世界上新出现的现实性的融合性质依旧没有结构性理解。全球化又是新生事物，因为，与过去不同的是，行为体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变化；另外，可以提供庇护的意识形态阵营不复存在了。全球化是新生事物，还因为它使新形式和新层面的领导更容易出现。

诸如仿佛没有止境的技术小型化和卫星传送等各种发展对大多数人的观察能力和生活现实产生着影响，从而使“地球村落化”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全球化也更容易了。此外，它们加强了各领域国际精英们之间的联系，但那些非精英们却一无所获。

尤其是，为就各种不同的、至今尚存争议的问题，如关于：

●管理方式(各种民主化规划)；

●维护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快速反应部队)；

●经济关系(世界贸易组织)；

●生活质量(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峰会)；

●环境保护(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这些问题以及就其他旨在形成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会赞成的共同体，并藉此达成全球共识。与此同时，人们还孜孜以求以特定的文化偏向为基础的同时否定其它文明特点的普遍性，这促使诸如塞缪尔·亨廷顿等人苦思冥想文明与宗教冲突的产生。

非洲令人沮丧的基础条件

150多年以前，大卫·利文斯通（译注：英国传教士和探险家，1813—1873）曾经热情洋溢地恳求他的听众把目光投向非洲：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要返回非洲，为贸易和基督教开辟道路；请你们完成我开创的事业。我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你们！"（在剑桥大学的演说，1857年12月5日，引言根据帕肯哈姆，1951年）

如今，这一热情的演讲不断被译成不同的语言和风格，有时略加修饰就会显得更加精巧，虽然个别字词有所变化，但内容完全一样。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夸张、直言不讳地细述赤裸裸的现实。如果由马丁·卡普兰提出的关于世界末日的论点只是隐约合乎实际的话——肯定会被认为对全球秩序稳定无足轻重的大陆表示赞同吗？非洲人给人的感觉是，失去了重新创造自我的能力，没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前进，反而成为世界的累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非洲已成为一个多余的大陆。尽管这听起来刺耳，但这一论点的基础却完全不难理解。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占世界贸易总额还不到2%，并且正如奥巴桑乔（1989）正确指出的那样，"国际善举有如杯水车薪，它不像上天赐雨，人人同沐甘霖。"

是的，对一个过去可以使投资获得巨额收益的大陆来说，这的确是杯水车薪。（多维尔等，1997；兰法尔；OXFAM，非洲，1993）然而，私有资本几乎完全忽略了非洲，而是涌向世界上新兴的市场。考虑到就连非洲出身的大多数人对非洲大陆的信任都很有限，而宁愿把自己的资金投资到其他地区的事实，上述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对于有些人来说，国际大家庭的恩惠并不存在。一般来说难以说明的是，一个遭受原料价格持续下跌、危机四伏、发展援助虽说没有完全断绝但却日渐减少、其投资市场又根本不景气的大陆，究竟如何才能生存下去。

非洲大陆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令人沮丧，政治不稳定即使不是持续的但却是长期的，债务负担极为沉重，饱受战乱之苦，同时政府机构及其存在的合法性似乎都得不到信任——对于这样一块大陆来说，要想获得国际经济竞争力，无异于在根本不具备现代化便利条件下进行大卫对歌利亚的战斗(译注：公元前11世纪，《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大卫在童年时杀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也就是说，需要排除万难的勇气与智慧。

目前预测的出发点在于，21世纪将是知识的世纪，只有那些占有必要的知识和信息的大陆才能领导世界和全球经济。非洲，作为一个面对外界因素和内部冲突依然脆弱的大陆，已经毫无准备地卷入了全球化过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度"关于人文发展报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000人只拥有149台无线电收音机，3台电视机和11部电话机。除南非以外，只有1万名注册的因特网用户。目前来自非洲的因特网内容只占全世界总量的0.4%。(阿达姆，第8页)这种状况可以从高度的文盲率中找到答案，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非洲男子平均文盲率为35%，妇女为45%。

此外，经济的生产基础薄弱，经济基础结构不平衡以及缺乏有效和足够充足的贷款基础。那么，全球化的喧闹对于非洲意味着什么呢？非洲人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能够期望收获什么呢？新的边缘化吗？被排除在全球福利之外吗？是稳步汇入全球经济主流还是徘徊在外围与边缘？我们能否想像类似欧洲一体化或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国际一体化模式呢？抑或这一定只能是一个幻想吗？

关心赢家与败者

仔细审度非洲大陆，了解非洲人对全球化的感受，无疑是有益

的。

对于大多数非洲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可与关于盲人摸象(7个盲人与路过的大象)的谚语故事相提并论。可以预料，每一位盲人对大象的内心感觉是因人而异的。感觉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多种因素，一方面是代际差异问题，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原因。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有某些本能的影响。

非洲地区深陷种种危机的泥潭，从原料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的上扬直至大规模的无力偿还的债务，这些危机使得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完全陷于瘫痪，并因变化无常的全球经济气候而易受冲击。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地区而言，全球化还只是望尘莫及、人们最多将来才会进行探讨的事物，因为强大的阻力和令人气馁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生存才是主要的忧虑。而且，非洲政府通常也没有能力使本国以适当的形式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

1997年9月，非洲领导人论坛[①]在其年度会议框架内举行了一次具有高质量的非洲领导人会议，其议题为"21世纪前夕的非洲"。(阿德因瓦勒，1997a)这次全球化会议的特点是激烈的争议，因为代际之间营垒分明，暴露出尖锐的对立。

与会的退休教授、讲师和前部长们代表了年长的各辈，其中多数人控诉了全球化在非洲造成的种种后果，全球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丑恶新面目遭到了否定。而年轻的一代非洲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深信，全球化将改变在这个大陆上沿袭至今的工作方式；全球化也许就是通向机遇无限的新天地的大门，并藉此使非洲从过去跃向未来。

① 非洲领导人论坛是非洲的第一个市民社会组织，它的目的在于帮助提高任何出身的非洲精英的品质和能力。1988年由尼日利亚前(并且自1999年以来重新任职的)国家元首奥雷塞贡·奥巴桑乔针对领导力量的不足而成立的。它试图通过会议、专家讨论会、专题讨论会和策划大方案来弥补领导力量的匮乏。关于非洲领导人论坛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http://www.africaleadership.com。

一位"青年土耳其人",大学生领导人和全非大学生联盟的现任总书记,当他向各代长辈们投去一瞥并宣布他们可以忽略不计时,似乎概括了这一代人的态度。这再次激起了老辈人的愤怒,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年轻一代对全球化如此狂热。

会上,亚什·坦登雄辩地论证,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最终胜利。他认为,资本的特性发生了两方面的根本改变:第一,投机资本更多,生产资本更少;第二,生产资本如今主要以知识为基础。为说明上述变化,他还补充说,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都超过 2 亿美元,但其中却只有 10% 真正与贸易有关,其余部分恐怕都是投机资本和虚构资本了。(坦登,1997,第 45 页)

然而,问题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怎样才能期望成为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呢?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手段,如果非洲首先必须从其以民主、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欠缺为特征的根本危机中重新崛起的话,那他们又怎样能够希望分享利益呢?争论的结果产生了极大的信任缺口,使人们对非洲推动转变过程并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如今,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非洲显然已经错过了时机。然而正如艾哈迈德·毛希丁所注意到的:

"我们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人们已经使我们相信,总会有人来帮助我们,这正是欧洲所描述的依附文化,而这种文化已经潜入我们的灵魂深处。现在下一代人说,让我们'走出这种文化……'。他们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全球化的速度,而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我要引用这个成语:'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引自德国之声,1997 年)

对于奥杜贝米·西纳(1997,第 147 页)来说,——也是上述年会的与会者——把全球化称为新帝国主义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学见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外国人"不会为了解决我们的事务而到非洲来。一旦经济上壮大起来,我们也就有了竞争力"。

国际环境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由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劳动跨越边界的流动，从而形成了随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而迅速扩展的全球市场网络。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正在不断加深。不幸的是，由于自己制度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缺乏，大多数非洲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虚弱不堪，无法从全球化中获益或跟上全球化的发展速度。

政治涵义

我们再看看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实现自由主义政治安排的渴望极为普遍。全球化赋予了非洲反抗各种形式的制度阴谋和无能领导的推动力。不断扩大自由主义政治空间的努力，意味着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较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强烈希望取消国家、限制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并把它缩小到以往的规模。鉴于历史的经验，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论点是离开了相互关系，脱离了全球化的现实，也就是说，这一论点没有意识到如下事实：一个软弱的国家不可能增进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对于成熟并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无论是就某些行动计划的资金来源还是就可以产生互动的思想与机遇而言，信息技术革命都带来了走向国际社会的便捷渠道。信息革命也增加了曝光遭受囚禁的人物的可能性。然而，信息革命也表明，市民社会的总体发展也发生了结构扭曲，非洲市民社会中得到发展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都市的某些人权和民主团体。与此同时，全球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信息和电信基础设施的飞速增长，促进了作为非洲现代化过程口号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大多数非洲政府和机构来说，要求采用任何形式的民主已经成为时尚，而民主的主要内容被理解为允许多党的存在和举行选举，尽管其框架常常

正好相反。

非洲弱小的市民社会，由于更容易接近国际大家庭而获得了道德力量与特征。大多数市民社会的组织都能够在其直接的政治环境之外得到经费来源，这给了它们更加坚定地信奉自己事业的勇气与信心。它们拥有通常只在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地区才可能迅速得到使用的技术，它们瞬间就能够与因特网建立联系并分享全球互动的种种便利。它们还能使本国境内的冲突和争执国际化，获得最新信息与情报。它们能够组织起对其事业的强大支持并从现在所称的国际市民社会[①] 中找到同盟者。全球化令人痛心地导致两种社会群体的出现，一种是"人们"，也就是"局内人"群体；另一种则必定被归入"局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的群体。

局内人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并有机会为自己的事情得到必需的一切。他们离不开报纸，因为报纸为他们的真正选民提供具体证据，他们对选民负有责任，并且终归为选民服务，从而保障他们得到远远超出他们国家的经济收益能力之上的收入水平。在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的积极分子的另一块飞地，这些积极分子成为政府必要的反对派。日益庞大的、由那些忙忙碌碌的职业选举观察员所组成的群体必定也属于这些积极分子之列——这是一个由志愿人员所组成的新群体，在非洲每一次选举仪式上，他们的存在既有益又令人不知所措。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见显然起不了决定作用。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因为："新成员"应该被介绍给民主的世界，而那些"老成员"常常愿意兴奋而又好奇地在一旁观望。

---

① 大多数情况下，在国际市民社会内部似乎都存在着大量的概念上的混乱，而这会影响到非洲民间团体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方面的活动。详见：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1996：解决尼日利亚的政治危机：选择与答案，受民主和选举援助国际研究所的委托所撰写的论文，斯德哥尔摩，9月。

总体上存在着全球运动的事实，但只有来自欧洲或持有西欧国家护照的人才能怀着世界公民的感觉跨越边境。非洲人落在后面，依稀还停留在原教旨主义、复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偶尔的仇恨和种族关系不宽容政策复活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多数非洲人被排除在世界公民运动之外，持有非洲护照本身被视为是自由迁徙的障碍。在最好的情况下，非洲的专业人员被当作经济移民，还常常被怀疑为毒品走私人员和可能的罪犯。就连在非洲境内，有时诸如尼日利亚、刚果和莫桑比克等国的所有公民也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也就是说，他们在边境会遭到极大的蔑视和无情的嘲弄。

对文化的矛盾影响

全球化过程对非洲社会和政治方面带来的最明显的后果大概就是权威和权威主义传统模式的瓦解。随着迄今有限的知识基础的扩大，出现了新的领导形式和水平，尤其在市民社会行动分子的行列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它的(大量外来的)独立的资金来源既是其优势，同样也是它主要的弱点。这意味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非洲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高度的外化倾向，而与国内的联系有限，而且这种向内的联系由于即便不是虚假的但也是相当微薄的援助而日益松散。总的看来，大多数非洲人忧虑的是渴望与世界其他地区结合的那些非洲人的方式。格拉察·马谢尔道出了大多数非洲精英的恐惧，她认为，非洲虽然必须致力于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并成为这一新运动的组成部分，但重要的是，要把非洲的遗产作为非洲精神以及非洲特征的重要内容来看待并加以保护。(阿德因瓦勒，1997b)

1998年初，非洲发出了抗议的怒吼，因为人们在一家澳大利亚网页上发现了加纳妇女栩栩如生的色情画像。大多数加纳人第

一次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后果,世人为之一惊。这使社会面对挑战,即要谨慎保持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1998年5月,非洲妇女论坛召开,来自非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70多名代表到会。在开幕式上,代表们表达了同样的心声,格拉察·马谢尔夫人的见解也因此获得了首肯。这次聚会的与会者还注意到,自由政治区域在非洲的扩大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却令人遗憾地使妇女蒙受其他形式的、费尽心机的剥削和虐待。这次聚会强烈谴责了这种发展,并建议从制度上寻找答案,以下令制止此类发展。所有的到会者都特别表达了他们对网上色情文学的忧虑。然而这次聚会也赞成,民主制度需要充分理解存在于个人自由的行使与履行社会义务之间的那条细微的分界线。挑战在于,怎样才能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面对这种无聊的剥削又能保护妇女的权利。(阿德因瓦勒,1999年)

在此期间,非洲和非洲人面临着使下一代人与可口可乐、牛仔裤和快餐、朋克音乐、电子游戏和影视暴力等文化成分断绝联系的挑战。然而,由于目前信息制度的不平衡和战略框架的缺乏,非洲文化的特点和长久特质能否得以长期延续,尚无把握。

对非洲人来说,无论可能发生什么,未来的一个主要挑战无疑将是对共同的非洲团结的认同,这是保证全球化过程不包含非洲文化和价值使命的框架。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模式在东南亚是如何发扬光大并彼此融合的:亚洲价值观、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所有的国家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以非直线性行为和经常性超越传统藩篱为基础的未来作出安排。具有微量子独创性的创造力、产品花色品种多样化以及技术能力,将是正在全球化的世界所提出的新要求。

非洲作为南方国家,必须认真研究全球化,以便获得对全球化涵义的结构性理解。此外,必须创立能使非洲普通百姓对全球化过程做出敏锐反应的机制。

综上所述，非洲应该加强各级智囊团和管理能力，无论是全国的、次地区的还是地区的。这并非意味着成立新的机构，而是要扩大现有智囊团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研究全球化的趋势和后果，并且能够通过他们与非洲一些公共机构之间有效的联络渠道，为非洲领导人就如何采取一般性的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出谋划策。

经济方面：赞成全球化，但是……

• 西纳·奥杜戈贝米（1997 年，第 117 页）以“非洲是新兴市场吗？”为标题，主张这样的观点，即虽然目前非洲市场可能不那么兴旺，但将来还是能有理由让人们抱以极大期望的。他相信，非洲将通过强劲的全球化过程融入全球经济，并从中受益。他依然坚信，非洲丰富的矿物原料、农业资源和美丽的风景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奥杜戈贝米强调指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超出 2.8% 的年度人口增长。他还提到，一系列泛非投资基金已经形成，并已在非洲至少 15 个国家中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对有关非洲经济政策选择辩论的了解，他满意地指出，尽管某些专家治国论者热衷于就经济政策的细节问题展开辩论，但在经济改革与转型的必要性上还是存有共识的。据他所言，“非洲的经济前景并非毫无希望。”法苏·贡登是南非非洲建设性解决冲突与发展问题中心的主任，他认为，全球化为非洲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弥合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也可能产生能力、专长和资本积累方面的差异，而这会构成该地区的严重危险。（根据德国之声，1997）

而麦克·詹森报道说，图阿雷格人（译注：北非柏柏人的部落中的一支）手工业者在一个加拿大慈善组织的帮助下，通过因特网推销他们的商品。虽然乍一看人们不得不说，非洲与外界有限的交往是主要的阻碍原因，但他同时又指出，大约 3 年来非洲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1996年时只有16个非洲国家与因特网相连，到1998年12月底已有53个城市中心在线。这一事实已经在商业活动的效率中得到了反映。坦桑尼亚TRCF公司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通过放弃用于进口定单的电传和信件以及杜绝打字工作和与此相关的浪费，成功地使公司的通讯费用下降了90%以上。虽然数目不大，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非洲大多数企业的资本化水平很低，节省这样一笔资金的能力可能就是求得生存并获得可能盈利的关键性第一步。

在另一个层面上，雅温得国立工程学校的卫生技术中心(CHT)已经开始了一项远程医学实验项目。在距离卫生技术中心300公里的邻近地区遴选出一批参加这一项目的地区医院和其他医院，这些医院都配备有必要的设备(电话、电子计算机、扫描器等)和一位合格的放射科医师。

远方医院所拍摄的照片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发送到卫生技术中心，由这里的医务人员或专家进行鉴定，之后再将诊断传回远方的节点。所发送照片的质量对于诊断的准确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教育领域，因特网也开辟了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和前景。一个相关事例是，南非大学使用电子邮件为6000多名可能的申请者提供函授课程，4万多名大学生就是通过这种媒介得到自己的成绩。非洲的大多数大学现在都拥有电子邮件基地连接，大约13个国家为大学提供完备的因特网连接，约33个非洲国家的报纸可以上网浏览。

在加纳，传统邮政的低效率通过一种通知系统得到了解决，这个系统采用电子邮政和自行车的结合把信件送达收件人。人们也许能援引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全球化过程对各层次非洲人的生活所产生的显著影响——但主要的挑战依旧是非洲的一体化和金融市场的建立。

1997年2月，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总统在反驳一再出现

的悲观主义论调时宣称，过去500年间，非洲的形势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好。他认为，贩卖奴隶、殖民主义、独立以后的独裁通通败走麦城，而如今摆脱殖民主义、壮大民主政府的领导、发展自由主义经济成为可能，非洲的形势一片大好。人们所听到的在刚果、布隆迪、卢旺达和苏丹出现的危机已经越来越不成其为重要的问题。非洲参与全球化过程不是是否与何时的问题，而是既成事实，非洲别无选择。非洲必须对这一过程的消极后果做好准备。非洲必须重新定义它的安全结构，以实现和平与稳定，因为这对于非洲能够走上发展之路至关重要。非洲必须加强非洲各国的力量及其协商能力，投资于人的发展，开展资源基础的多种经营。

回归起点——是非洲的奴化吗

为了有利于因特网连接和乡村电话，难道非洲政府应该放弃它们在水、电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吗？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它们能够寄希望于哪些文字和计算机知识以使它们跟上全球发展的自发行动呢？非洲真能赶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吗？非洲具有实现惊人发展的能力吗？非洲的问题是，经济主要以原料开采为基础，人力资源潜力遭到掠夺。人才外流的初期也具有体力外流的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流失夺走的都是非洲大陆最精壮的人口。非洲之外有比例可观的非洲青年，从而使得影子经济更容易出现。总而言之，非洲面临的似乎完全是其基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源自薄弱的基础设施。

在过去5年间，汇划机构在非洲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的兴盛证明了这一地区对于金融汇划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正像过去那样，青年非洲人努力逃避严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乐意离乡背井，并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忍受所在国的侮辱、敌意和排斥。新一轮奴役已经开始，这一次倒真是非洲自寻的奴役。这应该归咎于全球

化还是非洲人管理能力的欠缺呢?

此外又出现了新的时髦,即:尽可能把孩子生在欧洲和美国,其目的在于,孩子可以因此得到美国或者某个欧洲国家的护照,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护照,就能造就出的世界公民。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产生于一个没有真正遗产、没有灵魂归处的世界,在文化上,他们困惑迷惘,没有方向,就好像茫茫海上漂浮不定的小舟一样随波逐流,此时他们所能期待的就只有违心地投入船上妖言惑众者的麾下。

现在,对于非洲的大多数人来说,情况一目了然。非洲也许会为脱离全球化过程而自担风险。即使这个大陆不得不被卷入,而且万分委曲,但也必须成为这一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付得了全球化的挑战。

从"非互惠"(洛美协定)到"自由竞争"(跨国企业)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非洲国家缺乏与只尊重自身利益的跨国公司建立关系的能力。几家现存的跨国企业是如此财大气粗、所向披靡,以至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可能与它们相抗衡。如果这些国家允许这些公司出现的话,那么无论是就资源基础还是资金实力而言,前者都不是后者的对手。路易·埃梅里(1996年)以"关于全球化与竞争的思考"为标题表达了如下的担忧,即由于过分强调不受限制的竞争,全球化最终恐怕会对民族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埃梅里补充说,竞争已经成为对所有问题的回答。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有失业问题吗?他们必须提高竞争能力。他们的社会贫困加剧了吗?他们必须增强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竞争成为惟一的出路,并导致经济领域的无情厮杀。在这一见证过程中出现了埃梅里称之为全球化悖论的状况:国家贫困的加剧是全球财富之母。

最后的赢家是私有经济领域中的行为体，他们转瞬之间占据极大优势，从而能够把尚未成熟的民族国家逼入守势，这在像冈比亚这样一个只有100万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84亿美元的国家来说并非难事。微软公司日盈利3400万美元，区区11天就能达到上述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冈比亚之类的民族国家又何以谈得上与微软这样的超富跨国公司进行谈判呢？前不久，冈比亚前总书记，什里达特·兰法尔爵士（1998），曾就此指出：

“洛美协定的特征是非互惠的，它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在以往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的成就。如今欧洲则津津乐道于‘互惠’和‘差别’。互惠是正宗的新自由化教义；有人恨不得使它成为洛美谈判的出发点，但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就是在认为互惠是准则的理性趋势中，也存在着其他准则，并要求得到同等的尊重，其中之一便是这一定理——欧洲的遗产，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遗产相比，同样令人景仰——，即在力量不等的事物之间，平等不是要求‘互惠’，而是‘均衡’。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伙伴之间重要性与脆弱性都不相等，那么，互惠就意味着加剧不平等，扩大差别，其趋势是使富人更富而使穷人更穷也更脆弱。”

因此，非互惠关系必然涉及到要求那些力量不等的国家参与竞争。显然，令人悲痛的是，非洲目前还不能按照无序竞争的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抗衡，即将出现的国家贫困将是不堪设想的。

毫无疑问，全球化过程使非洲面对令人尴尬的后果。如果非洲得不到帮助，以使它们能在同等水平上应对世界其他地区，那么已经恶化的贫困将会变成赤裸裸的耻辱。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陆。非洲大陆还有1亿公顷未开垦的土地，人均耕地面积最大；草地面积高达7亿多公顷；水资源丰富，包括4×10^{18}立方米注入海洋的淡水，其中的10%就能够灌溉1300万公顷的土地；森林和林地的面积达2.2亿公顷；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几内亚、

安哥拉直到好望角，这里的海洋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渔场之一；非洲还拥有 6×10^{18}以上立方米的天然气，170 万吨铀和 900 亿吨煤，其中还不包括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生物量、风能和地热等大量的资源。在矿物原料方面，非洲有最大的黄金、金刚石和铬的储量；有些国家还属于铜、铝、汞、锡和铁矿的 10 个最主要的生产国之列；其他的关键性矿物还有钴、锆、锌以及大量的宝石。

为了全球领导者公开的自身利益，人们试图努力克服无序竞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而正是这些领导人假以全球化过程激起了这样的竞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从历史上看，地区和民族都遵循了两条发展之路：本地的辛勤劳动以及与其他地区在劳动、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合作。

展望：应该做什么

如果非洲想要实现与工业和经济增长中心接轨的话，它就必须自行采取一系列措施。非洲的学术机构应高度重视能力的积累，从而保证非洲人对知识和思想生产做到有的放矢。这一过程还要求大力增加对学术机构的投资，以创造限制人才外流的条件。

对实现这些目标甚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要使政治领导们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为此，有些举措可能特别有用。首先是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审议和批准国际条约；其次是畅通无阻地吸纳私有经济领域：必须允许私有经济领域在非洲对全球化的回应中发挥作用。

此外，非洲国家必须努力使国民经济发展以增长为取向，鼓励国内储蓄，为国内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开放的环境，同时也应该完善吸引外资的条件，还要采取一致努力，鉴别和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目前对利用出口经济的偏重是建立在对国际贸易及其作用的

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因为整个一代人的经验已经表明，只要同样重视国内市场，即使不是更加重视的话，前途也将会更加光明，非洲人的实际购买力可能因此得到提高。

优良管理是非洲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抓住参与机遇的一个先决条件，并将与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一起，确保非洲开发这块大陆的能力能够发挥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非洲把握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机会的重要手段，因而阐明旨在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政治意志是不可缺少的。

布罗代尔(1985，第600页及下页)曾经告诉我们，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适应来说，其作用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发展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并从世界贸易的豁免效应中获益的市场经济。

1999年当选的尼日利亚总统奥雷塞贡·奥巴桑乔明确指出，世界自由贸易的好处不会从天而降，相反全球化需要积极的政治创造，而且只有伴随着良好的政治愿望，世界上现存的资源也许才有可能为所有人带来福祉：

"关于美仑美奂的地球，最好的照片之一是从太空中拍摄的。那上面的地球是镶嵌在宇宙的苍茫与黑暗中的一个小巧、五彩斑斓的圆球。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人们不能把它分割成种族的断片。它是一个世界，是我们离不开的地方，我们必须在这里消除爱与恨、匮乏与过剩、战争与和平、富有与贫穷、黑与白、穷奢极侈与饥肠辘辘之间的矛盾。我们有能力根据照片的蕴意塑造一个美丽、和谐、几乎完美无瑕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过是意志而已。"(奥巴桑乔，1993)

(阿伯德勒·阿德因瓦勒　德文翻译：托马斯·西博尔德)

参考文献:

阿达姆,利山,非洲因特网,载于:非洲复兴,第12卷第3期。

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编),1997a:21世纪前夕的非洲,阿克拉:非洲领导人论坛文集。

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编),1997b:迈向21世纪的女性:政治、权利与发展的挑战,阿克拉:非洲领导人论坛文集。

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编),1999:交往与权利的获得:前方的挑战,渥太华。

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非洲与新一代,渥太华:非洲领导人论坛文集。

布罗代尔,费尔南,1985: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第2卷):贸易的车轮,伦敦:丰塔纳出版社。

多维尔(编),1996:超越自由:致奥卢赛贡·奥巴桑乔的信,纽约:非洲领导人论坛。

多维尔等,1997:21世纪之交的非洲:边缘化与复兴,载于: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编)。

德国之声节目,1997:聚焦非洲,9月。

埃梅里,路易,1996:关于全球化与竞争的思考,载于:多维尔(编),1996,第437~441页。

亨廷顿,塞缪尔,1996:西方:既无古人,亦无来者,载于:外交,11月/12月。

奥巴桑乔,奥卢塞贡,1989:21世纪的非洲,在非洲领导人论坛关于东欧发展总部、对非洲的战略意义的大会上的公开声明,巴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部。

奥巴桑乔,奥卢塞贡,1993:关于国际新秩序,载于:非洲的希望:奥巴桑乔,奥卢塞贡演讲选萃,渥太华:非洲领导人文集。

奥杜戈贝米,西纳,1997:非洲是新兴市场吗?载于:阿德因瓦勒(编),1997a。

OXFAM，非洲，1993：非洲复兴的破与立，OXFAM 出版中心。

帕肯哈姆，托马斯，1953：争夺非洲，伦敦。

兰法尔，什里达特：走进 21 世纪的非洲，载于：阿德因瓦勒，阿约德勒（编）。

兰法尔，什里达特，1998：面向 21 世纪的非洲，非洲领导人论坛成立 10 周年讲话，11 月，科托努（贝宁）。

坦登，亚什，1997：非洲与全球化过程，见：阿德因瓦勒（编），1997a。

第四部分

拉丁美洲:受制约的现代化、区域化、民主化与尚未解决的社会排外问题

受制约的拉丁美洲现代化

技术——工业活力和工业国家的世界性扩张以如下两个基本机构的形成及其协作为基础,即民族国家和"系统化资本主义生产"。(吉登斯,1996, 83)只有这两个机构才能在其他国家引起具有三重作用的现代化过程:通过工业化增强经济潜力,经由官僚化——直至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政治潜力,而这两种潜力的共同作用则能使"贫穷的社会……走向富裕"。(英格勒哈特,1998, 15)

在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上停滞不前

在技术——工业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现代的基本机构制度尚未完全形成,还处于引进过程之中。虽然存在着各种现代化推力,但工业化与官僚化却由于两个原因而一再受阻:"社会主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个人目标"也不是"成就动机"。(英格勒哈特,1998, 15)现代化发展受到阻碍,同时与工业国家和工业化生机盎然的亚洲国家相比,拉丁美洲的技术—工业和社会的落后状况正在加重。

前些年的自由化使这一地区的国家融入全球化过程,市场宏观政策和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宏观政策则会使今后参与世界经济的被动状态更为突出。很多国家坚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另有少数几个国家,其中首先是智利(埃塞尔,1999)则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近来,致力于制度现代化的努力方兴未艾,可以说,只有信奉工业技术赶超战略的民族国家行为体集团,才可能建立能够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结构,以及协调两种基本制度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然而,这样的行为体集团还没有形成。

伊比利亚人的后裔、外来的专业化压力以及本土现代化计划的影响

就现代化活力而言,拉丁美洲国家并不具备有利的初始条件。(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1998)从现代化建设阶段以来,伊比利亚人的后裔、现代化活力低的社会来源(同时还有源自这些社会的长期的文化转让)和强大的外来专业化压力,一直影响着拉丁美洲国家。相反,很多北美移民来自现代化活力更强的欧洲社会,而且数十年间并未遭遇多少外来的专业化压力。

对拉丁美洲国内活力的外因性障碍的长期流行的限制已迷失方向。历经500年沧桑、几近180年之久的政治独立以及各种各样自己制定的现代化计划之后，初始条件不再构成惟一的、至少在20世纪也不再是最重要的阻碍现代化的原因。把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因其实毫无意义：社会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化，与其他现代化进程的融合充其量只能得到一时的活力。

拉丁美洲与工业国家和日益强盛的亚洲国家群之间的技术—工业差距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未引起重视。向工业化国家靠拢的努力随意中止，甚至被否定，市场作为调节机制受到抑制，软弱、低效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为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

对本土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几乎没有进行过批判性探究，这不能说明外因的重要。而且，尽管社会活力越来越低，而且根据一般规律，政治、制度、组织与工艺的现代化水平也更低，也同样不能说明外因是主要原因。在这个地区，似乎也没有出现要求给予郑重回答的历史挑战。由于回避外来专业化压力，拉丁美洲距离现代就更加遥远了。

过度稳定——缺少延续性断裂

拉丁美洲社会的经济与权力结构以及思想与行为模式处于异乎寻常的稳定，这也是拉丁美洲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社会曾出现过三次历史契机，但就是没有导致延续性的断裂。在每一次激进的新开端之际都发生了谨慎的改革，而正是这种谨慎的改革使社会得以避免转向新的发展轨道。

当第一次契机于19世纪的前30多年中出现时，由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软弱和大英帝国利益需要的缘故，当地的克里奥其领导人在获得了可能的政治独立之后，比较成功地延续了传统的组织、控制和增长模式。

从1930年起,由于工业国家进口的暂时萎缩,一种内向的、适应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需要的政策开始了长时间的向外发展。尽管这种简单的增长模式很快就失去了活力,但还是持续了60年之久。这种模式缺乏增强技术竞争力、提高产量和改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刺激机制。除了满足少量的、增长缓慢的国内需求外,国家最终可能被"掠夺"一空。

市场机制由于内部市场的封闭而得不到发育。对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来说,国家干预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企业的寻租取向因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变得容易了,消费导向日渐取代了初期的投资倾向,原料和资金的使用表现出巨大的浪费,而不是资金的匮乏。尽管量上的增长不断走低,但国家依然坚持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由于收益下降和风险增加而引起的资金外逃导致了资本输入与外债,而后者从1982年开始引发债务危机。

第三次契机也没有发生延续的断裂: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活力的下降使得经济政策转向了代表富裕阶层和工业国家利益的轨道。由于外债危机,这种新导向不可避免,但却被推迟了很长时间。最终,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实行了彻底的市场导向。

到目前为止,虽然经济与政治领导集团并无多大变更,但富裕阶层的单方面利益却表现在很多方面。收入集中与贫困化进一步加剧;政策调整过程中甚至连技术—工业赶超战略及现代社会渗透的重要问题都未曾展开过讨论。

新的增长模式,世界市场压力和通过外国直接或有价证券投资以及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工艺转让的推动下的合理化改革,消除了一些内源性现代化障碍,但其他障碍仍继续存在。不仅如此,人们还忽略了:国家一体化,建立现代的制度结构以加强民族国家的行为能力,创造有利于企业的中观经济环境,对为经济以及增长的社会、环境政策辅助所付出预付代价的改革与扩大。

现代资本主义以一种畸形的和不完全的方式继续发展。以现

代化为导向的民族国家行为体集团并未出现，这一集团能给现代资本主义指出清晰、明确、持久的技术—工业发展方向。因此，当代发展方向依然居支配地位。

内在活力微弱的主要原因是，拉丁美洲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革命或战争性冲突这样可以赋予新的政治与经济领导集体新机会的延续性断裂，这种基本稳定的存在证明是增长、差异化、复杂性和学习的障碍。

经济和权力结构以及经济政策：技术—工业发展的障碍

过度稳定的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经济与权力结构的延续。长期以来，寡头政治的经济与权力基础是大庄园经济，正是这种大庄园经济使得寡头政治在经济上与众不同。

上层社会以消费为导向，关心财富与收入进一步集中的机制保证，也几乎从未真正面临过严重的威胁，而且由于认可他们规则的新富们的加入，上层社会进一步发展扩大。这个阶层价值上是保守的，如今也主张市场自由，通常与教会、军队和美国及其他工业国家的保守势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曾经拥有，而且现在也拥有足够的现代化潜力，但那不过是一种有限的、以自己眼前使用为导向的兴趣而已。这个阶层眼界狭隘，追求梦想、幻想和战略，从不谋求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这个阶层阻碍着社会一体化，尤其是阻碍来自非洲及白种社会下层的、直至今天依然边缘化和贫穷的当地人与社会的融合（必要时使用暴力），放弃建设强大而有效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并且忽视建立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也缺乏企业家精神，缺乏节约与投资的愿望，也提不出以现代化为导向的组织与控制模式。在一些小而贫穷的农村，富有阶层的创造愿望直至今天也几乎没有超出追逐权力、家庭、俱乐部和游说集团利益的范围。

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期间，传统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以及很多此前外向发展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继续存在。收入集中——与英裔美国不同——源自早期历史阶段的原料出口与大庄园经济，加强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使得社会上层更加缺乏学习与创造意志，更加倾向于各种“温和选择”。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程中，支持工业化的力量没能明确和长期地得到认可，他们与传统力量、也与主要是以分配为导向的中下阶层达成新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妥协。由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不是一种技术—工业赶超的战略，他们的地位也就下降了。

由于支持工业化的集团一方面把企业封闭在狭隘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保护和支持企业，而不是停止对企业的现代化刺激与出口压力，所以前工业化力量在经济上没有削弱，反而可以从高干预中得利并获得对国家的租金利益。

进口替代潜力耗尽之日，便是工业化支持者们的政治影响与经济政策的创造力衰退之时。他们—与保守势力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新的替代方案转而寻求经济的稳定而不是增长。只要以市场为取向的根本变革——像在该地区的很多国家一样——仅限于一种新的稳定形式，随之而来的便是这种变革将进一步加强传统力量。

过度的异质性：分化的经济与社会，缺失的国家一体化

经济领域、社会部门和国家内部以及它们彼此间异乎寻常的异质性保证了拉丁美洲的过度稳定。尽管有几百年之久大致相同的历史并在一个有疆域界限划分的文化圈中共同生活，但一体化趋势却始终模糊不清。

异质性的原因是共同的：克里奥君主们在建立城邦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时就已经使得这个地区四分五裂了，他们从未考虑过民

族国家的现代化计划;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打下了传统的烙印,并不断加剧,这是造成国家匀质化趋势微弱和国内需求狭小的原因之一。而正是国家匀质化趋势微弱和国内需求狭小这两个因素抑制了工业化发展。

城市人口削弱了君主权力,但却没能实施具有承载能力的技术—工业发展计划。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系统化资本主义生产,他们既缺乏能力也拿不出方案,政治愿望与一体化力量还不足以带来广泛的学习过程、合理化压力及强大持久的工业活力。所有领域,从教育到钢铁工业,都只是停留在数量的扩大上,而罕有质量的改进。当生产率低下的增长模式失去活力的时候,经济的社会分化效应加剧了,失业、就业不足与贫穷随之增长。

市场导向增强了新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比如说工人、经理与企业家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它消除了少数前工业经济的残余、国家官僚主义管理实践和长期以来得到支持的出口悲观主义。企业的分散,尤其是企业之间技术—组织上的异质性,对于抑制社会的分化来说过于强烈,可是经济增长与制度现代化缓慢停止。正式部门中没有创造多少新的和额外的就业机会,收入集中状况更加严峻,从而造成国内需求更加狭小,各级组织—控制模式对形成企业、地区、区域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结合与协作亦影响甚微。

由于缺乏集体教育,市场导向新方案也许不可能通过教育事业唤起旨在实现工业、技术、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活力。又由于缺乏学习动力和创造欲望,新的现代化推力将延续甚至加剧社会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边缘地带的自我控制与自己决定的能力很低,今后也看不到主张建立崇尚学习的社会、发展一体化力量并激发一体化文化活力的民族与社会思想。

虽然经济思想与举措已广为认同,但是社会先期准备,即使对于简单的、原料购进的增长模式来说,依然是不充分的。在一个本

来就缺乏凝聚力与团结的社会中,不顾社会责任与社会一致的完全的市场导向,抑制了这个社会的自身活力。实施民族国家现代化计划的趋向再次表现出虚弱无力。由于拉丁美洲的制度和技术文化潜能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并面向未来充分调动起来,拉丁美洲被纳入其他的现代精神中,尤其是技术学习过程将渐趋停止。

反资本主义成就动机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模式

也是由于类似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拉丁美洲构成一个文化圈。价值体系、情感方式与看问题的方法、调整与行为方式莫不如此,尤为突出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共性。

伊比利亚人的后裔、在少数小国中仍然存在的前工业寡头政治的统治地位以及1930—1990年期间的不明究竟的权力与经济政策问题,妨碍了技术—组织—社会的现代化:制度的巩固和对有利于共识与对话能力的机构设置实行规范约束的过程进展缓慢。实施监督和评估(以奠定新的决定过程的基础)以及明确且长期不变的游戏规则(以建立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力的企业),也非一日之功。

比传承下来的思维模式(包括天主教在内)更重要的是几百年来的经济与权力结构特点,这种特点不断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痛苦、沮丧与挫折。如果权力和关系始终更为重要,教育与成就又何足挂齿。由于助长腐败的法制不健全、人为操纵的游戏规则及强大的特殊利益的存在,节俭、投资与对未来的信任都是些令人怀疑的目标。

弱小的个人——或国家——都是像顺从而又没有信誉的人那样:坦率、友好和不承担义务的,避免舌战与公开对抗,然而必要时部分遵循指示,并且只要可能就会为了眼前的自身利益而破坏协定。

拉丁美洲缺少一个有抱负的、排挤传统势力的、风格特点鲜明的市民——他们能通过构建社会的价值、神话、符号及大众文化的方式给内在潜力的发挥指引方向。思维与行为今后还将受到富裕阶层的影响，而以现代化过程和欧洲价值来衡量的话，这些富裕阶层代表的却是一种负面的榜样：他们传播不信任、暴力、保护主义，缺乏教育热忱、节俭与消费主义。就创新动力而言，他们还缺少一种不知疲倦的精神，尤其是一种现代的创业精神。

行为体集团——像那些在东南亚国家中的行为体集团一样——把民族国家理解为无所不包的框架，把现代化发展看作是有约束力的、一致的目标，但道德基础设施的主管当局、学校或社区并不受他们的影响。没有人从事社会妥协教育与政治共识教育。

社会中现行的行为先决条件、核心行为体的长期玩忽职守、制度的不健全与欠完善、传统的农业结构和长期的经济政策失误，形成了行为体的心理状态并导致他们之间的不对话状况。

与亚洲不同的是，为支撑现代化发展而回归传统的价值与规范在拉丁美洲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即便在亚洲，回归传统之前也常常需要对传统进行重新评价。不过，当传统的经济与权力发生断裂时，传承下来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甚至还会继续影响着文化，例如，古巴的独裁——家长制式行为方式和预期行为以及对制度与技术文化的忽略就是例子。

经济、国家和社会统统包含在思想传译的文化关系中，而这种文化关系又常常来自经济和权力结构以及滋生低效率的经济政策。这种制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例子在拉丁美洲比比皆是：

●司法的吹毛求疵和法律缺乏适用性导致对待法律问题的无原则态度和对违法乱纪行为的私下解决——直至使用暴力，比如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农场主所支持的团伙。

●在受保护的市场上提供高价低质产品的企业——如进口替代时期所导致的那样——忽略了当代经济的要求。如今，墨西哥

对参与竞争的企业实施监督，智利或秘鲁也严格管理诚实纳税问题。

●如果说物质文化长期存在的缺陷表现在——如进口替代时期所导致的那样——如物质基础设施造价不菲但并非装备完好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再宽容这些缺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灵活性。

在一个缺少透明度、核算、效率和替代的新环境中，只要移民群体没有失去自己始终不渝的教育传统、执著的节约意志和其独特的企业精神的话，那么移民群体就是个例外。

在进口替代型战略期间，在一个制度、技术和物质文化缺陷不断增加的环境中追求全国性的文化一致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文化的交易费用太高。传统价值的稳定不仅来自权力结构，而且也因为大量且越来越多的人几乎没有融人现代的物质文化、基础设施、生产和消费中。只有在市场导向的框架内，个人和企业的部分高额交易费用才会逐渐减少。

片面的内向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导致企业的国家导向；企业与国家官僚的寻租行为共同造成国家机器的分化。数不胜数的规定，比如对市场机制的侵犯，造成人们穷于应付的疲惫，不明晰的鼓励与高度的风险导致企业片面追逐短期效益。在实行几百年掠夺式发展之后，情况更是如此。政治行为体缺乏指导方向造成了功利主义——一种没有未来前景也没有目标明确的学习过程的当代发展方向。

工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家们颇为费解的是，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新导向多年来给相当多数人带来了希望、勇气乃至兴奋，而这种新政策却受到制度、技术和物质环境的缺陷以及已然失灵的强力干预和腐败的官僚政治（机构）的损害。

然而并非没有令人沮丧之处。长期没有控制的竞争危害了市场，并继续分化着社会，没有为民族国家充分调节的市场充其量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此外，这种市场还瓦解共同价值或阻碍新型

共同价值的形成。

于是，社会不断采取种种努力，目的在于把市场经济竞争纳入一种受社会约束的、由市场参与者的可靠期望和可预计行为所保证的规则体系中，其结果是建立起一种瞄准市场的宏观和中观经济激励机制，这种体制可以克服失控的市场过热、带来明确的利益期望并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以及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存在着内在障碍和导致两极分化的全球化，尚未成熟的民族国家还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民族国家吗

在拉丁美洲，已经产生了具有社会凝聚力和有约束力的文化经验的民族国家可能还不存在，一方面，没有一个具有均质化的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创造兴趣的政治与经济领导群体；另一方面，改革集团使得因循守旧的反对群体的方案无以适用，部分知识分子则寄希望于革命行动，但古巴之外的革命力量都只在短时间内获得过政治上的成功。

在工业国家，民族国家成为社会动员和技术活力的推力，而在拉丁美洲，民族国家却很软弱且效率低下，没能给整个经济和社会以明确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因而在很多社会领域中以及这些领域之间都看不到这种现代化发展。

民族国家促成的集体认同并不突出，然而，这种认同依然是制度、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活力、确保自由主义选择和基本民主权利的重要条件。没有共同的利益与目标，也不可能有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致行动。因为没有一个群体实施国家计划，所以民族国家内外的行动活动空间都没有得到利用，这也正是该地区各个国家常常受到多方面内外影响的首要原因。

那么在市场与世界市场导向的条件下还能选择向市民与市民社会，即向一个有集体认同的、一体化的、相对自主和民主的知识

共同体社会发展的道路吗？作为主权的载体与开拓者的民族国家能否被建设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吗？或者，由于世界范围的全球化的结果，民族社会的解体会发生吗？这种民族社会的解体，尤其是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全球社会的形成，在拉丁美洲的社会分化中可能短时间内就会加剧社会与政治的混乱。

针对全球、地区和意识形态潮流中目前流行的民族国家的解体，人们提出在区域和功能干预层面上进行动员的设想来加以反对，这种动员能使民族国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只有这样的动员才会带来“系统化的竞争能力”——这是工业化和福利的重要条件。

但是，在拉丁美洲，要从中央集权的、过度官僚化的、就业与国有化政策所致机构臃肿与分化的、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高效的民族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在建设的国家应该是机构精简的，而且在拉丁美洲首先要是小政府，这也符合效率国家的衡量标准。（世界银行，1997）由于全球化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作用，这一路程也不会平坦。

出路在于建立民主监督的、强大高效的民族国家，这取决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尽可能组合分化的结构，比如通过企业间的合作、结成网络的次国家—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企业界以及如工会一样强大的、可以对话的中间组织形式。这种组合要求国家、企业和中间组织的共同本领，其前提条件是对国家和伙伴关系的全新理解：合作国家（Huber, 1996）和面向现代化的官方—私人间伙伴关系。

近期内，民族国家依然是经济与社会的主要的结构、关系与一体化框架，只有在国家框架中，能够启动技术工业和社会发展赶超过程的企业和国家的强大行为体才会成长起来，也只有他们才能建立起在工业国家很普遍的创新—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包括适宜的环境条件），只有他们才能不断发掘企业和民族国家的潜力。他们的密切协作可望增进两大基本结构的全球性学习过程，而这

种过程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完善的游戏规则、低要求的企业、得不到发展的技术文化

起初，进口替代战略带给富裕阶层和移民群体以巨大的经济分化的机会。然而，由于缺少以市场为导向的刺激，在该地区相对先进的大国中只有不到 100 个生产企业发展起来，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更是凤毛麟角了。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没有系统性，缺乏在其他地区成为资本主义特征的推动力、激励机制和扩展空间。

各国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发展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区域性产地优势，如忽视国民经济教育和历来就很薄弱的技术文化。也由于这些原因，工业很快就失去了扩展的动力，而这对于本来就很微弱的国家一体化趋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市场导向使得企业的发展余地根本改观，但到目前为止 15% ~ 20%以上的企业，至少是比较大的企业，几乎不可能经历重要的现代化过程。企业利用巨大的合理化改革潜力、接近顾客、了解市场、发展出口以及建立在工业国家极为普遍的功能性和区域性企业联合等等趋势只是在缓慢地增强。

对增长动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市场经济和经济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对富裕阶层施以产生现代企业家的压力，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企业家数量在各个国家都很少。这里重要的是两个政治决定：企业要尽早学习以出口为导向的、宏观与中观经济的激励机制。通过促进经济贸易发展，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与出口导向的扶持，现代企业的数目将显著增加，并因此加强企业对经济与社会的广泛影响。

企业并未对国家实行合理化改革、扩大国家竞争优势、提高区域产地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设与技术、生产和出口有关的私人

服务性公司以及国家促进经贸发展的密集网络的建设只是刚刚起步。

在工业国家，作为创新竞赛，熊彼特式的竞争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宏观政策时导致了工业政策方面的思想与行动，而在拉丁美洲，至今影响着经济的一系列特点却继续存在：在价值创造水平低的商品领域中，与世界市场有关的专门化加强了；亦步亦趋地照抄照搬工业模式的状况依然固我；不过，特别是在几个多国康采恩势力较强的行业中，比以前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工业国家的，首先是美国的消费模式，更加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人心。

除了例外情况，储蓄和投资额始终满足不了强劲的经济活力的要求，人力资本设置及技术的重要性还是得不到重视，加强新技术的转让、扩散与利用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工业化活力的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新兴区域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中，但远远赶不上东南亚的增长幅度。

适应文化转让，但不是新的文化组合

该地区各国的共同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它们就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中不同强度地然而近来又广泛地经历着文化转让，包括美术品及思想和行为模式。这一论断应该这样解释：

那种自我创造、均质的文化观是遭反驳的，文化是相互渗透的；它一直也是由多重继承组成的历史。社会把物质产品与各种来源的象征物相互结合在一起，并将它们整合为生活计划。在所有民族和区域文化中都可以看到相互的及单方面的外来影响。

外来影响如何被融入自己的文化特征要视情况而定，因为假如有一种独立的文化特征，而且这种文化特征的载体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与活力并且是一体化的、至少在重要领域中活跃的社会的话，那么文化舶来品的借鉴与吸纳就几乎不成其为问题，就像

在日本及当今其他亚洲民族国家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这些国家中，各种假设(价值、历史观、民族、社会思想等)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它们可以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及其影响之间泾渭分明。

只要相应的政治意愿得以实现，这种类型的国家就能成功地实现旨在工业技术赶超和建设现代社会的目的明确的文化转让，它们特有的文化特征显示出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它们的文化综合能力使得专有技术转让的进行有可能服务于企业和国家利益。

拉丁美洲文化圈展现出500年来五彩纷呈的外来文化影响，它在很多方面同属欧美文化圈。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文化，尤其是其文学与绘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影响。

因为在拉丁美洲，人们曾认为文化转让始终是单方面的并且影响极大，所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了“自我寻根过程”。这种过程片面地抵制外来影响，但却没有看到一种新的综合：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综合，另一方面是技术文化与思想文化之间的综合。由于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了解，北方文化看来不值得模仿，因而也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转让能力。

听起来荒谬的是，适应文化转让很可能造成“学习免疫力”，尤其是对工业国家的制度文化和技术——工业文化的“学习免疫力”。在针对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扩张方面，似乎存在第二条甚至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这是一条绕过工业国家的道路，这不是赶上，而是“超过”，不是新的综合，而是一种替代选择。

在拉丁美洲，如何着手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是有代表性的：一方面，传统的与支持工业化的群体间不断达成政治妥协使得拉丁美洲可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过由于国家作为动力，市场力量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对经济外行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把外因视为造成国家和地区不发达状态的原因是一种臆想，而不是

关注作为社会现代化基础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企业文化的独立发展。

内因,即拉丁美洲区域文化的独有特点,导致各种现代化可能性的狭隘范围不是得到准确估价而是被忽略了。如果没有强大有效的民族国家、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有针对性的专有技术转让和新的文化综合,那么"自我寻根",正像也在非洲和近东所表现出的那样,会滑向毫无益处的意识形态歧路。

现代化的推力而不是持续的现代化活力:面向未来的行为体集团没有出现

拉丁美洲将按照传承下来的经济与权力结构及成熟的思想与行力模式所决定的方向发展变化,而对这样一种强烈的趋向,现代化障碍难辞其咎。延续性的断裂,即质的飞跃没有出现,而所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偶然的和局部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现代化推力从内部或外部赋予经济与社会以生气,但又不足以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从而显著地扩大就业人口。只要传统的经济与权力结构和思想行为模式总是被粉饰一新而不是被废除的话,文化转让的机率就很少。

如果要单方面做出别出心裁的调整,如干预过多的内向型工业化(就像进口替代战略期间那样),那么拟定恰当的组织与控制模式的地方能力的欠缺很快就会凸现。这种对工业国家资本主义规避的后果(已经证明这种避让是可能的)是技术—工业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则巩固了传统的政治力量并阻碍权力向支持工业化的行为体集团的持续转移。

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新推力表明,在1930—1990年间,拉丁美洲形成了与工业国家之间巨大的合理化差距,政策、制度与手段、国家、中间组织及企业发展同样落后。同时,目前片面的市场导向表明,文化转让,首先是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文化转让,逐

渐包括其他要素的文化转让，再度带来现代化的推力，而不是生气勃勃的技术工业的发展。

随着禁止各种不同人群参加改革和革命组织，随着政党与工会受到削弱，也随着激进的反调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彼此接受与信任程度的降低，拉丁美洲的犯罪与国家打击犯罪的支出都大幅度上升，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支出——几乎还没有对新出现的贪污腐化问题展开斗争——在有些国家比用于公益服务的支出增加得更为迅速。

在拉丁美洲，内源性障碍导致了制约现代化的连续性的强大趋势，也强化了初始外因性的障碍，贫困与畸形决不仅仅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加的后果，而是源自——这在本世纪将尤其明显——那些诸如实行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进口替代战略之类的、忽略本国与工业国家之间差距的独立的发展计划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失误。

拉丁美洲还表明，现代化道路不可规避。补课是不可能的，由于缺乏活力和福利效果，消极的现代化也不充分。只存在独立自主的技术—工业赶超，而这要求有实施赶超的政治意愿。此外，还要求消除重重现代化障碍、进行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以及综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品的突出能力。只有实施技术—工业赶超过程的政治意愿才能使内在潜力的重要发挥成为可能。然而，在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转机。

社会并不总是只受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影响，正如简单化者所认为的那样，它们既不是自己历史与文化的傀儡，也不只是大资本的执行委员会或外来利益的甚至于国际市场条件的执行者。拉丁美洲国家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内外的挑战。根据“内源性发展”计划，社区、地区、民族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面临这样的任务，即要了解各自的资源储备并能充分利用所有潜藏的可能性。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但由于没有替代当时尤其出现在工业国家的模式的选择，所以这些国家必须辨清方向，自我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扫除障碍，并创造特有的、适合本国情况又能应付各自外来挑战的模式。由于现代化过程既复杂又艰难，社会中及社会之间的不平衡几乎不可避免。世界范围的整齐划一的趋势只包括少数几个主要是表面的特征。而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趋势则要强烈得多。

虽然现代化障碍和现代化推力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的共性是如此突出，以致于不妨把拉丁美洲称为一种区域文化模式，但这并不排除它们的历史与特色相当不同。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期间，各国已经表现出的增长活力与工业水平之间的区别继续存在。

很多征兆预示着，现代化活力会比到目前为止已表现出的更加不同，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政策对国情的适用程度不同，另一个原因是对本国增长模式中技术与世界经济变化的考虑不同。此外，行为体的意志、韧性、灵活性和能力及实现新文化综合的能力不同也造成现代化活力的区别。

对内的未决将导致对外的犹豫：该地区的军事冲突经常源自内政问题及对边境走向的要求，而后者往往因为有原材料利益的外国公司而加速发展，冲突也不是因为像常常在工业国家的历史上那样——日益强烈的民族国家的肯定而产生。

拉丁美洲国家根本无意于在工业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中很普遍的经济民族主义，至少只要这些国家主要依赖大量的资本输入保证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的话，那么国家就依然是价格与条件的接受者。也许在市场导向的框架中，能够捍卫国家对外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竞争力强的企业和政治行为体会在不远的将来成长起来。

反对这种文化冲突论的不仅是国家的衰微与无能，而且还有其他情况：墨西哥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通过“加勒比地区倡议”(CBI)在贸易政策上联手行动，及

正在建设中的南方共同市场的内部问题。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奉行的进攻性贸易政策，拉丁美洲并没有采取什么反措施。每次双边贸易中总是美国的增长率明显更高。

是深层次的改革进程还是深刻的危机才能造成连续性的中断

工业社会建立在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及现代的思想与行为体系（自然科学、技术、法律、意识形态、哲学等等）基础之上，经济的合理化过程即工业经济影响着思想与行为体系，又受到这些体系的深刻影响。这种交互作用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工业社会系统的单个组成部分虽然是一体化了的，相对独立的，然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又是相互协调的。

系统组成部分与社会职能关系的融合、它们彼此的分离与交流来自长期的实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创造出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特征并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逐渐形成为一个积极的具有共同学习文化的社会。

工业社会包括本土及外来的文化成分，人们几乎常常认识不到传人的思想倾向是纯粹的外来模式。这些社会彼此互相促进，它们的明确特征使得它们能够影响文化转让的方式与质量，传入的文化品将会被纳入自己的学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看来必要的话，本土的特征就会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社会、技术、组织和世界经济的挑战。

当地安排的改变有时表现得艰难而又漫长，然而，已经变得僵化的结构通常几年之后就会被摒弃。只要民族国家的行为体成功整合文化的本质特征，那么即使是诸如信息经济和全球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也能战胜。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导致工业社会的衰退。

如今，支承现代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不发达社会要想回避这种力量的机会已经急剧地减少了，回避工业、技术及组织和控

制形式也越来越不可能。设计与实施替代的现代化模式的意志与能力也消失了，尤其是在技术工业领域中，独立的方案几乎更不可能。按照一般规律，不发达社会也不会比工业社会更早地形成有广泛社会影响又有经济效率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但独立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不断涌现。

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成功摆脱了一般模式——特有模式的转变，采取对策（但很少）避开了这种转换。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冲破了这种固定的单方面内向的模式，企业、国家、国民经济新兴行业的中间组织以及社会的特征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今天即便新自由主义势力也强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技术统治经济政策的准备根本不够，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并进行法律、教育和金融领域的改革。

然而，改革过程进展缓慢；经济增长回落；储蓄率低，从而对巨额资金流入的依赖相应加深；在正式部门中几乎没有创造出新的、额外的工作岗位；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力量多半软弱无力，提不出实现技术—工业和社会的现代化的设想与战略。

建立现代的组织与控制模式的能力低下，传统的现代化障碍，比如说农业结构，再次更加明显地凸现。人们没有像亚洲一些国家那样认识到，现代化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挑战，而且尽可能听任于市场。

与工业国家相比，拉丁美洲国家更多地是被迫向别人学习，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依赖于照搬外来的组织和控制计划以及制度和技术的高招。然而，单单这样的转移保证不了成功，而是要取决于把本国的传统与外来的现代化推力结合起来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在拉丁美洲，善于独立地探索、选择、模仿、借鉴和利用——进行新的文化综合—的力量与能力都过于薄弱。

特别是在这个地区的贫穷的小国中，文化转移仅仅是被视为新发展的保障；因此外来专有技术的泛滥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

国家,尤其是智利,存在着制度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个人的转变能力,这使得各个领域中有目的的探索和转移过程成为可能。不过同样也是在智利,大多数企业的模仿性革新和快速转化成新产品的能力却并不高。

改革过程的速度与深度以及根据本国力量进行文化转让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使区域文化中的现代化障碍、传统经济与权力结构和思维与行为模式的继续存在,有的得以剔除,有的得以智取。

不能确定的是:是否是一种持续、日益深化的改革过程最终将发展成为质的飞跃。剩下的选择只有将引起经济与权力政治延续性断裂的危机,这种断裂也许能带来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这样的危机在一些中、小国家中几乎不可避免。

通过全球范围的学习获得的技术工业活力

每一种赶超过程都有自己的增长途径、独立的增长模式和不同的先后顺序。民族国家行为体设计未来画卷并排除现代化障碍;他们开辟了塑造民族国家和企业家们的领域,推行比如说本国的知识与专家治国体制;他们希望本土的活力中能注入世界经济的活力。

文化转让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转让越有针对性,形成新的文化综合就可能越快,从而独立的现代化潜能也就能越迅速地发展为现代的经济与民族国家的特色。全球性现代化就建立在土洋结合模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之上。

拉丁美洲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软因素:软的控制手段——如行为体之间为制定具体决议而进行的对话,振奋人心的民族国家休戚与共感情的培养,宏观与中观经济的刺激体制的完善,也是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务实可行的经济民族主义、人力资本教育、发明创

造、技术竞争、质量、市场营销或者软件等。转让软性因素是艰难的，大多数情况下则根本不可能。

在拉丁美洲的大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中，看来完全可能造就技术工业赶超战略和建设现代社会所需的充分条件，当然，新的现代化推动力也还不足以启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过程。

明确、清楚和持久地坚持这样一种过程本身不只是一个技术统治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它还要求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比如巴西或巴拉圭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压力，这种压力会迫使社会上层与政治家们达成新的社会妥协。此外，在几个中小国家中，还要求外来的、持续的、强大的推动力——或许来自本地区，也可能来自工业国家。

关键问题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努力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要自行设计并付诸实施符合实际的现代化计划。目标必须是使社会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学习把个人融入社会；而社会只有作为学习集体才会表现出持续高涨的技术组织—社会活力。只有善于学习的社会才能克服拉丁美洲的“消极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要把现代的预期行为和消费模式与生机勃勃的经济、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结合起来。

全球性学习潜力最可能应用于现代的两个基本结构的协作中。如果民族国家的制度不断完善的话，那么民族国家就会成为一个经由全球性学习与企业和中间组织共同发动本土资源的有效工具。

这样，经济与全社会的发展就有了发展方向与活力，接收引进的专有技术的官方及个人机构就会得到加强，吸纳并创造性地发展专有技术的能力就会提高。

专门技术，特别是制度和技术秘诀的引进、改造和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拥有生产、创新和竞争能力强的企业的国家和世界市场，决定了这种学

习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要把这样的学习过程转化为政策与生产力，就要实现两种基本结构的密切结合。

企业与民族国家行为体必须通过这种技术转让使强化的选择性学习成为可能，而这种学习会带来“强化的经济增长”。与在复杂工业中一样，在官方机构与私人组织中，不能编码因而也不可转移的知识占有很大的比例。已被采纳的技术不能简单地抄袭，而只能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经受检验。这样，技术就有利于独立的解决办法，并增强各自的特色。

对外开放的民族国家至少必须概略地制定社会学习过程的方案。假如民族国家片面依赖地方技术，民族国家很快就会失去生机；假如国家不加选择地引进，种类繁多却并无需求的技术就会涌入国门。重要的是要有系统化眼光、战略前瞻和民族国家行为体集团的旨在系统控制的紧密协作。特别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奠定“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基础将会把全球性的学习过程推向前进。

拉丁美洲有全球化的赢家吗

鉴于内外面临的高要求，拉丁美洲的先进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是否将跨入全球化过程的赢家行列尚属未知数，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则几乎没有这样的迹象。

对该地区所有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市场与世界市场导向、迫使企业现代化的坚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及建立民主监督、强大高效的民族国家。此外，生机洋溢的现代化过程还取决于教育的水平与质量、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信息与知识的利用，以及活跃国内交流并向全世界学习的意志与能力。

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竞争性市场必不可少但却远远不够，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通过制度发展也未能给以充分的弥

补。此外，拉丁美洲还需要具有发展民族国家、社会、生态与能源效率的意志和知识的行为体集团，以及指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现代观点与信念体系。

（克劳斯·埃塞尔）

参考文献：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1998：《拉丁美洲区域文化与现代化障碍》，报道与评论4，柏林。

埃塞尔，K.，1999：《全球化压力之下制度的转变：关于智利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建立与结合的思考》，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报道与评论3，柏林。

埃塞尔，K./W.，希尔勒布兰德/D. 迈斯勒/J. 梅耶—斯塔默，1994：《系统化的竞争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对政治的挑战》，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报道与评论11，柏林。

吉登斯，A.，1996：《现代的后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胡贝尔，J.，1996：《政治价值综合与福利国家的差异原则》，载于：M.·迪尔克斯/ K. 齐默曼，《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市场经济还有机会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93～209页。

英格勒哈特，R.，1998：《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的转变》，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

世界银行，1997：《 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变动的世界与国家》，华盛顿。

全球化时代的拉丁美洲：经济变革与区域化

联合国世界贸易发展大会（第十届）于2000年在泰国召开，这次大会主题报告的标题是“发展的全球化”，已由拉丁美洲经济体系（SELA）[①] 的常务秘书处于1999年6月提交给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讨论。报告中写道：“今后依然有必要争取有效、有利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加速发展进程迫在眉睫，这是确保该地区国家民主政治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挑战就是克服存在于参与金融、商业、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与保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和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克服这一矛盾意味着探寻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96b）[②]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所提出的全球化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得到印证吗？全球化在拉丁美洲如何得到体现又会引起哪些反应呢？它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有哪些影响？本文及后续文章将从不同侧面，而非“无所不包地”，探讨上述问题。首先对拉丁美洲全球化过程的各个方面做一粗略概览，然后介绍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讨论的基本方针与立场，并简要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接着各章节将阐明，作为后果与反应，全球化过程怎样有利于促进拉丁美洲和整个美洲大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不断加强的一体化。

---

① SELA是1975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缩写，所在地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成员国为28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包括古巴在内）。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一个负责拉丁美洲国家对国际组织中经济问题和对第三国或其他国家集团立场的协调机构与论坛。此外，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支持这一地区的一体化过程。

② 由外文引言译成德语。

全球化面面观

提起全球化过程在拉丁美洲的进展，可能每位拉丁美洲问题专家都会联想到某一具体画面或事件。1997年，笔者因为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项目评估而考察了阿根廷的门多萨省。作为评估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访问了一个专门种植与出口大蒜的小型农业企业。农场主住在附近的城市，谈话就在农庄的一个简陋的仓库中进行。在仓库前，来自玻利维亚的季节工人——这是说明在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框架中移民过程的例子——正准备转运收获的大蒜。谈话过程中，我们的对话伙伴打开一间木屋，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他的计算机并告诉我们，他就是从这里通过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与其南非和欧洲的贸易伙伴交割生意，并向鹿特丹的证券交易所定期通报大蒜的牌价。可以肯定，这位农场主并不代表阿根廷农业(首先是小农)，但他的行为却说明了经济与技术全球化在拉丁美洲的扩展。

全球化在拉丁美洲的发展有多方面的表现，第一批后现代的萨帕塔游击队，(德·拉·格兰奇/里科，1997，293ff)即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的诞生，可列为其中之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成就与其说是其实际的军事打击能力，不如说是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这一运动还有助于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萨帕塔运动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真正的或所谓的全球化后果的反应。没有全球化(经济、文化和通讯技术方面的全球化)，萨帕塔游击队永远不可能问世，而萨帕塔运动却把自己看作是抵制全球化过程造成的均质化趋势，并赋予全球化的受害者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以发言权的少数派代言人。萨帕塔运动是正在缓慢形成的国际社会的一面镜子。当副司令马科斯和加泰隆作家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在信中详细谈论其侦探小说中的主要人

物——侦探彼彼·卡瓦尔霍时,当他们在拉堪多纳的热带丛林相聚讨论全球化后果时,(巴斯克斯·蒙塔尔万,1999)真实与潜在的现实性之间的界限已然消失。

萨帕塔的例子说明,在全球化作为“非国有化”相反趋势的发展过程中,即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互动密集区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次国家与地方的认同得到强化。在过去这些年中已经出现了种族即首先是本土认同的表达与政治化,如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发生的那样。

智利的前独裁者皮诺切特想拒绝英格兰把他引渡给西班牙,因为西班牙的司法机关以其侵犯人权要对他提起诉讼,这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但这一次是人权的全球化。在拘捕皮诺切特将军所引起的反应中,拉丁美洲发出了“道德殖民主义”的谴责之声,并对欧洲人反唇相讥(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人):最好是管好自己家里的事。拘捕被驱逐的独裁者和前迫害狂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人们本来希望对受迫害者及被谋杀者家属承担起一种类似的救济教养责任,如同把前独裁者交给当今拉丁美洲政府一样。对全球化时代的拉丁美洲政府来说,更容易发生的似乎是国家经济主权的销蚀,而不是全面实现人权。对皮诺切特提起法律诉讼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司法机关以普遍人权和未失效的、可赦免的犯罪的名义开始全球化,并将国家界限和国家主权置之脑后。智利革命者和几位西班牙人与英国法官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此。

正如萨帕塔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领域,拉丁美洲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网络。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参数”,(世界银行,1999a,312)拉丁美洲每1千名居民拥有电脑台数达33台,明显高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值(16台),领先于中低发展水平的世界其他地区(参考年份1997),不过与高收入国家(千人拥有量为264台)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1985—1995年间,拉丁美洲信息技术市场年均增长15.6%,发展之迅速不逊于西欧。拉丁

美洲信息技术所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从总共1.5%(1985)上升到2.0%(1995)，几乎相当于东欧、中东与非洲的总和(2.6%)。(世界银行，1999，158)这样的发展势头也表现在因特网网民的数量上，目前拉丁美洲大约拥有570万网民，相当于总人口的1.3%。(赫尔左格，1999，106)虽然如此，该地区仍然是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增长市场。

掌握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政治意义。1999年4月，一本关于军人独裁时期违反智利法律行为的书刚刚发行不久，一家智利法庭就以这本书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予以没收并发出对作家的逮捕令。但智利一家报纸则针锋相对，通过在美国注册的一个服务器在因特网上免费提供该书内容并在其他报纸的网络版(如在迈阿密的新先驱报)上标明该书的去向。结果，第一天就已经有2万网民点击了网上的相关页码。当然，利用因特网本身在政治上是中立的，除了游击队(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南拉丁美洲的(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新纳粹主义组织也使用这一传播媒体。

当然，通过“产地讨论”拉丁美洲早就卷入了国际竞争之中，不过，与工业国家的讨论相比，拉丁美洲融入国际经济及由此对国家政府的自主活动空间产生的后果绝不是新的话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曾就此展开过讨论，20世纪60和70年代“依附论”也对此作过阐述，不过那时主要强调的是参与国际经济对国家政府发挥作用余地的限制和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弊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们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从拉丁美洲国民经济与国际竞争的融合中看到了发展机会。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拉丁美洲的经济专家居然也被东欧政府正式聘为顾问，以帮助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民经济的转型。在大约开始于30年前的全球化现阶段，人们不得不把20世纪80年代末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看做是一系列演变过程的组成部分之

一，这一演变过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和拉丁美洲日益繁重的债务，历经1982年的债务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紧缩调整政策，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政策的根本转变。（索普，1998，201～139）

经济危机的原因尚无定论

拉丁美洲经济崩溃的原因究竟何在，各种解释大相径庭。根据20世纪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经济崩溃和债务危机是数十年来实施被冠之以"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这一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高关税壁垒的屏障并未造就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工业，而是产生了一个效率低下的国家经济部门，主要原材料的出口遭遇国际市场价格巨幅波动的打击，利用外国贷款弥补国内储蓄不足，预算规则常常服从政治需要，从而造成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这种状况终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危机。

当然，对债务危机之前拉丁美洲经济政策导向的批评集中在政治发展模式的不足上。同时也有少数观点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经济史评价前后不一，尤其对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之前政策的尖锐批评，也只有部分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罗德里克分析了1973年以前进口替代政策取得的经济结果，得出了哗然一时的结论：

"与通常的观点相反，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所支持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整个经济严重的效率低下，事实上，相比较而言，很多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生产发展都可作例证。……作为工业化战略，进口替代可以扩大国内投资，提高生产率，因此在很多国家，这一发展战略至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是灵验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拉丁美洲经济崩溃的原因呢？罗德里克认为（1999，75～88），原因在于政府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

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缺少应变能力，也就是说，拉丁美洲政府对外来打击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危机无能为力。并非贸易或工业政策有误，或是对外开放水平不够，而是货币、财政与汇率政策上的错误导致了危机。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外开放的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微弱的统计上的关系。(罗德里克，1999，137～142)能否有效应地对经济突发事件，一方面受到社会冲突规模的消极影响(根据收入分配及种族/语言冲突的重要性来衡量)；另一方面，受到民主制度质量的积极影响。就这一点而言，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不良的经济状况中似乎也反射出20世纪70年代依然存在的独裁体制的残余。

还有一种思路是在文化因素中寻找拉丁美洲发展困难的原因。根据对拉丁美洲的洞察，劳伦斯·哈里森(1985)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过一本有争议的著作，题为《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态—拉丁美洲研究》，书中他把拉丁美洲发展的障碍与政治不稳定归结为那里传承下来的白种伊比利亚文化。不久，克劳斯·埃塞尔在其关于"拉丁美洲区域文化中的现代化障碍"的论文中，(埃塞尔，1998)再次阐发了这种观点。埃塞尔认为，拉丁美洲不具备必要的能力，以创造性地吸纳外来现代化推力并将这种推力与本土的文化特色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文化的整合，或者说从各种特有的和独创的方法评价中总结出一般规律。

是从人们的思想中还是从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寻找发展的障碍，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很多人认为，缺乏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冲突与变革是导致拉丁美洲经济停滞的原因，这种缺乏目前表现为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那么率先发生的会是社会变革还是文化转变呢？文化行为模式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政治行为？

在智利，首先是以暴力方式生搬硬套社会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继之而起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转变"。智利的事例也证明，社会冲突怎样释放出变革的潜能。在弗雷和阿连德领导下所进行

的农业改革，分割了传统的农业大地产，而倘若没有这一农业改革的话，那么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那种相当彻底的农业经济资本主义改革了。而且如果没有对大部分企业实行强硬的与毫不妥协的新自由主义调整的话，企业界的文化转变也不可能在智利发生。然而，这种根本的变革却是与巨大的社会（和人道的）代价联系在一起的，工人与企业家之间所有社会契约的取消如今依然构成对智利社会结构的压力。

就经济政策方向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贯彻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①] 这一“共识”规定，要实行和保证市场经济政策，即对外开放并重视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原则。于是，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中，关税壁垒被撤除，[②]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管理合理化，市场力量得到增强，而且，预算纪律和保障价格稳定受到高度重视。[③]“华盛顿共识”是对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的一种反应，阐明了最终得以采纳的解决途径。回顾过去，这些应付当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的对策，未必适宜长远的发展战略。

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数据，人们所关注的拉丁美洲国民经济竞争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出与其说是上升毋宁说是下降的趋势。在59个榜上有名的国家中，有11个是拉丁美洲国家，而其中7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都位于排行榜的后1/3

①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和90年代由居住在华盛顿的国家和国际决策者（美国政府、国会、思想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发展银行等）向拉丁美洲政府“建议”的经济改革。与此相对的是，爱德华兹（1995，41～65）却提出了“新拉丁美洲共识”概念，并与多边金融组织在形成经济政策基本共识中的作用作了比较。

② 拉丁美洲平均关税率从债务危机之前的45%下降到1995年的13%。（索普，1998，231）

③ 该地区199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还高居近1200%，但到1998年底时就降到了10%。18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2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甚至回落到10%以下，其余3国只略高一点。（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8，表－3）

之列。经过实行1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但拉丁美洲国民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只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而已。（世界经济论坛，1999）

表-1　拉丁美洲国民经济排行榜（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1996～1999）

	1996	1997	1998	1999
智利	18	13	18	21
墨西哥	33	33	32	31
哥斯达黎加	28	43	34	34
秘鲁	38	40	37	36
阿根廷	37	37	36	42
萨尔瓦多	-	-	-	46
委内瑞拉	47	47	45	50
巴西	48	42	46	51
厄瓜多尔	-	-	-	53
哥伦比亚	40	41	47	54
玻利维亚	-	-	-	55

来源：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cr/99rankings.asp

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平均经济增长率不到3%（人均1.5%以下），约3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7），近60%有劳动能力的人在非正式经济部门中（1998）工作，与国际上相比，收入差别尤为显著。所有这些情况使得拉丁美洲的经济开放和自由化趋势不容乐观。（详见：诺尔特，1999a及作者的后续文章）

"华盛顿共识"带来了什么

人们并不奇怪的是，即便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对经济转型

所付出的代价的抨击也从未停止过，而且在关于新自由主义战略所要求的稳定经济与对外开放是否已经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联合国下属组织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这是有关拉丁美洲经济政策和社会问题的思想库，就这一功能而言，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样举足轻重——，尽管也承诺放弃其长期兜售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战略讨论中还是强调了它所宣传的公平分配的生产模式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区域主义（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4）的战略。

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难以令人信服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以及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树甚少的结局，重新激起人们关于拉丁美洲经济政策计划的讨论。新自由主义已成明日黄花，而经济政策缺乏替代选择的迹象很快就促使人们积极地另辟蹊径，并为在新自由主义流行时期遭受歧视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式翻案。早在 1998 年 9 月，“新左派评论”就为其刊物题词为“新自由主义的崩溃”，少数拉丁美洲的评论人士则已经把世界经济论坛于 1999 年 2 月在达沃斯的召开宣布为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

在拉丁美洲，要求为在新自由主义统治时代受到压制的传统经济模式和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学派和依附论）正名的内外呼声日益高涨。另有一些观点主张拉丁美洲在全球化框架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地适应既定的外来游戏规则。（费雷尔，1999）

1996 年初以来，在乔治·卡斯塔涅塔和罗贝托·曼加韦拉的组织下，一群来自拉丁美洲中—左层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聚会，目的是制定一项替代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经济政策新计划。1997 年 10 月，这些人公布了他们的纲领——“新自由主义之后：一条新路”。

(康格尔，1998)在他们的主题报告中，作者们提出要把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建议与调整分配战略两方面结合起来；一个现代化的、有行为能力有作为的国家应该对外来投机资本的注入施以更加强有力的控制，同时应该通过提高国内储蓄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从而减少对外国资本输入的依赖，而且个人退休基金也应为此服务；应该优先考虑拉丁美洲经济及政治一体化的扩展与深化；实行有选择性的经济开放和临时的进口限制；税收(首先是消费税)应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以便提高国家再分配的能力；政治体制改革和扩大公民参与应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

虽然“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没有受到怀疑，但至少被批评为不充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洲发展银行”与“世界银行”(尤其是世界银行的拉丁美洲分部)提醒拉丁美洲应进行“第二阶段”改革，这是由世界银行政策总趋势所决定的，其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的题目就是“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同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题为“长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今后十年的改革纲要”。(比尔基/佩里，1997)该“纲要”除了要求实行讲究效率的非集中化，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改革，旨在巩固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及文教卫生部门的改革，而后一项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创造机会均等，减少贫困和进行人力资本(此乃长期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投资。最晚从世界银行为国家正式恢复名誉以来，关于“第二阶段”改革的研究与会议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多了。

在赫尔辛基的“发展经济研究世界研究所”所作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1998)谈到了“后华盛顿共识”这一新概念。虽然“华盛顿共识”带来了经济的稳定与开放，但手段与目的常常混淆不清，也没有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基础。报告还谈到要建立高效有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推行积极的竞争政策(也反对私人垄断)，保证市场透明度(包括金融领域的透明度)，投资教育领域以创造更多的机会均

等和提高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水平,促进技术转化与转让。

类似的主张也见于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分行的一篇题为“超越华盛顿共识:制度问题”(伯基/佩里,1998)的论文中。文中主张确立一种新的用于金融部门、教育事业、司法领域和行政部门的规章和调节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1998年4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次美洲首脑会议上,总统们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也把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确定为努力目标。(载于:菲什罗/琼斯,1999,207~213)

实际上,教育部门、政治制度领域和国际竞争的规章制度方面恰恰是拉丁美洲最薄弱之处,这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排序靠后的原因之一(不是惟一原因)。根据这个报告中由不法行为、衡量腐败程度的8项指标、偷税漏税、法治国家和刑事犯罪等组成的一个综合指数,11个被列入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就有10个(智利除外)处在排序的后1/3中:巴西(39名),哥斯达黎加(40名),萨尔瓦多(47名),阿根廷(48名),秘鲁(49名),哥伦比亚(51名),墨西哥(52名),厄瓜多尔(53名),委内瑞拉(54名)和玻利维亚(56名),其后只有乌克兰、印尼和俄罗斯。尤为不利的是,政治独立和司法机构贪污方面也列为单项指标,在所有这些指标中,每一项都有4个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最后5位。(萨克斯,1999,26~27)

不是全球化而是区域化吗

拉丁美洲的情况让人不禁要问: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领域并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是否与其说是全球化,尽管全球化在拉丁美洲是个时髦的字眼,还不如说是区域化过程。

西半球的区域化过程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美国立场出发的“霸权区域主义”,(林克,1998,100)(关键词:美国化而非全球

化）这种“区域主义”随着美洲大陆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而出现；另一种是各种拉丁美洲国家集团为在全球化竞争中寻找更好的出口条件而结成共同市场或关税同盟的努力，作为对全球化发展的反应，因此区域化同时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两种区域一体化过程，——次区域的一体化联合和整个美洲大陆的一体化努力，互为补充与交织，有时相互影响，其间，参加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允许一体化过程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公开的利益分歧。

经济政策模式的转变，——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到参与世界市场一体化，使得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更容易密切联系，就这一点而言，全球化过程对美洲大陆产生了匀质化的作用。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由于与美国经济政策相对的理智的对应方案而变得突出，那么同时也有部分政治与知识精英们接受了美国人的经济模式。在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上，今天的拉丁美洲更接近美国而非欧洲、亚洲特色的资本主义。美国人认为，签署一系列区域化的经济协议，直至建立一个全美洲的自由贸易区，可以降低拉丁美洲再度改变经济政策方针（直到实施更加强烈的保护主义）的危险，因为国际责任的约束将会保障国家的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准备阶段），拉丁美洲形成了一个新的由经济领域的技术官僚或者叫技术政治家组成的跨国阶级，（蒙特西诺斯，1997）他们实行对外开放并使新的经济政策模式合法化。这一群体超越国家边界结成人员之间的联合（通过共同的海外求学经历），其中大多数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如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和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周围的人士），接受并宣传美国经济的主导模式（具有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特征的）。这种新的人员网络能使美国在争夺拉丁美洲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有利条件（如获得对欧盟的优势）。

与美国关系的改变

美洲大陆的紧密结合还表现在政治观点及新近拉丁美洲对美国更多的尊重上。拉丁美洲人感觉到,过去与美国之间龋龉不断的关系变得顺畅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主张,外资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增大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民主制度更大力度的支持,都有助于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拉丁美洲对这一北方邻国的疑虑。(甘布尔/佩恩, 1996b, 253~259)或者,就像一位阿根廷政治家对“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以往列队行进的美国佬形象已逐渐为正操纵着人们应该立即登上否则可能空手而归的全球列车的非凡美国人形象所取代。”(引自罗德里克, 1999)在1997年度拉丁美洲晴雨表中,37%被调查的南美人和墨西哥人,45%的中美洲人,表示信任美国人,这一比例介于拉丁美洲各国不同的公民彼此信任的程度之间。多数(53%)南美人与墨西哥人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与其说坏,不如说好”(在中美洲这一比例为44%),同时18%的人认为“好”(中美洲为42%),还有18% 的人(中美洲为7%)认为“坏”。1998年度拉丁美洲晴雨表提出在世界上哪些国家是拉丁美洲最好的朋友这一问题,29.9%被问到的拉丁美洲人回答是美国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7.7%的人回答是西班牙,7.2%的人回答是日本(1%的人回答是德国,14.8%的人认为没有)。(华尔街杂志,1999)

饶有趣味的是阿根廷的情况。在卡洛斯·梅内姆总统任期内(1989~1999),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19世纪末来自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一背景,在文化上,阿根廷要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与欧洲的关系更为密切。阿根廷是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诞生地,国内庇隆主义者(正义党人)与美国的关系历来不和,但自1997年10月起,阿根廷成为美国在北约

之外的一个特殊盟国，现任政府恨不得加入北约。梅内姆总统在1999年2月甚至建议用美元来取代国家货币，而且并未因此在其正义党内遭受非议。根据1999年的民意测验，(引自奥本海默，1999b)49%的阿根廷人给予美国人以积极的评价，而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8%。至于更愿意与美国还是巴西结盟的问题，36%的多数支持与美国结盟(而只有26%支持与巴西结盟)。自1996年以来，去美国旅游的阿根廷人大大多于去欧洲的人数，文化导向模式更多地是以美国而不是欧洲为准。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区域经济区一体化不断深化

区域经济区一体化的深化可以通过贸易、投资与移民潮的发展来衡量。(甘布尔/佩恩，1996b，258)从外贸数字上看，美洲大陆的商品交换显著增长，对所有各方(贸易国)的影响也更大。这不仅适用于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且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同时，西半球次区域的贸易交流也在不断加强：一方面是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与乌拉圭)之间；另一方面是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内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在其他一体化联合中，这一趋势却没有这么突出。

从拉丁美洲国家间的贸易和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的贸易来看，在此期间，70%以上的拉丁美洲出口集中在美洲大陆上(同时60%以上的进口也来自拉丁美洲国家)。1997年，10个南美国家中有7个国家对外贸易的50%以上是在西半球进行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进口贸易的一半以上也是在西半球进行的)，只有巴西(46.6%)、智利(37.2%)和秘鲁(42.9%)三国向美国、加拿大或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比例低于50%。

表 2 拉丁美洲外贸结构 1985～1997(百分数)

贸易伙伴	出口			进口		
	1985	1991	1997	1985	1991	1997
西半球	54.4	62.5	71.3	57.0	63.8	62.8
美国与加拿大	41.5	45.8	50.5	38.9	47.3	45.3
拉丁美洲	12.9	16.7	20.8	18.1	16.5	17.5
日本	5.2	5.1	3.2	5.9	5.4	6.4
欧盟	23.8	21.1	13.9	19.8	19.5	16.4
亚洲发展中国家	4.1	4.8	4.8	1.9	3.8	8.4
欧洲发展中国家	1.6	1.2	1.3	0.7	0.8	1.1
其他地区	10.9	5.3	5.5	14.7	6.7	4.9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努嫩坎普,1999. 8

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理应得到的经济与政治影响与拉丁美洲对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之间明显不成比例,但在过去这些年中拉丁美洲对美国来说还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美国“再度发现”了拉丁美洲这一市场,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失去的 10 年”中,由于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的缘故,北美企业回避了南美洲,产品在这里的销路也萎缩了。在安全政治上,拉丁美洲对美国仍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扩大了的安全概念框架中,无论是为打击毒品贸易和治理非法移民潮,还是为了加强区域和全球的环境保护及预防传染病蔓延等,拉丁美洲对美国来说都格外重要。(里利,1999)

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反映出墨西哥对于美国战略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意义。经美国国会于 1993 年 11 月以微弱多数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该协定的新意在于两个先进的工业国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组成

了自由贸易区。自1995以来，墨西哥正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反，在对美国贸易结算中实现了巨额顺差。墨西哥人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确保了美国的市场准人，对内则保障了经济政策的变革，并且起到了某种“投资协议”(席尔姆，1997,62)的作用，以提高墨西哥对于意在美国市场的外资的吸引力。而美国所期待的，除了美国企业的经济利益外，还要确保墨西哥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在解决双边(安全)问题如毒品贸易和非法移民潮问题时的利益。

美国加强与拉丁美洲贸易关系的努力并非只局限在其南部邻国和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贸易伙伴的范围，而是循发展趋势着眼于整个美洲大陆。不过，由于美国外交决策体制的矛盾和反复无常，以及对外政策服从于内政需要——通常是选举——的明确原则，困难也不可避免。早在1990年6月，布什总统就提出建立从阿拉斯加直至火地岛的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开创美洲事业倡议”)。该建议最初被考虑为打破关贸总协定谈判乌拉圭回合僵局的压力手段，但后来却逐渐显示出其自身特有的生命力，因为拉丁美洲人担心当时来自东欧人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墨西哥政府为实现其经济政策改革也需要外交政策上的保障。

克林顿总统继承了其前任的拉丁美洲政策。1994年12月9日到11日，北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4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第一次“美洲首脑会议”。会上，克林顿总统向拉丁美洲人提议建立“富裕伙伴关系”。首脑会议结束时签署了一个声明和一个行动计划，要在2005年时结束关于组建覆盖整个半球、人口为8.5亿的自由贸易区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995年7月(丹佛)，1996年3月(卡塔赫纳/哥伦比亚)，1997年5月(贝洛奥里藏特)和1998年3月在圣何塞先后举行了执行迈阿密首脑会议决议的贸易部长系列会议。1998年4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上，评估了谈判的进展，确定了今后的

时间表，并就谈判中出现的新领域组建了谈判小组。下一届首脑会谈定于2001年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

作为加强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更加密切的经济网络化的重要内容，自1995年以来定期举行的专家级磋商不受下列两点影响，即2005年这一期限对于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有多现实以及未来条约文本中会增加哪些临时条例和特殊规则。专家级谈判所要商谈的是贸易往来中的规则、标准和程序及建立能够促进西半球贸易关系的人员网络，而这种贸易关系不受尚未出台的协议文本的制约。美国很可能将试图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框架内执行贸易(及其他经济领域的)标准，这样美国就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贸易自由化的未来回合中，从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出发提出这些贸易标准。近来，美国种种努力的目的在于使经济规则(比如竞争法、知识产权和政府定单的分配等方面的规定)能适合于拉丁美洲或是使这些规则在“半球的全球化”意义上与美国标准相协调。(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99a，36～38)

尽管美国政府为提高当地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市场份额及促进拉丁美洲国民经济与美国的紧密结合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拉丁美洲也决非只是美洲大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消极的观望者。正如人们在1994年12月迈阿密高峰会上所表述的那样，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主张也可以部分归因于想以这种方式改善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同时防止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南部美洲国家拒之门外的拉丁美洲政府的倡议。

一体化计划：南方共同市场

为应对全球化框架中日益激烈的竞争，部分也为对抗在贸易促进中首先贯彻自己利益的美国的经济压力，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区域一体化过程开始启动或重新焕发生

机。无疑，气势最为宏大的一体化计划是1991年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到1995年1月1日，取消了该区域的关税壁垒，并确定了共同的对外关税，同时执行将于2001年终止的“例外与过渡时期规定”。智利与玻利维亚分别于1996或1997年加入了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的多数国家(除了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都在为加入南方共同市场而努力。

一体化过程在拉丁美洲深得人心。南美与墨西哥一半左右的人口表示，曾经听说过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或者安第斯共同体；在1997年度拉丁美洲晴雨表的舆论调查中，4/5的被调查者(在南美与墨西哥为78%，在中美洲为80%)表示赞成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17个国家中只有3国(墨西哥、巴拉圭和危地马拉)的支持率低于70%，超过一半的调查者(在南美与墨西哥为54%，在中美洲为68%)期望自己的国家得益于一体化。

作为一体化过程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内部的贸易往来显著扩大，贸易额(出口)从1990年的1206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684亿美元，1990年拉丁美洲国家在本地区的对外贸易只占外贸总额的13.3%(平均值)，而1997年则上升到20.4%。(桑塔·加迪亚，1998)

与早期拉丁美洲一体化努力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一体化不只限于贸易领域。在过去这些年中，拉丁美洲企业的跨国投资显著增加了。但在当前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中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即如智利企业一样，减少对外投资转而关注本国市场。

美洲大陆的区域化不只是涉及商品交换、跨国投资和货币问

题，[①]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过程到目前为止也还存在尚待加强研究的副作用。因此可以预计，如果没有区域补偿机制的话，那么在一体化范围内，区域性差别会扩大。在南方共同市场地区，约90%的生产和75%的消费集中在区域走廊，这一走廊自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沿贝洛奥里藏特、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帕拉南、圣卡特琳娜、南里奥格兰德、经过乌拉圭，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放区、圣菲、科尔多瓦和库约，直至智利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比尼亚德尔马。近来，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一带构成了南方共同市场的经济核心，（托尔—雷斯，1997，41）因为未来国内或跨国企业将重点在该地理区域投资建厂。可以说这也会对拉丁美洲的移民潮造成不良后果。

错综复杂的区域移民模式

移民是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帕恩赖特尔，1999，130）它始于从贫穷到富裕地区的日益强劲的次区域移民潮——包括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的移民，这就是说，移民不仅发生在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北部，而且在南部拉丁美洲国家同样存在这种向更富裕地区的迁移运动，这在经济危机时期会导致国内政策的冲突，阿根廷最近的发展情况可为例证。[②] 复杂的、跨越国界的移民模式已在南锥体地区形成：巴拉圭与阿根廷之间；玻利维亚、秘鲁与阿根廷之间；巴西与巴拉圭之间；智利、玻利维亚、与秘鲁之间；智利与阿根廷之

① 1999年1月巴西货币贬值，造成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不稳定，从此在拉丁美洲（和华盛顿）引发一场关于“美元化”的讨论，也就是说要取消各国货币，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或南美洲使用同一种货币来代替各国货币。（法尔考夫，1999；奥本海默，1999a）

② 1998～1999年，阿根廷展开了关于来自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经常性非法移民（和制订相应立法的迫切性）的公开辩论，人们指责这些非法移民压低了下层收入阶级的工资水平并造成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

间，等等。根据阿根廷估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放区约有7万来自拉丁美洲邻国的移民。在拉丁美洲北部，大量的哥伦比亚人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移居到委内瑞拉（估计达100万）。但是，目前对拉丁美洲移民潮还缺乏研究，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状况也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还要考虑到非法移民所占比例很高）。[①]

与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南部的迁移运动相比，涌向美国的移民潮更为有据可查。自1970年以来，约有1000万拉丁美洲人在美国安家落户。大多数在美国生活的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与其母国保持着定期交流，其间还建立了美墨之间跨越国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网络——“跨国区”、“跨文化社区”或跨国村，（帕恩赖特尔，1999）并带来两国间的相互渗透，（洛温塔尔，1999b，110）从而在两个国家都形成了一个介于内外政策之间的政策领域。（洛温塔尔，1999a，73～75；1999b）在其他几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②]（此外还有古巴、多米尼克共和国；莱维特，1998）和那些成为美国人打击毒品斗争主要目标的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开始出现这种状况。

美国与少数南方邻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加尼福利亚的某些经济部门中，40%～50%的雇员来自拉丁美洲，主要是来自墨西哥与中美洲。这些合法与非法的拉丁美洲雇员汇

---

① 1999年2月，秘鲁外交部长披露，过去这些年中约100万秘鲁人移居国外。仅1998年就有约45万秘鲁人计划离开本国。一般来说，非法移民的主要目标有美国（估计在美国生活着50万秘鲁人），委内瑞拉（8万人），西班牙（5.2万），日本（5万人），意大利（5万人），阿根廷（5万人），玻利维亚（3万人），智利（4万人）（新先驱报和1999年2月14日与15日的CNN因特网版）。智利官方多次采取大规模行动以使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外籍工人的地位合法化。

② 例如把犯有刑事罪的外国人（其中也有重罪犯）驱逐回他们在加勒比和中美洲的祖国和墨西哥，这虽然减轻了美国的负担，但同时这些接收国中犯罪问题加剧了，而且还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参看：泰勒/阿雷尼科夫，1998）。

给他们家庭的款项成为他们祖国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例如萨尔瓦多,约120万生活在美国的萨尔瓦多人每年寄给其亲属的汇款多达11亿美元(1995),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从而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同年商品出口额为9.98亿美元)。约1/3的萨尔瓦多家庭从中受益,这些汇款即便不是惟一的但也常常是最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自美国寄到多米尼克共和国的汇款具有类似的意义。(迈尔斯, 1998, 7~9)墨西哥劳动人员从美国汇出的款项竟然高达45亿美元(1998)。(史密斯, 1999, 187)不过,与对中美洲国家的影响相比,这些移民美元对墨西哥整个经济的影响就不足为道了。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复杂的移民模式再次表明该地区全球化过程的多层次性。全球(和区域)网络及互动过程为突破僵化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全球化结果的经济变革可以说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在国际竞争中打开局面,反而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的不稳定,并扩大了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鸿沟。作为全球化对策并与全球化同时出现的是在经济领域且已开始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中出现的区域化过程,这种区域化既包括作为次区域的拉丁美洲,又包括整个美洲大陆。尽管全球化过程扩大了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差距,加深了美国通过企业对拉丁美洲的渗透,并加强了美国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包括文化霸权),但同时进一步密切了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社会与政治联系,这种密切联系将会抵消单向的依赖:在拉丁美洲"美国化"的同时,美国个别地区的"拉丁美洲化"也初露端倪。

(德特勒夫·诺尔特)

参考文献:

别伊沙尔姆,玛丽安娜/格雷戈尔 瓦尔特, 1997,"全球化"——计划的初级阶段,载于:国际关系杂志,4. 1,第 153 ~ 180 页。

比尔基,沙希德·贾维德/ 吉耶尔莫· E· 佩里, 1997:长征。未来十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改革纲要,华盛顿。

比尔基,沙希德·贾维德/ 吉耶尔莫·E· 佩里, 1998:超越华盛顿共识:制度问题, 华盛顿。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199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放的区域化。经济一体化对变革中的社会平等生产方式的贡献, 智利圣地亚哥。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1998: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1997 年概况, 智利圣地亚哥。

康格尔,露茜, 1998:第四条道路?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拉丁美洲抉择,载于:当代史(11 月),第 380 ~ 384 页。

德·拉·格兰奇,伯特兰/ 马伊特·里科, 1997:马科斯,绝妙的骗局,墨西哥,1997。

多明戈斯, 1999 :美洲国家间关系的未来,华盛顿,(美洲对话)(http://www.iadialog.org)。

爱德华兹,塞巴斯蒂安, 1995:拉丁美洲的危机与改革。从绝望到希望, 牛津/纽约。

埃塞尔,克劳斯, 1998:拉丁美洲区域文化中的现代化障碍,柏林: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法尔科夫,马克, 1999:阿根廷的美元化? 拉丁美洲的美元化? 拉丁美洲展望, 4 月(http://www.aei.org/lao/lao10297.htm)。

费雷尔,阿尔多, 1999:全球化评论演讲,载于:号角(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3.21 (http://www.clarin.com.ar)。

菲舍尔,卡琳/安德烈亚斯。诺维/克里斯托夫·帕恩赖特尔

(编)，1999:全球化与边缘。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的改革，莱因河畔法兰克福。

菲什罗，阿尔伯特/詹姆斯·琼斯(编)，1999:美国与美洲。21世纪展望，纽约/伦敦。

甘布尔，安德鲁/安东尼·佩恩(编)，1996a:区域主义与世界秩序，纽约。

甘布尔，安德鲁/安东尼·佩恩(编)，1996b:结论:新区域主义，载于:"区域主义与世界秩序"，第247~264页。

哈里森，劳伦斯 1985: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态。拉丁美洲研究，兰哈姆/伦敦。

赫尔德，大卫/安东尼·麦格鲁/大卫·戈尔布拉特/乔纳森·佩拉顿，1999:全球转型:政治、经济和文化，剑桥。

赫尔左格，罗曼，1999:拉丁美洲的因特网:商业与利用，载于:聚焦拉丁美洲，第13期，汉堡，第101~102页。

莱维特，佩吉，1998:跨国政治。多米尼克研究，见LASA论坛，夏季号，(http://www.pitt.edu/lasa)。

林克，维尔纳，1998:国际政治新秩序。21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慕尼黑。

洛温塔尔，亚伯拉罕·F，1999a:"美洲国家新纲要，载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第55章，第69~76页。

洛温塔尔，亚伯拉罕·F.，1999b:世纪之交的美国—拉丁美洲关系，载于:菲什罗/琼斯，1999，第109~136页。

迈尔斯，德沃拉·沃勒，1998:流向拉丁美洲的移民汇款:文献评论，美洲对话/托马斯里维拉政策研究所(http://www.idialog.org/meyers.html)。

蒙特西诺斯，韦罗尼卡，1997:拉美经济学家及其精英政治，载于:国际研究，30，第119~120页，351~375页。

诺尔特，德特勒夫(编)，1999a:拉丁美洲是经济全球化的受

害者吗?(聚焦拉丁美洲,1999—07),汉堡。

诺尔特,德特勒夫,1999b:民主政治前途未卜吗?21世纪之交的拉丁美洲,载于:国际政治,57,5,第25~34页。

努埃韦·索西达特,1999:第二阶段改革现状,第160期,加拉加斯。

努嫩坎普,彼得,1999:巴西金融动荡之后的拉丁美洲。为什么理想主义者可能错了。(基尔讨论会论文,337),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奥本海默,安德烈,1999a:美元能成为2010年西半球的货币吗?载于:新先驱报,1999年1月25日,(http://www.elherald.com)。

奥本海默,安德烈,1999b:阿根廷的美国情结,载于:迈阿密先驱报1999年4月29日,(http://www.herald.com)。

帕恩赖特尔,克里斯托夫,1999:移民:全球一体化的象征、后果和推动力。中美洲的经验,载于:菲舍尔等,1999,第129~150页。

波特,迈克尔,1999:微观经济竞争力:1999年度行政调查结果,载于:世界经济论坛,1999,第30~53页。

里利,约翰·E.(编),1999:美国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1999,芝加哥。

罗德里克,达尼,1997: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华盛顿。

罗德里克,达尼,1999: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华盛顿。

萨克斯,杰弗里,1999:年度回顾,载于:世界经济论坛1999,第14~29页。

圣加雅,罗萨里奥,1998:国际贸易中的区域主义:透视欧洲与美洲(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未定稿,1997/1998—2),哈佛大学。

席尔姆,斯特凡·A.,1997:美洲的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区域合作的新活力,巴登—巴登。

席尔姆,斯特凡·A.,1999:南北经济合作的机遇与风险:北美

自由贸易区中期盘点，载于：拉丁美洲。分析—资料—文件汇编，15，39，第1～12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99a：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外来动力的反思，载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第55章，第7～57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99b：发展的全球化，第9～99页。(http://lanic.utexas.edu/sela)。

史密斯，彼得·H.，1999：墨西哥移民，墨西哥国家与墨西哥政治和成员的跨国实践，载于：LASA论坛，夏季刊，(http://www.pitt.edu./lasa)。

施蒂格利茨，约瑟夫·E.，1998：手段与目标：走向后华盛顿共识(发展经济研究世界研究所年度讲演)，发展经济研究世界研究所，赫尔辛基(http://www.wider.unu.edu)。

泰勒，玛格丽特·H./亚历山大·阿雷尼科夫，1998：驱逐犯罪的外国人：地理政治学视角，华盛顿(美洲对话)(http://www.ia-dialog.org)。

索普，罗斯玛丽，1998：进步、贫穷与封闭：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史，巴尔的摩。

托尔—雷斯，乔治·豪尔赫，1997：南方共同市场：利、弊与困难，载于：今日拉丁美洲，17，第35～42页。

巴斯克斯·蒙塔尔瓦房，曼努埃尔，1999：(http://el pais.es/p/d/19990222/internac/marcos.htm)。

华尔街杂志，1999：关于美国的反映，(http://interactiv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nts/pollmirror 1999 - amigo.html)。

世界银行1999a：世界发展参数，华盛顿。

世界银行，1999b：世界发展报告1999，华盛顿。

世界经济论坛，1999：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日内瓦(http://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cr/)。

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发展:尽管存在社会抵制,但民主政治依然稳固吗

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和第一次挫折)结束之后,与国际上相比,拉丁美洲是除北美与欧洲之外最民主的地区。“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称,在非洲,17%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是自由的,这个比例在亚洲是50%,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是37%,中东是7%,而在拉丁美洲则高达58%。(卡拉特林基,1999, 120)在19个拉丁美洲国家中,12个被认为是自由的,6个是部分自由的,只有1个被列为不自由(见表-2)。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认为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与民主化已被视为一种罕见的共生现象呢?乍一看,回答是肯定的,但细究时,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过程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分析全球化对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影响,必须考虑如下发展背景:

●经济与政治领域日益加强的区域一体化和联合。它改变了拉丁美洲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也获得了绝对积极的评价。

●以新自由主义改革和世界经济日益强化的融合为标志的经济政策根本变革的成果与社会后果。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则遭到非议。

此外,还有拉丁美洲民主制度结构上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对民主制度本身,并且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政治制度起着更加震荡的作用。

在拉丁美洲,全球化(首先是经济意义的)、区域化和民主化彼

此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有时相互促进。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民主化和大大加强的世界市场一体化过程齐头并进。由于世界范围内调高利率和拉丁美洲政府缺少对新的经济挑战的应对能力所引发的债务危机及经济遗留问题，使得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独裁政权风雨飘摇。除了智利以外，还有墨西哥和秘鲁等国的民主合法政府都实施了稳定经济与对外开放的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开放过程中，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日益加强，而且还建立了政治论坛和协调机构，改革了"美洲国家组织"，签署或重新签署了很多拉丁美洲地区双边和次区域的及拉丁美洲与美国的经济协议。从而，降低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巩固了本地区总体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国际环境。相反，国家内部发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有时甚至导致引人注目的暴力水平的升级，不过这种暴力水平一般不再是基于政治原因。然而，经济政策重新调整的社会后果却给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

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贸易和国家之间冲突的调节

拉丁美洲似乎以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这样一点：民主国家之间（与独裁国家相反）具有战争性质的冲突的现实性减少了（戴尔，1998，57－58；奥尼尔/拉希特，1997），或者说，在全球化和社会非国有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沿着民族国家的边境形成冲突线并使之永久化。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非国有化引起的要求提高效率的压力也削弱了全球冲突的意识形态基础"。（齐恩，1998，321－322）事实也表明，国家间发生战争性冲突的危险减少了，或者说，民主制度推动彼此间扩大贸易往来，因而也间接地有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

美国作为一个区域霸权力量，同样为西半球冲突的减少作出

了贡献：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即自冷战已表现出行将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将在拉丁美洲建立民主制度视为其长远的战略利益，并致力于保障这个地区的民主制度（直至军事干预海地）与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厄瓜多尔与秘鲁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其军火政策（武器销售）上采取了克制态度。（隆佩，1998）值得探讨的是，美国针对拉丁美洲的毒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各个国家的局势动荡，以及在促进民主与反毒品斗争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中，反毒品斗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民主稳定。到目前为止，由于卡斯特罗政权实行开放政策，美国在古巴问题上所采取的对抗性政策显得没有任何成效。

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开放使拉丁美洲新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突出经济的原则与动机，外交政策中旨在国家权力的军事内容失去了重要性，拉丁美洲各国外交政策的利益亦彼此接近，从而使得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和解变得容易起来。

大量的事例说明了民主化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对消除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促进作用。[①]这也适用于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关系，（施密特尔，1991；海斯特，1998）几百年来，这两个国为争夺在南美的政治统治地位而相互角逐并曾经进行过军备竞赛（包括核武器），而如今，双方同为一个经济一体化联盟“南方共同

---

① 这里巴里奥斯（1999：393－395）也谈到：“所有拉美政府对外政策的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背弃了军事独裁政权作为对外政策导向的地缘战略思想，这首先表现在该地区国家之间关系上。……新旧政权更替之后，很快就提出了彻底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领土纠纷并采取措施达成信任的倡议。……对区域间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是，随着从集权主义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换，所谓的‘冲突假说’，即邻国之间永恒的、受自然条件（即地缘战略）决定而不受各自政府及其对外政策制约的冲突局面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假设，已经不攻自破了。……这种制约的取消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协调形式，并达成广泛的合作协议，从而最终一体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市场"的成员国,并在和平使用原子能领域进行合作,彼此的军事理论不再以威慑方案为出发点,相反,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还有智利与阿根廷关系的发展,20年前两国曾经处于战争的边缘,然而与经济关系深化相伴而来的是,自1991年以来,两国政府成功地以协议形式解决了所有24个依然存在的边境纠纷。最近,在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的外在压力、两国军事紧张关系所造成的的经济负担和两国企业家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厄瓜多尔与秘鲁也不得不和平地解决了它们之间曾于1995年还导致了武装冲突的边境纠纷。(明克内尔, 1999)

在拉丁美洲的各个次区域中,卡尔·多伊奇设计的方案——"安全共同体"已经得到应用,这首先体现在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上,也日益适用于作为整体的"南方共同市场"及其成员国。简单地说,"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个地区的人们拥有和平变革的可靠预期。由于这种共同体的意义结构和认同,松散的安全共同体的成员不必担心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军事行动并因此实行相应的自我约束"。[①] (阿德勒/巴尼特,1998,30)尽管与国际上相比拉丁美洲过去就已经是一个国家间战争较少的地区,但20世纪90年代战争危险依然继续下降。

在区域或次区域的一体化框架内,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比其他发展中地区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该地区各种政府间组织相互交织并彼此结成网络。比如,在建立全美洲贸易区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发展银行"、"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在一起。上述组织考虑的主题是如何巩固直接有利于该地区的民主政治,它们包括:政治机构(包括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强化与现代化、监督选举、支持选举机构、采取措施以建立该地区武装力量之间的信任。例如,1999年,受智利与

① 引言由外文翻译成德语。

阿根廷政府的委托，“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制定了一种能够对两国军事支出进行规范化比较的方法，因为两国政府各自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在 1999 年 6 月初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公约，参加这个公约的成员国今后有义务公开其国防预算与武器购买情况。“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认为该公约是拉丁美洲走向军备控制、并且可能在今后 10 年走向裁军的第一步。

该地区的民主政府力图表明，民主制度也可以依靠外界的力量得到保障，从而使处于国际经济危机中的拉丁美洲仍然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与民主。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反民主势力的上台对该地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①]比如说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诺列加操纵了选举），各国政府就暂时断绝与巴拿马的对话；自 1992 年藤森总统上台以来，对秘鲁则采取了疏远的态度。

经济一体化联合直接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便使民主政治在墨西哥合法化；“南方共同市场”则明确地把自己视为民主国家的一体化联盟并拟定了对不民主政权更替的制裁机制。

对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外在支持起积极作用的还有“美洲国家组织”的改革，虽然其重要性不应该估计过高，但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确实起到了比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组织更为重要的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早在 1985 年，“美洲国家组织”在卡塔赫纳全体会议上就决定修改该组织的宪章。新宪章于 1988 年开始生效，它的前言这样写道：“代议民主制是实现该地区稳定、和平和发展

---

① 旁观者的感觉也是如此。一项关于德国多国公司经理对于拉美的认识的论文得出如下结论：“拉美民主化相当于促进稳定的政治正常化，这可以给人以更大的可预测性。……在拉美，民主阶段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民主规则的背离就越容易被视为政治不稳定因素，而政治不稳定因素则对外商的投资决定起到消极的影响。”（克鲁姆维德/诺尔特，1999，71）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支持和巩固奉行不干预原则的代议民主制"属于"美洲国家组织"任务之列。因此,"美洲国家组织"把自己视为民主国家的联合会。自1990年以来,这个组织便指挥着一个促进民主制度的特别机构,这个机构在比如监督选举方面将起积极的作用。(诺尔特,1998)

民主规则日趋深入人心

正如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很多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已经预测的那样: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考验,发展走势良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因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并非"阳光民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挣扎在经济困境中。民主政府已经成功地度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失去的10年"),并采取了深层次的经济政策结构调整措施。

暂时的经济成就,这里主要是指克服通货膨胀,对民主政治的巩固作出了贡献,并以此成就使民主政治合法化。在实施稳定政策期间,卓有成效的总统——假如宪法允许的话——一般都实现了连任。拉丁美洲政府有力地回击了以前非常流行的那种论点,即专制政府比民主政府更容易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确保经济的增长。但同时,经济政策变革的形式及一些后果也危及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稳定,因为经济政策的调整改变了政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并使政治中间结构——首先是"利益集团"和政党——面临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挑战,这在社会分化已初现端倪的国家中并非易事。

表－1　拉丁美洲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 1995～1998(百分比)

国家	1995	1996	1997	1998
阿根廷	76	71	75	73
玻利维亚	–	64	66	55
巴西	41	50	50	48
智利	52	54	61	53
哥斯达黎加	–	80	83	69
厄瓜多尔	–	52	41	57
萨尔无多	–	56	66	79
危地马拉	–	51	48	54
洪都拉斯	–	42	63	57
哥伦比亚	–	60	69	55
墨西哥	49	53	52	51
尼加拉瓜	–	59	68	72
巴拿马	–	75	71	71
巴拉圭	52	59	44	51
秘鲁	52	63	60	63
乌拉圭	80	80	86	80
委内瑞拉	60	62	64	60
表示赞同这样的看法：民主制度比所有其他政府形式更受欢迎				

来源：拉丁美洲晴雨表(Latinobarometro)1995～1998

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几乎已经结束了这一转型过程，也就是说，在驱逐了过去的独裁政权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结构已经形成，这些结构在不同程度上——相当于民主体制的衡量标准(戴尔，1998，85－86)。除了古巴以外，拉丁美洲各地都把民主选举作为重大的政治选择。

有迹象表明，民主政治已日益扎根于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中，

因此，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在大多数国家中获得了高度的合法性。自 1995 年以来，“拉丁美洲晴雨表”在 17 个(最初是 8 个)拉丁美洲国家同时进行的民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民意测验反映出南美洲国家之间显著的区别：阿根廷与乌拉圭始终表现出对民主制度的高度支持，而 1998 年在巴西、墨西哥和巴拉圭却只有不足一半的被问者表示，他们更喜欢所有其他政府形式的民主制。1996 年，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拉圭、智利、墨西哥和巴西，有约 1/5 到 1/4 的被问者倾向于有条件的独裁政体。(诺尔特，1997，45)而在巴拉圭，这个数字 1997 年上升到 42%，1998 年又回落到 36%。还有很多人对于民主还是独裁的选择持无所谓的态度，1998 年在智利与阿根廷，几乎 30%的被问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拉克斯，1999：46)

对政治制度的“表现”——根据民主体制的功能令人满意的程度来衡量的评价逐年不同，且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1997 年时，36%(1996：27%)的被问到的南美人(和墨西哥人)对民主制在他们国家的效用感到满意。1998 年时，这种倾向却很不一致：在几个国家中满意程度继续上升，而在另外几个国家(如在墨西哥与巴拉圭)的支持率却明显回落。很多拉丁美洲人表达了对民主政治质量的怀疑。在 1997 年度“拉丁美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中，80%的被问者认为，在他们的国家还没有适当的民主制度，只有 1/3 的人相信，选举能在自己的国家“合法”地进行。另据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几乎所有的政治行为体与政治机构都只获得可怜的信任度，政党尤其如此，国会与司法机构同样也未出其左右。而军队却常常得到比较好的评价，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和巴西。享有最高信任度的是教会与新闻界。不过，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对比表明，上述政治行为体与机构在社会上享有的声望显著不同，而这一不同则反映出这些国家之间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民主制度稳固程度的不同。(诺尔特 1997，

49；拉克斯，1999，44）

根据一种乐观的解释，民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终究还是得到了主要是积极的评价，这一事实（见表-1）可视为民主政治正处于稳固过程中的标志：准确地说，人们从规范的层面上区分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政治机构、政治行为体的成就及其恪尽职守的状况。（普热沃尔斯基 等，1995，59）

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不断加深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政治也沉积于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关于这种价值转变的最新研究，例如1990~1991年进行的“世界价值调查”表明，在对同胞的信任与民主制度的巩固程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统计学上的）关联，其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民主政治很可能提高了国人彼此间的信任，或者说，当社会已经表现出高度的人际信任值时，比较容易建立一种民主制度。（英格勒哈特，1997，172-174）

在一项刊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年鉴、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基本价值与基本政治观点进行比较的民意调查中，有一点引人注目，即：在拉丁美洲地区受到肯定评价的美德中，顺从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与此相反的是，与国际上相比，拉丁美洲人表现出对本国人更少的信任和更低的政治兴趣。这个调查结果也通过“拉丁美洲晴雨表”的新数据得到证实（拉克斯，1997；1999）：1997和1998年分别只有1/5的被调查的南美人表示信任其同胞，这个比例在中美洲是29%，极为例外的是，在墨西哥竟高达43%。

政治兴趣的下降毫无疑问反映出人们对政治制度功能的不满。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平均质量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决定性的改善。在过去这些年里，主要是中美洲

的民主质量有所改进，而在南美洲的民主政治中，对落实政治和公民自由权利的评价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则表现出即便不是很严峻、但还是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更糟的趋势。引人注目的是，对政治基本权利的评价一般好于对公民权的评价。政治权利涉及到参加政党的可能性，这些政党能够代表广泛的政治多样性，而且其候选人在公平的选举中能公开地竞争政治职位。公民的自由权利包括宗教、种族、经济、社会、与性别有关及其类似的权利，此外还涉及舆论、出版、组织和示威自由权利。（加斯蒂尔，1991，32－33）

尽管“自由之家”最新的 1998/1999 年度报告还在庆贺民主制度的推进，但在拉丁美洲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创立一种新型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制”、（扎卡里亚，1997；普拉特纳，1998）“缺陷民主制”（梅克尔，1999）或者是“选举民主制”。（舍德勒尔，1998）换言之，就是创立这种政治制度——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决定政府与国会的组成，但这种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常常会侵犯宪法规定的权力行使范围，也会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表 2：“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数，1990～1999

国家	1990～1991			1994～1995			1998～1999		
	P	B	FG	P	B	FG	P	B	FG
阿根廷	1	3	F	2	3	F	3	3	F
玻利维亚	2	3	F	2	3	F	1	3	F
巴西	2	3	F	2	4	TF	3	4	TF
智利	2	2	F	2	2	F	3	2	F
哥斯达黎加	1	1	F	1	2	F	1	2	F
多米尼克共和国	2	3	F	4	3	TF	2	2	F
厄瓜多尔	2	2	F	2	3	F	2	3	F
萨尔瓦多	3	4	TF	3	3	TF	2	3	F

危地马拉	3	4	TF	4	5	TF	3	4	TF
洪都拉斯	2	3	F	3	3	TF	2	3	F
哥伦比亚	3	4	TF	3	4	TF	3	4	TF
古巴	7	7	NF	7	7	NF	7	7	NF
墨西哥	4	4	TF	4	4	TF	3	4	TF
尼加拉瓜	3	3	TF	4	5	TF	2	3	F
巴拿马	4	2	TF	2	3	F	2	3	F
巴拉圭	4	3	TF	4	3	TF	4	3	TF
秘鲁	3	4	TF	5	4	TF	5	4	TF
乌拉圭	1	2	F	2	2	F	1	2	F
委内瑞拉	1	3	F	3	3	TF	2	3	F
P=政治权利；B=公民权；FG=自由度；F=自由；TF=部分自由；NF=不自由； 程度从1(自由度最高)到7(自由度最低)									

来源："自由之家"主页 http://www.freedomhouse.org

拉丁美洲的总统民主制虽然仿自美国总统制模式，但其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成分历来就极为单薄，这种自由主义成分包括(属于民主制度"基本责任")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约束暴力。(奥唐奈，1998)这种薄弱还表现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分权、司法独立和联邦国家在联邦共和国的重要性上。经济危机又强化了这种消极的"政治遗产"，因为经济稳定的代价常常是政治决定权在行政机构也就是在总统手中的集中。

民主政治面临的社会挑战

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结构性缺陷之所以本身就蕴含着很多危

险，是因为这种缺陷面临一种爆炸性的社会状况。“一个自由的社会假如不能帮助贫穷的多数人，那它也不能维护富裕的少数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9年5月初在“美洲理事会”就拉丁美洲形势作报告时，引用了这段约翰·F·肯尼迪总统当年的就职演说辞，试图以此警醒听众。这个报告在拉丁美洲引起很大反响，因为美国政府把这个报告作为认识和评估这一地区的标志。奥尔布赖特为那些聚集在华盛顿的并与拉丁美洲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大企业的经理们描绘了关于这个地区的一种无异于忧郁的景象：

“假如我们不能保证全球化过程符合人性要求地向前发展的话，我们就要承担严重的、不必要的风险。在一些国家中，我们将可能看到公众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如何下降，也会观察到社会基本制度怎样逐渐失去其合法性。……我们甚至还要见证，不稳定与动乱怎样有利于独裁统治者重新掌权。”（奥尔布赖特，1999）

庄严的民主政治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已建立起来，但却建立在一种腐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远不足以在中期内解决这个地区的社会问题，而且与赶超工业国家所必需的增长率之间也存在差距。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7，13）的统计，要弥补技术上的差距和解决拉丁美洲目前面对的社会问题，每年必须保证6%的增长率。但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在3%以下，人均低于1.5%。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拉丁美洲发展银行”于1990年就已宣布20世纪90年代为“希望的10年”，但大多数拉丁美洲人已与这种“希望”擦肩而过。

尽管汲取了外来经验，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其经济结构的缺陷，在广泛的对外开放中，拉丁美洲还会继续以特殊的方式遭遇外来打击。1994年以来，危机一再以越来越短的频率重复发生。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特基拉效应”之后，先后受到1997/1998年亚洲危机、俄罗斯危机和1999年初巴西金融动荡的

冲击。因此,大多数拉丁美洲人对未来充满疑虑并不令人奇怪,1998年的"拉丁美洲晴雨表"表明,61%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父辈要比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只是有限地反映在个人收入与就业上。国际竞争中的"产地竞争"逐渐导致正式部门中稳定的雇佣关系的解体。技术变革使更多的劳动力成为剩余,于是,拉丁美洲的正式部门中失业率越来越高——1997年已经达到58%(美国国际贸易局,1998, 表6-A)。拉丁美洲失业率(在正式部门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回落之后,1993年以来又表现出上升的势头。预计1999年拉丁美洲平均失业率为9.5%,(美国国际贸易局,1998)从而再一次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债务危机时期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还不足以控制贫困。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1990~1997年间,拉丁美洲的贫困家庭所占比重大约从41%下降到36%,但仍然略高于1980年的35%。由于同一时期内人口的增长,拉丁美洲穷人的绝对数字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有了轻微的上升,最近的数字为2亿零4百万人。

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经济新方针能带来福利增长的预言只在极少部门成为现实。关于拉丁美洲收入发展状况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还曾有过收入差别缩小的记录,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不平等反而急剧地扩大。20世纪90年代期间,收入分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即便在那些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国家如智利也不例外。

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严重的贫困与更显著的收入差距仍将可能是拉丁美洲社会的一个特征。1990年,世界银行(1990,171)在"世界发展报告"中已经严厉指出:"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国家福利处在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那样尖锐的对立中,而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个地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8年之后，“世界银行”(1998,11)在其关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收入分配差别，5%的人占据国民收入的25%，最上层的10%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40%。这种状况只有在一些人均收入仅为拉丁美洲水平一半的非洲国家中可以看到……”

由于全球化引起的对雇佣关系的压力和预期的经济低增长的缘故，最近几年整个社会的增长不可能出现根本的变化，从而可以预计，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收入分配与贫困发展会再次出现倒退性的结果。全球化过程造成的外在经济制约和内部社会政治权力关系会阻止这一趋势的全面扭转，这对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会造成哪些后果呢？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

社会不平等对民主政治成就的危害

民主制度能长期承受多少社会不平等、紧缩开支政策和贫困呢？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其内在逻辑必然产生社会差别并削弱社会团结的市场经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民主制度长期共存呢？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彼此紧密相联，正如罗伯特·A·戴尔(1998)曾经指出的那样，两者是一种“对抗性共生“，就像琴瑟失谐的婚姻一样：虽然以冲突为特征，但却依然维系着，因为没有一方希望分开。资本主义的成果以特定方式危及民主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前景尤其如此(阿塔莉，1997，58－59)：

●市场诱发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又铸就了不平等的政治资源，从而有悖于民主政治的政治平等要求。

●民主原则在理论上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即通过多数决定原

则改变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但这会影响到少数有产者对民主制度的忠诚(过去在拉丁美洲也经常如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框架中,由于资本的流动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样的分配调整更加困难了。

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将长期削弱民主制度,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社会差别如拉丁美洲一样极为突出的社会中。"在此,重要之处并不是全球化在美洲大陆引起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是这种不平等(包括不平等带来的所有负面效应),正像现在表现出的那样,完全可能在日趋迅猛的全球化过程中继续存在与发展。"(斯塔克,1998,77-78)

迄今为止,拉丁美洲在过去这些年中所经历的经济与社会变革还没有使民主制度更深地扎根于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反而加深了社会不安定和分化的程度。拉丁美洲的情况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民主制度传统的支持力量即中间阶层,商业上的市场分析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讲,大量人口的贫困会限制行使公民权的可能性,并为独裁宣传留下活动空间。事实上,持独裁立场的政治家,如秘鲁的藤森,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或巴拉圭的前政变者利诺·奥维多,都曾深受或至少短时期内深受群众的支持,这说明危险能够从社会矛盾中衍生。社会危机有利于政治当事人关系的维持或重建,而在这种关系中,反对社会低效率的呼声消失了,国家机构依然是获取权力的"肥缺"。因此,建立有效国家行政机构的努力得到了外来的资助。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能会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在拉丁美洲发展银行(1998, 22-23)1998/1999 的年度报告中(根据"拉丁美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数据),收入分配与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或者说是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之间的统计上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在收入集中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或阿根廷,民主制度的支持值明显高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的国家,如巴西、危地马拉

或墨西哥。在后面这些国家中，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宁愿选择独裁政权而且对政治秩序表现出冷漠的人一直是少数，但他们所占的份额却增加了。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关于智利的“人的发展”的国别报告就是在“现代化过程的矛盾”这一指导题目下描述1998年的情况，其内容除包括不同社会指标在内的“客观”因素之外，还讨论了人的发展与安全这样的“主观”内容，这些“主观”内容已在民意调查资料中得到了反映。但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影响的理解的题目完全没有包括在内。(PNUD，1998，215)研究结果说明，在这个曾是拉丁美洲自由主义改革先锋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领域(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改革的国家中，经济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智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在20世纪90年代又实行了已经取得可观成就如减少贫困的的社会政策，但多数智利人对此并不满足也缺乏安全——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游戏规则。这个国别报告把智利称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显著但人们并不幸福的国家”。(PNUD，1998，53)同样，1997年7月在智利圣地亚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尽管占微弱多数的被调查者(54%)认为国家经济改善了，但绝大多数人(83%)却否认人们生活得更快乐。(PNUD，1998，53)社会凝聚力的下降表现为同胞之间明显的不信任、承担政治与社会责任的热情趋冷和家庭纽带松弛。报告还认为，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曾郑重承诺的人们对可支配收入更充分的选择与决定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因而人们所面临的生存风险与机会严重失衡。(PNUD，1998，219)

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犯罪率的攀升

智利的事例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如何削弱社会团结与政治表达能力并激起人们的恐惧心理。拉丁美洲的社会分化过程和日益强烈的个人不安全感首先表现为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和他们担心成为犯罪行为受害者的日益强烈的恐惧感,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情况。从概率上看,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在犯罪程度(谋杀与抢劫)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统计学上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国家的犯罪率高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主义的国家,占人口 1/5 的最穷的人所得收入份额越高,犯罪率越低。因而,与国际上相比,拉丁美洲既是收入分配最不公平同时又是谋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这并非偶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尽管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谋杀案发生率已经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与世界其他地区(亚洲,中东和北美)和富裕国家相比,拉丁美洲谋杀案的发生变得更加频繁。(法因兹尔博尔等,1998,13)根据"泛美健康组织"提供的数据,拉丁美洲的谋杀案发生率在 1984 到 1994 年间上升了 40%多。

通过国际毒品贸易——这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犯罪行为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或者是作为毒品的生产地、过境国或者是作为相关用途的基地(化学药品,洗钱),都卷入了毒品交易。由于毒品贸易越来越丰厚的利润、适于特定植物种植的气候优势、社会矛盾以及缺乏其他的诱人选择,毒品问题的蔓延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停止,但是通过毒品在拉丁美洲消费的增加,其负面作用还将增大。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只能有限地履行其保护公民的生命、人身

安全和财产的责任,从而限制了公民的生活质量,并在国家和私人防范凶手方面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差距。极不正常的是,受害者及作案人都来自社会下层。("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7)与此同时,对财产与生命的保护越来越私人化了:富人可以通过雇佣私人保安服务来获得更多的保护,而在一些贫民区却根本没有更多的警力。该地区很多国家的私人保安服务得到迅速发展并拥有比警察更多的保安人员。此外,大多数国家的警察不仅装备很差,报酬不高,而且由于滥用职权而令人生畏。

结论:拉丁美洲"哥伦比亚化"了吗

犯罪率上升和很多民意调查所反映出的那种持续的恐惧感会造成什么政治后果,人们只能大致推测。在存在独裁统治传统、缺少分权与权力监督、公民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拉丁美洲,诸如采取铁腕政策来处理犯罪问题之类的要求,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后果。

犯罪也造成经济负担:吓跑外国投资,产生高额费用,还有人命丧失,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工时损失,治疗与恢复的用项,贵重物品的损失或破坏,用于警察、法庭及维持监狱的费用等等。"美洲发展银行"曾进行过一项专门针对充斥暴力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根据这一研究的结果,在都市地区因犯罪造成的费用合计平均大约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4%,对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来说,这一费用甚至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布维尼克等,1999,19-20)

于是,拉丁美洲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经济的衰退和严重的分配不公对犯罪率上升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犯罪又造成高额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并损害经济回升的前景,而经济的停滞则再次加剧社会矛盾并加速社会分化的过程。

拉丁美洲面临的威胁是"哥伦比亚化"还是美国记者卡普兰在

其题为《地球的终结》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呢? 这种状态是:国家逐渐失去对国家领土的权力垄断,在贫穷与社会矛盾基础上因政治原因而产生的暴力与通常的犯罪混合起来,从而加强了暴力文化;国家的分崩离析与社会的分化瓦解为新的“秩序结构”、有组织犯罪以及在有限地区实行暴力控制的左翼和右翼好战分子们留下了活动余地。那么,这是一种“哥伦比亚化”的选择,还是作为怪物的国家暴力的卷土重来,并以个人自由为代价来建立秩序?

(德特勒夫·诺尔特)

参考文献:

阿德勒,伊曼纽尔/迈克尔·巴尼特(编),1998:安全共同体,剑桥。

奥尔布赖特·玛德琳,1999:对美洲理事会发表的讲话,1999.5.4,华盛顿(http://secretary.state.gov/www/statements/1999/990504.html)。

阿塔莉,雅克,1997:西方文明的崩溃:市场与民主制的局限性,载于:外交政策,第107期,夏季刊,第54~64页。

巴里奥斯,哈拉尔德,1999:南美洲新兴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奥普拉登。

布利斯,哈里/布鲁斯·拉西特,1998:民主的贸易伙伴:自由主义关系,1962~1989,载于:政治学杂志,60,4,第1126~1147页。

布维尼克,迈拉/安德鲁·莫里森/迈克尔·希夫特,1999: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暴力:行动框架(技术研究。可持续发展部。美洲发展银行),华盛顿。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7:公正的缺口。拉丁美洲,加勒比与金字塔社会,智利圣地亚哥。

戴尔,罗伯特·A.,1998:论民主制,纽黑文/伦敦。

法因兹尔博尔，巴勃罗/丹尼尔·雷德曼/诺尔曼·洛艾萨，1998：拉丁美洲与全世界的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实证评估（世界银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研究。观点）华盛顿。

加斯蒂尔，雷蒙德·邓肯，1991：比较自由研究：经验与建议，载于：阿历克斯·英克勒斯（编），衡量民主制，新不伦瑞克，第21～46页。

海斯特，莫妮卡，1998：安全政策、民主化和南锥体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载于：乔治·I·多明格斯（编），国际安全与民主制。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巴尔的摩/伦敦。

美洲发展银行，1998：拉丁美洲的经济与社会进步，1998年度报告，华盛顿。

英格勒哈特，罗纳德，1997：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中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化，普林斯顿。

卡普兰，罗伯特·D.，1996：地球的终结。无政府的边缘，纽约。

卡拉特林基，阿德里安，1999：封闭民主制的衰落，载于：民主制杂志，10.1，第112～115页。

克鲁姆维德，海因里希—W./德特勒夫·诺尔特，1999：拉丁美洲的位置。德国经理的观点，载于：拉丁美洲。分析—资料—文献汇编。

拉克斯，玛尔塔，1997：拉丁美洲的微笑面具，载于：民主制杂志，8. 3，第125～138页。

拉克斯，玛尔塔，1999：载于：来稿，16. 2，31～35。

拉丁美洲晴雨表，1995：拉丁美洲晴雨表，1995，智利圣地亚哥。

拉丁美洲晴雨表，1996：拉丁美洲晴雨表，1996，智利圣地亚哥。

拉丁美洲晴雨表，1998：拉丁美洲晴雨表，1997，智利圣地亚

哥。

隆佩·劳拉,1998:美国对拉丁美洲武器出口新政策,载于:LASA 论坛,冬季,(http://www.pitt.edu/lasa)。

梅克尔,沃尔夫冈,1999:缺陷民主制,载于:沃尔夫冈·梅克尔/安德烈亚斯·布什(编),东西方的民主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61~381 页。

明克内尔,梅希蒂尔德,1999:秘鲁与厄瓜多尔和平协议:冲突原因与冲突解决,载于:厄瓜多尔—秘鲁。百年冲突的结束(拉丁美洲,分析—资料—文献附刊 16),汉堡,第 3~29 页。

诺尔特,德特勒夫(编),1997:不安的"美洲豹"。经济理想主义与政治怀疑主义之间的拉丁美洲,载于:克劳斯·博德默尔等(出版),拉丁美洲年鉴 1997,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7~57 页。

诺尔特,德特勒夫,1998:国际选举观察,载于:迪特乐·诺伦/索妮亚·皮卡多/丹尼尔·佐瓦托(编),拉丁美洲选举比较,墨西哥,1998,第 674~688 页。

诺尔特,德特勒夫,1999:拉丁美洲属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失败者吗?(聚焦拉丁美洲,1999. 07),汉堡。

奥唐奈,杰列尔莫,1998:新兴民主制的基本责任,载于:民主制杂志,9. 3,第 112~126 页。

美国国际贸易局,1998:实验概况,1998,利马(http://ilolim.org.pe)。

奥尼尔,约翰·R./布鲁斯·M·拉希特,1997: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正确的:民主制、相互依存与冲突,1950~1985,载于:国际研究季刊,41. 2,第 267~294 页。

普拉特纳,马克·F.,1998:自由主义与民主制,载于:外交,77. 2,第 171~180 页。

PUND,1998:智利的人文发展,1998,智利圣地亚哥。

普热沃尔斯基,亚当等,1995:可持续民主制,剑桥/纽约。

舍德勒尔,安德烈亚斯,1998:什么是民主制度的稳固? 载于:民主制杂志,9.2,第91~107页。

施密特尔,菲力普·C.,1991:体制类型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进展,载于:伊曼纽尔·阿德勒/贝弗莉·克劳福特(编),战后国际关系的进展,纽约,第89~127页。

斯塔克,杰弗里,1998: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的民主制,载于:菲利普·阿古尔诺/杰弗里·斯塔克(编),转型后拉丁美洲民主制度的裂痕,博尔多,第67~98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世界文化报告1998,巴黎。

世界银行,1990: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0,华盛顿。

扎卡里亚,弗雷德,1997:封闭民主制的兴起,载于:外交,76.6,第22~43页。

齐恩,迈克尔,1998:超越民族国家的统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五部分
从政治上塑造全球化

结论:通过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提高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预见性

总结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关两个全球性问题(人口增长和跨界交流)的这些文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全球化原本被视为"西方"现象的代表,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世界秩序"有着历史联系,但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普遍都将它作为应该加以克服的弊端。更确切的说,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历或外在压力,并且试图为个人利益所利用。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比意识形态纲领的对立倾向更强。

●如所预料,因其自身令人不悦有时甚至令人担忧的伴生现象(社会分裂、自身文化标准的销蚀、经济依附和政治管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着差别。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全球化主要被看做是实现更多业绩公平的机会,代表着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总体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在阿拉伯穆斯林和那些迄今属于全球化攻势受害者之列的非洲国家,典型的反应就是对外来文化的怀疑、恐惧和对全球行为体的不信任。在拉丁美洲国家,面对世界市场激烈的竞争,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如果不实行坚定不移的内部结构改革,不去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点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然而,也逐渐可以发现,在各领域都存在与发展政策相关的赶超过程的新机会,对此,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全球化信息技术(网络)上。

●文化的全球化歪曲和贬低了日常生活中地方和国家的活动范围,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新的现实和可能的经验领域,(宾斯伯尔根,1998)这些经验领域以一种对地方和区域传统不断增加的压力形式出现,也强化了这些传统所包含的竞争趋势和有损于平均主义共同价值的多元化趋势。新的通信和运输技术、全球化教育内容和现代文化方式在国际上都得到了迅速传播(通过网络、旅游、移民等),并且产生了"混合"文化意识形态的新的表现形式:全球化认同。

●同类性的"全球村"没有出现,相反,一系列拥有多个城市中心并正在跨越贫困线的、民族文化残缺不全的全球性城市,从柏林中心到里约热内卢,从旧金山到上海,正在形成之中。不同出身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只使用一定的货币和价格。在全球性城市中,由于民族和宗教界限的划分,猖獗的暴力活动将增加(阿帕多拉伊,1998)——这是一项预防和处理公民冲突的巨大任务。

●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教育和权力精英们以及非民主制国家中原则上的反对派集团都期待着从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中谋求

自身物质和非物质的好处：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中心的赶超机会、更公平的市场准入、民主决策、人权保护。从这一世界观出发，首先要求“西方”(说到底就是北方)在世界市场上给后发展国家提供更公平的发展竞争条件——通过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和适当的债务豁免等等。

●在抵御经历痛苦的全球化风险时(“亚洲危机”、肆无忌惮的金融投机、原材料价格波动、新的环境损害)，第三世界地区都有国际合作的愿望：在解决全球问题时(环境、气候、能源供应、跨国恐怖主义和国际经济犯罪)，寻找多边合作的决心已经明显增大。这反映了已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政治自主政策不再适应社会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全球危机的防范。为建立更公平的世界秩序而进行跨国合作，已成为人类和所有单个社会的生存条件。

●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全球化的悖论，政府对此的反应往往无能为力、听天由命，有时甚至富有挑衅(马来西亚)：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独立自主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能力，同时，为了保持社会和谐，它有提高国家作为的必要性。一方面应在跨国调控中寻求出路(全球金融和发展体制、区域主义、全球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南北方向上，增加外汇支付款项(援助、发展合作、债务减免)。

●各国政府都面临全球化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要恢复、保证、必要时进一步发展各自产地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开支政策中，又不能太远离社会公平的理想，否则统治地位将面临威胁。另外，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为发挥创新潜能，给市民社会活跃集团提供更多行动空间的压力也增加了，——客观上会引发政治自由化倾向(“自下的全球化”)。

从这些推断中，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全球化导致边界消失和分裂，那么全球化政策就意味着划分边界、制定规则和实现团结统一。迫切需要重新发挥政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政权和非政府组织占领跨国政治空间

——这是从 1997 年发端于泰国的“亚洲危机”,并且后来持续在非洲蔓延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得出的教训。对全球金融市场实行有力而广泛的政治调控的历史性机会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利——就是说,在东西方冲突消失后,鉴于越来越突出的全球问题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会议成果累累(有关环境、发展、人口、社会问题、金融等),在克服亚洲金融体制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也进行协调合作。“市场宿命论者”对市场自身调节(在亚当·斯密那里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迷信已经转向寻求危机的政治解决。“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政策”是一句新的格言(梅斯纳/努舍勒,1996;赖尼克,1998)——21 世纪首脑外交的创造性使命。

●在北方和南方的全球化讨论中,借助对各种行动的政治调控来避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误入“市场极权主义”,这种信念已得到广泛扩散。如果能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是减少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体制福利之外的大规模贫困(因为世界上绝对和相对最贫困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二是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赢者与输家之间争取更多的分配和收入公平,那么在全球治理原则上也是能够认同的。因此,富有成效的发展合作和全球负担平衡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现实不平等合作者之间国际合作承载能力形式逐渐形成的有利条件”。(梅斯纳,1998. 8)

●可持续性已成为生态和谐的经济增长的主导思想,因而在南北关系政策上必须赋予社会公平理想同等的地位。社会公平作为政治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并不意味着结果平等,而是共同工作,建设一个能够保护人的尊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承担或排除现代经济发展代价的世界社会状态。这就涉及全球社会政策,它为自由世界市场经济设定界限,尽责为全球行为体维护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意味着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为社会市场经济创造大量的活动空间。

如果系统地考虑各种要求(包括阿尔特法特、埃伯莱、梅斯纳/

努舍勒、赖尼克、索罗斯),全球化积极形态的共同信念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1.从规范层面来看,(每三代)人权理念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具有普遍的效用:当外交、安全、发展、环境和法制政策要素彼此密切联系时,人权政策已成为其任务的一个方面,(费舍尔,1999. 36)同时应更重视发展权——尝试通过实践理性的作用,防止渐渐反映出来的社会分裂灾难(全球种族隔离)的发生。(特茨拉夫,1999)生存和发展需要一种基本的能力,即人人都有权拥有和进行选择。由此产生出三种必要的权利:生存(人的行动力的基本条件)、语言和思维能力的实现,以及社会和合作关系的建立。此外,为提高社会共同体的生活质量,还有责任比现在更加坚定地减缓违人心愿的人口增长。

2.从国际法的层面上,为更快地实现全球法制国家的理想:联合国公约、国际合作机制、国际刑事裁判权、多边仲裁法庭审理、为保护基本人权的人权干预等等,应该创设和扩大限制民族国家主权的机构和工具。

3.从政治行为层面上,为规范国际资本流通的框架条件,必须创造多边工具和方法:更多的调控,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透明性,更多的责任和全球行为体的共同担保。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出的为现在仍受到债权国及国际投资者照顾的债务国家创立一个无支付力的国际司法程序的要求显得迫切而又重要。如果失去国际保护,这些国家就会出现偿付能力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偿债能力危机以至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变革。假如实现国际破产程序,暂时出现支付能力问题的国家可以宣布停止还债付息,支持用法律诉讼程序防止债权国的干预,创建新的劳动资本,延长信贷,进行经济治理,在规定时期争取偿付债息。(霍尔,1999.4)第三世界希望西方真正尽力给债务国提供机会摆脱债务负担,以免总是为不断增加的债务付息。从各个方面看,减免债

务的目的在于恢复到一个"可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就是说根据国内储蓄和国家收入的最小保护值等基本问题,设定必要的免债范围,(托马斯·坎普夫迈尔/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引自:埃伯莱,1999. 46)还债付息不应超越债务国的国内资金筹措能力,比如将国内存款用于投资基金不允许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 20%,同样,中央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国家公共开支也不能低于规定的最小值。(埃伯莱,1999. 46 - 47)

4. 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根据自由不干涉原则,资本总是惩罚那些习惯于考虑和重视社会事务的国家。为了避免人类破坏性的竞争(走向极端),迫切需要调整社会最低标准。"我们需要一个阻止社会螺旋式下降的全球规则。"(库特纳,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1998. 31)

5. 在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政策合作的层面上,工业国和债权机构必须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目标和国家影响经济的工具方法更多的理解。如果发展中国家为防止和克服金融危机而实行资本流通监管,工业国和债权机构也要理解其政府。这些监管必须被看做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的主要手段——至少当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办法来阻止与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相联系的金融危机和金融震荡的跨国界蔓延时是如此。(翟尔,1999)

6. 另外,必须改革在许多人看来是全球市场经济最脆弱部分的国际金融体制。为控制特殊—合法的资本市场(如非法获取的收入"洗钱"),必须加强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与跨国界合作。私有经济部门也要参与危机管理和债务问题的解决,尽力阻止不负责任的分配行为(道德冒险)。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相关建议应该加以试验和实施。最后,建立全球"保险代理机构"的建议也要付诸实行,这一机构将为每个国家担保一定的贷款额度,识别各种轻率或投机性的外来信贷。

7. 从社会角度看，近年来跨国企业持续不断的兼并运动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如果高收入或公平合理的分配结构不能产生，将会有越来越少的工厂利用越来越少的人来生产商品。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世界卡特尔机构"值得讨论研究。可能的话，可以创建一个扩大到中国、印度、巴西、埃及和南非的七国首脑会议集团，为全球竞争政策制定统一的原则。不管这样一个机构最终能否建立，都应该使扩大了的七国首脑集团继续发展为一个有效的全球领导工具。（全球经济领导，贝格斯滕/亨尼希，1996）

8. 在发展政策的层面上，最终必须废除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这种行为以南方国家为代价，保护优势国家。同样，目前强迫南方国家（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手段）全面开放其国民经济的做法也必须予以修正。

9.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应进行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种能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改革措施的决策机构，并使这些国家学会顺利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公平协商并适当考虑与变革速度和强度有关的文化承受限度的改革设想应取代歧视性的结构调整计划（其效果甚微）。

10.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诱惑必然导致产生稳固地方性质的国内习惯传统的复活，因此，具有巨大宽容度的文化多元性应成为一种新的南北政策模式。

这些建议、理念和改革设想——在此只是概略地介绍——明确表明，在全球政治领域，不仅急需采取行动，实行全球治理，而且政治家们必须坚决果断地采纳已经制定好的纲领和方法。目前正在发生的国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退却（私有化，反调控）使国家不再有责任对将来必须在超国家的领域网络中才能完成的资本流动和技术发展实行调控。为此迫切需要培养新的一代政治家，他们不仅明确自己对国内选民所承担的义务，从未来世界国内

政策的意义上，也知晓人类的生存条件。

政治行为的新法规实行越多——废除社会不公平、实现基本自由和人权，全球化将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因为发展权将公民和社会人权实现的物质前提视为全球共同的使命，因而这种合乎时代的权利值得去争取。发展权包括为实现以公平为理想的发展国际法制定政策和框架条件的义务。发展权不应妨碍公民人权，而要为国际合作设定能使所有人的公民权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行为标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越来越多地根据在实现普遍人权理念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衡量西方。

（赖纳·特茨拉夫）

参考文献：

阿尔特法特·埃尔马，1999：全球化困境中的经济政策，载于：德国和国际政治刊物，第 9 期，第 1074 ~ 1082 页，波恩。

阿帕多拉伊·阿尔琼，1998，死亡的必然：全球化时代的种族暴力，载于：发展与变化，第 20 卷，第 4 册，第 905 ~ 925 页。

贝克·迪安/格拉尔德·爱波斯坦/罗伯特·波林（编者），1998：全球化与进步的经济政策，剑桥。

贝格斯滕·弗雷德 C/兰德尔·亨尼希，1996：全球经济领导和七国集团，国际经济研究所，6 月，华盛顿特区。

宾斯伯尔根·维姆·范，1998：全球化及其实质：当代非洲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分析，载于：发展与变化，第 20 卷，第 4 期，第 873 ~ 903 页。

埃伯莱·瓦尔特，1999：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危机解决了吗？科隆七国首脑会议的结果，INEF 报告，第 40 册，杜伊斯堡。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编),1998:构建全球化,国际会议,6.17/18,柏林,波恩。

费希尔·乔希卡,1999:全球问题论坛,载于:新教新闻服务(编),发展政策,99.10,第35~36页。

菲斯·托马斯,1998:德国与南方关系持续性的指示器,INEF报告,第34册,杜伊斯堡。

霍尔·马丁,1999:资本流通与无支付力规则的实行(马来西亚经验),载于:世界经济与发展资料通信,波恩,特别服务,第6期(《危机中的世界金融》Ⅲ)。

梅斯勒·迪尔克,1999: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发展政策,载于:国际政治与社会,第1期,波恩,第5~18页。

赖尼克·沃尔夫冈 H,1998:全球公共政策,无政府管理? 华盛顿。

梅斯勒·迪尔克,弗朗茨·努舍勒,1996:全球治理,21世纪之交德国政策面临的挑战,SEF政策文件2,波恩。

赖纳·特茨拉夫,1999:发展权——普遍适用的人权? 载于:格特·佐默(编),人权,奥普拉登,第84~112页。

附录

作者与编者

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Ayodele Aderinwale)

1962年出生,1993年以来任尼日利亚奥塔(Ota)非洲领导论坛主任,1985年在拉各斯(Lagos)大学政治学专业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98年以来,在非洲领导论坛担任不同的职务。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出版物主要有:《尼日利亚:出路》,载《非洲观察者》,第6卷,第4期。

克劳斯·埃塞尔(Klaus Esser)

1940年出生,博士,在科隆、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亚琛、利马学习政治学、历史、日耳曼学和哲学,1967年获博士学位。1971年以来,在柏林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工作,1978~1981年任三处(欧洲)主任,1981年以来,任四处(部分工业化国家,拉丁美洲)主任;最近的出版物主要有:《全球化压力下的制度变革》、《关于智利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建设与结合的思考》(柏林;德国发展政策研究

所)、《全球竞争和国家行动空间》、《经济、国家和社会的新要求》(科隆)、《制度竞争》;《工业发展的新的管理模式》(伦敦 1996)。

凯·哈菲兹(Kai Hafez)

1964 年出生,哲学博士,在汉堡大学和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学习政治学、历史学、伊斯兰学和新闻学。1994 年在东德以一篇有关东方学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95 年~1997 年,从事大众基金研究项目"大众传媒中的国际和跨文化表现过程";1998 年以来,以同样的题目获得德国研究协会教授聘任资格资助。1995 年以来,汉堡德国东方研究所科学合作者;1997 年以来,汉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学助理。重要出版物:(编者)《伊斯兰和西方对话的诱惑》(法兰克福 1997)、(编者)《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伊斯兰和西方》、《全球化世界中的不完整形象》(克雷斯基尔,1999)。

罗伯特·卡佩尔(Robert Kappel)

1946 年出生,莱比锡大学非洲学研究所与"企业促销和培训"研究生项目教授、博士,研究重点:非洲宏观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发展理论,经济理论。其中关于欧洲发展政策,非洲经济改革,发展理论和非洲不发达的著作有:(编者)《非洲的经济前景结构、改革和趋势》(汉堡 1999)、《洛美的未来》、《德国在欧洲联盟和 ACP 国家集团之间发展合作的改革选择》(波恩 1998)、(编者)《世界经济和贫困》(汉堡 1997)、《南撒哈拉非洲:全球化的失败者?》(迪特尔·本德尔/汉斯—林贝特·黑默尔)、(编者)《全球化时代中的发展中国家》(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第 155~194 页)、《非洲的持续不发达》、《国际政治和社会》(1999 年第 1 期,第 38~55 页)。

俞可平(Yu Keping)

1959 年出生,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

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主要著作包括:《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治理与善治》、《当代西方国家学说评析》等,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用中英文发表“文化与现代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政治哲学引论”等学术论文160多篇。

德特勒夫·诺尔特(Detlef Nolte)

1952年出生,政治学家,曼海姆大学哲学博士,1989年以来任汉堡拉美学研究所副所长,定期在拉丁美洲作研究访问,具有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经验。出版物(选摘):(编者)《变革中的拉丁美洲? 80~90年代之交的经济政治变化》(汉堡1991)、(编者)《拉丁美洲历史的告别》(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96)、(编者,与海伦·阿伦斯合编)《拉丁美洲法律改革与民主发展》(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99)、(与亨利希—W·克鲁姆维德合编)《拉丁美洲总统制民主中议会的作用》(波恩,1999/2000)、(编者,与扎比内·库尔滕巴赫和克劳斯·博德梅合编)《拉丁美洲的安全政策——从冲突到合作》(受奥普拉登委托,2000)、(编者,与彼德·因布施和迪尔克·梅斯纳合编)《当代智利》(受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委托)。

盖尔·奥姆韦德(Gail Omvedt)

1941年出生于明尼苏达的明尼亚波利斯,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82年以来,生活在印度并成为印度公民参与社会运动,主要参与妇女项目和农民组织。重要出版物有:《我们将捣毁监狱:斗争中的印度妇女》(1979)、《再酝酿中的革命:印度的新社会运动》(纽约1993)、《首陀罗和民主革命》(德里1994)。

贡特·舒伯特(Gunter Schubert)

1963年出生,在汉堡学习政治学和汉学,在海德堡新教研究协会的跨学科研究所任以东亚为重点的国际政治科学负责人。定

期在东亚作研究访问。最新的出版物有:(与赖纳·特茨拉夫合编)《第三世界停滞不前的民主》(奥普拉登,1998)、(编)《东亚的人权,思想的普遍性之争》(图宾根,1999)、(编)《迈向21世纪的中国——问题概况》(汉堡亚洲学研究所,2000年出版)。

赖纳·特茨拉夫(Rainer Tetzlaff)

1940年生于巴特萨尔茨布鲁恩(Bad Salzbrunn),在波恩和西柏林学习政治学、历史和日耳曼学,获博士学位,1977年以来,在汉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任教授。他是汉堡和平研究和安全政策研究所与海德堡新教研究协会研究员以及汉堡非洲学研究所的董事。特茨拉夫发表了许多有关非洲政治和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与"第三世界"民主化前景的论著。

曼弗雷德·韦尔克(Manfred Woehlcke)

1942年出生,社会学和拉丁美洲学家,1969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79年获教授聘任资格。埃本豪森(Ebenhausen)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专业重点有: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学,国际发展与环境问题,"挑战"(也包括人口问题)。近期著作有:《拉丁美洲的崩溃:进步的代价》(慕尼黑,1989)、《国际发展政策中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巴登巴登,1990)、《环境难民:起因与结果》(慕尼黑,1992)、《生态南北冲突》(慕尼黑,1993)、《生态安全:环境政策的新议题》(巴登巴登,1997)。

中外文名词对译表

Abendland	西方
Abfluß der Intelligenz	人才流失
Abhaengigkeit	依赖
Abraham F. Lowenthal	亚伯拉罕·F·洛温塔尔
Abschwung	衰退
Abu Zayd	阿布·扎德
Adam Przeworski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Adebayo Adedeji	阿德巴约·阿德德基
Adigun Ade Abiodun	阿迪贡·阿德·阿维诺敦
Adrian Karatnycky	阿德里安·卡拉特林基
Aegypten	埃及
Africa Women's Forum	非洲妇女论坛
Albert Fishlow	阿尔伯特·菲什罗
Aldo Ferrer	阿尔多·费雷尔
Alexander Aleinikoff	亚历山大·阿雷尼科夫

Alexander Gruhler	亚历山大·格鲁勒
Alexander Schubert	亚历山大·舒伯特
Alexander Yeats	亚历山大·耶茨
ALF(Afrika Leadership Forum)	非洲领导人论坛
Ali Schariati	阿里·沙里阿提
All-Africans Union	全非学生联合会
Amartya Sen	阿马尔蒂亚·森
Ambedkar	阿姆倍伽尔
Amien Rais	阿明·赖斯
Andre Oppenheimer	安德烈·奥本海默
Andreas Busch	安德利亚斯·布什
Andreas Schedler	安德烈亚斯·舍德勒尔,
Andreas Novy	安德烈亚斯·诺维
Andrew Gamble	安德鲁·甘布尔
Andrew Lowe	安德鲁·洛
Andrew Morrison	安德鲁·莫里森
Angola	安哥拉
Annabelle Sreberny – Mohammadi	安娜贝勒·斯雷贝尔尼—穆罕默迪
Anne Ehrlich	安妮·埃利希
Anpassungsintermezzo	调整插曲
Antagonistische Symboise	对抗性共生
Anthony Giddens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McGrew	安东尼·麦格鲁,
Anthony Payne	安东尼·佩恩
Anti-Amerikanismus	反美主义
Antiglobalismus	反全球主义
Antonie Nord	安东尼·诺德

Anwar Ibrahim	安瓦尔·易卜拉欣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padurai	阿帕多拉伊
Arbeitslose	失业者
Arbeitslosigkeit	失业
Arbeitsproduktivitaet	劳动生产率
Armut	贫困
Arthur Dunkel	阿瑟·邓克尔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hok Chowgule	阿肖克·乔古勒
Ashok Mitra	阿肖克·米特拉
Asi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亚洲重建和发展银行
Asian Monetary Union	亚洲货币基金
Asiatische Werte	亚洲价值观
Asienkrise	亚洲危机
Astrid Zipfel	阿斯特里德·齐普费尔
Aufholhoffnung	赶超希望
Aufschwung	繁荣
Aurangabad	奥兰加拉德
Auslaenderfeindlichkeit	排外
Auslandsberichterstattung	外国报道
Außenhandelsorganisation	对外贸易组织
Außenhandelsstruktur	对外贸易结构
Ayatollah Khomenei	阿雅托拉·霍梅尼
Ayodele Aderinwale	阿约德勒·阿德因瓦勒
Azita Amjadi	阿齐塔·阿姆贾德
Bad Salzbrunn	巴特萨尔茨布鲁恩

Baharatiya Janata Party	印度人民党
Barbara Stallings	巴巴拉·斯大林斯
Bath	铢(泰国货币)
BBC	英国广播公司
Béatrice Hibou	贝亚特丽斯·伊邦
Belkacem Mostefaoui	贝尔卡塞姆·穆斯塔法维
Belo Horizonte	贝洛奥里藏特(巴西)
Benin	贝宁
Benno Ndulu	本诺·恩杜卢
Bergsten	贝格斯滕
Bernard Berelson	贝尔纳德·贝雷尔森
Bertrand De La Grange	贝特兰德·德·拉·格兰赫
Bevoelkerungsmomentum	人口惯性
Bevoelkerungspyramide	人口金字塔
Bevoelkerungswachstum	人口增长
Bevoelkerungueberschuss	人口过剩
Bildung	教育
Binsbergen	宾斯伯尔根
Biodiversitaet	生物的多样性
Botswana	博茨瓦纳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
Brasilien	巴西
Bretton – Woods – Institution	布雷顿森林体系
Bruce Russett	布鲁斯·拉希特
Bruno Tressini	布鲁诺·特雷西尼
Bruttoinlandsprodukts(BIP)	国内生产总值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Buergertum	市民

Demuetigung	侮辱
Burundi	布隆迪
Carlos Menem	卡洛斯·梅内姆
Cartagena	卡特赫纳(委内瑞拉)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Casino	卡西诺赌场
Casino-Kapitalismus	卡西诺赌场式的资本主义
Castaneda	卡斯塔涅塔
Cesar Gaviria	塞萨尔·加维里亚
Chang Han-pi	张汉皮
Chaudhuri	乔杜里
Chavalit	差瓦立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
Chile	智利
Chris Barker	克里斯·巴克尔
Christian Glatzl	克里斯蒂安·格拉策尔
Christof Parnreiter	克里斯托夫·帕恩赖特尔
Clash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冲突
Claus Koch	克劳斯·科赫
CNN	美国有线新闻网
Coca-Cola	可口可乐
Colin Sparks	科林·斯帕克斯
Computerisierung	计算机化
Cordoba	科尔多瓦(阿根廷)
Côte d'Ivoire	科特迪瓦
Cresskill	克雷斯基尔
Cuyo	库约(阿根廷)
D'Orville	多维尔

Dani Rodrik	达尼·罗德里克
Daniel C. Bach	丹尼尔·C.巴赫
Daniel Lederman	丹尼尔·雷德曼,
Daniel R.Garcia Delgado	丹尼尔·R. 加西亚·德尔加多
Daniel Zovatto	达尼埃尔·佐瓦多
Das	达斯
David Goldblatt	大卫·戈尔布拉特
David Held	大卫·赫尔德
David King	大卫·金
David Livingstone	大卫·利文斯通
David Morley	大卫·莫利
Davos	达沃斯(瑞士)
Deborah Brautigam	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
Deborah Waller Meyers	德博拉·沃勒·迈尔斯
Dekodierung	解译
Demographie	人口统计学
Demographischer Uebergang	人口过渡
Demokratie	民主政治,民主制度
Demokratisierung	民主化
Denationalisierung	非国有化
Dependenztheorie	依附理论
Detlef Nolte	德特勒夫·诺尔特
Deutsche Welle Programm	德国之声节目
Dialektik	辩证法
Die Neue Ostindische Gesellschaft	新东印度公司
Dieter Bender	迪特尔·本德尔
Dieter Senghaas	迪特尔·森格哈斯

Diktatur	专制,独裁
Direktinvestition	直接投资
Dirk Hansohm	迪尔克·汉瑟姆
Dirk Messner	迪尔克·梅斯纳
Diversifikation	多样化
Djakarta	雅加达
Domestizierung	驯化
Dominguez	多明格斯
Dorothy Hobson	多萝西·霍布森
Draguhn	德拉贡
Dritte Welt	第三世界
Drogenhandel	毒品交易
Dunkel – Entwurf	邓克尔计划
Dutch Disease	荷兰病
Dwayne Winseck	德韦恩·温塞克
Ebenhausen	埃本豪森
Eberlei	埃伯莱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经济和政治周刊》
Effektivitaet	效率
Einkommensverteilung	收入分配
Elihu Katz	伊莱休·卡茨
Elmar Altvater	埃尔马·阿尔特法特
Emannuel Adler	伊曼纽尔·阿德勒
Emanuel Richter	伊曼纽尔·里希特
Ende der Geschichte	历史的终结
Entwicklungshilfe	发展援助
Entwicklungskrise	发展危机
Entwicklungsland	发展中国家

Entwicklungsperspektiv	发展前景
Entwicklungsprogramms der Vereinten Nationen(UNDP)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Entwicklungsstaat	发展中国家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发展合作
Erika Dettmer	埃丽卡·德特默
Ernaehrungssicherung	粮食保障
Ersatzniveau	补偿水平
Ethnische Identitaet	民族认同
Exit-Option	退出选择
Ex-Jugoslawien	前南斯拉夫
Export	出口
Exportlandwirtschaft	出口农业
Exportorientierung	出口导向
Exportstruktur	出口结构
Externe Schocks	外部冲击
Faktorproduktivitaet	要素生产率
Familienplanung	计划生育
Feindseligkeit	敌意
Felippe Aguero	菲利浦·阿圭多
Felix Moses Edoho	费里克斯·摩西·埃多霍
Ferdinard Braudel	费迪南德·布兰德尔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
Fernaudes	费尔南德斯
Fernkurs	函授课程
Fertilitaetsrate	人口出生率,生育率
FES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
Feudalismus	封建主义

Fidel Ramos	费德尔·拉莫斯
Finanzdienstleistung	金融服务
Finanzmarkt	金融市场
Fiskal – und Geldpolitik	财政和货币政策
Fouad Ajami	福阿德·阿贾米
Fragmentierung	分离化，分散化
Fraktion	议会党团
Frances Stewart	弗朗西斯·斯图尔特
Francois Misser	弗朗索瓦·米塞尔
Frank Ugboajah	弗兰克·乌格博阿贾
Franz Nuscheler	弗朗兹·努舍勒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FTAA)	美洲自由贸易区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Freiheitsindex	自由指数
Friedhelm Hengsbach	弗里德赫尔姆·亨斯巴赫
Friedhelm Streiffeler	弗里德赫尔姆·施特赖费尔勒
Friedrich Korkisch	弗里德里希·科基施
Frontline	《前线》
Fukuyamas	福山
Fundamentalismus	原教旨主义
G.R.Mashelkar	G.R.马歇尔卡尔
Gabriele Dietrich	加布里埃莱·迪特里希
Gabun	加蓬
Gail Omvedt	盖尔·奥姆韦德
Gary Gereffi	加里·热勒费
GEAR(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

Geburtenfoerderne Politik	促进生育政策
Geburtenhemmende Politik	节制生育政策
Geburtenrate	出生率
Geldwaescherei	洗钱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
George Soros	乔治·索罗斯
Gerard – Francois Dumont	热拉尔—弗朗索瓦丝·迪蒙
Gernot Rotter	格尔诺特·罗特
Geschlechterverhaeltnis	性别比
Gesundheit	健康
Gewaltenteilung	分权制度
Ghana	加纳
Gibraltar	直布罗陀
Gipfel	峰会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国际竞争力报告
Global player	全球行为体
Global village	全球村
Globalbuerger	全球公民
globales Dorf	全球村
Globalisierung mit Entwicklung	发展的全球化
Globalisierung	全球化
Globalisierungsdruck	全球化压力
Globalisierungsfallen	全球化陷阱
Globalisierungsprozess	全球化过程
Globalisierungssog	全球化潮流
Globalismus	全球主义
Globalitaet	全球性
Glokalisierung	全球地方化

Goliath	哥利亚
Gregor Walter	格雷戈尔·瓦尔特
Grundbeduerfnisse	基本需求
Guenter Bentele	京特·本特勒
Guenther Baecher	京特·贝希勒尔
Guillermo E. Perry	杰列尔莫·E.佩里
Guillermo O'Donnell	杰列尔莫·奥唐奈
Guinea	几内亚
Gulati	古拉提
Gunter Schubert	贡特·舒伯特
Gute Regierungsfuehrung	优良治理
Hal Kane	哈尔·凯恩
Hamid Mowlana	哈米德·莫拉纳
Handelsbeziehung	贸易关系
Handy	手机
Hans – Peter Mueller	汉斯—彼德·米勒
Hans – Rimbert Hemmer	汉斯—林贝特·黑默尔
Hans – Ulrich Wehler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Harald Barrios	哈拉尔德·巴里奥斯
Harald Mueller	哈拉尔德·米勒
Harry Bliss	哈里·布利斯
Hartmut Elsenhans	哈特穆特·埃尔森汉斯
Hartmut Schumann	哈特穆特·舒曼
Hauptstroemung	主流
hegemonialer Regionalism	霸权区域主义
Hegemonie	霸权，统治地位
Heike Bartholy	海克·巴尔托利
Hein Marais	海因·马雷

Heinrich – W. Krumwiede,	海因里希—W.克鲁姆维德
Helen Ahrens	海伦·阿伦斯
Henrico Cardoso	昂里科·卡多佐
Herausforderung	挑战
Herta Herzog – Massing	赫塔·赫尔佐克—马辛
Hindu Rashtra	欣杜·拉什德拉
Hochindustriestaat	高度工业化国家
Hollywood	好莱坞
Horst Afheldt	霍斯特·阿夫黑尔德
Horst Reimann	霍斯特·赖曼
Hubert Schmitz	休伯特·施米茨
Hugo Chavez	乌戈·查韦斯
Humankapital	人力资本
Hyper – Globalisierung	超全球化
Identitaet	认同
Ien Ang	伊恩·昂
Ikubolajeh Logan	伊库博拉耶·洛甘
Illegalitaet	非法性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perialismus	帝国主义
Import	进口
Importsubstitutionsindustrialisierung	进口替代工业化
Ina Zukrigl	伊娜·楚克里格尔
Industrialisierung	工业化
Industrieland	工业国家
Inflexibilit ät	不灵活性
Informationsübermittlung	信息传递

Infrastruktur	基础设施
Instabilitaet	不稳定
Institutionalisierung	制度化
Integration	一体化
Interamerikanische Entwicklungsbank(IDB)	美洲发展银行
Interdependenz	相互依赖
Internationale Waehrung Foundation(IW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et	网络
Internet – café	网吧
Investitionsquote	投资额
Investmentfonds	投资基金
IPRs	知识产权
Iran	伊朗
Irmela Schneider	伊尔梅拉·施奈德
Irredentismus	复国主义
Islam	伊斯兰
Isolationismus	孤立主义
Itzhak Roeh	伊扎克·勒
Jacques Attali	雅克·阿塔莉
James Curran	詹姆斯·柯伦
James Jones	詹姆斯·琼斯
Jawaharlal Nehru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ean – Claude Chesnais	让—克洛德·谢奈
Jean – Francois Bayart	让—弗朗索瓦·巴亚尔
Jean – Pascal Daloz	让—帕斯卡尔·达洛
Jeffrey Sachs	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tark	杰弗里·斯塔克
Jim Mckenna	吉姆·麦克纳
Joachim Betz	约阿希姆·贝茨
Joana Breidenbach	约安娜·布赖登巴赫
Joerg Callies	约尔格·卡利斯
Johan Galtung	约翰·加尔通
John E. Rielly	约翰 E.里利
John Lewis Gaddis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Mackinnon	约翰·麦金农
John R. Oneal	约翰·R.奥尼尔
Jonathan Perraton	乔纳森·佩拉汤
Jordanien	约旦
Joseph S. Nye	约瑟夫·S.奈
Joseph. E. Stiglitz	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
Journalismus	新闻业
Jusuf Wanandi	优素福·瓦南迪
Kaarle Nordenstreng	卡勒·努登斯腾
Kai Hafez	凯·哈菲兹
Kamerun	喀麦隆
Kapitalflucht	资本外逃
Karin Fischer	卡琳·菲舍尔
Kasegaon	卡西
Kaukasus-Republik	高加索共和国
Kevin Robins	凯文·罗宾斯
Khalid Nadvi	哈立德·纳德维
Khor	霍尔
Kidane Mengisteab	基达内·门吉斯蒂伯
Kim Dae Jung	金大中

Kinderehe	童婚
Kindersterblichkeit	儿童死亡率
Klaus Bodemer	克劳斯·博德梅
Klaus Esser	克劳斯·埃塞尔
Klaus Gottwald	克劳斯·戈特瓦尔德
Klaus Kamps	克劳斯·坎普斯
Klein – und Mittelunternehmen	中小企业
Knut Hickerthier	克努特·希克蒂尔
Kodierung	编码
Kolonialismus	殖民主义
Kolumbien	哥伦比亚
Kommunikation	通讯,交流
Kommunikationsimperialismus	通讯帝国主义
Kommunikationskosten	通讯费用
Kommunikationsrevolution	通讯革命
Kommunikationstechnologie	通讯技术
Kommunikationswesen	通讯业
Konditionalisierung	条件化
Kongo	刚果
Konkurrenzfaehigkeit	竞争力
Konvergenz	一致,趋同
Korruption	腐败
Kreativitaet	创造性
Kreditmarkt	信贷市场
Krieg	战争
Kriminalitaet	刑事犯罪
Kulturelle Identitaet	文化认同
Kulturentwicklung	文化发展

Kulturimperialismus	文化帝国主义
Kulturkreis	文化圈
Kulturwissenschaft	文化学
Kutner	库特纳
Laisser-faire	自由放任
Landwirtschaftliche Ressourcen	农业资源
Lateinamerika	拉丁美洲
Lateinamerikanisierung	拉丁美洲化
Latimobarometro	拉美晴雨表
Lawrence Harrison	劳伦斯·哈里森
Lebenserwartung	预期寿命
Lebensform	生活方式
Lebensqualitaet	生活质量
Legitimitaet	合法性
Lehrkraft	教师
Lester Brown	莱斯特·布朗
Liberalisierungsprozess	自由化过程
Liberia	利比里亚
Linda Lim	琳达·林
Linke Partei	左派政党
Lino Oviedo	利诺·奥维多
Lishan Adam	利山·阿达姆
Lizenz raj	许可管制
Lome	洛美
Lomé – Konvention	洛美协定
Lora Lumpe	劳拉·隆佩
Louis Emerij	路易·埃梅里
Lucy Conger	露茜·康格尔

Luise Ruerup	露易斯·吕鲁普
Lynn Mytelka	林恩·米特尔卡
M. Nureldin Hussian	M.努尔丁·侯赛因
MacDonaldisierung	麦当劳化
Machismo	男子气概
Machtvakuum	权力真空
Madeleine Albright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Maharastha	马哈拉施特拉
Mahathir	马哈蒂尔
Mahmood Mamdani	马哈茂德·曼达尼
Mahnkopf Birgit	曼科普夫·比吉特
Mahyco	马希科
Mali	马里
Manchandra	曼查德拉
Manfred Woehlcke	曼弗雷德·韦尔克
Manuel Vazquez Montalban	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Marathi	马拉提
Marc F. Plattner	马克·F·普拉特纳,
Marc Falcoff	马克·法尔科夫
Margaret H. Taylor	玛格丽特·H·泰勒
Marginalisierung	边缘化
Margot Schueller	马戈·许勒尔
Marianne Beisheim	玛丽安娜·拜斯海姆
Marion Graefin Doenhoff	马丽昂·格雷芬·登霍夫
Mark R. Levy	马克·R·列维
Marktfundamentalismus	市场原教旨主义
Marktoekonomie	市场经济
Markus Kriener	马库斯·克里内尔

Marokko	摩洛哥
Marta Lagos	玛尔塔·拉各斯
Martin Khor	马丁·科尔
Martin Neuffer	马丁·诺伊弗
Massenkaufkraft	大众购买力
Massenmedien	大众传播媒介
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
Mats Lundahl	马茨·伦达尔
Mauritius	毛里求斯
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
Mayra Buvinic	迈拉·布维尼克
Mechthild Minkner	梅希蒂尔德·明克内尔
Medha Patkor	迈扎·帕特卡
Medien	传播媒介
Megawati Sukarnoputri	麦加瓦蒂·苏加诺普特里
Mendoza	门多萨(阿根廷)
Menschheit	人类
Mercado Comun del Sur(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Mexiko	墨西哥
Michae Barnett	迈克尔·巴尼特
Michael Porter	迈克尔·波特
Michael Shifter	迈克尔·希夫特
Michael Stuermer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Michael Zuern	迈克尔·齐恩
Micheal Gurevitch	米歇尔·古列维奇
Micheal Kreile	米歇尔·克赖勒
Micheal Kunzick	米歇尔·昆茨克
Michel Camdessus	米歇尔·康德苏

Migrationsstroeme	移民潮
Minas Gerais	米纳热雷斯(巴西)
Mir A. Ferdowsi	米尔·A·费尔杜西
Miriam Meckel	米丽亚姆·梅克尔
Mittelklasse	中产阶级
Mittelschicht	中间阶层
MNU	多国公司
Modernisierung	现代化
Mohammad Khatami	穆罕穆德·哈塔米
Monica Hirst	莫妮卡·海斯特
Monsanto	蒙桑托
Moschee	清真寺
Murli Manohar Joshi	穆利·马诺哈尔·乔希
Mutterschaft	母性
Myron Weiner	迈伦·魏纳
Nachfrage	需求
Namibia	纳米比亚
Nanjundaswamy	南琼达斯沃米
Narenda Jadhav	纳伦达·贾达夫
Narsimha Rao	纳西蒙哈·拉奥
Nasr Hamid	纳斯尔·哈米德
Nationale Einheit	国家统一
Nationalismus	民族主义
Nationalstaat	民族国家
Neokolonialismus	新殖民主义
Neoliberalismus	新自由主义
Netzwerk	网络
Nicholas Eberstadt	尼古拉斯·艾伯施塔特

Nicht – Regierungsorganisation(NRO) 非政府组织
Nichttarifaere Handelshemmnisse 非关税贸易壁垒
Nicolass van de Walle 尼古拉斯·范·德·瓦勒
Nigeria 尼日利亚
Niklas Luhmann 尼克拉斯·卢曼
Nirmala Banerjee 尼马拉·班纳吉
Nitya Rao 尼蒂亚·拉奥
Nordafrika 北非
Nord – Sued Gefaelle 南北差距
Nord – Sued – Konflikt 南北冲突
Nord – Sued – Verhaeltnis 南北关系
Norman Loayza 诺尔曼·洛艾萨
Nueva Sociedad 努埃韦·索西达特
Nullsummenspiel 零总游戏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SEF(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发展与和平基金会
Oeffentliche Dienstleistung 公共服务
Oelfoerderland 产油国
OIT 美国国际贸易局
Oliver Boyd – Barrett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Olivier Valée 奥里维耶·瓦莱
Olusegun Obasanjo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Opladen 奥普拉登
Organisation Amerikanischer Staaten(OAS) 美洲国家组织
Orissa 奥里萨

Oskar Weggel 奥斯卡·韦格尔
Ost – West – Konflikt 东西冲突
Ota 奥塔
Outlook 《瞭望》
Pablo Fajnzylber 巴勃罗·法因兹博尔
Panamerikanische Gesundheitsorganisation 泛美健康组织
Panorama Social 社会概况
Paragim 范式
Parana 帕拉南(巴西)
Partizipationschance 参与机会
Partnerschaft fuer den Wohlstand 富裕伙伴关系
Patrick Chabal 帕特里克·沙巴尔
Paul Ehrlich 保罗·埃利希
Paul Willis 保罗·维利斯
Peggy Levitt 佩吉·莱维特
Pepe Carvalho 佩佩·卡瓦略
Peripheriestaat 边缘国家
Peronisten 庇隆主义者或正义党人
Peru 秘鲁
Pessimismus 悲观主义
Peter Dahlgren 彼得·达尔格伦
Peter Glotz 彼得·格洛茨
Peter H. Gleik 彼得·H·格莱克
Peter H. Smith 彼得·H·史密斯
Peter Inbusch 彼德·因布施
Peter J. Opitz 彼得·J·奥皮茨
Peter Mandaville 彼得·曼达维尔

Peter Nunnenkamp	彼得·努嫩坎普
Peugeot	标致
Philipe C. Schmitter	菲力普·C· 施密特尔
Pierre Bourdieu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nochet	皮诺切特
Pippa Norris	皮帕·诺里斯
Pluralismus	多元主义
Polarisierung	两极分化
Politikwissenschaft	政治学
Politische Fluechtlinge	政治难民
Postkolonialismus	后殖民主义
Post-Washington Konsens	后华盛顿共识
Pragmatismus	实用主义
Privatbank	私有银行
Privatisierung	私有化
Produktivitaet	生产率
Produktpalette	产品的花色品种
Pro-Kopf-Einkommen(PKE)	人均收入
Pune	浦那
Punk-Musik	朋克音乐
Rainer Tetzlaff	赖纳·特茨拉夫
Rajni Kothari	拉杰尼·科塔里
Ralf Dahrendorf	拉尔夫·达伦多夫
Ram Rajya	拉姆·拉吉雅
Rassenbeziehung	种族关系
Rationalismus	理性主义
Ratna Sudarshan	拉特纳·苏达斯汉
Raymond Duncan Gastil	雷蒙德·邓肯·加斯蒂尔

Raymond Kendall	雷蒙德·肯德尔
Rechtsstaat	法制国家
Regionalisierung	区域化
Regionalisierungsprozess	区域化过程
Reinhold Bendix	莱因霍尔德·本迪克斯
Religion	宗教
Reziprozitaet	互惠
Ricardo Petrella	里卡尔多·彼得雷拉
Richard M. Auty	理查德·M·奥蒂
Rico Maite	里科·马伊特
Rie Grande do Sul	南里奥格兰德(巴西)
Ringgit	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巴西)
Robert A. Dahl	罗伯特·A·戴尔
Robert Haveman	罗伯特·哈夫曼
Robert Kaplan	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Kappel	罗伯特·卡普尔
Robert O. Keohane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S. Kates	罗伯特·S·凯茨
Robert Stevenson	罗伯特·史蒂文森
Robeto Mangaberia	罗贝托·曼加韦拉
Roger Penrose	罗杰·彭罗斯
Rohstoffproduktion	原料生产
Roland Robertson	罗兰·罗伯逊
Rolf J. Langhammer	罗尔夫·J·朗哈默尔
Roman Herzog	罗曼·赫尔左格
Ronald Inglehart	罗纳德·英格勒哈特
Rosario Santa Gadea	罗萨里奥·圣加雅

Rosemary Thorp	罗斯玛丽·索普
Rotterdam	鹿特丹(荷兰)
Ruanda	卢旺达
Ruediger Lohlker	吕迪格·洛尔克尔
Ruediger Machetzki	吕迪格·马切斯基
Rupiah	卢比(印度尼西亚货币)
Ruth Klingebiel	露特·克林格比尔
S.K.Thorat	S.K.托拉特
Sabine Kurtenbach	扎比内·库尔滕巴赫
Sadik J.Al – Azm	萨迪克·J·阿尔—阿泽姆
Saekularismus	世俗主义
Sahara	撒哈拉
Sam C.Sarkesian	萨姆·C·萨尔克希安
Samir Amin	沙米尔·阿明
Samuel M.Wangwe	塞缪尔·M·王韦
Sangh-Familie	同盟家族
Sanjaya Lall	桑贾亚·拉尔
Santa Catalina	圣卡特琳娜(巴西)
Santa Fe	圣菲(阿根廷)
Santiago	圣地亚哥(智利)
Sao Paulo	圣保罗(巴西)
Saskia Sassen	萨斯基亚·扎森
Satan	撒旦
Satellitenempfangstechnik	卫星接收技术
Satellitenprogramm	卫星节目
Schah Reza Pahlewi	沙哈·礼萨·巴列维
Schattenwirtschaft	影子经济
Schicht	阶层

Schoenwetterdemokratie 阳光民主
Schucher 舒赫尔
Schuldendienstfaehigkeit 债务还本付息
Schuldenkrise 债务危机
Sebastian Edwards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Seifenopern 肥皂剧
Selbstentfremdung 自我异化
Senegal 塞内加尔
Shahid Javed Burki 沙希德·贾维德·比尔基
Shalini Rauderia 沙利尼·兰德里亚
Sharad Joshi 沙拉德·乔希
Sharma 沙尔马
Sheila Page 希拉·佩格
Shir Mohammed Rawan 希·穆罕默德·拉旺
Shridath Ramphal 什里达特·兰法尔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Simon Appleton 西蒙·阿普尔顿
Sina Odugbemi 西纳·奥杜戈贝米
Singapore 新加坡
Sistema Economico Latinoamericano(SELA) 拉美经济体系
Sklavenhandel 奴隶贸易
Sonia Picado 索尼亚·皮卡多
Sowjetunion 苏联
Sozialdarwinismus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zialgeschichtsforschung 社会历史研究
Sozialkapital 社会资本
Sozialwissenschaft 社会科学

Spekulations – Kapitalismus	投机资本主义
Spezialisierungsmuster	专业化模式
Spontaneitaet	自发性
Staatsbuergerschaft	国籍
Staatversagen	国家拒绝
Stagnation	萧条
Standortkonkurrenz	产地竞争
Stefan A Schirm	斯特凡·A·席尔姆
Stephen Ellis	斯特凡·埃利斯
Sterblichkeit	死亡率
Strukturanpassungsprogramm(SAP)	结构调整计划
Stuart Hall	斯图尔特·哈尔
Sub – Kultur	亚文化
Suedafrika	南非
Sudan	苏丹
Sui generis	特殊的
Swadeshi	国货运动
T.W.Oshikoya	T.W.奥欣科亚
Taffere Tesfachew	塔费勒·斯特法丘
Tamar Liebes	塔马·利布斯
Tamilnadu	泰米尔纳德
Technokrat	技术统治论者,专家治国论者
Telekommunikation	电讯
Telemedicine Pilot Project	远程医学试验项目
Tequilaeffekt	特基拉效应
Terms-of-Trade	贸易期限
Thandika Mkandawire	坦迪卡·姆坎达怀尔

Theo Sommer 特奥·佐默
Think – tanks 智囊团,思想库
Thomas F. Homer-Dixon 托马斯·F. 霍默—狄克逊
Thomas Packenham 托马斯·帕肯哈姆
Thomas Siebold 托马斯·西博尔德
Thomas·Kampffmeyer 托马斯·坎普夫迈尔
Tiger im Kaefig 笼中之虎
Tokyo Club 东京俱乐部
Tony Killick 托尼·基利克
Transaktionskost 交易费用
Transnationale Konzerne(TNK) 跨国康采恩
Transport 运输
Trojanisches Pferd 特洛伊木马
Udo Steinbach 乌多·斯泰因巴赫
Uganda 乌干达
Ulrich Beck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Menzel 乌尔里希·门泽尔
Ulrich Reinke 乌尔里希·赖因克
UMNO 马来西亚民族统一组织
Umweltfluechtlinge 环境难民
Unabhaengigkeit 独立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terentwicklung 欠发达,不发达
Unternehmensverband 企业联合会
Urbanisierung 城市化,都市化
V.T.Rajshekhar V.T.拉杰谢卡尔
Valparaiso 瓦尔帕莱索(智利)

Vandana Shiva	范达纳·希瓦
Vernetzung	网络化
Veronica Montecinos	韦罗尼卡·蒙特西诺斯
Verschluesselung	编码
Verschuldung	债务
Verschuldungsproblematik	债务问题
Verschwoerungstheorie	阴谋理论
Versklavung	奴役
Verstaedtung	城市化,都市化
Verwestlichung	西方化
Vielfalt	多样性
Vina del Mar	比尼亚德尔马(智利)
Volker Bornschier	福尔克尔·博恩希尔
Volker Matthies	福尔克尔·马蒂斯
Volkswagen	大众
Voreingenommenheit	偏见
Waehrungssouveraenitaet	货币主权
Wan Azizah	旺·阿齐扎
Washingtoner Konsens	华盛顿共识
Wechselkurs	汇率
Weggel	韦格尔
Weltbank	世界银行
Weltbevoelkerung	世界人口
Weltdorf	全球村
Weltgesellschaft	人类社会
Welthandel	世界贸易
Welthandelskonferenz der Vereinten Nationen(UNCTAD)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Weltkultur	世界文化
Weltmarket	世界市场
Weltmarktintegration	世界市场一体化
Weltsystem	世界体系
Weltsystemtheoretiker	世界体系理论家
Weltwirtschaft	世界经济
Weltwirtschaftsordung	世界经济秩序
Werner Link	维尔纳·林克
Werner Pascha	维尔纳·帕沙
Werner Weidenfeld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
Wettbewerbsfaehigkeit	竞争力
Wettbewerbsstaat	竞争国家
Widerwaertigkeit	排斥
William Reno	威廉·雷诺
Winfried Schulz	温弗里德·舒尔茨
Wirtschaftsfluechtlinge	经济难民
Wirtschaftskommiss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fuer Lateinamerika und die Karibik(CEPAL)	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Wirtschaftspolitik	经济政策
Wirtschaftswachstum	经济增长
Wirtschaftswetter	经济形势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经济学
Wirtschaftsystem	经济体制
Wohlfahrtsstaat	福利国家
Wolf Dieter Narr	沃尔夫·迪特尔·纳尔
Wolfgang Franke	沃尔夫冈·弗兰克
Wolfgang Hein	沃尔夫冈·海因

Wolfgang Merkel	沃尔夫冈·梅克尔
Won	韩圆(韩国货币)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世界发展指数
Yaoundé	雅温德
Yash Tandon	亚什·坦登
Yashwant Sinha	亚什万特·辛哈
Yoweri Kaguta Museveni	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
Zapatistenbewegung	萨帕塔运动
Zelluloid – Gewalt	影视暴力
Zentralbank	中央银行
Zentralisierung	集中化，中央集权化
Zimbabwe	津巴布韦
Zivil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

译后记

2000年春，当我结束在德国的研学之旅回到国内不久，即有幸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俞可平教授处领受本书的翻译任务，几乎与此同时，我又获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计划，于同年10月再次赴德访学。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选择了合作翻译。即便如此，因某些原因译稿还是不得不拖搁至今。为此，在整个翻译后期，我心中一直充满歉疚，在本书完稿之际，我首先要特别感谢俞可平教授的信任与宽容。在翻译过程中，俞可平教授提供了《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一文的中文原稿，我在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和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的洪启智老师也给予过一些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译者的话、作者前言、导论、第一部分的《传播媒介—通讯—文化：全球化讨论的歧途与前景》、第二部分、第五部分、附录和中外文名词对译表由吴志成撰写和翻译；韦幼苏翻译了第四部分；陈宗显提供了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中《人口增长和全球化》的翻译初稿，随后韦幼苏和吴志成对初稿进行了较大的改译，韦幼苏还承担了该部分参考文献的翻译工作。最后，吴志成统校全稿。

吴志成

2001年6月于南开园